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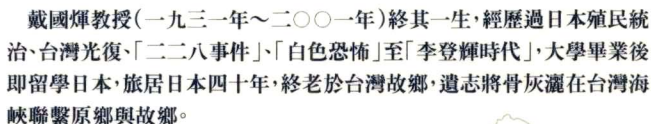
戴國輝文集
附冊

12

林彩美等著

戴國輝這個人

含生平事記與著作目錄



戴國輝教授(一九三一年~二〇〇一年)終其一生,經歷過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光復、「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至「李登輝時代」,大學畢業後即留學日本,旅居日本四十年,終老於台灣故鄉,遺志將骨灰灑在台灣海峽聯繫原鄉與故鄉。

從作為一個「殖民地的孩子」到「出生於台灣的客家系中國人」;由東京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到名滿東瀛的台灣史學者,戴國輝是一個台灣近現代史的研究者,也是一個台灣近現代史的參與者和見證人,他把他的研究和他的生命化為一體,他的生命決定了他的研究,他的研究重塑了他的生命。戴國輝的台灣史研究不同於一般學究,乃至於他的台灣史研究其實就是他生命的追求。所以,他不儘是台灣近現代史的學術研究者,他更是這一段台灣近現代史的代言人。

他曾經引述他二哥的話,說明他台灣史研究和生命的追求:

「我們都是被扭曲的=殖民地的孩子。如今,殖民地傷痕的本身成為我們不得不起步再次出發的原點,做為重新開闢的新道路的基石,我們必須好好地活用這個悲痛的經驗。我們一邊要痊癒殖民地的傷痕,一邊要超越它,必須將殖民地遺制的所有東西加以手段化、相對化,經過克服以變成我們自己能掌握的工具及東西。

對於圍繞著我們的殖民地傷痕糾葛的本質及核心事物:我們只有通過內省和對決,才有可能擴大做為自舊殖民地被統治者身份求生新的內在自由之嶄新境界。」

在旅日四十年間,由於「黑名單」,他長期不得返回自己的故鄉台灣,一個人孤寂的、善心的、認真的、嚴肅的在日本,擺脫了島內權力的是非恩怨,以「隔離的智慧」、敏銳的眼光,以「內在自由之嶄新境界」,觀察著故鄉歷史的發展,記錄著歷史的發展,陪伴他的只有他的愛妻林彩美女士。

戴國輝的視野遼闊,涉獵廣博,從史學、文學、經濟、政治到國際關係,著述內容從日據時期到李登輝,包括「二二八事件」、「台灣新文學」、「霧社事件」、原住民研究、「白色恐怖」。

戴國輝的中日文著述甚豐,在他逝世一周年後,七十冥誕之際,我們把他的中文著述匯編成《戴國輝文集》以紀念這位維護台灣人歷史尊嚴的「殖民地的孩子」和台灣歷史學家。並將這一份真正的有尊嚴的台灣現代史研究的成果奉獻給戴國輝所熱愛的故鄉台灣。

——王曉波

戴
國
輝
文
集

12 戴國輝這個人（附冊）
——含生平事記與著作目錄

戴國輝文集【12】(附冊)

戴國輝這個人——含生平事記與著作目錄

作者——林彩美等

照片提供——林彩美

總策畫——王曉波

主編——林彩美

執行編輯——陳淑美·李佳穎·洪淑暖

封面設計——唐壽南

出版——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發行人——王榮文(遠流)·魏德文(南天)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汀州路三段 184 號 7 樓之 5

電話◎(02)2365-1212 傳真◎(02)2365-7979

郵購劃撥帳號◎ 01894561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83 巷 14 弄 14 號 1 樓

電話◎(02)2362-0190 傳真◎(02)2362-3834

郵購劃撥帳號◎ 01080538

香港發行——遠流(香港)出版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310 號雲華大廈四樓 505 室

電話◎ 2508-9048 傳真◎ 2503-3258

香港售價◎港幣 2000 元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董安丹律師

2002 年 4 月 1 日 初版一刷

全套售價◎新台幣 6000 元 (套書不分售)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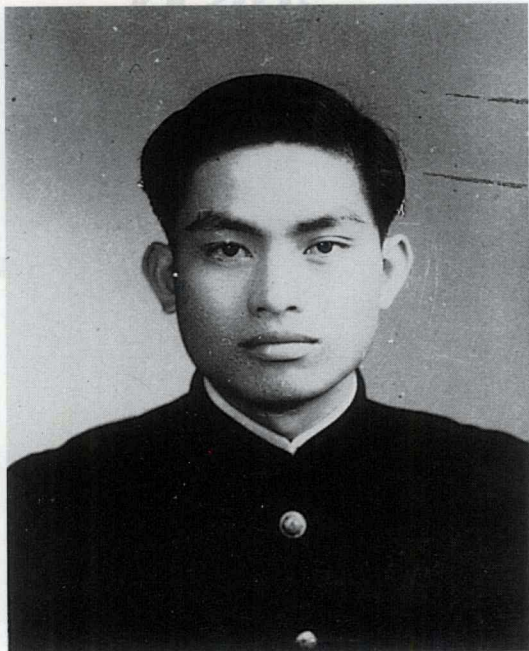
ISBN 957-32-4586-8 (套)

Ylib 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 E-mail:ylib@ylib.com

◎南天書局

<http://www.smcbook.com.tw> E-mail:weitw@smcbook.com.tw



戴國輝於省立台中農學院（現中興大學）
時代留影



戴國輝與林彩美的青春儷影（六〇年代在東大留學時）



1983年在美国愛荷華參加「台灣筆會」作家聚會。右起為陳映真、呂嘉行、葉芸芸、戴國輝（此次為戴國輝與陳映真的初次見面）



1983年在美国愛荷華，戴國輝與美天主教大學社會學教授李哲夫以「台灣的社會發展與省籍問題」進行討論



1988年戴國輝於日本與友人合影。前排右起為楊憲宏、戴國輝、魏廷朝、東大留學生黃玉軒，後排右起為蔣家語、黃玉軒之妻育良、林彩美



1989年戴國輝與吳大維（右）（攝於吳大維家中）



戴國輝（右二坐者）與王曉波（右一坐者）、吳瓊恩（左一坐者）、陳映真（左一立者）、吳克（左四立者）、杜繼平（左五立者）等友人餐聚



戴國輝與葉芸芸（左一）曾合著《愛憎二·二八》。葉芸芸在美辦《台灣與世界》雜誌時，戴國輝曾以「梅村仁」為筆名定期整理二二八史料，發表在雜誌上，這是二二八史料首度批露於世



戴國輝與許信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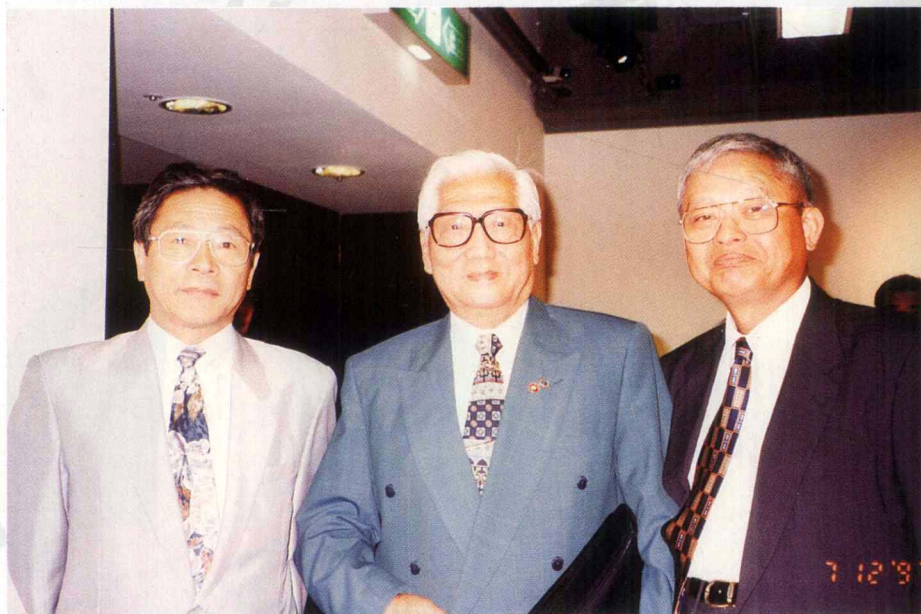
1997年於卑南族大獵祭時攝於孫大川（右一）家宅。右起為孫大川大嫂、日本友人內川千裕、興夏、林彩美、孫媽媽、戴國輝



1997年戴國輝與林彩美著卑南族傳統服飾合影於孫大川家宅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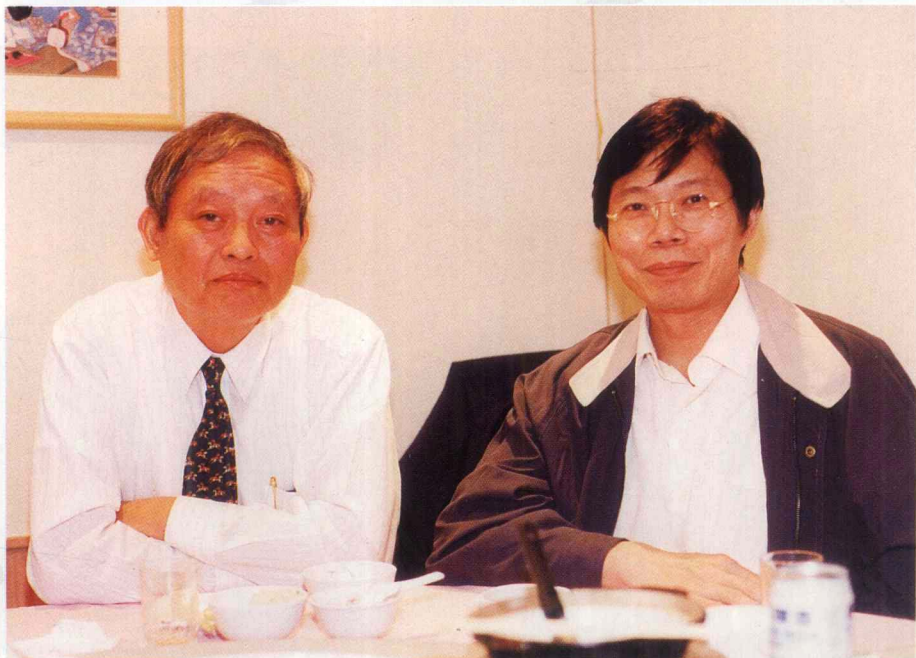
戴國輝與友人相聚。前排右起為內川千裕、原住民盲詩人莫那能，後排右起為醫生曾建民、王曉波、杜繼平（右四）



戴國輝與報人陸鏗（中立者）、橫濱市大矢吹晉教授



1999年戴國輝與夫人林彩美攝於柏楊府上（左一為柏楊夫人張香華、立者為蔡素貞）



戴國輝與聯合報記者王震邦合影

陳水扁總統褒揚令

歷史學家戴國輝，資性聰穎，才識閎通。早歲卒業於台灣省立農學院，旋負笈東瀛，獲日本東京大學農學博士學位，學成後留日四十載，治學轉以史學為重心，尤致力於台灣研究。自霧社事件至二·二八事件，華路藍縷，探究精微，真知灼見，中外蜚聲。歷任國內外各大學史學系教授、主任、所長等職，著作等身，享譽日隆。

民國八十四年膺聘為總統府國家統一委員會研究委員，克盡所學，迭建嘉謨。翌年返國定居，出任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碩學謀國，獻替孔多。公餘研究不輟，凡所述作，深為學界推崇。綜其生平，盡瘁學術，士林共仰，遠見卓識，功在國家。遽聞溘逝，軫悼良深，應予明令褒揚，以示政府崇隆碩彥之至意。

序

你有一副嚴肅的相貌、傲骨凌人的氣魄。你常埋怨我佔了你便宜，因為別人都以為你欺負我。可不是，學生開始不也都怕你嗎？但不須幾次的受課，他（她）們就像小雞依偎著母雞那般地貼近、跟著你後面勤覓食，你還頻頻招呼，不讓小雞落伍或迷失，只望早日成鳳、成龍。

你在研究院的聯合討論會上，鼓勵學生多發言。你說：「在研究的比賽場上任何人是平等的，教授也不一定是權威。」這話在台灣的學生是第一次聽到，而感動得不可言喻。有學生跟我講非常幸運能遇到戴老師。

可是你好惡分明不妥協、不敷衍、堅持立場。所以有人說你傲慢，在台灣你是三邊不討好，被尊敬但不受歡迎的人物。台灣史、日本史開研究會沒有人邀請你，因為你批評台灣史學界的「西瓜派與牙刷派」作風，團隊包工程、搞學術大拜拜、互相和稀泥、共犯結構的研究態度。已經有朋友勸告過你，不要凡事太認真，點到為止，不要點破，給人家留面子。日常處事還可以，學術研究那能妥協？所以朋友同情你是「宿命的寂寞」。你不在乎被冷漠，還樂得寧靜與孤高。

但台灣、日本以及世界各地，學術界、媒體界、民間也還有很多肯定你、尊敬你、欣賞你、推崇你的朋友與學生。令人欣慰更有這麼多朋友與學生為你寫紀念文章，也讓我重新發現我所不知道的你的那麼多優點與事蹟。

讓我們一起感謝朋友們、學生們的真摯的友誼，並祝他（她）們事業順遂，萬事如意！

二〇〇二年二月十七日

林彩美於新店梅苑

目錄

陳水扁總統褒揚令

序／林彩美

親友述往

戴國輝的交友與藏書／林彩美 五

憂心歪曲的歷史像／郭承敏 一三

戴國輝教授對台灣心存大愛／陸鏗 二〇

壯志未酬：緬懷學長戴國輝教授／李哲夫 二三

宿命的寂寞／陳映真 二九

我的好友戴國輝／陳鵬仁 三三

懷念戴國輝兄／陳鵬仁 三五

捍衛台灣人尊嚴的史學家／王曉波 三八

洗滌的靈魂／葉芸芸 五〇

戴國輝與許常惠／孫大川 六〇

松花江上／孫大川 六三

正派的戴國輝／郭冠英 六六

一個對人對弱小者和對民族抱著無限關懷的歷史家／曾建民 六九

不可言宣的遺憾／耿榮水 七五

悼念戴國輝教授並抒感／毛鑄倫 七八

燄火不熄·長照天地／杜繼平 八四

平生風義兼師友／杜繼平 九四

戴國輝走了／陌上桑 一〇二

門生感懷

痛失恩師／丁果 一〇七

台灣史學界永遠的損失／林德政 一一二

追憶恩師／蔡素貞 一一七

懷師／西冷 一二〇

正派治史做人／楊中美 一二二

紅帖白帖／林蘭芳 一二四

失去母語的人／陳淑美 一二七

媒體評論

台灣史學家戴國輝／林長風 一三五

文史家戴國輝病逝／黃曼瑩 一四〇

戴國輝 愛台灣／田炎欣 一四二

台灣史專家，批判日本殖民政策／田炎欣 一四四

戴國輝 硬頸精神超然絕塵／夏珍 一四六

戴國輝 傾聽台灣近百年聲音／王震邦 一四九

不是統派，不是獨派，是正派／曹銘宗 一五一

正派戴國輝／唐湘龍 一五三

台灣人的典型／中國時報 一五五

沁園春／皮葉 一五七

戴國輝和小林善紀：定位台灣主體的兩種思維／聯合報 一五八

戴國輝自述

隱痛的傷痕 一六五

令我臉紅的四十年前的往事 一六八

「中國人」的中原意識與邊疆觀 一七〇

身份與立場 二〇七

兩個尺碼與認識主體的確立 二四六

我是怎樣走向研究「二·二八」之路 二五六

對我影響最深刻的書和著者 二六七

我並不是英雄主義者 二七一

戴國輝最後告白

戴老師的最後一課／吳嘉陵 二七九

戴國輝最後的廣播節目錄音／戴興夏整理 二八一

後記：戴國輝沈默了一年／林彩美 二九三

附錄

戴國輝生平略傳／夏珍

戴國輝事記

戴國輝著作、發表及相關評論文章一覽表

戴國煇這個人

——含生平事記與著作目錄



親友述往

戴國輝的交友與藏書

林彩美

「向戴國輝告別」追思會於二〇〇一年二月十日自上午八時三十分至十一時禮成，在意猶未盡中圓滿結束。儀式始終在肅穆、溫馨、隆重的氛圍中進行，是一個惋惜、不捨勝於悲傷的儀式。有詩有歌與真誠的友誼作陪襯的動人肺腑、超俗、灑脫的儀式。我們家屬由衷感謝治喪委員會、執行委員們與許多朋友爲他準備的這樣別緻的最後舞台，讓他風風光光地出盡他人生最後的風頭。他會頻頻點頭肯定、滿意這場充滿新創意的告別式。

國輝在世上的兩大財產：第一是朋友，第二是藏書。告別儀式讓我們遺族深深感受到他做人的成功。作爲一介書生的戴國輝，居然不只有如此多學界、文化界的友人，還有傳媒界、商界、政界的顯宦達官，不惜寶貴時間光臨致哀。而且不只島內，連日本、美國、中國大陸的中國友人與外國友人不辭遠路迢迢地趕來參加這短短不到三小時的儀式。告別式場內座無虛席，場外更站滿了友人、學生，自始至終流連忘返。遺族只有感謝、感恩！

一月九日他過世的消息傳出，就開始接到數不盡的電文、傳真、書信、電話、奠儀與花料、花籃、

晚聯、祭文等。這千千萬萬個熱忱的友誼，溫暖了我們家屬的心、補償了失去至親的失落感，這無數的友誼，我們要繼承並當作支撐我們度過漫長人生旅途寶貴的財產。

第二大財產的藏書（約六萬冊），是他花費了將近半世紀的心血收集而成的。他從小就愛書如命，學校的圖書看完，課餘常泡公立圖書館，留學日本的二哥也勤寄書給他。讀建中的那段時間，他最愛逛古亭一帶的舊書店，留日後他愛書的性癖有增無減，何況又加上莫名的悲壯使命感。東京有「古書展」（兼賣古書）他幾乎到場必到，涉獵古書的足跡遍及東京與其近郊古都、地方大小城市的古書店。所以他與這些書賈也建立了交情。他們收購到珍貴的、合乎國輝性好的書籍會通知並優先、甚至打折賣給他。有時書店老闆遇到不知如何下定價的書他們會來請教國輝，也請求國輝把重複、不用的書籍放出，他們願以高價收購。國輝性格不馬虎、極執著，爲了寫一篇論文、一本書，他會盡其可能收集有關資料與書籍，那怕只爲了一個措辭、一個概念。遇到目前還不用、但錯失了機會就幾乎不能重逢的有關台灣的舊資料、舊書刊，他會處心積慮確保它。因爲國輝暗地裡有爲心愛的故鄉留史料的使命感，由於這種使命感使然，他的藏書就是在這種情勢下，有增無減且急速增加。

一九九六年他準備妥當，結束了四十二年在日本的生活基礎。把藏書以十八噸的貨櫃運回。在新店山上買了房子，安頓家屬與藏書。總算了了心願，把他的第二性命——藏書，搬回心愛的故鄉，他可以安心了。

同時他要將餘生回饋台灣——這個曾經哺育他的母親。然後落葉歸根，以滋養台灣。如今他「壯志

「未酬，最後竟中途而仆，留下遺憾與惋惜，令人不勝唏噓！」

國輝一九四九年從建中畢業，一人悄悄南下到台中考省立台中農學院農經系，是爲了避開白色恐怖
的陰霾籠罩的台北，他暗中留意如何平安地度過四年的大學生活，然後去日本留學，當時留學都要通過
教育部舉辦的留學考試。此外留美要繳二千四百美元的保證金，留日只要有生活保證人。二千四百美元
在當時的台灣是天大的一筆錢，他二哥在日本，所以他自然就選擇留日，大學四年級時他二哥寄了二百
美元與一台照相機給他作爲畢業禮物。我在一九五三年也考進農經系一年級。他擁有兩百美元，當時可
算是窮學生中的闊佬，他生性慷慨、愛踢足球與打排球（排球是桃園縣省運代表）。常在運動後帶著一群飢
腸轆轆的同學去吃牛肉麵或紅豆冰，大概都由他付錢，所以我起先以爲他是哪裡的闊少爺或花花公子，
對他不免有些提防。我是鄉下長大的女孩，擲、跑、球類都行。當時有股風氣，認爲運動是屬於玩樂的
，並非正經事，用功的學生是不運動的。學校對外的球類比賽，因我住校，所以每當諸如籃球比賽，經
常很不情願地被抓去充數。記得是與豐原的紡織廠的籃球隊比賽時，戴國輝的一夥人愛熱鬧就跟著去當
啦啦隊，在回程的微暗的車上，對面坐的一副黑瘦的臉孔上有一對又大又晶亮的眼睛是我對他的第一印
象。他又愛打網球，農經系的系主任宋勉男先生是網球高手。農經系旁有一座網球場。傍晚，住校生在
校園散步時都會被那有節奏的硬式網球聲吸引過去。我們常爬在鐵絲網上，羨慕地看著。戴國輝也是那
「特級階層」之一。有一次他們大發慈悲，讓我們也進去打幾下，我們真是受寵若驚，因爲硬式網球的
球拍與球都很貴，場地更是少之又少，就是現在硬式網球還是蠻高級的。我們就這樣認識他們。戴國輝

是善於組織的人，郊遊、游泳、到街上打牙祭都是他的主意。我們經常是一夥人踩著腳踏車移動，煞是顯眼。正好有一日本片「青色山脈」在台放映，是一歌頌青春的電影。所以我們這一夥就被揶揄為「青色山脈」。有一次他問我在看什麼書？我答說：《資本論》，他嚇了一跳，問我哪來的？我說去好朋友家玩，在書架看到就借來看，我懵懵懂懂以為學農經讀《資本論》是最恰當不過的了。他要我馬上還給朋友，並告訴我《資本論》是共產主義的「聖經」，光是拿著被發現就罪該殺頭的。每憶起此事，他總說是被《資本論》給騙了，我則回之以紅豆冰釣我太便宜了。

一九五四年他大學畢業，受了一年預備軍官訓練後，於十一月便負笈東瀛，寄二哥籬下。他一邊幫二哥看店，一邊上學，也算是半工半讀，辛勤而節儉。

他到日本後第一次寄回的照片，就明顯發胖了。因解除軍役後少運動，朝夕緊繃的心理壓力沒有了，真謂心廣體胖的彰顯。為了節省交通費並兼運動，他常常從新橋二哥的住處走到本鄉三丁目，然後經過東大赤門（國家指定保存建物）東大大門到達東大農學部。這一路線上有他常去的神田古書街與幾處古書展場。也是他發掘至寶的主礦區。

一九五八年二月我只拿了一張單程機票，身無分文，穿得像個皮球般降落在嚴寒的東京羽田機場，我那副土包子裝扮，肯定讓他在日本朋友面前太不風光。不知為何當天的照片沒有洗出來，他說底片壞了，如今他走了，留下永不能糾明我此生對他唯一的疑問。

一九五八年三月搬離二哥家，在靠近東大農學部的吉祥寺租了一間四疊半榻榻米的日式房間，開始

了最簡單的共同生活。去東大有路面電車，僅數站即直達，但是爲了省車資，我們都抄近路由東大農學部的後門進去。翌年又搬到附近的富士前町，房間大小一樣只是有個一平方多米的小廚房方便請客。四疊半的房間裡放一張小書桌與美軍用單人床兩張疊成上下鋪，剩下的空間，吃飯、喝茶時可以擺一摺疊式的日式矮茶几，衣類、日常用品可收納到房內的日式壁櫥（叫「押入」）還稱得上簡單清淨。國輝和我都是念冷門的農經，沒有官費與公費的名額，所以都是自費留學。

台灣與日本的經濟在五〇、六〇年代還未起飛。出國時的飛機票就夠家人去周章籌湊，不可能有多少盤纏。當時日本又沒有什麼工可打，在日華僑以操「三把刀」，經營電動彈珠店爲多，我們最希望能在華僑家庭裡找家教的工作。因爲我們要對華僑社會更了解，再則是對忙於生意，忙於日常的華僑子女教育有所幫助，後來有位任教於四谷中華學校的老師在農經系做研究生的金湘泉先生，介紹戴國輝去中華學校當兼任老師，我也費了汗牛之力，找到家教。

在人生歧途上我們常遇到雪中送炭的貴人排解了困難，租房靠近學校，省了交通費和上下學時間，卻多了客人，經常有朋友路過順便走進來。戴國輝好客，終其一生貫徹了有「交」無類、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的作風。恰好六〇年代前後留學生大部分很窮，有錢的在日本也難於找到道地的家鄉味。中國菜在日本學生中更是珍貴。所以炒米粉、滷豚肝蛋、紅燒豬腳、雞爪、翅膀、糯米飯、元宵、菜包、鍋貼……，對於這群經常空著肚皮的遊子，我們有什麼，他們吃什麼，都不會挑剔，也不必客套。在我家可得到精神物質一時的飽滿，又能不期而遇其他朋友，撫平鄉愁，爲明天充電。我們的四疊半小房，仿如

小梁山泊，可是更包容了左、右、國民黨各派學生，戴國輝始終努力把持自己不偏不黨的位置，連現在日、台當紅的右派旗竿人物金美齡女士，當時雖已是一另類學生，跟我們也有過一段交情，戴國輝念舊，不曾公開批評她的過去與現在，她卻暗諷直批，更獻奸言，暗地算計戴國輝，不知其居心爲何。

一九六二年長子興宇將出生，藏書也增加，需找租金低廉的租屋，就搬到東京的邊緣與埼玉縣交界的東武東上線的成増，房子空間加倍，台灣留學生陳國章先生夫婦是鄰居。

一九六六年，國輝獲得東京大學博士學位，同時決定到亞細亞經濟研究所當研究員，他是該研究所第一位外國籍研究員。因此東大研究室的私人藏書必須搬回，可是租屋已容不下，找更大的租房，租金、押金、禮金也隨著增加，除了押金將來可退還之外，什麼都留不下來，我們直覺是應該想辦法擁有自己住家的時候了。

戴國輝得到台灣在日本的建商、東南商事董事長林以德先生與夫人的禮遇。將他們在小田急線讀賣遊樂園前站附近的二層樓小木屋打折，以分期付款方式賣給台灣來的窮學生戴國輝。次男興寧一九六五年在此出生。此木屋漸漸也嫌小了。

一九六九年長年的夢——爲藏書蓋書庫，付諸實現。千葉縣西習志野有林以德先生的胞弟林以文先生的惠通商事所開發的建築用地。林以德先生要國輝直接去交涉，結果以文先生非常通人情，答應以社員待遇，將地賣給國輝蓋書庫。我們擬以賣木屋的錢作爲建築資金，請東大建築系畢業的友人涉谷先生設計一半爲鋼筋一半爲木頭結構的書庫與住家的建築物，立刻動工，要趕在四月一日之前搬入。因日本

的學校在四月一日開學，我們希望孩子的轉學與開學的日期一致，以減少孩子因轉學而衍生的問題。結果工程大幅延誤，我們要求先準備好一間讓家族可作息的房間，如期搬進，家族就在工地般的環境中生活了約半年。

一九七二年長女興夏在此出生。在這千葉縣西習志野的家，迎接了很多重要的客人：王作榮先生與李登輝先生、沈宗瀚先生伉儷、東大教授東畑精一老師、神谷慶治老師。很多國輝的日本人同事、朋友、學生，中國人的朋友、學生與洋人。因為在此我擁有第一個專業用的廚房設備，國輝要我大顯身手，而我也自願辜負他的期待。國輝要請客，他要預設客人當天的話題，然後去邀朋友，邀到客廳可容納為止，常有客人帶客人，客人的客人又帶著客人的情形。每次聚餐都話題沸騰、議論踴躍，酒好話好，不覺已深更意綿綿而散。

一九七六年戴國輝決定轉職到立教大學當教授。爲了上班與孩子的教育方便，我們又作了一次挑戰。一九七五年在東京杉並區宮前覓到一塊地。當時千葉的房子貸款已償完，在那同時三木首相的文部大臣永井道雄先生組織一個教育諮問委員會，戴國輝也列名委員會名單，刊載於日本大報，因爲他是第一位外國籍委員，姓名特別，銀行支店長對他有印象，所以當他去商量貸款的時候，支店長特地接見他，立即給戴國輝方便。在人生的大轉折點，國輝都僥倖遇到貴人與偶然的機遇，讓他一生走下來還算平順，沒有大失大過。

一九九六年，戴國輝在立教大學服務屆滿二十年，距退休年限還有一年，但已有資格領年金，便毅然

然決然地決定回台，要將餘年奉獻給故土鄉親，把收積近半世紀的藏書運回以饗同道，在新店山上買了房子安家，又讓寶貝的藏書有擺放的地方。

現在他英年早逝，留下遺憾，滿屋藏書人去樓空，觸景傷情不勝淒淒！可是我們不能沉湎在悲傷中、不能自苦於對過去事物的懷想中，我要以有限的時間與綿力，替他把書目理出，為他的藏書找到一個最好的歸宿。以報答他此生對我不渝的愛顧。

寫於新店梅苑

——原載《傳記文學》第七十八卷第三期

憂心歪曲的歷史像

郭承敏

——緬懷戴國輝先生

批判李登輝時代的虛實真假

接到著名的台灣研究先驅者戴國輝先生突然的訃報，已經過了兩個月。現在因歷史諸問題導致台灣政情騷動之時，而且圍繞日本新教科書檢定的問題，中國、韓國等亞洲的人們正表示嚴重關切的時候，在「近代中日關係史」及「台灣史」的學術領域，留下諸多優秀著作的戴教授竟然逝世，實在令人惋惜不已。我與戴教授最後一次見面，是去年的十一月底，在福岡舉行的加藤周一討論會上。由福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所主辦的討論會，或許是對加藤先生的向心力吧，來自世界各國、日本全國各地熱心的學者、研究專家全集合起來。戴先生也從台北飛來，我們都對這次意外的相會感到高興。

一同共進晚餐交談時，一開口，戴先生就說：「李登輝（前台灣總統）真是麻煩人物。對其將台灣賣給日本的言論是不可原諒的。大家一起展開大批判吧。下次你來台灣時，我會送您一本即將出版的批判

李登輝的書。」我也回應說：「連那麼粗糙的漫畫家（小林善紀）也喜孜孜地與其見面，還對著日本的媒體吐出『台灣是日本的生命線』（《日本的氣息》雜誌二〇〇〇年九月號）等謊言，真是差勁！」從台灣到北京，然後到沖繩，談話仍意猶未盡，道別時，戴先生說：「想做的事堆積如山，好需要時間啊！」我漫不經心地回答說：「還有十年沒問題的。」他反駁：「還是想要二十年啊！」令我留下格外深刻印象。是命運在惡作劇吧，我收到那本書，竟然是在二月十日，在台北盛大舉行的戴先生的告別式上。題目為《愛憎李登輝：戴國輝與王作榮對談錄》。乃戴先生與王先生二人論述與李登輝相識之後，對李的支持、失望，然後分離的種種，很生氣地將李登輝擔任總統的時代背景，李登輝的虛實真假描繪出來，對台灣的研究者而言，是不能錯過的珍貴的一冊。

事實七年前當李登輝和司馬遼太郎的對談發表後，我在東京與戴先生見面時，戴先生便已經嚴厲批判司馬的錯誤史觀及李的「外來政權論」和反常的對日本的鄉愁。但是九六年戴先生結束了四十二年在日本的學者生涯回到台灣，應李之邀就任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的諮詢委員之要職，此舉引起不少人的困惑，甚至私下非議其「晚節不保」等等。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戴先生曾有的希望與絕望到底是什麼？可惜如今戴先生已離我們而去了。在告別式上致悼詞的戴先生的親戚國民黨副主席吳伯雄先生，臉色悲痛地說：「其實極力推辭的戴先生，是我們夫婦再三說服其爲了台灣，無論如何希望能貢獻出其學識及才能的。然而此結果竟短其壽命。如今我爲此自責不已，對遺族們謹此表達最深的歉意。」告別式之後，戴先生的遺灰被灑在台灣海峽，這是

體現戴先生生前關注兩岸統一的宿願之意。

戴先生似曾以用總統的顧問這樣的地位對李登輝的想法，進而內外政策也能多少發揮影響力。例如他曾將有名的維茨札克的演講稿交給李，但是沒什麼效果。終歸是像「硬拉不想喝水的馬到江邊」般困難。還有戴先生也曾考慮過在台北設立國際文化中心的方案，也曾期待繼承松本重治之流派的國際文化會館及日本的有識者——並非為阿諛奉承李登輝而來的一群無聊之人——在物心兩面上的贊助。因而未完全從殖民地狀態蛻變出來，今日在台灣仍殘留著歪曲的日本像，此事是誰也一目了然的。「六萬冊左右的我的圖書，將來也會被收藏在那兒，供大家來利用。」這是在福岡，最後一次見面時戴先生留下的一句話。

儘管對李登輝持有靠不住的念頭，仍接受其邀請，畢竟是因對李還有所期待。戴先生和李有過很長時間的交往，還有李登輝戰後不久，討厭來到台灣的國民黨的惡政，加入中國共產黨台灣大學支部此事也早知道的。當時台大支部的領導，是從東大醫學部轉到台大的劉沼光氏（故人），不管是東京或台北都獲得大家的尊敬，李也似頗心服。劉先生和李及戴先生都同樣是客家人，也是戴先生新竹中學的學長。再有，李也曾將逃避逮捕的同志藏於自己的生家數日。

但是關於出生成長於差別社會的日本殖民地，逃過戰後白色恐怖的殖民地知識分子共有的激烈的精神上的糾葛，在李登輝著、江口克彥執筆的《台灣的主張》一書中，卻幾乎看不到。更甚者，以《資本論》為首讀遍大量書籍，戰爭期間台灣學生貪婪地閱讀宛若聖經般的矢內原忠雄的名著《日本帝國主義

下的台灣》，也全未觸及，留下非常不協調之感，這難道也是因為由不懂台灣殖民地史等的日本人所執筆的緣故嗎？在別的書籍的出版會上，李登輝熱心地對著出席的日本人，表達出對日本的軍隊生活的懷念，此話一出，連日本人都感覺納悶，這是李按慣例，令人討論的癖好流露出來了吧。

李登輝「權威保證」《台灣論》

戴國輝先生「當官」時，親眼目睹到李登輝旁若無人逐漸加劇的「親日」姿態。加上來台的大多是「失言」大臣，石原慎太郎及低劣的漫畫家之類的，與他們相會時，李真是欣喜雀躍，手舞足蹈，渾然忘我，李與其說是台灣總統，不如說更像「陛下的忠臣」，眉開眼笑聲稱「我二十二歲之前也是日本人呢」。更甚者，一邊是對殖民地時代的讚美歌的大合唱，另一邊則是瞪眼發怒瘋狂地對中國的政治、文化展開攻擊，是很不像樣的立體聲類型。《中國時報》的幹部也曾歎息對我說：「批判國民黨及大陸是其自由，但也無須為此成爲日本人（軍國主義時代的）兒子呀！」不是戴先生也要退避三舍吧。

在東京以李的股肱自居者一味地高喊台灣獨立，這些傢伙發行的月刊小冊子《台灣青年》，現在乃充斥著「支那人」、「清國奴」這些字眼。還有，去年在來台北探訪的小林善紀的歡迎會上，李登輝的親信們也一起愉快地唱日本的軍歌討小林的歡喜。所謂「日本精神」化身的傢伙，總掛在嘴上的台灣認同的真面目，是多麼空洞啊。

戴先生的告別式的當天下午，在台灣大學的鹿鳴館，召開了批判小林的漫畫書《台灣論》（中國話版）的座談會。其實此集會乃戴先生生前所提議的，主辦團體是由教授、作家等組成的「諍社」。「諍」乃諫諍之意，從前進諫暴君的家臣稱爲諍臣。這次的座談會我也參加並發言了。我認爲「鹿鳴館」及「諍社」都是意味深長的名稱。

小林《台灣論》的內容是：謳歌日本的殖民統治時代；愚弄台灣人；嘲弄「支那人」；最後竟連朝鮮人、金大中、金正日、南北會談都成爲其譏笑的對象。此乃日本的極右派及台灣的老「皇民」醜惡的合作成果。座談會的出席者都嚴厲批判這本辱國之書，以此座談會爲導火線，猛烈的非難，譴責之聲不只來自台灣，也擴及到中國大陸。

根據這本漫畫書的記載，台灣的從軍慰安婦並非被強迫的，而是貧窮人家需要金錢，並且成爲軍隊的「慰安婦」也能出人頭地……；日軍殺害台灣原住民三百多人的霧社事件（一九三〇年），是原住民襲擊日本人大量殺人所引起的……。像這樣，可以說就是企圖歪曲歷史、抹殺記憶。受到包括元從軍、慰安婦的強烈抗議，張行政院長在立法院，發表了禁止小林入境的處分的決定。

李登輝竟兩次接受了此書的採訪，其中一次，歷經四個小時，懇切地談論日本的殖民地統治是如何美好等，可以說替此書的發行給予了最高權威的保證。因此現在全台灣、中國大陸圍而攻之的荒謬之極的此書之「影子主角」不是別人就是李登輝。

在此前所未見的惡書的刊行上大大地活躍的就是在日本的媒體歇斯底里高喊「愛國心」、「日本精

神」的金美齡。喜歡說「強姦」此句話的西村真悟次官因有關日本擁有核子武器的問題上發言失當而被辭掉防衛次官後，西村一幫人舉辦的激勵會，金也趕去，並鼓舞說「期待你將來當上總理」。因為會有此等事，所以有人讚美金美齡為「女傑」，也有人罵她無恥。我認為若不是無知且不知廉恥，就不會當小林之流的啦啦隊長。

在金的《我的主張》（二〇七頁）中，寫道中日間「戰後已過半世紀，金錢上的補償及道義上的謝罪，今天都已經解決了」。中國於一九七二年恢復邦交時放棄了超過六千億美元的要求賠償權。事實上，是蔣介石從台灣向日本索取賠償，卻被美國大喝一聲，因而縮回去的。這是研究政治史的人皆有的常識。並且日本一次也沒有真正謝罪之事，去年朱鎔基總理在TBS的電視上，清楚地說明過。正因從未謝罪，所以不斷有「失言」大臣，二月份，野呂田元防衛長官因美化侵略戰爭的發言而遭受來自中國、韓國的責難。

更有這一次又因「制定新的歷史教科書之會」所作的新教科書的檢定問題，遭受來自中國和韓國數次「『新教科書』的問題點是侵略的美化及殖民地的正當化」，這種指摘警告其若採用這樣的教科書，必導致嚴重的外交問題。

儘管如此，對於愚弄自身的《台灣論》，台灣民眾識破李登輝、金美齡、小林等的詐欺而給予了總反擊，我認為這可以證明台灣人的意識是健全的。

金美齡去年受邀參加石垣市舉辦的「以沖繩的自信和驕傲爭取發言權」討論會。針對主持人高良倉

吉氏（琉球大學教授）「該怎麼使用基地問題這張牌呢」的詢問，金作了「不要一味主張自己是被害者、弱者，這就是我的審美意識」如此冠冕堂皇的回答。

但是我不得不聯想起沖繩發言權中三位參加者的話：「我們三個人與那對『歷史』過度要求說明責任的論理畫清界限」，然而沖繩基地的歷史問題是否已作出令大家認可的清楚說明了呢？

例如我部政明琉大教授辛苦地從美國公文書館發現到很久以前的秘密協定資料。令我們驚訝的是，日本政府大部分的情況都假裝沈默，好像說反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在有關核武器等問題上要求說明難道也是賣國賊嗎？實在不能理解。

最後有關戴先生的事再說句話。他總是從少數的立場對台灣原住民寄予深厚的關心。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他爭取發言權在台北舉辦了「回顧高砂義勇隊的歷史」此題目的學術研討會，譴責了日本政府不負責任的態度。還有，每次和我見面，戴先生總是懷念沖繩很早便結識的好友屋良早苗先生，池宮城紀夫氏等長久的友誼，說與沖繩的人們心靈相通，一定要替他轉達問候之意。在此欲借此文傳達故人之意。

——原載二〇〇一年五月一日《海峽評論》第一二五期

戴國輝教授對台灣心存大愛

陸鏗

——向台灣史研究權威致敬

認識戴國輝教授，對我來說是人生過程中的幸事。戴教授對日本的了解，他在中日關係上正確的歷史觀，使我得到的教益，永銘心版。

我屬於抗日戰爭的一代，勝利後又是中國赴日的第一個記者團的團員，遠在一九四七年就寫了《麥帥治下的日韓》一書。對日本的認識，應該承認是片面而有情緒的。

直到一九七九年經歷廿多年牢獄之災獲釋，二度訪日，得識戴國輝教授，對於怎麼看日本，看中日關係，把廣大日本人民與軍國主義者區隔開來，才有比較公正客觀的認識。

一九八〇年三度訪日，戴教授不僅邀我在他東京家中小住，受到他和他夫人林彩美女士的親切款待，還主動陪我訪問日中友協主席岡崎嘉平太先生；我也在接受老友李香蘭女士宴請時，向李介紹了戴教授，戴、李日後也成了朋友。

戴爲人熱情，給人以一見如故之感。但治學卻甚爲嚴謹。對待問題不受流俗羈絆，更無畏政治力的要脅，台灣人研究中國與日本史，像他那樣的力求公正，不計個人損益，在我看來是第一人。

誰都知道，戴國輝教授與前總統李登輝先生也是舊識。李先生也在戴家作過客，而且彼此間達到無話不談的深交。

一九九六年李先生當選中華民國第九屆總統，戴國輝先生應邀回台任國安會諮詢委員，備受重視。後來由於李總統無原則的親日態度，嚴重斷裂族群情感，在戴教授看來非台灣之福，坦率進言，不但為李所接納，而且碰了釘子。

我的《回憶與懺悔錄》由日本筑摩書房以《中國妖怪記者的自傳》書名出版時，戴教授原曾主動表示要好好寫篇書評推介，後來遲遲未寫，他向我表示歉意說：「我這一生是從不爽約的，但最近心情實在不好，原準備寫的為妖怪記者叫好的文章，沒法完成了。」經我發揮記者追問的精神和猜測的習慣，窮探底蘊。他終於說出，是與李總統之間的不愉快，甚至不得不離職。

經歷日治殖民政權的台灣人，格外有感於生的尊嚴。戴國輝教授更能卓越地跳出歷史悲劇的限制，不以排斥其他族群做出主體認同的依據。他毫不隱諱自許為「出生於台灣的客家人」與李登輝先生的「日系台灣人」自豪的態度，迥然不同，兩種境界，自然形成沒有共同語言的矛盾。

感謝夏珍小姐在戴教授逝世沒有幾天就出版了《愛憎李登輝——戴國輝與王作榮對話錄》，為我們揭開了這一李登輝之謎。

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廣大讀者的願望，也為阿扁總統提供了前車之鑑：以史為鑑，避免重蹈歷史的錯誤。特別是族群情感不容再分裂，大陸政策不容再有「去中國化」的台獨走向。

戴國輝這個人

二二

兩千三百多萬族群融合，在新世紀建設新台灣，這正是對台灣心存大愛的戴國輝教授的願望。願
好友安息！

——原載二〇〇一年二月十日《中國時報》

壯志未酬：緬懷學長戴國輝教授

李哲夫

思想開放 尊重學術自由

從台北傳來消息，國輝兄於元月九日與世長辭。我除了怨嘆天不與時之外，也感傷我所尊敬的這位學長國輝兄在台灣「壯志未酬」。

可以說我對台灣近現代史的啓蒙，比較正確地認識，是從讀八〇年代初在美國創刊的《台灣與世界》開始。記得一九八二年夏，在芝加哥林孝信主持的「海外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舉辦的夏令營，當時受邀的講員包括正在加州柏克萊大學的訪問學者戴國輝教授、陳鼓應教授和我自己。當時，我剛從天津南開大學在大陸社會學重建而首辦的一個社會學專業班講學回來。所以，我在那夏令營做的報告集中在對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方方面面的觀察。尤其是改革之初，百廢待舉，建議大家從台灣來的旅美朋友們，多為大陸即將興起的政經社會的建設事業關係，並適時依據各人所學所長，參與貢獻大陸同胞的興革過

程，此為增進兩岸人民相互了解，取得互信共榮的良機。

由於兩岸長時期的隔絕和台灣官方的反共教育，直到八〇年代之初，與中國大陸同胞認同的言論，仍會受到各種「親共」、「左派」等等的標籤。沒想到，當時初次謀面認識，以研究台灣歷史為專長的戴國輝教授，竟然就公開地對我這個學弟的觀點和說法，表示讚賞並且勉勵有加。那時，我直覺地認為這是戴國輝教授，作為一個思想開放，尊重學術自由，而又關愛同胞學弟的一種溫暖的表現。因為，我對於國輝兄在日本發表的日文學術著作一無所知。並且，此後幾年他以筆名在《台灣與世界》持續發表的《二·二八史料舉隅》，我也毫無所知地能夠把國輝兄和所讀的這些為我對台灣史開竅入門的重要文獻聯繫起來。

隨著時間與國輝兄相知漸深，才開始體會到他各方面做學問的嚴謹作風。成長於台灣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籠罩下的威權的台灣政制下，固然是使這一代人對政治敏感性的顧慮較多的原因之一。可是，戴教授選擇的研究題目：台灣的近現代史，更具有較為深層的複雜性。他告訴我，當時在五〇年中期要出國留學，目的地原先也是美國。但在他兄長給他的意見是，台灣近現代史與日本有那麼多年的糾葛，是否在日本能夠更直接地獲取有關台灣的資料，以及對台灣有較密切歷史關係的日本學者當指導教授。就在這樣的選擇之下，戴教授鶴立雞群地凸顯出他在同一代學習中國和台灣的政治歷史上，有他獨特於其他留學美歐在冷戰時期間製造出來的華僑華裔學者。他對於中國和台灣的研究立足點，沒有受到「美制」華人「中國通」的冷戰期西方陣營的意識形態的汙染，他在學術研究上，沒有出現對於自己出生根源和

民族認同的「愛與憎」的自我認同的錯亂症候群。始終明白自己的出身與自我的肯定。

政治委婉 學術悍直

更爲嚴謹的學術態度是戴教授對於歷史文獻和資料來源的一種「保護」的情理兼顧的立場。他文獻資料的收藏豐富是廣爲大家所知。可是豐富的資料當中，有相當部分是他以一種社會科學方法，接觸訪問仍在世的歷史見證人的第一手資料。就像新聞報導者的職業道德一樣，戴教授是極爲審慎地保護他的資訊來源。他的這種嚴謹的職業道德，正可以使當代許多在台灣搞「本土化」時髦的「台灣本土化」專家，動不動搶先暴露資料來源的「權威性」，自慚形穢的。

戴教授的另一特殊風格，也是我後知後覺地逐漸領悟到他的「和平」政治策略。做爲一位嚴謹公正的歷史學者，他早有他自己對於台灣歷史的過去與其命運的未來有一套系統的理论想法。但是，基於他的個人背景，台灣島內多層面的交往關係，和他在日本學術界、輿論界樹立起一定的名望，他深知自己出面作任何政治政策方面的倡導者是不合時宜的。因此，長時期裡，他不作任何公開的政治政策的倡導者。八〇年代末期，台灣有了省籍的政治領導，體制上也因爲解嚴而開始有較大的空間可以討論台灣前途的不同選項。四、五年前國輝兄開始回歸台灣島內的準備。基於他對於台灣史的深刻研究，他有一定的信心，樂觀地認爲他所認爲的融合「台灣結」和「中國結」建構成一個比較健康正常的「台灣人中國

意識」，可以透過有效的管道，影響台海兩岸關係的建設性發展。今天，國輝兄早走了一步，我不能不遺憾地說：「爲什麼天不給他再幾年，他應當能夠看到他在台灣的『和平轉移』是會有成效的一天！」

在此，我的感慨是國輝兄的「壯志未酬」，並不是他的「壯志不酬」。台灣島內和兩岸關係的種種跡象，都已經指向兩岸和平談判的必要性。並且漸漸深刻地認識「一個中國原則」是無可迴避的和談根本的基礎。國輝兄在世時，從未主張「急統」，並且他珍惜台灣近三十年來的政經體制的改革建設和政治上從威權專制轉移到相對的自由民主。所以他有所謂的「辜丸理論」，主張大陸作爲主體，仍應保持如辜丸的台灣島存在於身體之外發揮它的作用。這樣的構想，事實上與「一國兩制」，「我不吃掉你，你不吃掉我」的意義上是一致的。國輝兄如我前述的「和平政治戰略」，選擇了較爲委婉的語言，說出他從近現代史研究所得的結論。今天，海內外「反獨促統」聲音的崛起，正印證了戴教授深信：「不懂歷史過去的錯誤，未能避免重犯錯的未來」的歷史學者的基本信仰。

談及此，讓我回憶起一個故事。在八〇年代末期，北京的一次「兩岸關係研討會」上，國輝兄第一次公開露面在這種場合。經過幾場的論文發表，自由發言討論之後，國輝兄突然站起來，以非常嚴峻的態度，幾近沒有保留地批判了一番大陸上參與會議的「台灣專家」學者們。他說：「你們做研究不深入，掌握資料太薄弱，並且，你們論點太八股，太拘泥於官方上層的政策所愛。這樣的學術研究，站不住腳，並且，對於官方對台政策的改善也無可貢獻！」雖然，這樣發言來自海外的學者戴國輝教授，讓當場局面有幾分尷尬。可喜的是，從那次開會之後，國輝兄不僅不爲大陸上台灣研究學者的排斥，反而更

熱絡地繼續有來往，還交流互換資料和論點，並且，戴教授在日本立教大學，也開始接受國內研究台灣問題的留學生，受他指導寫博士論文。

這種「不打不相識」的戴教授學術作風，是中國包括台灣學術圈裡少見的現象。曾在台灣聽聞一些學界圈內，提到戴教授的「傲慢」風格。當今懷念國輝兄，我更能珍惜他這種政治委婉，學術悍直的多文化交配的結晶體。

沒有任何派別

長年來，國輝兄和彩美嫂在東京的家居，一直是訪日，或過路各界朋友的最親切的「招待所」。台灣史近代見證人，台灣政界的頭面人物，海內外路過東京的朋友，不知有多少到國輝、彩美伉儷的家受到最誠懇的款待。記得一九九二年，我帶著正在高中畢業的小女兒，到北京參觀亞運會。因為女兒從未訪問日本，我們就要求國輝兄，路過東京，要停留他家二、三天旅遊東京。我們到他那裡，不僅從第一夜開始歡飲暢談，彩美嫂是烹飪專家（除教日文外交官家屬如何烹調待客外，還有特殊烹飪專著出版），我們接受到「五星級」之上的款待。人情上，更令我懷念的是，當時我小女兒在學期結束前提早離校，仍有課業論文繳交才得畢業。國輝兄，半夜親自替她用傳真傳回美國我女兒的學校，交代作業。這個記憶更使我懷念國輝兄、彩美嫂，他們的關懷絕不限於公關和通俗的價值判斷，他們的愛心，是普遍的，是人常的

博愛，即使據我所知，國輝兄和彩美嫂並沒有自稱屬於任何宗教派別的信奉者。

台灣，包括現今的中國大陸，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時局造成了一代的留學生和他們在海外創業、立業的一段事跡。戴教授所代表的是這一個時期較早期的流落海外，爾後落葉歸根。期能在自己的學習、經驗和新建構的理想帶回自己家鄉，產生一定建設性的影響。

戴教授和他的一家人是這麼做，這麼嘗試了。從當前台灣各種現勢看來，台灣省籍的領導和執政，台灣島內普遍的民心所向，仍未能實現戴教授理性的領導方向，這是我前言「壯志未酬」的遺憾和感嘆。可是，有時，我們從古訓裡得到一定的安慰。《聖經·約翰書》十四章開頭這麼說：「當耶穌知道他要離開門徒之前說：『你們不要憂心，主的殿裡有許多許多的房間。若不是，我先去替你們準備你們的地方，我會回來告訴你們去的地方。你們會知道我將去的地方，也會知道您們要去的路。』」

國輝兄，您先走一步。您已經讓我們知道此去的路。

（二〇〇一年二月於華府）

——原載二〇〇一年三月一日《海峽評論》第一二三期

宿命的寂寞

陳映真

元月初，我在一個開會的場合，從電話中妻的哽咽裡，知道了戴國輝先生病倒、送進加護病房的消息。雖然這之前的一年許，幾次和戴先生見面，已經憂愁地看見他因肝病瘦了一大圈，但聽說他倒下了，還是感到極為意外和震驚。

及至承蒙戴先生家屬的好意，把探訪加護病房的極有限的時間分給我到床邊看他時，又是一驚。戴先生已沉落到最深的昏睡裡，表情固然安詳，無如令人痛感到戴先生確實正在一步步離去，不禁熱淚盈眶。我在床邊枯立片刻。突然想到據說昏迷中的人仍然心智靈明，便俯身向戴先生說，「戴先生，請加油撐下去。朋友們都等您回來……」

元月九日。戴先生終竟與世長辭了。

一貫做事周詳、認真的戴先生，對於病況猝然的惡化，想必也完全不曾料想到的罷。匆促間，留下多少事不曾交代、處理和安排，留下多少未竟的著述計畫，留下終竟不能眼見民族重新和解與團結的缺憾，戴先生一定走得滿懷遺恨、走得驚惶和不甘心。

一九七五年我遠行回來，飢餓一般地蒐讀各種資料，其中就有戴國輝先生以日語發表的一篇文章。文章中說，十九世紀中後以降，中國在從歷史的前現代向著歷史的現代掙扎中，一切侵略與反侵略，內戰與反內戰的煎熬和痛苦，無非是中華民族迎向她的新生的胎血與胎痛（大意）。戴先生文章的題目，甚至文章的其他部分，於今竟已不復記憶。但惟獨這一段話卻極震動了我的思想。七五年，我為自己的小說集作序：〈試論陳映真〉，便依了這一段話，以中國從前現代向著現代蛻變的陣痛，說明百年來中國的渾沌和苦難。

一直到一九八三年秋末，我才能在美國的愛荷華市，第一次見到了心儀已久的戴先生。戴先生以他一貫的、對於後學的提攜，找我做了一次對談，刊在葉芸芸女士所主宰的《台灣與世界》上。

一九八七年晚夏，我因雜誌《人間》的編務，去了東京。戴先生約我在一家日本餐廳見面。一大盤炸蝦端出來後，戴先生一面抱怨我不會喝酒，一面給自己斟上一大杯冰啤酒。我們先是拉了一陣子家常，遂談起《人間》雜誌。

「編這樣一本雜誌，很辛苦吧。」

戴教授微笑著說。他於是問起那年七月號刊出的、有關仆倒在五〇年代白色肅清刑場上的革命家郭秀琮的報導。

「寫得很不錯。」

他沉吟著說。不料語聲方落，戴先生猛然抓住了我的右手腕，低下頭來：開始十分費力地吞嚥著他

突如其來的哭泣。我在他強力的握力和顫抖，在他於公共場合也無法抑壓的至深的悲慟中，沉默地坐著，一任他抓著我的手腕，守候著他從別人無從知道的心靈的風暴中恢復平靜。

一分鐘後，紅著眼眶、擰過鼻涕的戴先生和我，都若無其事地說起別的事，吃完了一餐飯。

一直到今天，我從來不問，他也從來不說起那一場錐心的慟哭的緣由。但我卻從戴先生那一次無法自抑的男兒之哭，無來由地、切膚地感覺到了他與郭秀琮那一代人與歷史的、刻骨的聯繫。

一九九二年，戴先生在他為與葉芸芸女士共著的《愛憎二·二八》寫的序文中，說到了在建中讀書時，少年戴國輝在今日台北泰順街「各路英傑」學長「聚合的『梁山泊』」裡，聽他們議論風發、受到強烈的「薰陶」；說到在二·二八風暴中，這些「梁山泊」的學長對於事變的科學性分析，如何折服了年少的戴國輝；說到在一九四九年「四·六」逮捕學生事件中，他的「同學、學長、老師或被捕，或逃逸大陸，一時風聲鶴唳」；說到韓戰爆發後「白色恐怖」舖天蓋地而來時，他的「許多學識超卓、愛國、正直的同學、朋友、師長紛遭繫獄、槍斃」，也說到他為「免遭無端牽連」，不在台北上大學，避禍到台中度過四年農學院的生活，終於在一九五五年悄然負笈於東瀛。

而根據調查資料，郭秀琮正是當時那「梁山泊」中熱血青年所仰望的一顆明星。

對於我而言，戴國輝先生彷彿是從一個人們長期不被允許說和回憶的，遭到滅族血洗而徹底覆亡的、傳說中的國度裡倖活下來、變裝逃脫，而又易服行走於今日市廛中的人。長年以來，我以尊敬默默地注視他的行止，傾聽他的言說，閱讀他的書。我於是看到，當台灣現當代史被機械地劃分為加害者與被

受害者，戴先生卻力言俗稱的「被害者」中的「共犯構造」，足人反思。對於一時甚囂塵世上的「台灣民族論」和台灣「建國」論，他迭次提出科學性的、不媚俗世的反論；當日本殖民統治有理、有益之論盈耳，戴先生最早提出尖銳的批判；而當人們在煽動「台灣人」和「中國人」之間的對立與仇恨，戴先生卻呼喚台灣漢族人在台灣開發史中對少數民族犯過的滔天「原罪」意識，並且在自己的生活實踐中，深情地關懷原住民朋友和他們的運動……。

一九九六年，戴先生任職於「總統府」，在一些朋友中招來一陣訝異和議論。一九九九年他辭職不久，我們相見於一茶室。

「別人說我『晚節不保』，爲什麼獨獨你對我不曾置疑？」戴先生以日本語問我。

我笑而不答。及至去年，戴先生最後一趟到日本，有日本朋友告訴我戴先生在日本說我「最能了解」他。每想到一個從昔日的災禍中倖活下來而孑孓於今日市塵之人的徹底的孤獨，不禁悵然。

如今戴國輝先生猝然走了。我不能不感到痛徹心肺的損失和悲哀。家族決定把戴先生的骨灰撒在祖國的海峽，歸於大化，連墓碑都不留下來。

戴夫人林彩美女史和家族的這樣的決定，不但體現了對於戴先生朗朗錚錚的一生的理解，彷彿也深刻地理解了戴先生那宿命的寂寞的長途。

我的好友戴國輝

陳鵬仁

我的老友史學家戴國輝兄走了。我們於民國四十三年，在預備軍官訓練班一起受訓，而且我們是同一個中隊，生活在一起。

後來我們又到日本東京大學留學，他念的是農業經濟，我念政治學和國際關係。但他比我拿東大博士學位早得多。不過後來他專研台灣史，這可能與他的博士論文有關係，因為他寫的是日治時代台灣的糖業，對日人治台有許多感觸，而延伸研究台灣的歷史和台灣人的命運。

民國五十五年我由東京轉到紐約繼續求學，六十二年，應斷交後首任代表馬樹禮邀請，回東京負責日本的僑務工作。那時，國輝兄也參與僑社的活動，擔任東京崇正公會的理事，故時會見面和聊天。

記得在留學生時代，他因參加東大中間偏左的讀書會，被我國大使館視為「左派份子」，且被沒收護照。當時，我曾對黨特派員李德廉說，戴國輝不是左派份子，經過一段時間，這個問題始獲得解決。兩年前，國輝兄離開國安會議，轉往中國文化大學史研所專任教授。我於半年前告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轉任文化大學日研所專任教授。國輝兄很高興我也轉到文大，與他同事。

三個多星期以前，在文大教職員專車上，他鄭重其事地對我說：「讓我們好好把文大搞起來，我們共同來爲文大奮鬥。」我將這番話轉告了文大日研所蔡華山所長。蔡所長非常感動，並說我們真的要把握文大的學術地位提高，使文大成爲一流的大學。

如今，國輝兄突然走了。文大一定要把國輝兄這句話當作留給文大的遺言，好好爲這所大學的學術地位奮鬥，以慰國輝兄在天之靈。

——原載二〇〇一年一月十一日《聯合報》

懷念戴國輝兄

陳鵬仁

戴國輝小我四個多月；我們於民國四十三年，在預備軍官訓練班第三期一起受訓。我們屬於第二大隊第八中隊。由於一切訓練皆以中隊為單位，所以訓練和生活在一起。分科時，我分到海軍陸戰隊；他似乎被分配到裝甲兵，最後一個月的政治教育又在一起。

預訓班結訓後不久，他就到日本留學，進東京大學得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民國四十六年我考取留學考試，他的夫人林彩美也是同期。民國四十七年春天，我去日本進修。有一天在東京的電車上，偶然碰到林彩美。她告訴我她說她最近要結婚。我問對象是誰，她說「戴國輝」。我說老戴是預訓班的同學、老朋友，她也覺得好巧。東京人口一千多萬，在電車裡能碰到熟人，少之又少，幾乎不可能。我去東京不久便碰到了老友의 未婚妻，這只能說是一種緣分。

在預訓班受訓時，戴國輝被迫參加國民黨。但結訓後，他一直沒有「歸隊」。這也難怪，因為他是被迫的。他大概希望以無黨無派的立場來從事他的學術研究工作，所以沒有參加任何政黨。

兩年前，戴國輝離開國安會議，轉到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專任教授。去年十二月十三日，他還

特別請我擔任他所指導文大歷研所許瓊豐同學的碩士論文口試。許同學寫的是有關日本神戶華僑尤其是吳錦堂在日本和國內的事業發展及其貢獻。

現在我要說的是，我認為戴國輝的日文著作，應該設法把它譯成中文在台灣出版這件事。據我的瞭解，他的書只有兩種中譯問世。但譬如《日本人與亞洲》、《與日本人的對話》、《台灣與台灣人》、《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華僑》以及他的博士論文等等，都很值得譯成中文出版。

而我認為，戴國輝那麼念念不忘，要把它提升成爲一流大學的中國文化大學，實有肩負起這份工作的責任和義務。我相信文大是能夠做得到的。

例如《日本人與亞洲》這本書，其內容就非常精彩而有深度。此書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日本人與殖民地〉，討論樺山資紀與水野遵；伊澤修二與後藤新平；細川嘉六與矢內原忠雄六個人的思想及其與台灣的關係。

第二部〈殖民地與知識份子〉，論述吳濁流的心靈世界和創作；郁達夫與台灣，探討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另一個層面；台灣的詩與現實，敘述羅福星的一生，都是巨作。

第三部〈台灣史與「華僑」問題〉，包括台灣史略、東南亞華人系住民、今日研究霧社起義的意義。

第四部爲〈雜感六束〉，有憂慮新亞洲主義的抬頭、連帶與多管閒事、河上肇在中國、讀「同文同種」、「耕織圖」與東亞和弱者的優點，其所談皆發人深省。

據悉。戴夫人決定將先生的一切藏書，全部捐給中國文化大學。如所周知，一所大學的好壞，端賴

教授陣營如何堅強，和有多少藏書。今日，戴教授的藏書決定悉數捐給文大，必將豐富文大的藏書內容，而無疑地它將是提升文大學術地位的一個主要因素。我深信，國輝兄一定很高興他夫人的這種決定，而我們的努力也將告慰國輝兄在天之靈。

——原載《傳記文學》第七十八卷第三期

捍衛台灣人尊嚴的史學家

王曉波

——敬悼「出生於台灣的客家系中國人」戴國輝教授

我能知道「戴國輝」的大名，是一九八二年，老友陳平景從日本寄來一篇介紹戴國輝教授的文章。我才知道還有這麼一個台灣學者在日本從事台灣史的研究，而且堅持台灣人的民族立場，批判日本對台灣殖民統治的歷史。我即把平景兄所介紹的文章推薦給胡秋原先生，在《中華雜誌》刊出。

一九八三年，陳映真兄訪美，適戴國輝教授也訪美，在美國友人的安排下，戴、陳二人在愛荷華有一場對談，並刊登於葉芸芸主持的《台灣與世界》，談的主題是「台灣人意識」與「台灣民族」，我才更進一步的認識到老戴的思想和看法。這個對談在一九八四年，也重刊於復刊的《夏潮論壇》。老戴數十年來都是以日文從事研究和寫作，致使不諳日文的島內讀者對「戴國輝」都非常陌生。戴、陳對談發表之時，正值島內黨外統獨路線激烈辯論之際，除了戴、陳對談外，訪美期間，老戴又發表了和李哲夫及李嘉、陳鼓應的對談紀錄，所以老戴一時間變成了「浪尖上的人物」，後來許多台獨派攻訐老戴也應肇因於此。

他對台灣的研究主要有二點：

一、是由「自我認同」的追尋，企圖建立起台灣史的「主體性」。在光復之初，雖然台灣人熱烈歡迎回歸祖國懷抱，但經「二·二八事件」，對國民黨徹底失望，於是部分台灣人開始懷念日本的殖民統治，由於不能認同國民黨代表的中國，而肯定日本統治。老戴認為對日本殖民統治的肯定，同樣是失去了台灣人的「主體性」。「主體性」是建立價值判斷的基礎。對於日據台灣史的研究，日本人和台灣人是不同的主體，當有不同「主體性」的價值判斷。老戴認為，殖民統治是對被殖民民族的犯罪，應該站在台灣人立場予以嚴肅的批判，才能維護和建立台灣人的尊嚴，台灣人不能因為反對國民黨統治而肯定日本的殖民統治，價值判斷必須是具有目的性的，日本在殖民統治期間，容或有一些建設，但這些建設的目的是屬於日本殖民統治，而不是以台灣人為目的的，主人養牛，是爲了奴役牛爲目的的，不是以牛爲目的的，豈有牛去感謝主人餵養之理。肯定日本的殖民統治，那是台灣人失去「主體性」的奴隸史觀。

二、老戴由「主體性」的建立而提出的「共犯結構論」。殖民地統治經常是有殖民地精英的協助，才能穩定其統治的，這些穩定或幫助殖民統治的殖民地精英，老戴認為，他們一方面是殖民統治的被害者，但另一方面也是殖民統治的加害者，整個殖民統治乃是這樣子的一種「共犯結構」。他認為光復之後，台灣人沒有能夠對日據時期的「共犯結構」嚴肅的清算和批判，所以一直無法建立起台灣人「主體性」的史觀，反而一受到國民黨統治的挫折就去肯定日本的殖民統治，喪失台灣人的尊嚴和民族立場。

一九八四年夏，我應柏克萊加州大學和哈佛大學之邀赴美訪問研究，老友陳宏正兄約我路經東京順道訪問老戴。六月十七日到東京，二十日見到了老戴，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老戴。時值台灣發生「林少貓

事件」，林少貓是「台灣民主國」失敗之後，台灣抗日義勇軍的「三猛」之一，直到一九〇二年才被殲滅，光復後入祀忠烈祠。林少貓當年被陳中和引日本軍殲滅的，陳中和的孫子陳田錨時任高雄市議長，陳派市議員起而指責林少貓是「土匪」，要求將林少貓逐出忠烈祠，我們即在台北舉行座談會聲援林少貓，誓言捍衛林少貓的歷史地位。我到東京見到老戴，入寶山豈能空手回。於是對老戴作了一次訪談，還寫了一篇《日據價值體系之批判——訪戴國輝教授談林少貓事件》（後收錄在其所著《台灣史研究》）。

在路過東京的幾天中，他除了介紹我和他所主持的「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的朋友見面外，還請了日本報紙的資深記者對我做了一篇專訪，並且派他的學生陳梅卿陪我參觀東京，最主要的是東京靖國神社，那是日本近代軍國主義的精神堡壘，不能不看。他還特別告訴我，當年征台軍統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躺過的中壠媽祖廟的門板也被存放在靖國神社。

在東京，見到了老戴也見到了戴大嫂，並且到了老戴在千葉縣的藏書屋，看到了老戴在東京蒐集了幾十年的藏書，其中竟有日據時期尚未能出版的《蔣渭水選集》世上唯一的孤本。老戴在日本蒐集了許多日據時代的史料，爲了保存史料，還復刻了《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台灣憲兵隊史》等日本官方的史料，讓日本對台殖民統治的犯罪紀錄不得銷毀。

老戴因黑名單不得返台，又極希望能返台看看故鄉的變化，所以我從美國返台後，就找到當時在海工會任職的楊明恆先生，希望他能替老戴澄清。楊先生去了解情況後見告，老戴有個親戚是吳伯雄，返台探親問題不大。不久就在台北接到老戴電話，他隨著立教大學的棒球隊回台了。老戴的黑名單終於

被衝破了。

他回來台灣，除了舊識陳映真外，我還幫他介紹了與我在「林少貓事件」中並肩作戰的尹章義教授及胡秋原先生。當時日本正在鬧「竄改歷史教科書事件」，此外《中華雜誌》亦每年舉辦「七七抗戰紀念會」。我們希望老戴能邀請幾位日本學者來參加「七七抗戰紀念會」，老戴提出最好有一個學術研討會，日本學者應邀來台比較方便，於是老尹向其任教的輔仁大學提出開一個「中日關係學術研討會」，趁參加研討會而參加抗戰紀念會。一九八五年七月初，老戴帶了姬田光義、森正孝等數位日本教授來台，曾轟動過一時。

老戴雖然出版過幾本日文哲著作而享譽東瀛，但是卻從來沒有出版過一本中文著作，老戴把書稿給我，要我在台灣幫他找出出版社。老戴是黑名單人物，國民黨不歡迎，又批判日本殖民統治，台獨人士更忌恨，台灣史研究當時是冷門卻又敏感，找誰願意出版老戴的書？後來是陳宏正介紹遠流出版社王榮文先生，不意王先生卻慨允出版，而有一九八五年老戴第一本中文著作《台灣史研究》的問世。

由於老戴的「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的啓發，一九八七年，我們在台也成立了「台灣史研究會」，我和老尹分任正副理事長，王永擔任秘書長，老戴是我們的名譽會員，還捐過台幣二萬元支持我們。一九八八年，「台史會」舉辦第一次學術研討會，老戴不但親自從日本來出席，並且還邀請了日本學者松平誠等教授出席發表論文。

一九八七年，台灣解嚴及開放大陸探親，一九九〇年後，北京每年夏天召開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

老戴和我幾乎每年都會受邀參加，戴大嫂也會隨行。一九九五年，在廬山開會，主題是台灣史，時值李登輝和司馬遼太郎對話發表，又李登輝訪美，引起中共飛彈試射。記得老戴那晚約了我、老尹、毛鑄倫、曾祥鐸在他房間喝洋酒，他表示在日本要退休了，退休後回台，並且透露了他過去和李登輝的交情。

一九九六年，果然老戴退休返台了，但不是傳聞中的出掌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而是被李登輝安排到總統府的國家安全會議擔任諮詢委員。

蔣經國去世後，台灣知識界多寄望於李登輝能結束威權統治而趨於民主。後來李登輝發生主流、非主流之事，政治上有權力之爭也不足為奇，尤其是盤踞權力地位的蔣家遺臣，本來就該「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只是李登輝經常說一些類似於台獨的「怪話」，什麼「生命共同體」、什麼「台灣已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或許認為這是討好台獨派，以打擊蔣家遺臣的策略運用，但是司馬遼太郎的對話發表後，李登輝的問題已不是權力鬥爭的問題，甚至不是統獨對立的問題，而是涉及到老戴的「主體性」和「共犯結構」的問題，李登輝是不是漢（色）奸的問題，漢奸還有什麼台灣人的尊嚴。

司馬遼太郎的對話出來後，老戴還沒當官前，我就常常糗老戴說：「這是李登輝對老戴的中華民族主義的考驗。」老戴說：「我還是中華民族主義者。」後來，他還指責我沒看懂李登輝的話，「李登輝許諾把我們台灣人帶回迦南祖地，我們台灣人的迦南祖地就是中國大陸」。

老戴當官之初，還常常請朋友吃飯喝酒，經常是全桌都在罵李登輝，老戴也不吭氣，酒醉飯飽後，老戴說：「今天是李登輝請客，你們又罵了一晚上李登輝。」老戴當李登輝的官，領李登輝的錢，老戴

請客當然就是李登輝請客囉。後來老戴跟我講，李登輝明明知道他是反台獨的中華民族主義者，爲什麼要把他請回來放在身旁？他認爲，李登輝對兩岸關係欲有突破，所以才請他回來在身旁，以便有所作爲。能爲突破兩岸對峙的僵局有所作爲，能爲兩岸的和解與統一有所促進，這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願，當然包括自命「出生於台灣的客家系中國人」戴國輝在內。中國讀書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能有兼善天下的機會，亦該當仁不讓。

老戴自認爲是有所作爲而當仁不讓，甚至不避清議的指責和疑慮，就有朋友當面指責他當李登輝的官是「晚節不保」，但他卻以爲「以其有所待也」，而樂於背負一時之誤解，以待來日澄清。

老戴當官不久之後，就不再請我們這些「牛鬼蛇神」吃飯喝酒罵李登輝了。一九九七年，是「二·二八事件」五十周年，台史會和夏潮基金會合辦學術研討會，我們也邀請了老戴，老戴也欣然同意，我們把研討會的廣告刊在《海峽評論》上，但是開會時，他卻缺席了。我去問他爲何缺席，他告訴我，《海峽評論》的廣告登出後，有他的名字，「他們」就去找老戴說：「你現在身分不同，怎麼可以公開跟他們統派搞在一起。」後來，老戴找我見面，都是他打公用電話給我，我也不方便打電話到他家去了。除了反華、分離主義外，李登輝的言行愈來愈皇民化，老戴在日本還反對過日本竄改歷史教科書，一九九七年，李登輝也在台灣竄改國中「認識台灣」歷史教科書，我們發起了抗爭運動，我把國立編譯館印的教科書初稿帶上山到老戴新店的家裡，李登輝要用這樣的教科書毒化台灣下一代，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強力的要求老戴出來講話，以捍衛台灣史的真實和台灣人的尊嚴。

記得，那天老戴安排我坐在他的書庫裡談話，遠離他家的電話機，並且開啓收音機的音樂，我知道他是擔心家中有竊聽的裝備。他告訴我，我在北京開會中提到他，台北都有錄音帶。他不方便這時候出來講話。他說，李登輝被一些日本右翼包圍了，他有一個更長遠的計劃，要組織一個以留日學生爲主的日台交流的團體，邀請一些日本進步的學者到台灣來，讓李登輝改變他的一些不正確的看法。我知道老戴不是「晚節不保」，也不是貪圖什麼官位，而是老戴對李登輝這位年輕時代就認識的老友還有所期待。所以，我就直指老戴對李登輝的期待是幻想，爲了當那麼一個鳥官，付出的代價太大。老戴也笑著跟我說：「我知道你們這些朋友都在罵我晚節不保。」

老戴那個鳥官是一年一聘的，在屆兩年之時，老戴約我在景美一家水餃館喝酒，跟我講，根據他的觀察，李登輝當總統後變了，什麼話都聽不進，他的任期快到了，不想當了，但又沒有一個專職的教職，在政大、文化都是兼任，政大是國立，年滿六十五歲以上不可能專職，文化曾給過專任教授，但因在總統府而未接。我聽到了老戴的話，即去找蔣永敬教授，我知蔣教授與文化教務長（也是歷史系教授）王吉林熟，文化歷史系應爭取老戴，讓老戴的台灣史學術在台灣有學術傳承。後來蔣教授告訴我，文化發出了專任聘書，但老戴先接了總統府聘書，只好繼續兼任。直到第三年結束，才離開總統府到文化大學專任。

老戴雖然後來不再約朋友吃飯喝酒罵李登輝了，但一兩個月總是要約我見面。龍應台當台北市文化局長之後，要整頓「二·二八紀念館」，須有專業的評審委員，我即推薦老戴。北京盧溝橋「中國人民

抗日紀念館」成立台灣抗日展覽館，我也極力向張承鈞館長推薦老戴，張館長來台灣，我還介紹了他們認識。

《海峽評論》經費稍微寬鬆一點，我們開始重刊台灣史料，許多資料都是老戴提供的，他一再說不要提及他的名字，但我一定在出版前言中交代該書的來源，每次被他罵，我只有一笑置之。我之所以提及老戴之名，為的是留下歷史紀錄，老戴果真「晚節不保」，會為「大統派」王曉波提供台灣抗日史料嗎？耿耿之心，老戴地下有知也應會諒解罷。

去年我們把《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武裝抗日的部分譯完準備出版，我想請老戴總校訂一遍，但當時老戴已罹肝病，先都答應了，後來實在體力難以承擔，我只好請他寫個序，因為這套書的日文本是老戴費盡氣力蒐尋復刻出來的，他是唯一作序最適當的人。他似乎還是擔心被人「誤會」，而在序文一開始即予以「澄清」。

主持本書出版的王曉波教授囑我在本譯書的前面寫一篇序，使我頗感惶恐，因為我一直不願與搞政治／社會運動的朋友們走得過於「親近」。雖然，我尊重朋友在其社會行為為上所作的諸種自主性選擇，但我一直堅持著要我朋友們，亦能尊重敝人不介入任何黨派的政治／社會運動之生活信念。筆者一貫地自我期許，更盼望能出「污泥」而不染，繼續在學術界盡一點綿力。

老戴真的是「一直不願與搞政治／社會運動的朋友們走得過於『親近』」嗎？老戴基於其強烈的道

德感和救贖感，一直對台灣原住民運動予以熱切的關懷，而和胡德夫、莫那能、孫大川過從甚密；他在東京，心在台灣」，在「黑名單」的時期，康寧祥、許信良，甚至李登輝路過東京無不熱情接待。只是這十幾年來的變化太大了，叛亂犯變成了執政黨，執政黨變成了「賣台集團」，唯一不變的是堅持台灣人民立場的愛國主義，我們從來沒搞過什麼政治運動，但從戒嚴時期的「共匪同路人」，到解嚴後的今天還在被安全單位以「偵字號」監控，以至於老戴跟我聯絡還得用公用電話。老戴到了晚年，不願再受政治干擾，希望有生之年能完成他的台灣史著作，這才是真心。

陳水扁當選後，他還在報上寫過一篇文章，婉轉的勸告陳水扁不要走李登輝的路線。去年秋天，有一次，老戴約我到台大旁邊咖啡廳，那天老戴的精神還不錯，吃了兩客大冰淇淋，他說，吃了陳立夫的方子，肝疾被控制住了，我還跟他開玩笑說：「壞人禍害一千年，死不了！」並且鼓動他站出來說大聲話。他說，現在還不行，因為夏天他趕到日本之便，到大陸去走一趟，雖誰也沒找，但他擔心台灣當局會有情報，他卸任還未滿三年，規定不得前往大陸，李登輝的勢力還未消除，一旦得罪，不免挨整。

他還一個人到了盧溝橋看了台灣抗日展覽館，他覺得非常難得。老戴一向評人論事標準甚高，所以我故意激他說，有總比沒有好，台灣連有都沒有，大陸的再差也比台灣沒有好。他不能不同意，並且我告訴他，據說是李嵐清和錢其琛兩位副總理批的，並且指示不僅盧溝橋，全國各地的抗日紀念館都須有台灣抗日的展覽。小林善紀說，要尋找「日本精神」得到台灣來，看樣子，尋找「台灣精神」則要到大陸去才行了。

那次他還很興奮的跟我講，徐宗懋也跳出來搞了一個「台灣史工作室」，並且他手上還拿著剛買到的徐宗懋出版的照片集。去年光復節，台北市支持徐宗懋辦了一個日軍征台的漫畫展，老戴也去了，很仔細的一張張的觀看。

我最後一次見到老戴，是在去年十二月三日，東吳大學舉辦「百年來海峽兩岸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反省學術研討會」，我的論文是「日據下台灣民族運動及其兩條路線——林獻堂與蔣渭水的比較研究」，大會安排的評論員就是老戴，老戴把我三萬多字的論文逐句讀過，提供了不少補充的意見，並修改一些文字，例如，我文中敘述到「全島大抵平定」，老戴即把「平定」改為「被鎮壓」，蓋「平定」是日本官方立場的用語，站在台灣人民的立場只能說是「被鎮壓」，這正是老戴治台灣史不失其「主體性」的地方。

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聯合報》報導了小林善紀新出版的《台灣論》在日本熱賣，也訪問了老戴批評的意見，我即聯絡「誚社」的朋友，是否可以召開一個「媒體座談會」，經許明仁、張麟徵教授等同意後，我即於一月二日聯絡老戴，他也欣然同意，但他建議等中文版出版後再召開比較適宜。我們也接受了老戴的意見，等中文版出版。

不意，一月五日夜，接到戴大嫂電話，老戴已病重轉加護病房，我即趕到台大醫院，陳映真夫婦、陳純真、王津平已經都到了，除了戴大嫂外，老戴的二男一女也都在焦急的等著消息，消息非常悲觀，醫生認為老戴過得了今夜，恐怕也過不了明夜。我們還是極力的安慰戴大嫂，夜深了，戴大嫂要我們先

回去等她通知消息。老戴一直在昏迷中，沒有起色，九日夜接到戴大嫂電話，老戴已於下午五時三十分宣告不治。

老戴的一生，正是戰後台灣知識分子的寫照，出生於日據時期，少年時期以前受過日本教育，從小被日本老師羞辱，在〈隱痛的傷痕〉一文中，老戴說：「這一片往日的傷痕，依然清晰的留在我心靈深處，它常常在不知不覺之間隱隱作痛，啃啣著我的記憶，歷久彌新。」

光復後，歷經「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到日本留學以至流亡，他沒有認同過任何政權，但堅持著出生的尊嚴和學術的尊嚴，作爲一個「出生於台灣的客家系中國人」立場從未動搖，作爲一個來自日本前殖民地台灣，而不得不流亡寄食於日本的戴國輝，卻在日本堅持著批判日本對台殖民統治的「主體性」，老戴的勉力自有其可貴的、自我價值的肯定。

晚年退休返台，自以爲知遇於李登輝，思有所作爲於國族，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唯所託非人，今上已非昔友，四十載東瀛苦守之漢節幾乎毀於一旦，幸「君子可欺之以方，而不可欺之以道」，只好黯然離去。所以，他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五日寫道：「三月中旬以來，我一直爲精神上的『自我解套』，開始著手編我文集。」老戴新出的中文文集只出版了《台灣史探微》、《台灣近百年史的曲折路》二本，雖預告了第三本《近代台日關係史論》，但還沒出版，老戴就走了。

朋友們都知道老戴走得不甘心，但天下有誰是走得甘心的呢？老戴一生作爲一個堂堂正正的「出生於台灣的客家系中國人」已了無遺憾，爲台灣近現代史蒐尋史料，保留紀錄，更是功在後代，他所提倡

的台灣人的「主體性」，一旦台灣歷史恢復正常也必然會建立起來的，他生前念茲在茲的信念，也是他最後二本文集的自我介紹所言：「他既愛故鄉台灣，更不忘原鄉未來的走向，他率先提示了(1)出生(2)民族(3)職業等三項的基本尊嚴。」

老戴是「出生於台灣的客家系中國人」，日據時期客家人台灣作家鐘理和曾有言：「原鄉人的血；必須流回原鄉，才會停止沸騰。」他之所以晚年「失身」於李登輝，就是因為「既愛故鄉台灣，更不忘原鄉未來的走向」，戴大嫂依老戴的心志，將老戴的骨灰海葬於台灣海峽，讓故鄉和原鄉能透過海峽的海水緊密的連結起來，讓原鄉人的血永遠能流回原鄉，又誰曰不宜呢！

老戴，安息吧，台灣人的悲情必然會結束，台灣人的心靈將不再受到殖民歧視的凌辱；中華民族復興的曙光已在望，中國人民將不再受到貧窮落後的摧殘；您也必然是一個有尊嚴的「出生於台灣的客家系中國人」，直到永遠。

——原載《傳記文學》第七十八卷第三期

洗滌的靈魂

葉芸芸

——悼念張光直與戴國輝先生

這是記憶中最寒冷的一個冬天。二〇〇〇年只剩下最後的兩天，剛剛送走回來度假過節的兩個兒子，當夜就來了一場大風雪。家又恢復了平日的秩序，兩個人伴著一隻名字叫做「星期四」的貓。整整有兩天，門前的馬路，看不到有過路的人煙車跡，尺深的積雪環繞著小屋，寂靜無聲，宛若冬眠。

二〇〇一年元月初五日，我從紐約的華人報紙上得知，張光直教授三日病逝於波士頓。當夜又接到興夏小姐的越洋電話，告知戴老師病危的消息。

光直先生苦於帕金森氏症的折磨已經超過十年，因此聽到他辭世的消息，比較不感到突然。戴老師一向硬朗而炯炯有神，雖然年前曾因肝疾住院，但是，怎麼也想不到他竟然真的垮下來了。隔日，從台中趕去探望的旭弟，在台大醫院門口來電話，報告戴老師彌留的病情。

終於，在美東時間九日的晚間，電話中傳來彩美姐姐的哽咽：「芸芸啊！戴國輝走了。」數日間，這世間的有心人突然就少了兩位，怎不令人唏噓不已呢。

同年同月同日生

張光直教授與戴國輝教授，不僅同年同月同日（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五日）出生，如今又間隔僅六日相偕辭世。生命的起點與終結無由選擇，只能嘆說是巧合。不過，屬於同一世代的他們，成長過程所經歷的共同時代，影響他們一生活行誼極爲巨大，卻是很明顯的。

光直先生出生在淪陷的北京，十五歲才初次回到他父親的故鄉台灣；他說一口流利的北京話，說起閩南話也帶著北京口音。客家籍的戴老師出生在桃園中壢，在日本皇民化運動下接受他早期的教育，他的閩南話帶著客家口音。

一個在台灣，一個在大陸，少年的他們經歷過被殖民、被征服的屈辱與挫折；他們也見證了殖民者、征服者、日本的敗戰，以及被殖民、被征服的祖國的慘勝。

戰後初期，相遇相知於台北建國中學的少年張光直與戴國輝，目睹了那場驚心動魄的二·二八事件。軍警格殺民眾，群眾失去理性的暴行，都留置在他們少年敏銳的心靈；因爲帶著腔調的閩南話，他們還遭遇一些困擾與危險。

少年的他們曾經浪漫，曾經熱切的關注人間的正義、國家民族的前途。隨著國共內戰政局的變化，韓戰爆發後，全球冷戰時代來臨；白色恐怖鋪天蓋地而來。風聲鶴唳的大逮捕聲浪中，他們失去許多尊

敬的師長與親愛的友人；不僅如此，當時肅清思想的四·六學潮，十八歲的中學生張光直竟而有過一年多的牢獄之災。

小心翼翼地，他們讀完了大學，在五〇年代初期。光直先生捨棄了他所鍾愛的文學，而在台灣大學讀考古人類學；戴老師則遠離台北，到省立台中農學院讀農業經濟。而後，攜帶著少年的困惑與傷痛，他們終於展翅飛翔，離開島嶼故鄉的是非。光直先生到美國哈佛大學，戴老師到日本東京大學，各自繼續在學術的領域，開展視野，奮鬥不懈。

扎實豐碩的學術生涯

張光直先生以《古代中國的考古》，奠定學術地位。歷任耶魯大學、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教授；歷年獲選為美國科學院、美國文理科學院及中央研究院院士。光直先生開創新的觀點與研究方法，重建中國上古史青銅時代及殷商文明，貢獻卓著。多年來，致力推動兩岸考古與人類學研究的光直先生，對於台灣的考古學與人類學研究，更有開創性的貢獻。一九六〇年代，他就完成台灣第一個完整的考古遺址發掘「大盆坑；鳳鼻頭與台灣史前史」。一九七〇年代，主持涵蓋考古、歷史、地理、地質的「濁水大肚兩溪人地關係的研究計劃」。一九八〇年代，再主持「台灣史田野研究計劃」。不僅提升台灣史與考古人類學研究的人文與科技的方法與材料；開啓新的視野、觀念與層次；並且，在故鄉栽培了大批這方面

的人才。

一九九〇年代，光直先生應李遠哲先生的邀請，回到台灣擔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數年，並倡議促成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之成立。

戴國輝先生以〈中國甘蔗糖業之展開〉奠定學術地位。歷任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立教大學史學系教授、系主任、研究所所長、國際中心長；並在學習院大學及一橋大學兼任教授，是第一位在日本皇族大學任教的中國人。戴老師的研究主題，從台灣糖業經濟史切入，而追溯到它的前史：七至十七世紀中國社會經濟史的一個側面〈中國甘蔗糖業之展開〉；從寬廣的亞洲關係、中日關係、台日關係到東南亞的華僑史。而他最關注的當是台灣史，早在台灣史研究仍為禁忌的七十年代初，他就在東京領導一個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整整十年而編撰成《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不僅揭穿日本殖民台灣的黑暗一面，也從學術上表達了他「漢族系台灣人對原住民懷有原罪感」的人道關懷。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追尋戰後史的悲劇真相，解讀政治陰影下扭曲迷惘的認同危機；更而探索歷史的鑑戒，對兩岸問題有更深遠的洞察。

一九九六年，戴老師以十八噸的貨櫃攜帶他的藏書返回故鄉定居，出任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一九九九年辭職。

兩代的情誼

當我初遇光直先生與戴老師的時候，兩位先生都已經在大學任教多年，不僅在各自的學術研究領域擁有一席之地，並且獨領風氣。

我雖有緣有幸受教於他們兩位，但是我離學術殿堂之門太遠，不敢以弟子自居。兩位先生的學術成就，留有等身的著作，不言自明。兩位先生交遊四海，桃李滿門，追述先哲的行止也毋庸我多言不及義。不過，我與他們兩位卻各有一段比較不尋常的兩代情誼。

光直先生尊翁張我軍先生與家父葉榮鐘曾經少年英雄惺惺相惜，並肩征戰二、三〇年代的台灣新舊文學論戰。原籍板橋的張我軍雖然長期旅居北京，不過淪陷的北京比之被殖民的故鄉，並沒有好多少，也在日本軍國主義的蹂躪之下。戰後，壯年的張我軍，在歡慶光復的熱情殷切氣氛中，攜眷回到了故鄉台灣，遂而與鄉親故舊一起經歷戰後初期的轉折，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張我軍與夫人正在台中市訪問故舊好友，事件中家父捲入台中市的風起雲湧；張我軍與夫人一家則受到台中師範校長洪炎秋及台中友人的照顧。

劫後餘生的父執輩們，在其後旋踵而至的白色恐怖年代，如果說養家活口之餘，還有些許的慰藉，可能只是還有少數幾個昔日志同道合的相扶相持。

張我軍先生的名字我自小就耳熟能詳，曾否見過英年早逝的他？卻不能記得了。光直先生很早就離開故鄉，我不曾見過出國以前的他；卻知道他少年時代因政治思想惹來的麻煩，以至於必須由楊肇嘉先生等台籍大老擔保，才得以出國留學。這些大約都是在家裡聽來的吧！小時候我們住著一棟日本式建築的房子，父執輩們在客廳談話，我在紙門紙窗邊常會聽到幾句話頭話尾。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就曾在父親的書桌上看過戴老師的論文，我相信他與家父相知是很早的。但是，他們的初次見面，卻要遲到一九六九年秋，長期名列黑名单的戴老師，首次得以安全返鄉訪問之時。父親當日的日記記載著，那是一見如故，相見恨晚的相遇。

一九七四年，父親與母親漫遊美加數月，秋天返台途中，特別在東京逗留近月。而有機會一睹吳濁流先生所嘆譽的「蓬萊第一峰」，瀏覽戴老師長年來獨力收藏的有關東亞、中國、台灣史研究的書籍，並與戴老師所主持的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的成員交流。深深受到感動的父親，返回台灣之後竟然重振雄心，要為保存及研究台灣史再有一番作為，曾經請王詩琅與康寧祥兩位先生陪同去找吳三連先生，希望能借重吳先生來推動一個台灣史料及研究的機構。

充滿挑戰的戴老師

家父在一九七八年過世後，又過了數年，我才有機會在北加州初會戴老師。年過半百的他，一臉童

稚的挑戰，幾近俏皮地說：「我竟然不知道葉榮鐘還有個能拿筆的女兒！」那是一九八三年的春夏之交，他在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擔任客座教授一年；我為籌辦《台灣與世界》月刊而到灣區拜訪作家邀稿。

即使是今日，想起自己給戴老師寫的第一封信，依然會背脊發涼，而冷汗三斗。就在信封上，他的大名戴國輝三個字，我竟寫錯了兩個字；不只一次，我被他修理得面紅耳赤。但是，我知道戴老師不是怪我不敬，這只是他行事認真、求學問追根究柢的個性。

一九八三年，戴老師即以「梅村仁」之筆名，在《台灣與世界》月刊上開闢專欄「二·二八史料舉隅」；同時，他也極力鼓勵我往口述歷史的方向發展。此為日後我們在一九九二年出版《愛憎二·二八》之濫觴。

那些年月，我一邊辦雜誌，一邊尋覓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見證人，不時還往來太平洋兩岸，進行口述歷史的採訪工作。另一方面，我也是一個四口之家的主婦，還有一份補貼家計的工作。因而心力交瘁，陷於低潮之時在所難免；這種時候，戴老師又是瞪著一對大眼睛，充滿挑戰的對我說：「葉總理，這麼一點挫折就氣餒，怎麼可以？」「葉總理」是他給我的戲稱，大約是因為從雜誌到家務事，要我分心照顧的事情太多了。從來告誡我要遠離政治的戴老師，因緣際會接受李登輝的邀請，於一九九六年返台擔任官職，的確讓許多朋友不了解。

希言不爭的光直先生

初識光直先生是在一九七四年，那時他方逾越不惑之年，已經是耶魯大學考古人類學系的資深教授。希言不爭的氣度，讓他更像是個沉潛的長者。他總是稱呼我「葉先生」，因為他是在北京出生長大的，我只當那是北京人的習慣。但是，受尊稱為「先生」，對一個從台灣來的年輕女孩而言，確是從未有過的經驗。

那時，光直先生很積極地推動兩岸的考古與人類學研究。我離開台灣才只有兩三年，對大陸與台灣的三〇年代文學、日據下的台灣左翼政治社會運動、二·二八事件、國共內戰、延安時代與長征的中共、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大陸、甚至於蔣介石的秘聞等等；只要在台灣是禁忌的，我都有強烈的好奇。耶魯大學的校園裡有壁壘分明的中國同學會和台灣同鄉會，又常有介紹新中國的電影與演講。對於這些熱鬧的學生活動，光直先生也會出席，但是他很少發言，私下也很少表示意見。

有一次，光直先生卻頗為認真地對我說，台灣人應該好好研究二·二八事件；又說耶魯大學的東亞圖書館就有不少資料，可以從當時的《新生報》著手。記得他還特別提到新生報的「橋」副刊；不過並不會告訴我，「橋」副刊上有他文學少年時期的文章，雖不能說是光直先生這一番話，就讓我走上了二·二八研究之途，但我的確是從那時候慢慢出發的。

一九七七年，光直先生回到哈佛大學任教，一九七九年文典完成耶魯大學的學位，我們也跟著搬到南加州，見面的機會就少了。八十年代，我主持的《台灣與世界》有一個訪問台灣人物的專欄，光直先生也欣然同意；我乃請當時在耶魯大學深造的陳弱水與周婉窈負責、採訪成稿（舊垃圾堆中建立起來的學問）（《台灣與世界》#26, 1985.11）。

一九九七年春天，我和文典一起返台，特地到中央研究院去看光直先生。苦於帕金森氏症多年的他，剛剛動過一個胚胎移植的手術。雖然說話不很清楚，但是思路非常清楚，記憶力尤其驚人。那天他跟我提起兩件事，是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我們在北京他的哥哥光正家中見面，當天家母也在場，於是他問家母是否仍健在？並說就是那次到北京之前，才診斷出他的帕金森氏症。另外一件是，他想把早年因四六學潮而入獄的事寫出來。那時，他拿筆寫字已經很困難了，直說可以用電腦打字寫作真是太好了。

那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光直先生。

洗滌的靈魂

光直先生和戴老師的同一世代，有許多人之所以出國留學，是因為當時的台灣，實在是待不下去了；這樣一種近乎逃亡的心理，在五十年代的留學生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被殖民的怨恨屈辱、戰爭的悲歡離合、光復的狂喜、二·二八事件的驚駭與白色恐怖的血腥，織成一席如影無形的髮網，難以解

脫的「自我認同的困擾」之枷鎖。

遠離故土浪跡天涯的光直先生和戴老師，如何超越他們少年的夢魘？

那至為孤獨的跋涉，轉折煎熬的心路，我只能約略瞭解一二。光直先生和戴老師所體現予我的，乃是一種啓示，也是永恆的鼓舞：「歷史之昨日」的負面確能昇華，成爲百般堅韌而向上的動力與智慧。他們洗滌了自己的靈魂，而成爲心靈更爲健康、更爲自由的人。從而，他們尊嚴地接受，那纏繞著自身爲中國的台灣人的責任。

（二〇〇一年三月九日 於長島石溪）

——原載《傳記文學》第七十八卷第四期

戴國輝與許常惠

孫大川

元月上旬，許常惠教授和戴國輝教授相繼過世，一是元月一日，一是元月九日；許教授享年七十二，戴教授七十，皆至「古稀」之年，一切彷彿是講好的一樣。

我無法推斷兩位教授生前是否熟識，但做為他們共同的「小老弟」，我在他們身上的確看到許多因時代、性格和際遇形塑出來的既相似又獨特的生命風姿。

知道兩位教授的大名，當然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但是彼此間有些「私誼」卻是近七、八年來令人懷念的交往。這一相遇的共同交集主要是因為「原住民」的關係。許常惠教授是音樂家，但卻長期從事民族音樂的田野採集和研究工作，在他的帶動和努力之下，近百年來台灣原住民各族的樂舞才得以被保存並逐漸跨入學術的殿堂。幾年前就在他的鼓勵和支持底下，由他的高徒阿美族的巴奈·母路和其泰雅族夫婿孔吉文醫師創立「原住民音樂文教基金會」；幾年下來，不但鼓舞了不少原住民朋友親自投入自己族群音樂的研究，還累積了相當的成果。我和許老師的會晤，大都是在基金會或音樂研討會中進行的。隔場休息時間或中場茶敘，在會場的角落抽抽菸、喝喝雞尾酒、交換小小的意見、說說笑話，輕鬆

、零碎、自然，如一小段一小段精緻的小品文。許老師平易、溫厚、放鬆、淡淡的幽默感，讓每次的相遇都彷彿夏季午後巴黎咖啡館外慵懶的邂逅。

相較起來，和戴老師的相識便顯得辛辣且戲劇化得多。民國八十三年左右，一個背著旅行包、頭髮半白、神情嚴肅的「糟老頭」，撞入羅斯福路山海文化雜誌社凌亂的編輯室。交換名片之後，才知道他是民國六十年代以來，以台灣人意識的論述，驚動文化界的戴國輝教授。出身農經博士，卻以台灣史為志業歸宿，尤其著眼於台灣精神動力發展歷程的探索。長年旅居日本，教學、著述，引領風騷。戴老師的來訪和《山海文化》雜誌有關，他對我們這樣一本原住民的專業雜誌有著很深的期待。後來我知道他因研究台灣史的關係，蒐集了相當多的台灣原住民史料，特別是有關霧社事件的收藏。他表示自己是懷著原罪的心情來保存這些資料的，希望日後能和原住民一起重建台灣史。戴老師讀書很雜，話題一開，從時事評論、人物品鑑到文化歷史戰略，縱橫交錯，猶若巨浪翻騰，浩浩蕩蕩。如果配上他的眼神、臉部表情和說話腔調，保證讓你自慚形穢、破功不已。

第二次正式見面，已是民國八十五年總統大選後。李登輝總統延攬戴老師入總統府任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當時我正被新政府探詢入閣任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副主委一職之意願，戴老師是我唯一徵詢的對象。在重慶南路一家咖啡館二樓，他的勸進當然還是從國際大戰略談起。那是影響我大半生的下午！之後，我們便常有見面餐敘的機會，到他新店的新居，認識優雅的師母，參觀他一屋子的藏書。他和家人還開車到台東，參加我卑南部落的年祭，似乎深受感動，回台北後寫了一份報告給李總統，為我

賺了一次和總統私下談話半小時的機會，他得意非凡，其實他是非常在意李總統的。認識愈深愈理解到隱藏在戴老師嚴苛面容背後頑皮、童稚的一面，他喜歡我沒大沒小挖苦、調侃、諷刺、開玩笑的相處方式；我很能逗他開心，他笑起來或無厘頭鬧起脾氣來，就像一個長不大的孩子。我常說他瞪眼、歪嘴，大聲辯論的驕傲樣子，像極了李登輝。

許常惠老師狷中帶狂，戴國輝老師狂中帶狷，兩人都深受日本文化的影響，都愛原住民，也是李登輝總統的朋友，他們共同標識著和我們完全不同的世代和情感。人間情誼，貴在能有所感通，既有感通，則生命必可通傳。如此，緣盡也不是盡，不盡也是盡……。

松花江上

孫大川

在戴國輝教授素雅感人的告別式上，聆聽女聲樂家呂麗莉演唱的〈松花江上〉，悲愴無法自己。據說這是戴老師生前最喜愛的歌曲之一，也表達了他和一般狹窄、封閉的台獨人士不同的器量和不同的文化、歷史襟懷。前監察院長王作榮先生隨後發表感言，至性至情，感傷中不失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堅定與豁達，這是台灣失落已久的人格風範，全場爲之動容。

王院長的談話，從一九七〇年在日本和戴教授相識的因緣談起，提到他和戴教授以及李登輝總統之間長達三十多年的友誼。他說戴老師讀書、做人、做事都相當嚴謹，是正派人；這樣的人物品鑒標準，其實也是戴老師常常掛在嘴上的。我想他們能保持長期的友誼，正因為他們都是正派人，不像現代一般檯面上的人物，一腦袋的克里姆林宮。接著話鋒一轉，王院長幾乎以一種感傷語調，談到〈松花江上〉這首抗日時期大家耳熟能詳的老歌。一個流亡學生，在烽火離亂的大時代裡，藉一首悲愴的歌曲，寄託對家國父母無盡的思緒。話從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口中說出，那種蒼涼、孤寂的氛圍，令人心碎。他說現代年輕人，不可能瞭解他們那個時代的心情，如果以台灣目前歷史教育的淺薄情況來看，院長的感慨

不是沒有原因的。其實〈松花江上〉這首歌，我初中的時候就會唱，連同〈故鄉〉和斯義桂主唱的〈嘉陵江上〉，都是我青少年時代常常演唱的歌。我幾位外省籍的姊夫和馬蘭榮家的伯伯們都喜歡聽，尤其幾杯高粱下肚，引吭高歌，往往能牽動大家的情緒，竟至淚流滿面。我當時就強烈的意識到潛伏在這些長輩生命底層那深沉的時代哀痛，對他們而言，歷史不是抽象的知識堆砌，而是仍然活在他們的血脈裡的东西。這對我這樣渴望歷史存在的卑南族少年來說，格外感到親切。卑南族是一個沒有文字的民族，部落和族群的記憶只能依賴口耳傳遞，母語的快速流失，使我們的歷史記憶逐漸模糊、斷裂，即將失去歷史的焦慮感，深深影響我的少年時代。在那段歲月裡，唱歌變成建構我的歷史的唯一方式。我不但學會許多卑南族的古調，聆聽母親訴說哪些歌是祖父或曾祖父的歌？哪些歌又是某某長輩的招牌？並連帶談及這些人的生平往事。我的部落歷史知識，就是這樣一首又一首建立起來的。在這當中，日據時代的日語歌謠以及國民政府遷台前後流行在上海的歌曲，也都成了我歷史串連的材料。文字之外流動在音符上的歷史傳遞，往往使我感覺到更能領略歷史中非文字的情感因素。那絕對不是理性的文獻判斷所能掌握。

戴老師和王院長在〈松花江上〉這首歌的生命相應，或許應該從這樣的角度來理解吧！一位有中國文化意識的台灣人，和一位奉獻一生命給台灣經濟建設的大陸人，在對日本侵華暴行的共同歷史判斷上，連結成牢固的友誼同盟。他們合著的《愛憎李登輝》，當然不是政治信仰或路線上的分歧，他們有完全不同的歷史認知和情感歸屬。〈松花江上〉正是戴教授、王院長與李登輝總統分道揚鑣的大分水嶺

。近日來小林善紀的《台灣論》，以及總統府資政許文龍先生引發的慰安婦事件，清楚地告訴我們：台灣內部要處理的歷史問題仍然繁鉅，這不是簡單的政治炒作所能解決。過去以政治意識形態打造的台灣史論述，已經到了必須徹底檢討的時刻。

致詞的末了，王院長祭告戴教授：自己年事已高，很快也會火化海葬，與戴教授在台灣海峽相遇，暢快地討論學問、月旦人物。視死如歸的約定，早已不是生死範疇所能拘限。王院長即使自歎「壯志未酬」，但典範已立，〈松花江上〉應可千古傳唱，不只追念「九一八」，也紀念二十一世紀另一個友誼的典型。

——原載二〇〇一年三月一日《聯合報》

正派的戴國輝

郭冠英

——他各派朋友的共同語言

戴國輝每次都以他那特有的口音叫我：「老郭，你好，好久不見了。」

我最後一次見他是三個月前，他來新聞局參加客家人紀錄片的介紹會，他很削瘦，我對他致上關心，但我沒想他走得那麼快。

他對我做的「世紀行過——張學良一生」紀錄片甚有好評，要我送他一套。現在想來，真高興還有這個讓我們有思想交流的機會。

我重視戴國輝的請託，因為，我尊敬這個人。

他要海葬，我會去海邊，看著海浪把他的骨灰沖回岸上，讓那溶浸了他身軀的海水沾濕我鞋子，再走回我自己的路。

這些年事情太多，變化太多了，我都記不起我是怎麼認識戴先生的。我只約略記得我們是二十年前在加州大學變得熟稔的。那時我受的黨化教育的知識仍在腦中佔主體地位，而他卻早有一更全面深刻的對歷史的瞭解。我那時看二·二八還是很簡單膚淺，是從他那才聽到他的親戚在事件中有受害，而且遭

虐殺，死事極慘。

但他卻沒什麼仇恨，他是個正直的人，愛憎分明，但是他有更高闊的角度來看問題。因為，他書讀得多，他又想得深，因此，有是非，但少偏見。

還有，他是個中國人，以中國人的角度來看問題，當然，經過這些年的非中化，他不是如此，我不敢確定，還是我以前看錯了。但是，那些當初聯繫著我們在一起的東西，似乎沒有消逝。我就算後來與他來往得不是那麼勤，對他的文章不是記得那麼清，但我仍認為他是個可與言的朋友；當然，我們也避談他的那位朋友。

他曾與那位朋友那麼親，這或許是歷史的必然。他們間有那部分是相契的？又有那部分是相對的？後來的發展，似乎是兩人疏淡了，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題目，其原因本只有他說最好，現在王作榮應還能說些出來。據說他們兩個本準備合寫一本書，若成，那一定很有價值。後來，卻只能用對談後記錄整理的方式為之，不過，仍有可觀。

我想，基本的歧異是：一個是最知日、知中（知^ち）的在日本的中國人，一個卻是只知日，卻仇中的在中國的日本人，後者以做中國人為恥，聞中國為辱；前者堅持做個中國人不以為苦，後者卻要他為復日而共同砥礪。這點歧異，終難調合。

戴國輝有個中國學生丁果，他後來雖對老師略有批評，但一直視戴為其恩師，對戴基本立場未曾懷疑。最後聞戴有關朋友的發言，丁果還特別馳電向老師致意，師徒倆隔海笑談，卻成永訣。

戴國輝說他是「正派」，這點他的朋友都會同意，非常同意。這點就是他與各派朋友的共同語言。

戴國輝這個人

六八

——原載二〇〇一年二月十日《聯合報》

一個對人對弱小者和對民族

抱著無限關懷的歷史家

曾建民

台灣的二十世紀的歷史，大部分時期可說是在舊的、新的帝國主義和民族的獨裁政權重層壓迫下的歷史。在這種特殊的歷史中，民族受到屈辱，社會被切割撕裂，人的心靈和思想受到嚴重的扭曲。這樣的歷史，對台灣社會造成的最嚴重的後果，莫過於普遍地喪失了認識自己的歷史的能力，致使台灣社會的現實像無航標的船，迷航於汪洋中。

記得，前西德總統維茨拉克，於一九八五年五月八日納粹戰敗四十周年，對西德國會發表了有名的演講；此文題目是〈對過去的無知就是對現在的盲目〉（或也可譯為〈無視過去的人必對現在盲目〉），呼籲德國人要記取歷史的教訓，不斷地以自省的態度向歷史學習，指出對歷史的無知必然造成對現實的盲目；該文深刻地闡述了歷史認識對現實的重要性。戴國輝先生在與王作榮先生的對談中也曾提及該文，並會將該名文輾轉交給李登輝，寄望李在草擬「二·二八道歉文」時能參考該文的精神，可惜李並未有這般程度。由此可見，戴先生如何重視該文的歷史觀點。

這就是戴國輝先生，一個深刻的體認到歷史對台灣人民的重要性的先覺者。他早在一九七〇年，便

在日本創立了「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首開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的先河，當時台灣仍處於昏天暗地的戒嚴時期，這是需要一番見識和勇氣的。自此，他一生致力於追求被權力者和被時間所掩蔽的台灣歷史的真相，不斷地追尋並指示客觀的真實的對台灣的歷史觀點，以期重建台灣人民的歷史心靈和民族的認同，希望對莽撞以及充滿危機的台灣社會的走向有所影響。

戴先生研究台灣史的精神，令人敬佩的地方，除了從客觀的史料調查出發，堅持歷史學的專業精神之外，最值得學習的就是，從對人的和對民族的無限的關懷出發，燃燒著熱情把歷史還原到對人的對民族的處境的思考，並勇於批判和自省，這是他的歷史研究的最大特質。這個特質，簡單地說有下列幾個方面：

1 致力於掌握第一手材料

歷史是客觀存在的，唯有以科學的態度從事研究，才能接近客觀的史實，而掌握第一手材料是科學的歷史研究的出發點，戴先生一生據守這個原則。台灣近現代史是在重重強權支配下的歷史，幾番撥弄，歷史資料早已佚失四散，戴先生在歷史的迷霧中，數十年來，在日本、大陸、美國、台灣各地辛苦地四處蒐尋、訪問、調查，蓄積了龐大的第一手材料，並誠正地依據這些史料爬梳追尋歷史事實，才建立了獨自的歷史觀點。有別於時下許多曲學阿世，以政治風向或意識形態取代歷史的所謂「歷史學者」們

，戴先生一貫依史實說話，他的治學風範足爲後來者追習。

2 「台灣出身的客家系中國人」

所謂歷史研究，除了追求事實，還要解決價值判斷的問題，這也就是中國史學傳統的「春秋筆」的精神。要有一個明確的價值和立場，才能像歷史研究不致淪爲統治者的、權力者的歷史。特別是像戴先生那樣，身經重層的壓迫的台灣近現代史的人而言，歷史除了是一個客觀的研究對象之外，更是自己生命歷程的一部分，研究歷史也是研究自己的生命歷程，在主客觀的歷史之間不斷地辯證上升過程中，戴先生所確立的就是「台灣出身的客家系中國人」，這樣一個堅定的身分認同和民族立場。這使他雖然旅日四十多年，在日本成家立業，卻仍堅持中國國民的身分不歸化日本籍，這在對外國人重重設限的日本社會中是需要極大的勇氣來抵擋壓力和誘惑的；雖然在日本立教大學主持歷史研究所，仍持一貫的態度批判日本帝國主義對台殖民的歷史；在台獨氣燄高張的留日僑界中，他仍高舉客系中國人的旗幟；並且在八〇年代後，台灣的分離主義意識日漸氣盛之時，他毅然挺身投入「中國結·台灣結」的論戰；在二·二八已超過歷史論議被當做政治圖騰的今日風潮中，他是最早著手研究二·二八掌握大量史料的人，並把他的良心史識結集爲《愛憎二·二八》；特別是，一九九六年，他放棄長年的日本生活和事業，賣掉房子，像鮭魚逆流回母川一樣，把他一生心血換來的大量書籍資料搬回故鄉台灣，投身台灣子弟的教

學和政治建言的實踐，而在李登輝用獨大的政治權力所掀起的台灣社會的反民族認同的狂潮中，他仍孤獨地迎向狂瀾……。支持戴先生一生奮戰不懈的原動力，我想就是他以自己的生命和歷史研究，所錘鍊出來的，堅定不移的「台灣出身的客家系中國人」的身分和民族認同的立場。

3 站在弱小者的立場

在戴先生的一篇題名為〈隱痛的傷痕〉的文章中，起頭如此寫道：「這一片往日的傷痕，依然清晰地遺留在我心靈深處，它常常在不知不覺之間，隱隱作痛，啃咀著我的記憶，歷久彌新。這傷痕宛如無形的文字，寫出殖民統治下的辛酸和亡國的血淚……」，文章的結語，他說：「由於那些惡毒的辱罵所造成的傷痕，常常警惕著我……並且鞭策著我，堅持一貫主張，去反殖民主義與反種族歧視……」

從這一篇感人肺腑的文章中，使我們深深地體會到他的思想特質就是永遠站在受欺凌的弱小者的立者。這使他從七〇年代起，除了致力台灣史研究之外也關心原住民的問題，開始著手研究霧社事件，編寫了《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引起廣泛的評價，他從自己受屈辱的歷史出發，超越受害者意識推己及人，而上升到站在所有的弱小者的立場的精神高度，特別反省到，自己漢族的身分中也曾有壓迫原住民的歷史，而懷著一份原罪的心情，從事原住民歷史的研究工作。這種自省的歷史態度，在今日瀰漫著傲慢的「大台灣主義」的風潮中，更顯得珍貴。這使我不禁憶起，在戴先生的告別式上，原

住民盲詩人莫那能先生含淚高歌自創詩歌，歌詠戴先生「您是天上的星星……」的一幕。

4 提出「共犯結構」的歷史觀點

站在弱小者的立場批判日本的殖民統治的同時，戴先生也勇於自我批判，誠實地面對歷史事實，指出了部分台灣人幫殖民地獨裁者助紂為虐的「共犯結構」，點出了殖民統治下和獨裁統治下的人的兩面性。戴先生超越台灣人受害者的意識，勇於指出台灣人與加害者「共犯」的事實，這不只符合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史實，甚至對國府戒嚴統治時期，直至今日台灣人資產階級執政時期來說，也仍是一針見血的真知灼見。這對片面誇大台灣人受害歷史，盡情煽起台灣人片面受害意識，替台灣人戴上絕對受害者的道德光環，以獲取政治權力的勢力來說，不啻當頭棒喝。

從戴先生歸鄉並投身教學與政治諮詢的實踐工作以來，數年間，他好像有點沈默了，在許多次與反民族的狂瀾鬥爭時，在人少力薄的處境下，我們多麼渴望戴先生出面以正義的洪聲挺身相助啊！直到他辭去了當政者的政治諮詢工作，才又恢復了原有的對歷史與現實針砭的熱情。記得去年，我們將組團赴韓國參加為紀念光州事件二十周年所召開的「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國際研討會」第四屆會議時，他本欣然答應參加，但可惜，因為醫師忠告他不宜長途旅行勞頓而作罷。在他過世的前二個星期，也就是去年的十二月末，因為小林的漫畫書《台灣論》荒誕傲慢的氣燄，使他再度站出來，本著他特有的歷史

精神，不只批判了小林的日本右翼觀點，更嚴厲批判了「台灣若似李的自我迷失，路會愈走愈窄」（見《聯合報》，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同時，本來約定好了，邀集朋友們聚會一次，進一步談論小林《台灣論》的問題，不意他突發高烧不退，但仍堅持如約赴會，經大家相勸才作罷，沒想到隔天就陷入昏迷，一周後竟溘然辭世，留下未能如願完成的宏大的歷史著述計畫，雖然戴先生抱著未竟的著述宏願憾然辭世，但他留給我們的歷史精神卻比任何一本歷史著作還珍貴，永遠留在我們心靈的書齋。

（二〇〇〇年二月十六日於台北）

——原載二〇〇一年三月一日《海峽評論》第一二三期

不可言宣的遺憾

耿榮水

一個多月前，聽到戴國輝教授罹患重病的消息，並未特別憂心；因為印象中，他的身體還算硬朗，雖已多年未見，我對他的健康還是有信心。

不想幾天後，在電視上看到他批李登輝有關「兩國論」的鏡頭時，變得黑黝清瘦，一臉病容，令我大吃一驚，心想最近一定要找個時間，請他吃個飯，以了卻一樁心事。

源於去年七月間，他曾傳話給老友百全圖書公司老闆廖榮聲先生，希望和我碰個面，交換一點國是的意思，我因事忙，一直沒排出時間。想不到延宕至今，忽聞戴教授遽逝的消息，令我不勝哀悼，我與戴教授這頓飯成了無盡的飯局，在人間是永遠吃不成了，悲哉！

我與戴教授結識於九〇年初，尚不夠資格稱老友，平時交往也不甚頻繁，即使如此，我們卻有相知相惜的君子交情；我久仰他的學者風範，他則對我的敏銳政治觀察力頗表賞識，兩人都很關心兩岸政局發展，也在許多學術場合相互切磋。九四年夏，我與戴教授一同出席在浙江寧波舉行的兩岸關係研討會，包括邵玉銘、黃輝珍、張榮恭、卜大中等知名人士都來了。會後遊覽普陀山、北崙港，參觀溪口蔣介

石故居等，四、五天的相處，彼此相談甚歡，感覺上，他是個邏輯思考嚴謹的學者，有強烈的中華民族意識，應屬統派學者。後來我才知道，他是出生於桃園中壢的客家人，他的堂妹戴美玉是吳伯雄的夫人，五〇年代即留學日本，曾列名黑名單，直到解嚴後才得以返鄉，成爲兩岸熟知的重量級學者。

大約在九五年春，台灣首屆民選總統選舉逐漸進入高潮。有一天，戴教授突然打電話來，要我安排林洋港和他見面，表示他有一些看法想和林溝通。我立刻和林聯絡，幾天後，我們三人便在中山北路巷中的日本料理店見面，只見戴教授抱了厚厚一疊資料交給林先生，全是用日文寫的，是他對日本政情研究心得和當前政局的意見，林先生十分高興，也很感謝他的賜教，說回去一定仔細拜讀。席間，兩人各表惺惺相惜之意。雖然林洋港後來落選了，相信對戴教授一定是感念在心的。

以我側面觀察，從戴國輝邀見林洋港一事，可見在林洋港和李登輝之間，他在理念上是比較認同林洋港的，內心也希望他能當選，可惜事與願違，成了他一生中不可言宣的遺憾。

九六年夏，戴教授正式從日本立教大學退休，返台定居。不久，傳出他被李登輝聘爲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的消息，配有一部車子，享受部長級待遇，在兩岸學界引起不少議論，有人懷疑他是否被李登輝收買了。我也頗感訝異，以我對戴教授的瞭解，他們兩人的理念應有極大落差，怎麼可能合得來呢？後來我從《王作榮回憶錄》裡得悉，原來他們早就是老友，六八年王偕李訪日時，李還特別帶王去看戴，這樣的交情，在李發達後給個學術研究的好差事，也是人之常情，何忍苛責呢？

但此後幾年，戴確實極少在公開場合露面，更未曾在兩岸學術討論會上出現，報刊雜誌上也很少看

到他發表的文章，莫非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或者他已經看透紅塵，不再食人間煙火了？

事實證明，戴教授果然與李登輝不同路，兩人的老交情無法填補政治理念的鴻溝。去年五月李登輝卸下總統職務，戴國輝也恢復自由的學者之身，開始在媒體上批判李登輝的言行，《台灣論》是其中之一。戴國輝還是戴國輝，不僅學界友人同感欣慰，我也佩服他始終如一的政治立場，慶幸沒有交錯朋友！戴國輝教授走了，走得那麼快，那麼突然，那麼令好友措手不及，連見他最後一面的時間都不允許。安息吧，老戴，我們永遠懷念你！

——原載二〇〇一年三月一日《海峽評論》第一二三期

悼念戴國輝教授並抒感

毛鑄倫

去(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初《海峽評論》的編輯會議上，總編輯王曉波提到，學界前輩也是老朋友的戴國輝教授肝病惡化，正由醫方緊急救治中。大家心情一時都沉重起來，也很自然的祈盼醫療能發生助益，或者上天終會疼惜這個人，保佑他撐過這一場劫難。在編輯會議當時，大家也因此聊了一些跟戴教授長年以來的交情因緣，已經過去了的許多事，在你一言我一語的漫談中，真是歷歷如昨，沒有人想到我們很快就要跟老戴告別了。

今(二〇〇二)年一月十日晨起閱報，戴國輝病逝台大醫院的噩耗立時刺入眼簾。這是殘酷的事實，只有屈服的接受。隨後，收到戴夫人寄下的訃告，素簡的把老戴去世前的相關狀況，以及後事將怎麼辦理的程序做了通知。戴夫人具名的這篇短文，雅致樸直的表達了老戴一生的為人風格，也流露出戴氏家族含蓄但準確的尊嚴——他們終身認真堅韌的面對我們這個荒謬離奇的時代與環境的原則。不過無論如何，戴國輝離開了人世，也離開了他所愛的、所憂心的台灣。舉目四望，我們似乎很難在台灣找到另一個戴國輝般的人物，那樣用力和深情的關愛著台灣，執迷不悟的預期台灣將在未來的大中國之中有所貢

獻取得光榮，從日帝殖民地、美帝虐從的失魂落魄扭曲異化的悲慘羞辱宿命重復成人。

以下文字是受《海峽》編委會之命，所抒寫的對戴國輝教授的悼念和一些感懷。

昂然立足異域的中國人

我個人結識戴教授比較晚，但是在大學與研究所時代，便已經零亂無序的拜讀他的著作，大致上掌握了他的理論與某些特別的觀點，對這些，我是同意而且也能接受的。譬如戴教授以台灣光復前後及五〇年代台灣歷史為主體的研究論述，他提出的「共犯結構」理論包含十分豐富的意義，反映出他作研究的客觀公正與學問力道。他把對台灣當代史的解釋深刻化，這是從事同一範疇研究工作的其他許多本省（台）籍學者所遠不及的。我們應該清楚的看到，戴國輝是戰後台灣學術界真正獨立自主面對自己的歷史與命運極少數人之一，他的重要性在於能理直氣壯的為台灣人的不幸與悲情探索追究出何以如此的原因，卻絲毫不會貶損或懷疑台灣人的中國人本質與當然性。戴國輝是做為中國人的台灣人，昂然挺立於日本帝國主義奴化台灣政策與皇民化台灣人集團之前的中國民族主義大旗。他一生的此一堅持，特別是對比台灣近十多年來的現狀，足以令人思之熱淚酸淚交雜而下。我認為，這是戴國輝的不朽之處，但內心卻因此隱隱痛楚。

老戴避居日本四十一年，在他學成就業，於敵國站穩之後，便幾乎來者不拒的接待來自台灣的同胞

，並且以坦誠直率的態度跟台灣來的各路人馬懇談台灣事、中國事，而美麗、賢慧又能幹的戴夫人則在一旁燒茶、煮茶、斟酒，讓來自故鄉的同胞在異鄉享受到難得的溫暖。戴國輝與夫人應該是以這樣的付出，來交換那種盡可能的跟故國的親近吧。

二月八日《自立晚報》曾刊出一位叫邱垂亮的人寫的對老戴的追憶文字。邱某懷念戴氏夫婦在日本居處多次對他的熱忱款待與深切交談，但卻冷酷的詆毀老戴的中國民族主義懷抱與社會主義立場，恰好反襯出同樣的台灣人在品格本質上的驚人落差，也更使我確認戴國輝是如何高貴。我是多麼希望這一代以及下幾代的台灣人後生，能知道戴國輝這個人，願意學習他的著作。戴國輝進入歷史，跟他的台灣歷史研究與論述融為一體，以單獨的個人而言，這未始不是一種圓滿，但我們敢於妄論老戴人生最後階段的心境與期望嗎？戴國輝在台灣權勢如日中天的時候，從日本退休返鄉入李的入幕之賓，而又在自己告別人世前夕與王作榮對談解讀李登輝（《愛憎李登輝》），這裡面有些什麼意義呢？

廬山夜會 話兩岸大勢

一九九五年夏季，因為九四年的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對談，以及九五年六月李氏的訪美康乃爾大學之行，兩岸關係陷入一九七九年以來空前惡化緊張的時刻，大陸方面在江西廬山舉辦一場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主題卻是四〇、五〇年代的台灣史，這是戴國輝的領域，他和夫人都出

席了這場會議。但是，一九八八年一月蔣經國去世後的台灣「去中國化」運動，進行到此一時刻，已經發展出一種源於美國和日本觀點的混雜型式的「台灣認同」論述，卻正是一些台灣來的與會學者的理論武器。大陸方面與會的學者們世故的旁觀，或許可藉此比較務實與深入的了解「台灣現況」，但老戴卻因此身處一種較孤立被圍剿的狀態。這是對台灣的中國民族主義的攻擊與毀壞。我因身在現場，所以體會到戴國輝夫婦的困難無援，但也欣賞到老戴的風度與因為理解而發自真誠的寬諒，這都是主流派台灣學者與大陸學者完全無知的。我竟認為，他們幾乎是不約而同殊途同歸的在打擊戴國輝與其主張。這是不折不扣的中國人的悲劇。

但是更有趣的是，廬山研討會的最後一天晚餐時間，老戴有意的與曾祥鐸兄、王曉波兄和我討論台灣現況問題，不免涉及李登輝，由於題目很大，欲罷不能，大夥移師到戴氏夫婦下榻的房間繼續談，戴夫人從內室拿出威士忌酒和一些日式佐酒小點，她坐在老戴身邊，安靜的聆聽四個男人的交談。事實上，戴國輝是在努力的想要改變祥鐸兄與曉波兄的李登輝印象，他想要證明李登輝仍是中國人，是真誠的愛台灣以及是信仰民主的。老戴回味了不少李登輝跟他的私人友誼，「李登輝是一個好朋友」。由於酒意與老戴平板的敘述，多日開會勞累的曾祥鐸與王曉波竟然都睡著了。老戴的談話會最後變成他和我的對話，在結束談話之前，戴國輝不懈的強調李登輝多年來與他的友誼來為李辯護李（最終）的正確，我只得打起精神回答老戴，李登輝做為中華民國、KMT甚至台灣的元首，卻不斷且不以為意的說謊，這是不尋常且難以理解的，內裡必有必須搞清楚的原因。李登輝再三再四的對大陸中共也對台灣人撒謊，

只是流露出皇民化台灣人對中國包括台灣本身的自大傲慢，這種人才是真正的賣台害台者，他們無可救藥的在西洋人、東洋人之前自卑自賤；在海峽兩岸中國人之前自大驕狂，已清楚的自白了他們的異化與做爲中國之敵。中國人應清醒的面對這一批同胞中的非我族類。

當夜，老戴並未反駁我的意見，但仍間接的點到他對「外省人」的不了解與不能投入台灣人感情與問題的看法。我認爲，這幾乎是絕大多數，不論是獨是統的台灣人的共通看法，但這卻是對在台外省人的武斷且不公平的論斷。同爲中國人的台灣人，不應有這種特權或霸權。坦白言之，在台外省人永遠不能理解與同情台灣人在一九四五年之後，怎麼會有可以自中國分離出去與自認可以辦到的想法。這是甚至「台灣統派」內部的 gap。

與李登輝成一鮮明對照

那一次跟老戴的「深言」，事後回顧，我有這樣的歸納：其一，李登輝在得意之前長時間跟戴國輝的交誼，使戴相信李是（跟他相同的）愛台灣愛中國者；其二，李的柔軟身段，曲意承歡的謀求在KMT內的官祿，反而讓類同戴國輝之輩的台灣人，將救台灣的憧憬投射到李的身上。但這也是李登輝的邪惡沒有靈魂之所在，他冷靜冷血的詐騙那些真台灣人的感情與信任，而意圖將台灣和他的同胞們重新導入日本的宰制。

老戴在一九九六年如願以償的離開日本，和戴夫人與子女返回故鄉，他的更偉大的抱負就是要襄佐「好朋友」李登輝應對兩岸與對日問題。老戴在台灣統派或大中國派朋友們不太放心的默許下，參與了「李登輝團隊」。事實證明，從九六年到二千年，老戴一籌莫展，也痛苦的看清了李登輝虛妄的內在與做爲權力者的醜陋嘴臉。李登輝恰恰是戴國輝的相反的存在，但他卻在台灣現實中榮華富貴呼風喚雨，放肆粗鄙險惡的充當帝國主義走狗傷害著中國。可以想像，戴國輝在這一逆境中，鬱卒悲憤到什麼程度，他因此而肝疾惡化藥石罔效，應是可想而知的。

戴國輝的人生價值，除了他在當代台灣史的研究與詮釋的不凡成就外，尤其表現在他跟李登輝一類的皇民化台灣人的對照上。除非台灣竟然可在美、日帝國主義的卑劣用心與手段下，淪爲彼等的小卒附庸，台灣人因而永遠的成爲邊緣人，充當反華的虎俵，否則，戴國輝的人格與學說，必將拯救與解放他所摯愛的鄉土同胞，台灣人終於化解與中國之間的一切障礙，堂堂正正的恢復做爲中國人本原的真命。

謹以此文，祝福戴國輝教授在天之靈。

——原載二〇〇一年三月一日《海峽評論》第一二三期

燭火不熄·長照天地

杜繼平

戴國輝這個人

八四

「但悲不見九州同」

戴國輝教授猝然長逝了。我相信，他是滿懷遺憾很不甘心地撒手人寰的。從我對他的了解，他最感遺憾的可能有兩件事：一是「但悲不見九州同」，未及得見中國的和平統一；二是精心構思的台灣近代史未能完成問世，以為台灣史研究奠立一座里程碑。

戴教授對台灣的特殊意義在於，他身歷日本殖民統治、「二·二八」事件與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那些風雷激盪的年代，卻不像許多台籍知識份子或灰心喪志，或沉溺於自憐自艾與憤恨怨懟的情緒中，反之，他不斷以哲學、社會科學的思維，痛切而深刻地自我反思，確立本身堅定的民族認同與精神的主體性，並以此呼籲、勸誡台灣人（特別是台灣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應沉澱非理性的激情，深入地整理台灣的歷史經驗，提煉出智慧的結晶，才能為自己與台灣做適當的定位，從而有利於台灣的未來發展，否則

，終將召台灣以大禍。

從世界的角度來看，戴教授多年來不遺餘力地批判日本殖民主義與軍國主義思想，大聲疾呼台灣應徹底清理日本殖民體制的遺毒，並從思想、文化上擺脫戰前遺留下來的日本價值觀與戰後形成的美國價值觀，不再淪為日、美帝國主義的精神奴隸，重建中華民族自覺的主體意識。這些言論、思想置諸全世界反殖民、後殖民的思想歷史中，也閃耀著熠熠的光彩。台灣學術界近年來才一知半解地稗販美國學界流行的後殖民理論，戴教授數十年來對殖民主義及其遺毒的認識與批判，不論就深度、力度或身體力行的實踐皆超乎其上遠矣。在台灣崇美媚日之風猶盛的今天，戴教授的過早辭世，不單是至親好友的傷痛，也是台灣難以彌補的一大損失。

戴教授既已不能復起，思往事、傷逝者之餘，對其思想略加闡發，維持其批判的火焰於不熄，啓迪更多蒙昧的心智，或許是悼念戴教授最好的方式吧！

戴教授好學深思，雖以歷史為專業，但他強調對事物的探討不能僅止於觀察表象，而應提高到思想的層次，以掌握事物的本質，故而於哲學、社會科學亦用力頗深。從戴教授的著作、演說及我個人與他的交往中，可以得知戴教授的治學方法深受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與唯物辯證法的影響（附帶一提，國民黨史會主任委員、文化大學教授陳鵬仁在戴教授過世後，於元月十一日的《聯合報》撰文稱，戴教授在東京大學就讀時，因參加讀書會被大使館視為「左派份子」而沒收護照），對韋伯（Max Weber）的社會學理論亦有所著力，他對歷史的見解主要來自德國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雅斯培（Karl Jaspers）、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而對殖民

主義的批判，除了源於左翼的帝國主義論之外，還深受阿爾及利亞著名的反殖民主義理論家法農（Frantz Fanon）的啓發。戴教授所一再申論的主體性思考、共犯結構及其民族主義的觀點可從上述的思想脈絡得其索解。

以下僅對戴教授的歷史見解與主體性思想稍加疏解，以闡幽發微。

戴教授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台灣結與中國結》序言中說：「經過多年摸索，我已經把歷史當爲三個時間的流程來掌握：（一）當爲歷史的過去（The Past As History）；（二）當爲歷史的現在（The Present As History）；（三）當爲歷史的未來（The Future As History）。」在同書第四十二頁，他進一步闡釋道：「一般朋友對歷史的看法是當它爲一過去的事物；其實，……目前所發生的一些事物，是過去在當前的一種顯現。所以我們命題爲『當爲歷史的現在』，……再者，當今的事物亦將影響到未來，甚至可以規制我們未來的導向，或者這些事物將在未來顯現出來。因此我認爲歷史具有三個局面，……這三個局面是有其一貫性、持續性的。」

海德格的歷史觀

戴教授對歷史時間的見解與海德格在《存在與時間》這部影響深遠的哲學巨著中揭櫫的歷史觀若合符節。海德格認爲：「歷史主要不是意指過去之事這一意義上的『過去』，而是指出自這過去的淵源。」

『有歷史』的東西處在某種變易的聯繫中，在這裡『發展』是忽升忽降，以這種方式『有歷史』的東西同時也能造就歷史。這種東西以『造就時代的』或『劃時代』的方式在『當前』規定一種『將來』。在這裡歷史意味著一種貫穿『過去』、『現在』與『將來』的事件聯繫和『作用聯繫』。』又說：「歷史是生存著的此在所特有的發生在時間中的演歷；在格外強調的意義上被當作歷史的則是：在共處中『過去了的』而卻又『流傳下來的』和繼續起作用的演歷。」

海德格的存在主義哲學打破了西方哲學自笛卡爾以來主體與客體二元對立的觀點。在笛卡爾建立的哲學傳統中，作為先驗的認識主體與外在的客體世界對立，並通過認識客體，掌握、控制、征服外在的世界，成為客體的主宰。海德格反對這種觀點，他認為人不可能自外於世界，人是在未經有意識的自我選擇的情況下，被偶然地「拋擲」到世界裡，人一出生就嵌入在一個特定的時代與社會環境中，自己的父母、血統、民族都是「既定的」、在生存、成長的過程中、外在的社會、文化環境在人的身上打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構成了人的實際存在狀態，此即所謂人的「此在」。因為人是作為被決定的「此在」從事思考，故而不是笛卡爾所說的「我思，故我存在」，而是相反，「我存在，故我思」。海德格指出，生存在由人際關係結成的社會網絡中並且終究要走向死亡的最終歸宿的「此在」，會追問本身存在的意義，這時就面臨：是要因憂讒畏譏而自甘沈淪於世俗的價值標準，與時俯仰，喪失自主性？還是勇敢認清人之必死，在有限的人生中積極奮進，追索生命的真義，達到靈台清明、返璞歸真的最高境界？人一旦意識到本身的存在是被偶然「拋擲」到既定的社會脈絡中並由時間構成的有始有終的歷程，就會力

圖超越「此在」的自我，汲汲於擘畫未來。但「此在」的處境是由過去的歷史所決定的，人於「當前」、「現在」所要處理的問題是先輩與本身過去的作為造成的，即「此在是歷史的」，「存在者的存在是由歷史性組建的」，人必須在既定的歷史與社會脈絡的限制下，做出「自由」的選擇。故人的過去與今日之所為、未來之可能形成一條不可分割的歷史長河。

基於這樣的哲學觀，海德格強調，人要達到歸真的最高境界，只有勇敢接受他被拋入指派給他的「世界」並與他人共存的命運，承擔起歷史遺業，開展當下實際的種種可能性，而在同一個「世界」中共處的同代人（即共同體、民族）具有共同的命運，其共同的演歷成爲天命。因此，海德格說：「歷史還意味著『在時間中』演變的存在者整體」。與海德格關係密切、同爲德國存在主義代表人物的雅斯培對歷史的看法可爲這個觀點做一註腳：「倘若我們不想把自己消失在虛無迷惘之鄉，而要爲人性爭得一席之地，那麼這種對歷史的回憶是構成我們自身的一種基本成分。歷史觀給我們提供了場所，我們有關人的存在的意識就是從那裡來的——歷史的圖景便成爲我們決斷中的一個因素。」中國古語有云：「欲滅其國，先滅其史」，其理在此。

正視本身的歷史

戴教授多次表白他始終堅持出生、民族、學術三大尊嚴的立場。

他在〈我觀「中國結」與「台灣結」之爭論〉中說：「(一)出生的尊嚴——對個人而言，任何人的出生都無法事先選擇，是帶有命運性的一種『結果』；而個人座標軸之基點便是在其出生，因而非固執不可。(二)民族之尊嚴——我認為民族是半永久性，對自己民族的認同是一件極為嚴肅的事情，來不得半點馬虎。」（《台灣結與中國結》：九、十，台北：遠流，一九九四）在《台灣結與中國結》中又說：「既然我們沒有辦法選擇自己的父母，同時也沒有機會和權利選擇我願意生在台灣、生在中國大陸、美國或者生在日本；我們的父母在哪裡生活，我們就在那裡出生。出生的時候附帶來的是民族的屬性，民族是半永久性的，是很不容易改變的，因而民族的尊嚴也就不容易更不應該拋棄。」（同上書：四十）戴教授這裡強調人的出生與民族屬性是無法選擇的「命運」，在其他文章中也屢次強調歷史不可能有斷層，要正視本身的歷史，從中汲取歷史的教訓，以為鑑戒，並建構自我的「歷史意識」。這些看法都與海德格所主張的人應接受被「拋擲」入世的無可選擇的「命運」，承擔歷史的「遺業」，擁抱民族的「天命」頗相契合。戴教授在一九八五年的〈身分與立場〉一文中說：「我，曾經爲了超越自己，爲了自立爲更自由的一個人，更爲了正確地接受纏繞在自己身上的『責任』，開始寫了形同自願且自行套上重『枷』的一類台灣史研究評論。」（《台灣結與中國結》：一三二）一九九五年爲紀念台灣光復五十周年而寫的文章中也說：「只要我們不是醉生夢死之庸人，我們人人都該具有：爲追尋未來之光明而企求『超越當今之自我』的覺悟。」（《台灣史探微》：一三七，台北：南天書局，一九九九）對照前述海德格的存在主義哲學所言，不甘隨波逐流、與時俯仰者，就會力求超越「此在」的自我，爲未來規劃宏圖遠舉的說法，即可見其淵源所

指責拜美日爲阿公的言行

戴教授多年來著書立說的主題，一言以蔽之，就是希望台灣人民（尤其是台灣的知識份子）能掙脫日本與美國的意識形態的枷鎖，建立本身思想的主體性。他對台獨論者高喊「獨立」卻一意取媚美、日帝國主義，妄圖依人成事的軟骨頭作風，極爲不齒，自邱永漢、王育德以降的台獨論者歌頌日本的殖民統治爲台灣奠立現代化的基礎，戴教授痛斥這種媚日論調缺乏「應該具有的台灣人主體性思考」，引爲台灣人的「恥辱」。他認爲，台獨提出「台灣民族論」的根源有二：一、受日本殖民統治的殘害，喪失了對民族文化的信心與自覺的思考能力，自囚於日本帝國主義設置的牢籠中，無能與日本殖民體制對決，終乃成了「日本秩序與殖民地支配價值體系的俘虜」；二、對光復後的「二·二八」事件與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的歷史，沒有用冷靜的頭腦與嚴謹的社會科學方法加以整理剖析，徒然停留在膚淺的表象上，陷溺於主觀的情緒中發洩怒氣，因而從反國府而反外省人，進而反中國、反整個中華民族。對於台獨口口聲聲喊「獨立」，卻腆顏事仇，以奴顏與媚骨頂禮膜拜日本的價值體系，並對美國善頌善禱，戴教授極爲痛心疾首，多次指責這種拜美、日爲「阿公」的言行，是毫無主體性的表現。戴教授一生勤勤懇懇戮力於研究台灣近現代史，主要就爲正確總結歷史經驗，重新樹立台灣人作爲中華民族一員的主體性，並

提醒日本不可重蹈軍國主義的覆轍。

戴教授幼承父祖庭訓，深植客家人濃厚的漢族意識，但他絕非狹隘的大漢沙文主義者。他一方面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服膺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的治學態度，主張從事社會科學研究應把個人的情緒與社會的禁忌、成見對象化、客觀化，運用理性與嚴謹的方法加以批判性的探討，揭露內在的本質，使之昇華為科學的研究。因此他對本身的漢族意識在〈「中國人」的中原意識與邊疆觀〉一文做了深度的剖析，也為台灣漢族的祖先在拓懇台灣的過程中侵佔、掠奪原住民的土地而深深負疚，視為「原罪」。故而費時十年編輯了《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一書，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鎮壓台灣原住民的殘酷罪行，並表彰原住民抗日的英烈事跡。

戴教授一九八五年在〈戰後台日關係與我〉一文中提到，一九五五年他初抵日本就幼稚地以為「只要飛出台灣，便有了自由，從而獲得了『自我解放』」。同著名的黑人精神病醫學者、思想家佛朗茲·法農的『解放人類』的思想境界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至今只要一想起，便禁不住冷汗涔涔，慚愧萬分。」（《台灣結與中國結》：九七、九八）。

反殖民主義的代表人物法農

法農是第三世界反殖民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九六一年正當三十六歲的英年即為阿爾及利亞脫離

法國殖民的革命而犧牲，但其深刻的思想歷數十年而不衰，至今猶被後殖民理論奉為先覺。法農在法國接受高等教育，對西方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皆有深厚的造詣。他譴責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雖反對殖民統治，但思想上仍跪服在帝國主義的價值體系下，學步於宗主國之後，所圖者只是做效宗主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取代殖民者成為新的統治階級，充當買辦的角色。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以主人代表自為存在的獨立意識，奴僕代表為對方而存在的依賴意識，闡述兩者對立統一並相互轉化的關係。法農引用黑格爾主人與奴僕的比喻感嘆說，在黑格爾那裡，奴隸以勞動製造物品使主人轉化成為依賴他生存的奴隸，因而獲得解放，但黑人面對白人主人卻放棄自己的創造力只「想要和主人一樣」（Fanon, *Black Skin, white Masks*, pp.220 - 221,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7）。法農極力主張，殖民地的革命絕不是為了照白人的形象複製自己，而是謀求重建本身真正的主體性，獲得「整個人格心靈的全面解放」。他強烈呼籲，被殖民的人民應該充分發揮本身的創造力，「讓我們下定決心不模倣歐洲，讓我們的身心脫胎換骨。讓我們嘗試創造出歐洲已無能使其誕生的完整的人。」（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p.253,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6）法農積極鼓吹民族意識，但既不贊成抱殘守闕簡單返回民族的傳統，也不同意對其他民族深閉固拒，而主張聯合各個民族，共謀人類的解放。

戴教授一再強調台灣的知識份子應超越、揚棄美國與日本的價值體系，確立本身思想的主體性，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曠觀宇內，關注人類面對的共同問題。這些見解無疑也有法農的影響在內。

戴教授其人遠矣，但他充滿批判精神的宏言讜論不唯對當前的台灣仍深具警示意義，也必將在台灣

歷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一頁。

——原載二〇〇一年三月一日《海峽評論》第一二三期

平生風義兼師友

杜繼平

——追懷戴國輝教授

元月十日上午，吳克兄打電話告知報上登載了戴國輝教授辭世的新聞，乍聞此一噩耗，不敢置信看來身體壯碩的戴教授，短短數年不見，即罹肝癌，形銷骨立，終致不治，撒手西歸，隨即以電話詢問王曉波兄，方知戴教授這兩年為肝病所苦，逝世前不久還詢及我的近況。聽聞此言，哀悔之情油然而生。通完電話，與戴教授的交誼一幕一幕浮現腦際，久久縈迴不去。

十一日下午，與陳映真兄嫂、王曉波兄、王津平兄同赴新店戴教授宅第致哀。戴夫人林彩美女士起初還以節哀順變的堅毅神情相迎，等到陳麗娜大嫂擁抱戴夫人表安慰之意時，戴夫人終於忍不住強自壓抑的哀痛，放聲痛哭道：「結婚四十多年，也沒留下什麼話，這個人就這樣丟下我，一個人先走了！」那樣從內心深處迸發出來的短短一句話，包含著無限的悲慟，數十年深厚的鸚鵡之情，表露無遺，聞之不由心弦震動，淚泛眼眶。在對治喪事宜與處理戴教授遺著、藏書提供建議後，曉波兄表示，要在《海峽評論》出紀念專輯，而後，曉波兄、戴夫人又來電話告知，《傳記文學》也擬出專輯，囑我撰文悼念，乃援筆屬文，既託追思，亦以述賢者之志業，發潛德之幽光。

初識戴教授之名，是在一九八四年三月。當時我猶在台大歷史研究所就讀，同時擔任《夏潮論壇》的編輯工作。實際主持《夏潮論壇》的陳映真兄，於八三年八月底應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之邀赴美短期訪問，巧遇亦在美國講學的戴教授。兩人針對當時台灣的「中國結」與「台灣結」爭論，展開了精彩的對談，經在美國發行的《台灣與世界》發行人葉芸芸女士整理，以《台灣人意識》與《台灣民族》為題，發表在《台灣與世界》一九八四年的二月與三月號上。《夏潮論壇》隨即於同年的三月、四月號轉載。在對談中，戴教授深刻地批判了台獨的「台灣人意識」與「台灣民族論」，給我很深的印象，但真正訂交則遲至一九九一年四月。彼時我任職於「中國時報」系的《美洲時報周刊》，時任副總編輯的吳克兄得悉戴教授在台短暫停留，要我專訪戴教授對當時台灣已蔚然成風的台灣史研究提一些看法。訪問經我整理後，題為《歷史解釋權·二·二八·台灣人原罪》刊載於《美洲時報周刊》第三二〇期。雜誌在美國上市後不久，戴教授即從美國傳真一函至辦公室給我，謂拉雜而談的一席話竟能整理得條理井然，「感謝拔刀相助」。

數月後，戴教授返台在政大歷史系擔任客座教授。某日，戴教授邀我餐敘，談到他準備把「二·二八」事件用通俗的方式，全面作一深入的剖析。他表示，他苦於中文表達能力欠佳，故需人代筆，最初找了寫過多本有關二·二八與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受害人物傳記的青年作家藍博洲，為他整理口述的錄音帶，但試行一段時間後，效果頗不符合他的理想，希望我能接手。考慮到「二·二八」事件是台灣現代歷史的一大公案，台獨更藉曲解「二·二八」事件挑動省籍矛盾，大撈政治資本，而戴教授不但親歷「

二·二八」，且為探索事件全貌多年勤蒐史料，又具備紮實的社會科學基礎與嚴謹的治學態度，若能將研究成果公諸於世，必可大有助於廓清「二·二八」事件真相，戳穿台獨虛構的神話，便毫不猶豫地一口應承。

由於戴教授希望能在一九九二年「二·二八」紀念日之前出書，便商定兩人每星期見面，由戴教授依記錄在卡片上的章節綱要口述大要，我再根據錄音帶鋪陳成篇，經戴教授過目定稿，每成一章即交由《美洲時報周刊》自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初出版的第三四九期起逐期連載，全書序言亦由我代筆交《聯合報》副刊發表。此書後來借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楊澤為「二·二八」專輯下的標題，命名為《愛憎二·二八》，由遠流出版社印行。

自此，我與戴教授時相過從，一起喝茶、吃飯、逛書局。兩人經常無拘無束地坦露胸懷，縱論時局、品評人物，逸興遄飛之際，常能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從數年懇摯的交往中，我既獲益良多，也對戴教授的性格、思想與抱負有了深刻的理解。

戴教授傲骨嶙峋，愛憎分明，待人與持己俱嚴。晉朝的阮籍才高氣傲，依其對人物的評價高低而分別施以青白眼，戴教授與之有幾分相似。外表上，他望之儼然，遇有不苟同的人與事，常不假辭色地嚴厲批評。實則他有顆熾熱的赤子之心，對朋友重義氣而推誠相與，談笑之際不時還會有風趣、頑皮之語，是即之也溫的。猶記他曾帶我到師大附近的泰順街，重訪他中學時常去的「梁山泊」，訴說他如何在兄長及其同學寄居的「梁山泊」聽各路青年俊彥議論國事而頗受啓發。一路上，也沈浸在青少年時期的

回憶中，說說笑笑地由中學、大學的經歷直談到與夫人林彩美女士的戀愛史與留學日本的甘苦。最令我動容的是，有一回，談到他的眾多師長、同學、朋友在「二·二八」事件與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中，慘遭監禁、殺戮、流亡的命運，說至激動處竟抽泣哽咽道：「他們都為革命的理想而奮鬥犧牲了，幾十年來，我卻躲在日本墮落。」聽到年逾六旬的戴教授這番發自肺腑的痛悔之言，心中頓時感到震撼性的悸動，使我領會到戴教授心靈最深處始終燃燒著的不熄的理想火燄。

魯迅曾說，他不僅嚴於解剖別人更嚴於解剖自己。戴教授批判的鋒芒也同樣不只是單面向外的，他經常不吝於作徹底的自我批判。當他指控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體制殘酷剝削榨取台灣的土地與人民，並造成台灣人人格與心靈的扭曲時，也不忘揭露自己出身的地主家庭在日本殖民體制下充當共犯，分沾了日帝利潤的殘羹冷炙，享受到特權階層的利益。他在多篇文章與演講中一再提到，他初到日本留學之際，心中對日本充斥著由殖民地傷痕而來的憤恨不滿，經過二哥與師長的開導，才幡然省悟片面譴責殖民壓迫者是錯誤的，必須透過理性的分析，分清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差異與相互依存關係，在批判統治支配階級的罪惡時也應作徹底的自我批判，這樣才能清洗自己的靈魂，把怨恨、受辱的情緒昇華為自覺的、具有主體性的自立自強精神。

秉持這樣高度自覺的清醒理智，戴教授數十年來不斷為文抒論，苦心孤詣地勸導在日本殖民體制下成長的台灣人，特別是台灣籍知識分子及早衝破日本殖民的價值體系的樊籠，不要再自甘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精神俘虜，不經反省地發出諸如「日本為台灣奠立現代化的基礎」、「日本建設台灣有功」之類

的諂諛之辭。戴教授不憚其煩地申論，台灣人民只有回歸作為中華民族一員的身分，自覺地批判戰前的日本殖民價值體系與戰後的美國價值體系，恢復本身的主體性，使美、日等國的物質與精神產物為我所用，而非為其所役，台灣才有前途可言。

戴教授對於一些受過日本殖民教育的台籍知識分子以能說流利的日語為榮極感痛心，認為那是臣服於日本殖民價值體系而不自知的表現。在《愛憎二·二八》出版後，他邀我至家中聚餐，飯後我們照例又邊喝茶邊談天說地，不知怎地戴教授很謙虛地說感謝我充當他的中文老師，並為自己未受完整的中文教育，難以流暢地用中文表達思想深感遺憾。我答以「戴教授經過這些年的努力，中文大有進境，何況戴教授的日文寫作之優美，連日本人也大加讚譽，亦屬不易。」戴教授聞言非但未面露得意，還黯然而說，那不是什麼值得誇耀的事。戴教授的反應，令我對他又生幾分敬意。

戴教授和後殖民主義的代表人物薩依德（Edward W. Said）這類出身第三世界又具有高度精神主體性的知識分子一樣，雖身處帝國主義的中心國家，嫻熟中心國家的語言，躋身主流地位，卻非但未匍匐於帝國主義的價值體系之下對之頂禮膜拜，反而利用出色的學術專業能力，站在本民族的立場，分別對美、日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與行徑提出嚴厲的批判，為自身民族的尊嚴而奮戰不已。戴教授在日本曾寫過《境界（邊緣）人的獨白》，描述身在異國，徘徊於中、日文化之間的精神境況。戴教授如果讀到薩依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的這段話，或許會有些同感吧：「這是本流亡者的書。出於我無法控制的客觀原因，我成了一個受西方教育的阿拉伯人。……長期以來，我一直是個美國的局外人，特別是在美國

對遠非完美無缺的阿拉伯世界的文化與社會發動戰爭並與之深深對立之際。……同屬帝國所劃分的兩邊，使我更容易了解雙方。」（*Culture and Imperialism*：xxvi-xxvii,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3）戴教授經常撰文促請日本應該反省對亞洲國家所犯下的罪惡，對日本右翼軍國主義分子尤深惡痛絕，強調台灣知識分子應知日，但不親日，更不能媚日，以免助長日本右派勢力的氣燄，造成日本軍國主義復甦，亞洲以至世界重又遭殃的悲劇。不過，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台獨人士還是在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六日在台北演出了「馬關條約百年告別中國」大遊行的醜劇，呂秀蓮更跑到日本下關的春帆樓去感謝日本佔領台灣，使台灣走向現代化。戴教授對此只能「感到無奈及痛心」。戴教授對喪失精神主體性的台獨人士所提的「台灣人意識」、「台灣民族論」屢有不客氣的批判。魯迅對中國老百姓的愚弱曾有「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之語，戴教授嚴厲指責台獨分子拜美日帝國主義為「阿公」，則可謂「哀其不幸，怒其不思」了。

自一九九五年後，我與戴教授日益疏遠起來。這一方面是因為我自一九九三年負笈北京後，大半時間待在大陸，另一方面，眼見李登輝日益走向分離主義的乖謬言行，戴教授非惟未秉一貫立場，痛加針砭，反而發表了一些為其迴護、轉圜的言論，深不以為然，於是便疏於問候。迨一九九六年五月戴教授任職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正式成了李登輝的入幕之賓，我更是敬而遠之了。

一九九七年中，戴教授邀請一些朋友到新店山上的新居相聚，我對戴教授歷數李登輝自一九九四年與司馬遼太郎的談話以來種種媚日反華不可原諒的言論舉措，語氣激動地指責說：「按照戴教授過去的思想、原則，戴教授理應嚴厲批判李登輝，為什麼戴教授還甘為所用？真是晚節不保！」戴夫人在旁聽

我痛批李登輝，頻頻點頭表示同意，戴教授則面色凝重，偶露苦笑，沒有答辯。從這次會面後，我深感戴教授身陷宦海，身不由己，談話多所顧忌，已難以像過去那樣暢所欲言，盡抒懷抱了，自此即未再與戴教授謀面。

戴教授何以會應李登輝之召甘為所用？這是一些反對戴教授就職國安會的人的共同疑問。從戴教授與我交往中所表露過的想法與心態看來，我推測：戴教授是誤把李登輝對他的「收編」當成「知遇」，而想透過影響李登輝來推動台灣的政局與兩岸關係朝向戴教授理想的方向發展。中國傳統的士大夫常想藉「得君行道」實現抱負、或者能如唐朝的陸贄那樣「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戴教授也未嘗沒有化知識為力量以淑世濟民的理想。問題出在他對李登輝的認識不清，有傷知人之明。他沒有看出，李登輝器小易盈、剛愎自用。在順利鬥倒政敵、掃清障礙又於總統直選大獲全勝後，更躊躇滿志，以為天命在我，予智自雄，已聽不下一點逆耳諍言，戴教授也就只能投閒置散，成了虛耗時日的幫閑清客了。

這對身存傲骨又有志不得伸的戴教授自然是非常大的打擊。戴教授在南天書局出版的《戴國輝談台灣歷史與現實》叢書的總序中說：「目前的台灣係難有催生並維護具有大本領真學識的傲骨人士之公共空間。要作好明哲保身，迴避奴氣和媚骨，不自陷卑微之境地已是相當不容易了。……我重新確認，我個人當今迫切需要的是『時間』及『自由』，我有需要重新樹立我自己的主體性，並掌握住我自己的『座標軸』。為重尋我『夢』，在我內心深層將高揭全新的挑戰大旗。……三月中旬以來，我一直為我精

神上的『自我解套』，開始著手編我文集。」這些話無疑是戴教授沈痛的告白，他尋求「時間」、「自由」、「重新樹立我自己的主體性」、「精神自我解套」的迫切心情，多麼像晉朝陶淵明〈歸園田居〉裡：「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的心境！

我認為，戴教授會罹患肝癌且急遽惡化與他這幾年的心情抑鬱難抒有很大的關係。戴教授曾跟我提過，他希望有生之年能利用嚴謹的社會科學方法與數十年辛勤搜集來的宏富史料撰寫出一部高水平的台灣近現代史。戴教授若不在國安會浪費三年的寶貴光陰，再假以數年，以他深厚的學養與史識，必能寫出當代無人可及的台灣近現代史。可惜戴教授一時失足，竟使他這一宏願齋志以歿，令人扼腕興嘆。但堪欣慰的是，戴教授終究洞悉了李登輝的真面目，「重新樹立自己的主體性」，在與王作榮先生對談的《愛憎李登輝》中，實事求是、毫不留情地對李登輝的知識、思想、政策作了恰當的論斷，重現了戴教授的本色丰采。

這些年來，我先是全神貫注在博士論文的寫作，孜孜於研讀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與大量材料，論文完成後，又轉而戮力於自己所關注的重要理論問題，深居簡出，鮮少與親朋故舊聯繫，因而也無從得知戴教授的近況。不意，與戴教授竟天人永隔，連最後一面亦告錯失，成了終身無可彌補的遺憾。然而，與教授這段可貴的忘年情誼，將會是此生永不磨滅的美好記憶。

——原載《傳記文學》第七十八卷第四期

戴國輝走了

陌上桑

著名歷史學家戴國輝於九日下午因敗血症走了，得年七十。

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我到日本留學，當時在日本有兩位台灣人很出名，一是吳濁流，一是戴國輝。吳是因小說在日本出版而享譽東瀛文學界；戴由於研究台灣史之外，並專攻兩岸事務，特別對兩岸關係具有高瞻遠矚的看法，在日本學界與政界擁有一席之地。

很多人因此認為戴「感情」上傾斜北京，緬懷中原祖國太濃，濃得讓獨派人士誤解。

認識戴國輝大概在八五年前後，他返台參加由《民眾日報》舉辦的海內外專家學者國是座談會，我是接待人。

初次見面是在高雄國賓飯店，握手之後，我說：「在日本，我看了戴教授不少書。」

「你的文章我也看得不少。」戴說：「不曉得你也是留日的。」也許彼此都留日、也同是客家人，加上他常常替《民眾日報》寫稿，兩人因此成了好朋友。

譬如我每次到東京，他會請我喝咖啡；他返台，我同樣請他喝咖啡。我們之間的話題幾乎不離開兩

岸問題與台灣政治。

對我來說，他是亦師亦友。

對他來講，我是他的後輩，因為他每次見到我就叫一聲「小老弟」。

李登輝主政後，他應邀回國任職，結果因對李的統獨走向與戀日情懷不以為然，毅然為文批判並與李漸行漸遠。

前幾年他發表「睪丸理論」，闡述兩岸關係就如人體與睪丸密不可分。

我為此寫了一篇長文批判他。第二天他打電話給我，只淡淡地說：「小老弟呀，你以後會瞭解我的。」我確實為那篇抨擊他的文章懊悔良久；而他的話也改變了我過去以「意識形態判斷事物」的缺點。

如今戴國輝走了，好像我人生中失去了什麼！

——原載二〇〇一年一月十二日《民眾日報》

門生感懷

痛失恩師

丁果

——懷念我的老師戴國輝

今年是世紀交替之年，本來應該充滿興奮與期待。但是，對我來說，新年的開端卻有意想不到的哀痛之事。我在日本立教大學留學時的指導教授戴國輝突然去世，給我很大的震動。去年下半年，從《聯合報》主筆，好友王震邦兄處瞭解到戴教授患了肝硬化病，人瘦了一大圈，我心裏存了陰影。但是，震邦兄又告訴我，戴教授準備全面評論司馬遼太郎的歷史觀，我想他有新的寫作計劃，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到了年底，戴教授寄來了他系統談台灣歷史與現實的新著《寧靜革命的來龍去脈》，書中附了短簡，說到他住院治療肝硬化化的情況，並稱讚中藥的神奇。過了幾天，我在報上讀到他針對李登輝接受日本右翼漫畫家小林良則專訪內容的訪談，第一次公開批評李登輝的媚日情結和錯誤的歷史觀。我閱後大喜，心想他終於走出了「李登輝情結」，其學術第二個春天已經可期可待。我忍不住寫了一個傳真，直呼他的評論令人感到痛快，同時寫上「我有您這樣的老師為榮」，這也是我第一次對戴教授說出自己感覺有點「肉麻」的話。誰知道，這竟然是我們最後的一次聯絡。他在寄來新著的時候，還說夏天和師母會來北美一遊，順道來溫哥華玩一玩。我從東京移居加拿大十多年，他幾次都說要來，但總有其他的

事情纏身，不能如願。九六年，戴教授返台定居，在總統府的三年多，戴教授更是身不由己，無法隨便外遊，好容易離開政界，到文化大學執教，恢復了學者的自由之身，但天不留人，奈何奈何！

我在溫城電台電視台議政論文，跟陳定南、姚嘉文、邱義仁、饒穎奇、馬英九等政界明星唇槍舌劍，暢談台灣政情歷史，也跟白先勇、余光中、痲弦、洛夫等文學前輩閒話台灣文學。許多人開始以為我來自台灣，或者娶了台灣太太，才對台灣的事情瞭解得那麼清楚透徹，不然怎麼可能花那麼多的心血與情感去觀察和研究台灣呢？我在這裏不能不說，我的台灣情，很大一部分植根於戴教授的授業傳道與解惑中。

在文革中上學的我，本來對台灣的瞭解也局限於「台灣是祖國的寶島，那裏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這樣的三段論中，除了政治偏見，沒有具體知識。八四年我東渡日本，在東洋文庫當外國人研究員。那時讀書氣氛濃，出國留學，總想拿學位。我當時的首選當然是東京大學，但是當我跟東大的濱下武志教授談話後，知道進東大的碩士課程，必須先當半年或者一年的預科生（研究生）。我心急，等不了那麼久。於是，我的經濟擔保人，著名明代史專家山根幸夫教授就介紹我認識戴教授。戴教授以客家人的質樸與率真吸引我，我便通過立教大學的碩士入學考試，師從戴教授。我來日本的時候，說好是跟山根教授等研修中日關係史，但戴教授希望我搞台灣史，我有一陣子十分為難，不知道該怎麼辦。好在山根教授最後讓了步，他覺得戴教授是日本最好的台灣研究專家，這個研究課題對我未來拿博士學位方便。就這樣，我開始了跟戴教授研究台灣的生涯。沒有戴教授，恐怕我不會踏進

研究台灣的領域，而因為師從戴教授，我對台灣歷史和現實的認識，一開始就處於較高的台階上，他的歷史視野對我影響至深。比如，他認為對日本殖民台灣加以頌揚，不但會危害台灣，也會擴大到東南亞，因為這將誤導日本人，以為他們過去的「侵略」對亞洲是有功的。他居日四十年，卻始終堅持拿中華民國護照，持守了自己的出身尊嚴。

由於戴教授在東京研究台灣問題，而且對統獨各派朋友都很好，所以他不但被國府懷疑是「台獨」，也被大陸誤認為是「台獨」。因此，上海學術界的一些朋友都在傳我跟了一個「台獨教授」，國家安全部也把我列為「可疑分子」，作了調查。我心裡覺得好笑，這樣一個熱愛中華文化，反對福佬沙文主義的學者，怎麼會被貼上台獨的標籤呢？每當國內有學者出來，我介紹他們跟戴教授見面聊天，戴教授也都熱情地請客吃飯，幾個小時下來，他們不但折服戴教授的學術見解，也對他愛中華愛台灣的赤子之心相當感動。

但是，儘管如此，他是台灣本省人，對台灣的愛根植心底，對李登輝的治台抱有厚望，這種單純使他在晚年返台定居後投入李登輝的幕僚群，遭到了包括我這個學生在內的一些朋友的質疑。記得八八年經國先生逝世後，李登輝面臨蔣夫人等主流派的阻攔，在接班一事上起了風波。一天，戴教授把我叫到新宿一家幽雅的餐廳，一邊吃飯一邊談起他和李登輝的關係。那時李在農復會任職，有一次到東京。戴教授當時是東大學生會的主席，同時也學習農業史，負責接待李。他們喝酒聊天，十分投契，甚至脫光了上衣，暢談通宵，由此結下情誼。他對我說，李登輝這個人不錯，由他主政，台灣的改革會有前途。

他要我幫忙，代筆寫一篇文章，支援李登輝上台。當時，我對李的真面目也沒有看穿，覺得新人上台，總比夫人派的舊官僚好，於是根據戴教授的口述，文情並茂地寫了一篇文章。戴教授改署名後發表在《聯合報》頭版，因為這是海外知名學者第一篇擁李的文章，引起海外學者的擁戴風潮，從側面或者輿論上幫助李登輝上權力寶座。李登輝對此十分感激。

戴教授研究「二·二八事件」有三十年之久，收集資料不遺餘力。他也很希望我能超越兩岸官方立場和不同意識形態的局限，完成「二·二八事件」研究的博士論文。我自尊心也很高，害怕自己的研究被戴教授「說不」，所以在港台刊物和日本最好的漢學雜誌《東洋學報》《中國近代史研究》等刊物發表中日文的研究論文時，都沒有跟戴教授打招呼，但其實他都注意到了。一九九二年，他跟葉芸芸小姐出版中文版的《愛憎二·二八》。

九〇年我離開日本定居加拿大。從書信來往中知道戴教授於九六年返台，進入總統府擔任國安會諮詢委員，相當於部長級。九八年，我去台灣開會，他專程來酒店接我去新店的家，由在中華料理餐食業很有名的師母掌勺，設家宴款待我。喝酒聊天之際，他雖然對李登輝的「知遇」頗感激，但也在言談間對「老頭子」的專橫有所不滿，並透露李如何阻撓連宋配的內幕。我直言勸他兩件事：一是少喝酒；二是離開總統府，因為他秉持的歷史觀與歷史良知與李根本不符合。戴教授對我這個學生的勸告不置可否，但我從他若有所思和欲言又止的神情中，可以讀出他在總統府的不開心。在書房，他跟我說，為什麼他沒有動筆寫日文的「二·二八事件」，這對他來說比寫中文更容易，主要就是等我的博士論文先出，

這樣對我比較有利。我聽了心裏很感動，同時也爲違逆他的願望沒有做完博士論文感到內疚。他又說，看來你不寫了，我就會很快動筆寫。後來我到圓山飯店開會，他又要我約一些媒體的好朋友吃飯，由他作東在圓山吃飯聊天。我的朋友當然都是統派，他或許就是要婉轉地表達他跟李登輝的距離。誰知道，這竟然是我和戴教授一起吃的「最後的晚餐」，也是我最後一次見戴教授。九九年歲尾，詩人痲弦在台北主持一個新書發表會，其中也有我的一本小書，戴教授抱病參加。痲弦回來告訴我，戴教授對我頗多讚詞，我聽了又是一陣感動，然後又是愧疚。因爲我知道，他對我沒有完成學位就離開東京移居加國，雖然嘴上沒說什麼，心裏總是不快的。然而，他對我的關心，卻始終沒有斷過。

如今，戴教授走了。我把他送我的十幾本日文與中文著作找出來，翻看著，回憶起跟隨他近五年的種種往事，不禁垂淚。我在香港《亞洲周刊》寫的追念文章，最末一段這樣說：我感激，蒼天有眼，讓戴教授在最後時刻與李登輝分道揚鑣，保存了歷史學家的晚節；我又遺憾，歲月無情，讓戴教授沒有完成他書寫台灣全史的心願。我現在想加上一句，戴教授已經用自己的學術良知，爲自己樹起了一座紀念的豐碑。他會安心走的，因爲落葉歸根，他將長眠在台灣，這片他自己深愛的土地上。

——原載《傳記文學》第七十八卷第四期

台灣史學界永遠的損失

林德政

——記戴老師晚年及與他交往之經過

知道戴國輝教授的大名是在一九八五年，當時他的第一本中文著作《台灣史研究》在台灣出版，立即轟動台灣史學界，我購讀之後，佩服其治史之深度與廣度，常思有朝一日能拜訪，向他當面請益。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機緣終於來了，這一天，戴國輝老師應成大歷史系邀請，到台南演講，講題是：〈台灣現代史研究的幾個問題〉，那一天演講廳裡座無虛席，慕名而來者把講堂擠得滿滿的，戴老師語調和緩，深入淺出地講述，令聽眾獲益巨大，演講末，我向他提出有關「河南」是否應為廣東珠江以南的問題，面對此與他不同的說法，戴老師絲毫不以為忤，對其風度，我感佩之餘，留下深刻的印象。

很有緣分的，第二天，即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六日，我與他皆應邀參加台中逢甲大學舉辦的「丘逢甲丘念台父子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他發表〈我所認識的丘念台先生〉，我發表〈抗戰期間丘念台先生的延安經驗〉，他的論文因為都是第一手資料，述說他在東京與台籍前輩丘念台交往經過，引起與會者高度重視，而第二次見面，感覺上更加親切，會議進行時，他除了講他與「丘翁」（指丘念台）多次談話情形外，還提到一些滯留日本的台灣人，並帶了一本謝姓台籍先輩的著書介紹，知道我研究台籍人士

，他特地拿那本書給我看，從此我就以師禮尊敬戴老師。

兩個月後，即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中國近代史學會在嘉義阿里山上舉辦年會，非難難得的是戴老師也親臨參加了，中央研究院張玉法院士、政大文學院院長張哲郎教授也都參加，會議共三天兩夜，大家都住在阿里山青年活動中心，所以向他請教的機會更多，分組討論時，戴老師與我同組，都參加中國近代史與台灣史組，原本引言人沒有安排他發言，我提議請戴老師介紹日本方面研究台灣史的學界狀況，小組主持人師大歷史系吳文星教授從善如流地接受，戴老師侃侃而談，而夜裡大家飲茶暢談，多少回憶長存腦海裡。三天下來，與戴老師熟悉多了，這次到阿里山，戴老師未帶師母參加，他告訴我這是我第一次到阿里山，他鼓勵我應到國外觀摩學習，多了解國外學界狀況，以便知己知彼。

一九九九年九月，我重返政大歷史系博士班就讀，終於有機緣正式當戴老師的學生，時戴老師在政大歷史系只在大學部開課，研究部的課暫停講授，而成大歷史系研究部則請他開了「台灣農業發展史專題研究」，於是我選了這門課，在他門下深入研讀台灣史，一年下來，眼界更開，心胸更闊，他關心我的博士論文，我向他表示擬以台灣人在大陸為主題，獲其讚許，他並同意擔任我的指導教授，他引導我參觀他那豐富的藏書，並指示閱讀一些資料，當場借我一本書，一年下來，認識漸深，而他每次南下授課，多半我都會抽空到台南機場接送，在汽車裡，又是師生之間最好的聊天時間，也是我向他請益的寶貴時間，他談學術、談理想、談到計畫撰寫大部頭的「台灣通史」，也談到他感到身體在病了一場後，不太好，而要做的研究工作又那麼多，有點煩惱，我勸他考慮請一個專任助理，可以協助文書處理，這

樣會事半功倍，他點點頭，可惜後來戴老師還是沒有請助理，否則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應有更多著作出版才對。

戴老師居留日本長達四十二年，但是說起國語（北京話）仍然流利非常，但他常謙虛說他雖然國語講得還可以，中文書寫卻帶有「沙西米」味道，這當然是他謙虛，不過他卻是認真的，南天書局爲他出第二本書《寧靜革命》，因爲原稿不少是日文，戴老師自己翻譯了一部份，也請別人翻譯了一部份，但他不放心，爲求慎重，他請我就全部中文書稿，一邊校正，一邊潤飾，請我把帶有日文味的語句改正過來，這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南天書局版《寧靜革命》。

我曾經問過他與前總統李登輝的事，大家知道，他與李登輝始而好，後因理念產生差距辭去國安會諮詢委員的職位而離去。但是在我與他多次談及李之事情時，他從未直呼李登輝之名，他總還是口口聲聲「李總統」，這樣的做法，今天有幾人還能做到？君子相交，相知又相惜，分手也不出惡聲，這是戴老師令人敬佩的風範。戴老師略帶俏皮地對我說，有關李的詳細事情，現在不能告訴我太多，因爲他要寫李的傳，現在講了，就沒得寫了，他接著說，李總統的傳記，李親口對他說要拜託他、要請他來寫，他也蒐集相當多的資料，以戴老師和李登輝相交之長，相知之深，再加上戴老師對台灣歷史的功力，請他寫李登輝傳，世界上真是不做第二人想的，如果戴老師寫成「李登輝傳」，那將是最真實、最有價值的本李傳，遺憾的是，戴老師過世了，再也不可能完成李登輝傳了，這是戴老師的遺憾，應該也是李登輝的遺憾，更是台灣人的遺憾。

對於部分人質疑他統獨立場的問題，他不只一次地對我說：「我不是統派，也不是獨派，我是正派。」對於兩岸問題，他看得比一般人深遠，他也常常對我說：「年輕人犯錯是權利，老年人犯錯是羞恥」，他的操守是令人敬佩的。有部分反李人士質疑他爲什麼以一位知識分子的身分，到總統府擔任國安會諮詢委員，戴老師對我說，他是要藉此了解國家機器如何運作，也是幫助老朋友的李總統，更是把所知所學，透過這個職位，貢獻給台灣，這是戴老師的真心話，而實情的確如此。

最後一次與戴老師相聚暢談，是在二〇〇〇年六月三日，這一天我到他家，與戴老師、戴師母晤面，我剛從廣州中山大學回來，向他報告大陸所見所聞，他聽完，對我補充和引申不少，使我多所啓發，暑假時我再到重慶蒐集資料，九月回來，因忙於開學，並忙著準備在國史館主辦的「台灣與大陸關係史學術討論會」上，發表論文〈抗戰期間台籍人士在重慶的活動〉，所以就沒去看他，只寫了信，又將該篇論文稿寄給他，請他斧正，過年時又寫了賀年卡給他及師母，總想在農曆新年時再去向他當面拜年，沒想到今年一月九日就得知他突然去世的消息，錯愕與悲痛，真是難以言述。

在與戴老師相處的兩年中，深深感覺戴老師爲人正直、熱情、講義氣，以他留日四十一年，始終不加入日本籍，以他在日本工作，寄人籬下，而仍然不客氣指正日本人對台灣的殖民罪過，這是需要多麼大的道德勇氣啊，以他與李登輝之相知相交，仍能稟承知識分子之良心，規勸無效，不合則去，不戀權位，這樣的傲骨，究竟有幾人能夠？

戴老師生於一九三一年，逝於二〇〇一年，只活了虛歲七十一歲，足歲七十歲，以今天醫學之發達

，以他四年前剛回台時之硬朗身體，他都是該活到八十歲，甚至九十歲的，他是累壞的，他為台灣這塊土地操勞，也急著培養後進，也多少遭受莫名的誤解與中傷，終於病倒，多麼可惜，多麼遺憾，他的去世，損失的是戴師母、他的子女，更是台灣史學界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啊。

戴老師，我們永遠懷念你，你的精神，我們將會繼承下去，您眾多的台灣史相關著作，也將永遠輝映在台灣人心目中，戴老師，請你安息吧。

深切悼念戴國輝老師。

（二〇〇一年三月八日寫於戴老師逝世兩個月紀念日前夕）

——原載《傳記文學》第七十八卷第四期

追憶恩師

蔡素貞

——壯哉此生，他，一生精彩、豐富

恩師走了，在和病魔搏鬥一星期後，撒手人間，留下一群愕然的弟子、朋友，拋開了人間種種。憶及當晚，在宜蘭佛光大學教書的我得知噩耗，連夜驅車北上，分不清是雲霧還是淚水模糊了視線，車在北宜撞山，當下，不禁嚎哭起來。也許連他自己也沒料到會這麼快離開人世，他曾說再給他五年，因他尚有系列台灣史著作未完成。也或許他早已料到這一天會提前來到，於是他爭分爭秒，與時間競賽，完成《愛憎李登輝》一書，而他的生命，就在伏案趕稿中折損耗盡，以致走得如此之快。恩師之逝，不僅是學生們的損失，更是史學界、文化界的巨大損失。

印象中的老師，有時像個童心未泯的孩子，對事物充滿著好奇心，因為好奇心，豐富了他一室的藏書與博學多識的內涵。對年輕一代的愛護，可說是無微不至。他常說：「年輕人要勇於提出自己的看法與見解，不要懼於學界的輩分關係，討論會只要爭得有理，是互動的，是進步的，既非攻擊，更非敵對。」居學界前輩地位，他襟懷是如此之大！

師生一場，收穫最豐的當是每星期開車送他上課兩年。老師喜歡暢談時局、品評人物，聊到最起勁

的話題時，往往流連忘返。由於他宏遠的見識，對時政總能針砭有力，察他人所未察。談話中常能感到他那對國家之愛，及其不苟於世俗的正直執著。他常說：「他既非統派，亦非獨派，而是正派。」他甘於各派的批評或壓力，即使兩面不討好，亦絕不屈從權勢，不媚於時俗。這自我定位，體現了他那客家人的硬頸，也表現出讀書人的堅持與傲骨。即使因諍言而不容於層峰，他仍無畏。他曾說：「當無所求時，便無畏無懼。」他的襟懷也表現在其民族認同上，居日四十三年，他不偷安於異國，常不識時務、不計利害的屢犯大忌，批判日本殖民（如霧社事件研究）。他有他不變的立場，不以時代改變，改其立場，更見其清流。

對弟子們而言，他視野寬廣的歷史觀及其歷史良知，常啓引我們對史實的切入角度。加上他客家人的質樸氣息，師生總能相知相契。在學生眼裡，老師是個先覺者、是個交遊甚廣、博覽群書、帶點浪漫的讀書人，以能親炙或私淑爲榮。先生之學，不獨博涉多優，功力醇厚，且久享盛譽於海內外。平生栽培後學，更是不遺餘力。他一生率情認真，是一位令人敬愛的長者。我們耳濡目染其日常談吐和風範，著實獲益良多，誠爲我一生中的大好事。人海博沙，有緣遇合，這是我的幸運。

承蒙師教，尙未報答，老師卻溘然長逝。回思往事，其音容還活生生留在我的心裡，可是他已不在人間了。滿室桃李悼良師，從今不復聞講授。借劉半農「教我如何不想他」曲名，來表達對老師之思。年壽有時盡，先生沒有白走，也沒有白忙，他留下了他堅貞正直的風骨，爲學界樹立了典範，他擺脫了既往的窠臼，一一還原歷史事件的面貌，讓我們不至於對歷史有所偏頗。他的精神，將隨他佈滿台灣海

峽的骨灰，護佑台灣這一塊土地。

世間唯情字使人有生氣，杏壇有師則師道永存。

——原載《傳記文學》第七十八卷第四期

懷師

西冷

旅日一代學者，戴國輝教授一月九日在台北過世。消息傳來，識者無不哀痛惋惜。

二十年前，筆者在法政求學，蒙卓南生、蔡史君前輩提攜，結識了教授，從而開拓了我狹隘的視野，對「東南亞華人」重新定位，也不再堅持華人等於中國人的愚見。

教授早期致力研究華僑 Identity 問題，寫下數部「華僑」書籍，轟動日本學術界。他特別強調區域性結構重於民族血統。我多次在他書香洋溢的立教大學研究室，聽他娓娓談論中國問題、台灣困境、新馬泰菲及印尼華人如何安身立命處世。我雖不是門生，他也竭盡所能，謙和有禮地解答所有稚拙的疑問。

八九年，工作上需要採訪東京華人過新年的感言，首位對象，便是戴教授。他高興地立在研究室門口迎我，微笑關愛地問：黃毛丫頭長大了！

他受邀擔任侯孝賢台灣電影的歷史顧問。侯到東京，他催我去陪客，到法國謝松酒廊。他知我喜聽謝松，便約好到銀座聽美輪明宏演唱，說好票價一人一半。可見他教書不忘娛樂，娛樂不忘節約。

有回，他給蒙古學人授課，談到印度甘地的仁政，勉我們應多讀羅柏·庫爾斯的 Erikson *The Growth of His Work* 上下兩冊哲學書。我讀了十年仍未弄懂來龍去脈，真可謂朽木。

九六年秋，他應李登輝之邀到台北出任幕僚，攜眷路過新加坡一夜，蒙錯愛，約晚宴，席上遞過名片「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他補充一句：爲日本資政。我心咯噔一下，不知是喜是憂，沒有太多祝語。他自嘲說：「過去在東京太寒儉沒機會用小車子載你。今後到台北，備有司機房車迎你。」明白他希望我有位風光的師長，只不過學者戀棧權位是否影響史觀？在日本他是位舉足輕重的華人學者，這一走，應有一番從長計議，非晚輩所能理解。

走筆至此，翻開他贈予的《台灣總體相》，蒼勁的筆跡，一雙象眼溫和笑貌，浮現腦海，更令人不敢相信他已遠離塵世。他臨走囑託辦一些事，尙未完成，無法在台北乘他「備有司機的房車」，也沒機會稱讚他批日本侵華，批李登輝，批司馬遼太郎，批小林良則——一位令人敬愛的歷史學者，精神永垂不朽。

——原載二〇〇一年一月三十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正派治史做人

楊中美

我在一九八三年進立教大學東洋史研究科攻讀中國近現代史專業時，有幸成為戴國輝先生的弟子，並多次參加戴先生的研討會。

研討會結束時，時間湊巧的話，戴先生常常會帶學生去學校附近名叫「東江樓」的中國餐館，邊用餐邊繼續討論研討會中沒有結束的問題，或者聊些輕鬆的話題，學生常會被戴先生幽默風趣的談話而引得哈哈大笑。

從閒談中，我才知道戴先生是生在台灣的祖籍廣東梅縣的客家人，「東江樓」則是一家有客家菜風味的餐館。有一次，我問戴先生，為什麼叫客家人。他笑著說：「楊君，你是漢族，還是我是漢族？客家人是漢民族的一支，原是住在中國中原地區山西、河北、河南等地的漢民族。因戰亂、災害而多次自北南下，但始終保持著自己的語言、風俗、習慣。客家語與古漢語相近，可以說客家人是正宗的中原漢人呢！」

戴先生的家庭是台灣的名門世家，堂妹是現國民黨副主席吳伯雄的夫人。吳伯雄是台灣客家人的大

老。

戴先生對自己是客家人的身分很有幾分自豪感，說中共革命領袖很多是客家人。葉劍英、葉挺是他的梅縣同鄉，朱德、鄧小平、郭沫若等也都是客家人。再往上溯，國父孫中山、太平天國的洪秀全等也是客家人。哈哈……客家人是天生的革命者呢！

——原載二〇〇一年四月九日《明日報》

編按：此文刊載於網路《明日報》，特此向楊中美先生致謝。

紅帖白帖

林蘭芳

今年二月十日，我參加了在第二殯儀館景仰廳舉行的「向戴國輝告別」追思儀式。收到的白帖上寫著：戴國輝因為敗血症，一月九日下午五時三十分病逝於台大醫院，享年七十歲。戴師病逝後三日內火化，骨灰灑在台灣海峽。

戴國輝老師於一九九六年應李登輝總統之邀回台，除任職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之外，並在我就讀的政治大學兼課。我選了戴師「近代中日關係史」課程，也因此認識戴師。課後老師曾請修課的同學到他家中用餐，師母林彩美手藝好，個性溫和悅然。記得某次飯後，聽到老師和師母自然地談論到死後的安排，我很驚訝，因為台灣人最忌諱死亡，他們竟然如此自在的談談說說。聽了他們的說法，我很佩服他們對生命的灑脫。

老師和師母談到，人死後不要有墳塋，紀念一個人，是在心中，而不是燒香拜拜。老師的兩個兒子都在日本，只有女兒在台灣，老師說，如果要孩子回台灣掃墓，他們得兩地奔波。言談中，顯現了慈父慈母的光輝。當時只聽到戴師說不設墳塋，沒想到，戴師還選擇往生後以台灣海峽為埋骨所。

二月十日下午，雨絲綿綿，或許天人同感悲愁，搭乘一輛遊覽車離開第二殯儀館，抵達金山附近的海關檢查完畢，前來送別戴師的人紛紛上船，戴師長子興宇捧著骨灰罈，大家要出發了，航向海峽，將完成戴師遺志，把他的骨灰灑在台灣海峽；這是最後的告別。

在第二殯儀館所舉行的告別式，由遠流出版社佈置靈堂，只有白綠相間的鮮花，正中央置放放大的戴師的照片，雙眼炯炯有神的注視著他生前的親人、友人、同事和學生。告別式中，盲詩人莫那能為戴師誦詩，也請族人以族歌來歌頌莫那能心中的「天上星」；屏東藍家出身的藍敏向戴師哭索到里港一遊的承諾；前監察院長王作榮，細數結識戴師因緣。老病的王先生，未來也要追隨戴師，來日往生後，將骨灰灑在台灣海峽。聲樂家呂麗莉女士「松花江上」和「玉山頌」的歌聲迴繞在靈堂中，由日本遠道而來的立教大學同事，發言追悼他們的好同事、老朋友戴國輝。

最後發言的師母，談著戴師為學求真的精神。不掉淚的師母，在海上最後的告別式中，由骨灰罈抓起戴師的骨灰時，失聲哭喊「戴國輝」。一把骨灰，一把香花瓣，一行淚水，一些祝福，飄灑、交織在雨中，風中，浪中。

戴師將長眠於波濤洶湧的台灣海峽，魂魄有靈，請多保佑台灣平安。風大，雨大，浪大，和著顛簸著的船，好多送行的人暈船，有人看著高過船身的大浪心懷忐忑，我心想，不論風浪多大，戴老師會庇佑大家的。

灑完骨灰，船掉回頭了，師母、興宇、興寧、興夏回望海峽，心中猶默向戴師屢屢道別。

這次收到的白帖，讓我見證告別死亡的豁達，往者如斯，生者亦如斯。

——原載二〇〇一年《明日報》

失去母語的人

陳淑美

二〇〇二年一月三日，晚上打電話給師母，約好明天去出版社送稿，師母聲音略帶沙啞，不敢問師母好不好，想起去年此時，老師驟然倒下，就是在今天進了加護病房，從此不起，對於從來相信老師大病後已漸復癒的師母來說，是生命裡的大轉彎，說是人生重挫，亦不為過。

一年了，老師離去已然一年！

幾次前往新店山區探望師母，向來優雅的師母仍然一如往昔殷殷相問，從來的訪問都是溫暖相迎，不是一碗熱騰騰的紅豆湯，就是一壺沏好等待的熱茶，走時還會塞上個蛋糕、巧克力、仙貝等給我家人。而粗枝大葉的我也總是在離去時，才想到，啊！自己竟常是兩手空空而來，而且更該死的是，每次總是在上課、家務等諸事了結之後，夜幕已然低垂才來叨擾師母，而往往離去時，已是子夜。

造訪師母目的性其實也都很强，通常都為老師文集的編輯而來。

免不了要講起老師，講起老師生前上課、說話種種，然後是談老師所寫文章的觀點，一說說不完，真是說不完。常常離開師母家，還是老師的言語、聲音，走在黑黝黝的山路上，望著晶亮晶亮的星光，

有著另外一種心情。

老師身後，「半個共產黨」也罷，「統派同路人」也好，撻伐之語偶現。這些話對一個七〇年代在海外就開始披荆斬棘，率先研究台灣史，甚至搶先找到一些珍貴史料的歷史學者是否公允？對一個七〇年代就以「暫為原住民收集、整理史料，期望將來有原住民歷史學家，寫出屬於原住民的史觀」，這樣一個始終懷著漢人原罪與人道精神來研究整理霧社事件史料，帶著今日流行名詞所謂「本土情懷」的人，這樣的劃邊是否公允？

那種感覺很難說，常常車子開著開著，出了神，猛然又想起師母說起的，在日四十餘年的老師在一九九六年回到台灣後，是如何努力地學著「母語」（漢字、國語），他的書房貼滿漢語、日語、英語的詞彙對照表，努力研讀，最得意的是給師母看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寫好的中文文章，「我寫得不錯吧，」老師總是這樣向師母說。

也才想起老師上課時總會介紹一些史學名著及外國暢銷書的中譯本，「我來看看有些話用中文怎麼說？」老師不是不讀原文，原來是在找一個對照組。

歷史對像戴老師這些經歷過離亂世代的人們，是否也應該有所虧欠？

南天書局的魏德文先生總常笑說，戴老師真正的中文程度只有小學五年級。戴老師在念高中以前，受的是日文教育，光復後讀建中才開始念漢文，但因時局混亂，台中農學院唸完後就負笈東瀛，從此旅居海外四十餘年。老師晚年常說起他建中的學長張光直，「不能跟他比，人家能通北京話」。對辜振甫

等能通京劇、說北京話的時代人物也有些說不出的情結。與同代人相比，若稱戴老師是「失去母語的人」並不為過。而當這失去母語的人一旦歸根，很難相信要面臨的問題，還不僅是語言。

在老師生前，偏就有這麼多人，常以現實「政治正確」的語言觀揣度，他們摹想老師在日四十年，用日文說話問候，該是親切一些吧。那些研究所的學生，或是後進的同行，往往在老師上完課後，就哇啦啦地以日文向老師問候起來，殊不知這樣的「招數」在老師看來總是怪異得很，老師也總是扳著臉，以嚴肅的神色回應，這一方面當然是在老師面前，那樣的蹩腳日文實在羞煞人也，一方面「反對被殖民之人，沒事就以殖民語言說話」的老師，從來不認為有能力以殖民國的語言說話有何光榮。老師一生批判殖民者，要「曾被殖民過的人們」建立起主體性的思想，而且是要身體力行的，我總是這樣認為。

老師的忘年交杜繼平先生認為，戴老師與後殖民時代的代表人物薩伊德這種「出身在第三世界又具有高度精神主體的知識份子是一樣的，雖然地處帝國主義的中心國家，嫻熟中心國家的語言，甚至躋身主流地位，卻未匍匐於帝國主義的價值體系下，對之頂禮膜拜，反而利用出色的學術專業，站在本民族的立場，分別對美日帝國主義的意識型態與行徑提出嚴厲的批判……」，我覺杜先生的說法很清楚地點出老師一生的風格。

老師在日四十年，能以日語演講、寫文章，日文甚至比日本人還好，但老師終生未以此為傲，晚年甚至常以中文不夠好為憾。有次老師跟我談起台灣的語言問題，講起僅能以英語授課的印度籍教授，最羨慕的是同被殖民過的台灣，仍能夠以漢語上課，「至少您們在被殖民後，菁英溝通的語言仍是母語，

「老師這樣引述那位印度籍教授的話。之於戴老師來說，從原鄉情感而出的「地方語」（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外省籍語）、便於大家溝通的「標準語」（國語、普通語）、被視為大同理想的「世界語」這三個層次語言分隔，是很清楚的，但台灣今日的道世道，這些分隔總還是剪不斷、理還亂，老師在面對「後殖民」台灣的現實時，恐怕還是感慨居多啊。

老師生前常說，任何人出生在哪兒，是那個種族、省籍等都是命定的，不可能自己選擇，因此對於因不同血緣、省籍，甚或文化背景所產生的觀點歧異，老師總帶著同情的觀照，這也就是為什麼老師在日期間，左右各派不同意識形態的台籍人士都能成為老師東京家中的座上客。這樣一個在殖民母國日本居留過的人，不媚日、不仇日，每每以其寬廣的襟懷，時時觀照自身民族的立場，並且希望不同立場的人能打開心胸，以學理及社會科學的基礎，理性對話，對照今日意識形態彰顯，或藉此打出種種偽命題，假正義之名的張牙舞爪之徒，在風格上已是高下立判。先生之風，遠矣！

老師離世後，師母放棄了在日已卓然有成的中國料理教授事業，專心整理老師舊稿及藏書，偶爾還應出版社邀請，為李登輝情結下對老師莫名的裁贓，出來講幾句話。戴老師在日四十餘年的生涯，經師母對照著老師細心留下來的案曆、日記，一頁頁整理出數萬字的戴教授年譜，過去不大過問老師文章大業的師母，也像變魔術一樣，將老師過去未成書的舊稿、手稿，一篇篇找出。當一月初，師母拿出那以密密麻麻筆跡排列著包括老師生活譜系、著作目錄及世界大事的年譜出現時，眾人在默然間，卻同時感受到師母的毅力與不眠不休的付出。「老戴有你這樣一個老婆，在地下也可以偷笑了，」初見年譜的剎

那，台大哲學系王曉波教授說出了大家的心情。

戴師母身上，也是女性的我看到二十一世紀後，或許會愈來愈稀少的女性質素：單純、專情而執著，對老師的千萬情義，全化為繼承夫志的種種付出，「多情應笑我」，或僅因曾是牽手緣。

謹以此紀念戴國輝教授逝世一週年。

——原載《海峽評論》第一三四期

媒體評論

台灣史學家戴國輝

林長風

戴國輝教授是當今很有名望的一位台灣史學家，台灣省籍人，長期居於日本。一九六六年在日本東京大學取得了農業經濟博士學位，先後在日本多家大學任教。一九七〇年以來，一直在東京主持「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

應該坦白的說，戴國輝教授引起我尊敬的，是他研究台灣史的史學觀，我看過他有關這方面的一些文章和演講稿。但是，我沒有讀過他的史學著作。他的史學著作是用日文寫的，而我卻完全不懂日文。遺憾的是，海峽兩岸似乎都沒有把他的史學著作翻譯出來。台灣「黨外」雜誌不時刊登戴國輝的談話和文章，知道這位台灣史學家的人多一些。但在大陸，戴國輝這個名字卻鮮為人知。大陸有那麼多的研究台灣問題的機構，卻很少看到有人介紹戴國輝，這是我至今還是很難理解的問題。

最近，讀到戴國輝教授去年在芝加哥大學的一篇演講稿，對他研究台灣史的史學觀又加深了理解。對於那些不重視或不那麼重視戴國輝教授的人，介紹一下應該是有益處的。

戴國輝教授首先介紹他下苦功研究台灣史的原因。第一是他不滿意當年在東京搞「台獨運動」的廖

文毅、邱永漢、王育德等人的史觀，尤其是他們對日本統治台灣史的看法，結論是「媚日」兩個字。而「媚日」又不止限於「台獨人士」，「甚多台灣知識分子犯有同樣的毛病」。第二是「台獨認為日本給台灣帶來了資本主義，促進了現代化云云的話」，使他感到「害人不淺」。一、二兩點其實是一個動機。戴國輝教授把「台獨」的台灣史學觀，提升到將會給台灣，中、日兩國，甚至對東南亞帶來災禍的高度。由此可見戴國輝教授決心研究台灣史，是帶有很神聖的使命感的。

還有第三個原因是他在五十年代中期從台灣到日本時，看了一些大陸出版的有關台灣的書籍，發現編著者連漢族系台灣人的風俗習慣與高山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都沒有搞通的實例，感到「傷心」和「無限的失望」。應該說，近幾年情況已略有改變，大陸出了幾本質量不錯的台灣史，但為數眾多的宣傳文章與小冊子，這種使人「傷心」和「失望」的實例還不少。

戴國輝教授研究台灣史，最主要的是，要否定這樣一種觀點：「日本在台灣殖民主義是成功的，是少有罪過的。」這種錯誤觀點，不僅存在於日本史學界，還存在於台灣史學界，甚至還「包括以（所謂）馬克思經濟學的方法來看問題的一部分學者先生們」。戴國輝教授對此深惡痛絕。

他第一篇博士論文是《中國甘蔗糖業之展開》，敘述七世紀到十七世紀的中國甘蔗糖業史，駁斥所謂台灣兩大產品之一的糖，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才發展起來的謬論。由此展開了「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台灣的真相」的研究。

他另外一篇論文是《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極力排除「後藤新平治台」的神話。論文論述日人統

治台灣之前，台灣經濟已有了一定的發展，已經「樹立了資本主義萌芽的基礎」；決不是一些人所醜化的那樣，在日人統治之前，台灣仍是「化外之地」、「瘴癘之地」。

去年《生根》第八期，刊登一篇高伊哥的文章，題為〈後藤新平——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戴國輝教授斥之為「被殖民心態」。他對這種「心態」長期存在於「很多中產階級以上的台籍知識分子」中，「感到有無限的悲哀和說不盡的內疚」。

在我看來，反對「被殖民心態」，似乎是戴國輝教授研究台灣史的史學觀的精髓。正是在這一點上，引起我最大的敬佩。

另外一個突出之處是，戴國輝教授非常尊重高山族（編按：台灣原住民）的歷史。他早就提出，而且多次說過：「我們客家人和福佬人雙手並不是頂乾淨的，尤其是參與開拓台灣的客家父祖輩，扮演過侵佔山地的先鋒隊。我始終保有一種『原罪』感。」

他編著了一本《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高度頌揚高山族同胞英勇抗日的精神。但是他認為自己「是屬於迫害、欺凌高山籍人士的後裔，所以必然具有不少的局限性」。「只能暫時代為收集和整理資料」，期望將來能有高山族的歷史學家，自己「來敘述他們的真正歷史」。

在海峽兩岸的台灣史學家中，我認為戴國輝教授的史學觀是最實事求是的。

只有真正懂得台灣歷史的人，只有真正掌握正確觀點來研究台灣歷史的人，才能對當前非常複雜的台灣政治現實，站得高，看得遠，看得準確。

在台灣史研究中有高度成就的戴國輝教授，在涉及台灣人問題上的政治觀點，水平也是很高的。

他歷來反對把「省籍矛盾」看作「民族矛盾」。反對與「中國意識」相對立而孤立地強調「台灣意識」。他很鮮明而一貫地反對「台灣獨立」。

他在芝加哥大學的演講中說：「很多同鄉不滿現狀，常常自閉守關地，不願把自己的台灣的『位置』擺在世界地圖，亞洲地圖，全中國的地圖來瞄一瞄，來思考思考我們自己所站有的地位（當然包括歷史地位）。」「爲了明察『台灣何去何從』的課題，我們還得從全中國史，從亞洲史，從世界史的連關上面作好台灣史的定位來考察問題，才不至於陷入自己的小『框框』，溺死於『小浴池』裏頭。」

如果讀者了解當前台灣的政治狀況，了解台灣省籍同胞的思想傾向，將能理解戴國輝教授這段針對台灣省籍知識分子，特別是針對「黨外」人士所說的話。分量是很重的，確能一針見血地指出某些人的思想障礙。

美國的「台獨」組織肆意地攻擊戴國輝教授，因爲他從台灣史的深刻研究中，從根本上否定了「台獨」炮製的所謂「台灣民族論」。他的威望、影響和水平，有力地壓制著「台獨」謬論的泛濫。他在芝加哥大學的演講最後說：「我希望我們鄉親們，不管他的省籍，只要對台灣海峽的安靜，台灣和大陸雙方老百姓們的福利和人權的進步有關懷的，我們一齊來互勉互勵」。

筆者很愛讀戴國輝教授的政論演講，他不僅對台灣省籍同胞有教益，對大陸省籍同胞也有教益。海峽兩岸老百姓都可以從中找到融洽相處之道。

很遺憾的是，大陸方面似乎很少注意到戴國輝教授。他的歷史書都是用日文寫作的，大陸如能翻譯出來發行，對讀者將有很大好處。這是應該而且很值得做的事。

——原載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五、二十七日香港《大公報》

編按：此文為八〇年代林長風先生為香港《大公報》撰寫介紹戴國輝教授之評論，原文分上、中、下三篇刊載，是同時期介紹戴教授治學梗概最為周詳的一篇報導，今日讀來，仍能代表戴教授一生治學行誼，故輯錄之，特此亦向因年代久遠而難以追索聯絡的林長風先生致謝。

文史家戴國輝病逝

黃曼瑩

見證台灣近百年史的歷史學者，前國策顧問（編按：應為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戴國輝，九日因細菌感染引發敗血症，合併器官衰竭病逝，享年七十歲，生前原本計劃與前監察院長王作榮欲重新為前總統李登輝提出評價而未竟，臨走前還抱著許多抱憾，但僅只簡單交代「海葬」，果貞斯人也茲有斯文也！台大醫院表示，戴國輝住進醫院時，因細菌感染引發敗血症，且腦部已化膿，原本即罹患肝硬化，且食道靜脈瘤有出血情況，昨日終告不治。

文史大家戴國輝，雖然出身農業經濟，但畢生為研究台灣文史而奉獻心力，從霧社事件到二·二八事件，不停探索台灣近百年命運，研究其中的政治與歷史變遷，體會出箇中苦難與悲情。他也曾在白色恐怖中被列名，但文人屹立不搖的精神，還是換來一身風骨。

台灣的民主化是戴國輝期待最高的，對前總統李登輝也抱非常大的期待，但自從國發會後他失望了。戴國輝曾說，李總統主政，許多學界中人也寄予厚望。他記得自己在這十多年來，不同階段會給李總統三個不同建議：學者從政時，要立污泥而不染；開創台灣民主新途時，要謹記「民主的摩西不能只有

一人，而應是追求改革的一群人」。

李登輝當選民選總統後，他也提醒「民選總統不等於民主總統」。期望學者在李遠哲號召下站出來，不要再一次被政治所欺，上述三項建議，戴國輝說，他還是要提供給學者和總統候選人們參考。

戴國輝美好的戰役走過了，台灣近百年文史的悲情苦難，他也深刻體會，去世前曾計劃與前監察院長王作榮，重新對李登輝提出評價，醞釀出版「李登輝風雲十二年」，但這一本頗具歷史價值的書，可能只得徒留嗟嘆……。

——原載二〇〇一年一月十日《東森新聞報》

編按：此文取材於網路新聞報，特此向難以追索聯絡的黃曼瑩先生致謝。

戴國輝 愛台灣

田炎欣

客家籍的戴國輝，或許是因為個性關係，讓他在史學與政權這方面，似乎都存在著邊陲性格，他愛台灣，卻因為專研史學而遠離台灣，他研究史學，從日治、二·二八事件到李登輝時代、陳水扁時代，都有許多的民族與民主情懷，但是，對政權核心，他卻始終是若即又若離。

蔣家執政時期，為蔣經國引荐台灣省人才的徐慶鐘，曾經幾度請戴國輝回台，但是戴國輝都婉拒了，李登輝時代，因為李登輝先前曾與王作榮到日本拜訪過戴國輝，他欣然回國任職，並且出任許多要職，也一度出任總統的決策團，為當時的政局與兩岸關係提供諸多良方。

不過，後李登輝時期的統獨走向，以及李登輝對日本殖民政權的情懷，引發了嚴厲批判日本殖民政治的戴國輝，與李登輝產生理念不合的情況，戴最後選擇離開，並對權力者採取批判姿態。

戴國輝曾經批評李登輝總統主政十二年以來，最大的特色是只顧往前衝，談的是主張、使命，但是很少停下來作總結，沒有總結就沒有反省。

最近李登輝接受日本漫畫家小林訪問繪製的《台灣論》在日本上市，戴國輝也不諱言直指李登輝對

歷史認識不清。

阿扁新政府上台後，戴也對施政與兩岸關係提出多方建言，但是，他的兩岸理論還來不及讓扁政府多所研究，扁政府也還來不及與這位台灣歷史學大師多所接觸，戴國輝就已經離開了。

戴國輝走了，他的身軀在他愛的、畢生精研的台灣。但是，他的民族與民主情懷，在新舊政府的情結中，能發酵多少？

——原載二〇〇一年一月十日《東森新聞報》

編按：此文取材於網路新聞報，特此向難以追索聯絡的田炎欣先生致謝。

台灣史專家，批判日本殖民政策

田炎欣

戴國輝，一九三一年出生於台灣桃園縣，在台中農學院（今中興大學）畢業後，即赴日本東京大學，取得日本東京大學農學碩士、博士。

這位專攻台灣史的歷史學家，在台灣史研究仍為禁忌的年代，率先在日本組織研究會，研究台灣及亞洲相關議題，因此被列入政治黑名單。後來在李登輝的延攬下一九九六年返回台灣，並且擔任李的決策團成員，但是後來因為與李的日本情結有所相離，才與李漸行漸遠。

戴國輝曾任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調查研究部主任調查研究員、日本立教大學國際中心長，返台定居後，擔任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國史館長顧問，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所教授。

二·二八事件的相關研究部分，戴國輝也是開研究風氣之先，他並且引用台灣當時還不多見的資料素材。對當時引發二·二八事件的陳儀，有比較公允的評價。

戴國輝雖然長期居住在日本，但是他對日本統治台灣的各種現象，卻有難以拋棄的情懷，更嚴厲批判日本殖民政權的殘酷殺戮，霧社事件、高砂義勇軍的許多相關研究，就是其代表作。

——原載二〇〇一年一月十日《東森新聞報》

編按：此文取材於網路新聞報，特此向田炎欣先生致謝。

台灣史專家，批判日本殖民政策

一四五

戴國輝 硬頸精神超然絕塵

夏珍

知識份子在政治洪流中，要選擇一種超然塵世的姿態，是困難的。走過肅殺的歲月，前國安會諮詢委員戴國輝，面對權力，從疏離、走近、走進再離開。

兩蔣當政，為蔣經國引荐省籍人才的徐慶鐘幾度請他回台，戴均予婉拒；李登輝主政，他欣然回國任職，最後卻選擇對權力者採取批判姿態，李登輝的統獨走向與對日本殖民政權的懷舊依戀，是戴與李分道揚鑣的主因。最近李登輝接受日本漫畫家小林訪問繪製的《台灣論》在日本上市，戴國輝即直指李登輝對歷史認識不清，做為國家領導人，因此嚴重斷裂族群情感。

這是戴國輝生前，對李登輝的最後批評。

李登輝與戴國輝初識於一九六〇年代。當時王作榮攜李赴東京考察，出於李登輝的建議，說要王陪著去拜訪一位「黑名單」中人——戴國輝。三人酣暢歡談，數十年過去，王作榮猶記得那一頓令他齒頰留香的美宴，李登輝則在數十年後邀戴返國，還不忘對他一牆藏書，稱羨不已。這許多日籍資料叢書，隨著戴國輝返台定居，全部遷回新店，未及整理停當。主人已悄然辭世。

戴國輝出生於一九三一年，桃園縣，客籍血統使他得「邊緣情結」格外濃烈。在台中農學院（今中興大學）畢業後，即赴日本東京大學，取得農學碩士、博士。

在台灣史研究仍為禁忌的年代，他率先在日本組織研究會，研究台灣及亞洲相關議題，因此被列入政治黑名單。有趣的是，他的研究立論，其實並不離經叛道，以其所著華僑論而言，其時東南亞排華激烈，戴國輝實地考察，強調華僑源於歷史悲劇，多數遠去海外的華僑，都是從最底層的奴工做起，歷三代而聚積財富，被視為「黃禍」，是極不公平的對待。

研究二·二八，他亦開風氣之先，並引用台灣當時還不多見的資料素材。對陳儀則有比較公允的評價，視之為蔣政權用以宣洩台民激忿的渠道。他不滿國民黨政權的法西斯成份，更嚴厲批判日本殖民政權的殘酷殺戮，霧社事件相關研究是其中代表。

晚近幾年，他的著作密集地在台灣出版，對兩岸問題有深刻的觀察，並提出「翠丸理論」，認為台灣與大陸，猶如翠丸與人體，兩者密不可分，又有獨立的功能，翠丸被吸納進人體，可是會生病的。

做為歷史學者，戴國輝無疑對兩岸走向有著更高遠的看法，他的看法，與李登輝顯有差異，李登輝代表政府對二·二八事件道歉文，取杜正勝，捨戴國輝，其實已經標誌兩人對歷史詮釋的分歧。爾後戴國輝在日本發表文章，引用李登輝加入共產黨的史料，更令李登輝不快，要求戴不要在日本闡釋他的言論。

一九九六年返台定居，任職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別人視他當官，他自視這是「方便研究

」的職務；與李疏離後，外人同樣視他「求官未遂」，他了然於胸，卻坦直以道：豈能因憂讒畏譏，失去批判精神！

過世前，戴國輝還密集整理有關台灣史的著作。上週五他與難得回台的二兒子長談他在日本的奮鬥經歷，戴夫人幽婉地告訴孩子，仔細聽，這可能是為父的最後遺言。一個多小時後，戴教授大量吐血緊急送醫，昏迷數天終於不治，留下未竟全功的草稿，人間長遺恨，徒留唏噓而已。

——原載二〇〇一年一月十日《中國時報》

戴國輝 傾聽台灣近百年聲音

王震邦

台灣近百年史大家戴國輝過世了，生前沒有特別的遺言，只有簡短的交代：海葬！磊磊落落來，也要磊磊落落地去。

出身農業經濟的戴國輝，從來沒有想過會成爲台灣史研究大家；但放眼台灣近百年政治變遷這一段，則非戴國輝莫屬。從原住民抗日的霧社事件研究到二·二八事件，戴國輝以此爲基軸，不斷地探索近百年來台灣命運，也不斷反省台灣近百年史的種種苦難和悲劇。

傾聽台灣近百年來所有的聲音，站在同情流亡者的觀點，從留學日本起始，戴國輝幾十年來傾聽著流亡在日本的台灣異議人士，從左派到右派，從台共到台獨，戴國輝傾聽他們的苦悶，也傾聽他們的傳奇。接受學院嚴格訓練的戴國輝開始觸覺到這就是歷史，是台灣史的一部分，歷史的真相在這裡顯影，不同的眼光和曲解也在這裡投射。而這是多數史家無法擁有的機會。

戰前史料不斷出現，日本侵略和殖民台灣半個世紀的真相也在日本逐漸出土。戴國輝點點滴滴的蒐集，也點點滴滴地看到了台灣成爲殖民地的悲哀；更悲哀那些接受殖民統治者的認同錯亂，竟完全無視

日本在台灣的掠奪、剝削和野蠻的武力鎮壓。從台灣早期菁英分子身上，戴國輝看到了不同的面貌；從辜顯榮到林獻堂，戴國輝以更接近歷史現場的觀察，重新給予肯定和批判，呈現不同的觀點和論述。在歷史長河裡，戴國輝也看到了許許多多人在歷史中遭到遺忘，他要為他們留下紀錄。

從研究華僑入手，戴國輝看到中國人海外移民的苦難，非僅台灣一地而已。寬廣的視野和思維，加上人道的關懷，戴國輝有著更多的反省，並不時流洩於筆下。出入於左右之間、統獨之間，戴國輝以學術真誠一體對待。但基於個人的認同，戴國輝公開宣示：「我是生於台灣的客家系中國人。」對不同政治立場的異議人士，戴國輝有著同情的理解；但對台獨的偽命題則不假辭色，對虛構的歷史更是不留情面，大肆撻伐。

台灣的民主化對戴國輝是極大的鼓舞，對前總統李登輝更抱以極大的期待；但是從國發會以後，戴國輝徹底失望了，而且提出了質疑。戴國輝也因此承受了許多不必要的誤解，但是戴國輝還是默默地承受了。除了台灣史的研究外，戴國輝臨走前最後一本書就是和前監察院長王作榮對談李登輝。要從歷史的觀點為李登輝重新定位。

從留學到教書，戴國輝在日本待了近半個世紀，因著台灣人的傲骨，戴國輝拒絕歸化日本籍；但回台五年，卻讓戴國輝一再感受台灣學術界的虛矯，不時為著他的台灣研究無法展開而抱憾。在無限憂思中，戴國輝最後的缺憾也只有以海葬還諸天地了。

不是統派，不是獨派，是正派

曹銘宗

昨天去世的歷史學者戴國輝是客家人，他的教育、文化、學術、歷史背景與一般史家不同，使他的史觀、研究視野、切入角度寬闊而多采多姿。

戴國輝於一九三一年出生於桃園平鎮，日據時代念新竹中學；一九五五年赴日留學，六六年獲東京大學農學博士，擔任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一九七六年至九六年任教於日本立教大學史學系。

一九九六年，李登輝當選首任直接民選總統。五月，戴國輝返台擔任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直到一九九九年五月；後來擔任文化大學歷史系所專任教授，並在政大兼課。

戴國輝自認對台灣原住民懷有「原罪感」，曾花了十年時間研究霧社事件；他也曾以三十年時間研究二·二八事件的「神話」及「謎」，寫出《愛憎二·二八》。其他的重要著作還有《台灣總體相》、《台灣與台灣人尋求自我認同的心路歷程》、《台灣往何處去》、《台灣結與中國結》等。

他既深愛台灣，也關心原鄉未來的走向。他曾提示「何為台灣，何為台灣人」、「新台灣與新台灣人之認同」、「台灣該確立及保持的主體性」、「自立（非獨立，非分離）與共生」等時代性的命題和概

念。

對台灣政治問題敏感的戴國輝，自認是以深厚、長遠、客觀的角度來研究台灣政治問題。他說：「歷史不可能有斷層，只是我們洞察力不夠而易於錯覺而已。」

「我不是獨派，也不是統派，我是正派！」面對別人的批評，戴國輝常用這句話來為自己辯解。

這兩年來，他計畫由南天書局出版「戴國輝談台灣歷史與現實」系列著作，目前已經出版了《台灣史探微》、《台灣近百年史的曲折路——寧靜革命的來龍去脈》，最新的《近代台日關係史論》正在校稿當中。

南天書局負責人魏德文回憶，有關台灣政治問題的研究，戴國輝常說，很多人的研究非常膚淺，但他自己的研究卻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證明正確。

——原載二〇〇一年一月十日《聯合報》

正派戴國輝

唐湘龍

台灣史大家戴國輝走了，食道靜脈曲張出血，引發敗血症。享年七十歲。

桃園客家人。日本東京帝大農學博士。不管是日本，還是農學，在戴國輝那個時代，都是顯學。能造就出一個李登輝，當然也能造就一個戴國輝，不過，戴國輝終究不像李登輝，誰更值得尊敬，歷史很快會有答案。

他跟李登輝好過，很好過。一九九六年，要不是李登輝邀他，他不會回來接個國安會諮詢委員。講日本，他待得更久，懂得更多。立教大學一教二十年，他這輩子，待日本，比待台灣時間更長。他談日本，談李登輝，談日本和李登輝，比李登輝跟那些右翼政客互吹互捧，更有公信力。他沒有媚日，他沒有偏獨。他沒有那種以皇民背景驕人的殖民餘毒。

他來自台灣，研究台灣。在那個戒嚴時代，他在黑名單上。他在海外批台灣，談起台灣島內的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運動，鏗鏘有力。他的《台灣結與中國結》，點燃了解嚴前後統獨論戰的序曲。可是，他說他不是獨派，也不是統派，他是正派，算是他對自己政治路線的總說明。這句話的意思是：「我是

學者。」

死前，戴國輝是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他最後的工作，是和王作榮（另一位和李登輝交遊半世紀，臨老翻臉的人）共同為李登輝的歷史地位再評價。

他很硬頸。比起某些客籍大老，他一點都沒有失了客家人的面子。他最後一次公開的談話，就是痛批李登輝接受日本漫畫家小林善紀的訪問。對李登輝高度吹捧小林的《台灣論》，甚至肯定日本對台殖民是一種良心統治，大加撻伐。

還好有戴國輝。成為觀察李登輝一生行止的對照組。

——原載二〇〇一年一月十四日《中時晚報》

台灣人的典型

台灣史學者戴國煇先生昨日舉行告別式，他的骨灰將海葬於台灣海峽，伴隨永恆的濤聲，走向歷史。由戴國煇的一生，我們可以看出見台灣人的心路歷程。早年他負笈日本，離開白色恐怖下的台灣，以尋求學問的純粹性。然而，他並不以此為滿足。在僅有的時間裡，他以超乎常人的意志力研究台灣史，隨時搜集資料，找人訪問，不僅日本，還遠及美國、中國大陸，保留了一切可能的資料。

在他的著作中，人們可以發現那熱情超出一個研究者的範圍，而更近於尋找台灣歷史答案的終極關懷。然而，他又是冷靜無比的學術研究者，永遠不會用意識形態來左右歷史。因而在台灣意識論戰中，他可以徹底分析台灣意識與台灣獨立論的差別，也可以引證歷史，來分析台灣人的性格。

他在日本任教數十年，卻一貫批判日本帝國主義，從來不曾因為身在屋簷下而卑躬屈膝，也因此贏得日本學界的敬重，成為日人眼中的「諍友」。這種風骨，和許多政客在日本放言日本殖民台灣是「現代化的起點」，還感謝日本帝國主義，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在歷史的面前，他從未隱藏過；在真實的面前，他未曾折腰。

即使是去世之前，他仍以有限的精力，和王作榮對談他回台灣後，與李登輝共事的反省。他想做的，仍是為歷史留下真實的記錄。這樣的風骨，這樣傲然挺立的氣度，是一代學人的風範。雖然，戴國輝先生已走入歷史，然而，他對待歷史的真誠與骨氣，卻已為台灣的學術，以及台灣人的風骨，樹立一個無可抹滅的典範。

沁園春

皮葉

——代賦悼戴國輝

時代菁英，面對洪流，超然絕塵。

昔先生有志，學農多載，後來轉向，治史終身。

道理精微，眼光宏大，自此台研成一門。

回鄉矣，續直言論事，無愧文人。

遽傳溘逝新聞，謹一闋詞填以饗君。

慕清風高骨，文追太史，凌雲健筆，才傲星辰。

不戀權名，堅持批判，客籍精神硬頸伸。

應無恨！蓋先生雖去，典範猶存。

編按：此詩原載網路特此向皮葉先生致謝。

戴國輝和小林善紀：定位台灣主體的兩種思維

一位台灣史學家，一位日本漫畫家，「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戴國輝和小林善紀這兩人，在什麼題目上引起共同討論？

《台灣論》漫畫的作者小林善紀說，他知道對他的漫畫批判最力的是戴國輝。已經無法再挺身闡釋自己立場的戴國輝教授，則是日前台北一場座談會中受到懷念的缺席人物。這場討論小林的《台灣論》的座談會，最初由戴國輝倡議，最後卻在學生故舊向他告別的追思儀式的同一天舉行；出席學者延續戴教授的觀點，批評小林錯誤地詮釋歷史。

從表面上看，《台灣論》或可視為戴國輝和小林善紀的「交會點」；一位史學家對一位漫畫家的作品提出批評。但這樣說，未免小看了這個議題。《台灣論》是一本以台灣為主題的日本漫畫，出版後廣受日、台兩地注意，目前也有了中文版本。對台灣民眾來說，值得注意的也許不是一本日本漫畫所反映的此間哈日或仇日情結，問題遠比這個嚴肅得多。小林自稱希望提醒注意「台灣人認同」的問題，而這幾乎可說是戴國輝教授窮畢生之力關懷探討的主題。我們今天與其說是關心一個日本人的「台灣論」，

不如說應深思台灣人民自己的「台灣論」。

日本漫畫《台灣論》，用作者小林自己的話來說，是在描寫「日本對台灣殖民統治的妥當性」，以及他在台灣所發現到的「在日本已中斷的歷史的延續性」。其論述的事實基礎及詮釋角度偏狹有誤，連一些日本學者也提出糾正；不過，從日本人的本位角度來說，小林的觀點又幾乎是不足為奇的。他在辯護其觀點時，屢屢強調的是日本利益。他說要喚起日本年輕一代了解，幾乎斷絕了的日本傳統在台灣可以找到；又說「站在日本國利益」的觀點，日本應該把台灣當作王牌來打；並坦承他聽信旅日台獨人士的親日言論，強調「只要這些人是親日、愛日本，即使背後有戰略陰謀，聽他們的話有何不可」？小林的善紀的日本利益至上論，對台灣所讚不絕口者，無非是因觀察到台灣社會片面的親日情結把台灣視為日本的文化附庸。

台灣民眾聽日本人強調「日本對台灣殖民統治的妥當性」，也許義憤填膺，也許啼笑皆非。討回歷史真相當然是重要的；戴國輝在旅居日本多年的學術生涯中，多次挺身而出駁斥日本人對侵華和殖民台灣的事實扭曲。然而，更重要的還有一點：小林這種出於維護日本利益的觀點，於我們自身相關的台灣利益會產生何種影響？對我們急欲建立的「台灣人認同」有何關聯？這也是戴國輝教授最終所關懷的台灣主體性定位的問題。

戴國輝研究台灣近代史，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留下的正負兩面之遺產」，願意以較為持平的態度面對。他描繪台灣人民受到長時期殖民經驗而在「自我認同」課題上產生的壓抑和迷惑，也非常惋惜日本

的殖民統治把台灣住民與大陸割斷的歷史悲劇。從其中衍伸出的「台灣結」和「中國結」的糾結，成爲建立「台灣人認同」的必須面對的一個因素。但是，當戴國輝觀察到某些人把台獨運動的原點指向二·二八事件和省籍矛盾，他則提出了「這是不符合史實的」之糾正。戴國輝指出，台灣光復不久，「少部分與日本治台當局具有密切關係的台籍人士，或者深受日本皇民化教育影響的一小撮中上層台灣士紳及其子弟」，在當時出於「保護自己的安全和既得權益」的目的，而懷有台獨思想。從這個角度出發，戴國輝雖然致力鼓吹台灣民眾應建立「自我認同」，但對於台獨人士打著「本土認同」的招牌而依附日本勢力的心態，一直批評不遺餘力。他最終與前總統李登輝在理念上分道揚鑣，即出於個人這種信念堅持；對小林善紀的《台灣論》急欲揭穿其背後心態和戰略手段，亦出於這種對歷史事實的洞察。

戴國輝著有《台灣史探微》、《愛憎二·二八》、《台灣結與中國結》及許多其他中、日文學術作品，曾經因戮力研究台灣史而名列政府黑名单，旅居日本多年，在李登輝執政後期應邀返台出任總統府國安會諮詢委員，終因理念不合而辭職。這一段過程，凸顯的不只是道德勇氣，更重要的是學術堅持。個人的道德判斷或價值觀或各有追求，但學術研究和歷史真相則不可扭曲，此乃戴國輝所堅持者。

小林善紀欲反駁戴國輝對他的批評，誣指戴國輝等學者「在台灣民主化之後，連在日本的發言權都失去了」，而爲親日派的台獨人士所取代。這句話除了與事實不符，也凸顯小林所代表的日本利益至上的《台灣論》與親日派台獨理論之間的密合關聯。小林善紀的《台灣論》，對台獨主張者表現「對霸權主義的中國充滿反抗傲骨」和成爲日本文化附庸此二現象同樣讚不絕口；但戴國輝站在「台灣自我認同

「的主軸上批判小林的重點，不正為表達出身為台灣人對日本霸權主義的反抗傲骨嗎？戴國煇和小林善紀指出了台灣認同問題的兩種思維，其中真正能反映台灣主體定位的「台灣論」是什麼，難道還有懷疑的餘地？」

——原載二〇〇一年二月十二日《聯合報》

戴國煇自述

隱痛的傷痕

「你這個混蛋東西，是從那裏滾進來的臭清國奴，哼！明年再也不讓這一類東西進校門！」

這野蠻，惡毒的吼聲，曾經深深地傷害了我幼小的心田，震撼了我的生命。如今，隨著歲月的流逝，整整有三十年了。這一片往日的傷痕，依然清晰地遺留在我心靈深處，它常常在不知不覺之間，隱隱作痛，啞啞著我的記憶，歷久彌新。這傷痕宛如無形的文字，寫出殖民統治下的辛酸和亡國的血淚。

那時，我小學（公學校）剛剛畢業，歷經相當的辛苦，才踏進了那一所著名的州立中學。入學後第二個禮拜，在國語（日本語）課堂上，日本老師高野要我朗讀課文。當我站起來讀時，那惡毒的吼罵就震碎了我的心靈。

「清國奴」三字是日本人當年對我們台灣人最起碼的罵法，充滿了藐視和惡毒的侮辱。當時，我們漢族系台灣人唸的叫公學校，而日本人唸的叫小學校。一直到了日本投降前夕，才改公學校為乙種國民學校，原來的小學校改成甲種國民學校。但是，教科書卻故意叫我們唸低於日本人小學一年的書。入學考試當然依照日本人小學課本考，刻意安排這個，不就等於當局在作弊嗎？根本是無理和野蠻的不公平

。然而，這日本老師居然還有臉罵我清國奴，還加上一句明年不再讓我畢業那所公學校的學生進校門，以示他的無上威權。

我所畢業的公學校，位於偏僻的農村，全校才只有六個班級。我是自創校以來，破天荒第一個考進當時州裏唯一官立中學的人。自然被認為是很大的光榮。記得當那喜訊傳到我們村子時，全村給我這個小傢伙來了一個大宴會，其轟動可想而知。但是，如今入學才兩個禮拜，這個日本老師的一聲辱罵，卻永遠留下了心中的傷痕。

我們漢族系台灣人唸日本語，一般都搞不清濁音和ラ行和夕行的分別。我呢！濁音沒什麼問題，但是ラ行和夕行，即使今天當了大學教授，還是唸不好，寫錯也是常有的事。

追根究柢，這和我的家教很有一點淵源關係。我出生在一個小康家庭，不能說窮得日本語也唸不起。但是，我的祖父，乃至我的父親，向來視日本語為「賊」的玩藝兒。本著「漢賊不兩立」的春秋大義，終其一生，既不學，也不用，以「嚴夷夏之防」。因此之故，我上小學時，連個最起碼的發音也一竅不通。我就是那樣一個華夏的小傢伙。

我們中學的那一位高野老師，聽說是沒有學歷而經過檢定考試取得教員資格的，只因如此，他就耿耿於懷，自慚形穢，居然患有嚴重的自卑感。他除了鞭子、鐵拳和不絕於耳的吼罵聲之外，對於教育的内容和愛，這一切，都了無所知，後來日本人戰敗投降了，這下子我們同學對他的怨恨爆發了。有一天，把高野的房子包圍起來，要找他算算帳。這個過去以辱罵，鞭子和拳頭對待我們這批本島人（台籍）

中學生的傢伙，終於坐在地上，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哭嚎起來。我實在不想再見到這個「東洋鬼」的臉，我並沒有應邀去參加這次行動，我倒對這個日本人充滿了憐憫之情。

和這樣卑鄙人士成強烈對比的老師也有，那就是我們的漢文老師谷口先生和物理老師惠美先生；這兩位先生不但沒有以「清國奴」三字來罵過我們，相反地，谷口先生曾用柔道把欺負我們的日本學生摔倒在地，打抱不平。可憐天下好人就是那麼短命，當我來日留學時，曾想探訪這兩位老師，閑話離情，不料他們都已作古，令我無限感慨。可嘆的是今天用經濟大國做靠山，在我們的家鄉台灣又出現當年那暴戾之徒與高野相類似的人物，在那裏得意忘形，表演日本武士式的醜態。

歲月悠悠，戰後已三十多年了，任憑時光逝去，並未帶給日本人太多反省。馬齒徒增，我居然對於當年無法容忍的殖民地官僚與教員們的作風慢慢能夠了解了；他們不也是殖民主義的受害者嗎？對於這些人，除憐憫之情，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由於那些惡毒的辱罵所造成的傷痕，常常警惕著我，避免傷害學生的「心」，並且，鞭策著我，堅持一貫主張，去反殖民主義與反種族歧視。這樣說來，我個人的傷痕卻也不想積極地把它醫好，寧可讓傷痕留在，好做警鐘時時用它。

——原載《台灣史研究》（遠流出版）

令我臉紅的四十年前的往事

七七事變以後，台灣平靜的田園生活，很快就受到了騷擾。日軍侵入華南，台灣的青壯年，很多被拉去入伍。「南支派遣軍」司令安藤利吉（最末一任台灣總督，戰後畏罪自殺），認為台灣人既講閩南話，客家話，又通漢文，就將他們派到閩粵地區去。那些搬運軍用物資的苦力，叫作軍伕；那些幹翻譯、調查、慰勞、連絡的，叫作軍屬。

大約民國三十一年之際，我們村子也被拉去一人當軍伕。記得他大概幹了一年多吧！這位在公學校（專給台灣人上的小學）畢業以後，一直就在我們鄉下種田的老實人，有一天穿了一套日本卡其軍裝，沒有配帶任何階級徽章，拿了一個八等瑞寶勳章，退伍下來（這是日本勳章之中，最低的一等，在侵略戰爭末期，日本政府大量發給幫助他們打這不義之戰的人）。

我的父親爲了給這位歸來的軍伕洗塵，特地請他到我家來吃晚飯。當天安排的客人，不是至親，就是好友，沒有外人，鄭重其事，目的是想聽聽這個故國劫後歸來的客人，報告他在廣東的所見所聞。我父親頻頻催促我說：「明天早上要上學呢，早點睡吧！」可是，我這個小學五年級的小鬼，充滿著好奇

心，實在不願意，拖延了好久，才勉強強爬上床，在那裏躺著，假裝睡著了。

大人們並不知我這小鬼有詐，等我上了床，頃刻之間，就迫不及待地，爭先恐後向這軍伕提出一大堆的問題，諸如：我們的故鄉廣東現在的情形怎麼樣？廣東鄉下，像我們說的這種客家話，還可以通用嗎？日本兵在那裡有沒有幹出壞事等等。當時台灣與大陸的往來被極度限制著，海天遠隔，音信難通，我父親那一輩人對自己故土廣東的關懷，和那思鄉的飢渴，好像一下子就要得到滿足一樣。良久，軍伕壓低了聲音，慢慢地開始細訴日本兵在我們家鄉幹的種種暴行，如何慘絕人寰，如何動人心魄，其中包括獸兵強姦了我們中國婦女之後，還用刺刀從陰部把她捅死！

現在每每回想起來，猶令我臉紅的事：當時，在蚊帳裏偷聽大人講話的我，突然爬起來，大聲說道：「日本軍是皇軍，不會幹出那種壞事！」

這事發生得太突然，以致大人們全給嚇得面無人色，手足無措。紛紛到我跟前，誠惶誠恐地訓誡我，今天這番話一旦洩漏出去，他們全都坐牢，那軍伕可能給警察大人逮去，也可能被宰掉。我現在還清清楚楚的記得，當我爬起來大聲說出上面那兩句話之前，還聽到父親說道：「這場戰爭的勝敗已定，日本兵敢於幹出這樣傷天害理的暴行，斷無戰勝中國之理。我們回歸唐山懷抱的日子，也就不遠了啊！」

——原載《台灣史研究》（遠流出版）

「中國人」的中原意識與邊疆觀

——從自我體驗來自我剖析或解釋

中心與邊陲的對立，是一個普通存在的現象。城市與鄉村、中原對邊疆，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與第三世界地區等等，都是這種對立的例證。有關這種對立的研究已逐漸盛行。例如二十多年前興起的庸屬理論（或依賴理論）便是根據中心——邊陲的對立與差別來探討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問題。

台灣地處中國邊陲，加上曾受日本統治，以及目前與中國大陸的分離狀態，具有濃厚的邊陲性。台灣居民因而具有遠較其他地區為強烈的地方意識，亦即「台灣意識」。但另一方面，台灣居民除了少數原住民外，均移自中國大陸。移民每有綿延不斷的原鄉意識。來台的移民因而具有不同程度的中原意識。這種中原意識在受到日本等外來侵略，形成漢族意識或「中國意識」。「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並存於台灣，反映了台灣社會組織及歷史過程的複雜性。

原鄉意識不僅發生在台灣，也發生在海外華人或留學生。東南亞華人的原鄉意識曾導致當地政府的排華行動。台灣來美留學生的原鄉意識也在支援台灣民主運動及提倡台獨運動中發揮重大作用。

戴國輝先生這個講稿係根據他在紐約哥大一次公開演講整理而成。作者以親身的經驗來分析這個重

要而不易理清的題材，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角度來省察「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論戰，特此推薦給讀者。

我先交代一下今天這個题目的由來。第一是前年，一九八二年的暑假我用日文寫了一篇論文，收在《漢民族與中國社會》裏。（舉起這本書）這書是一系列從當前的世界探討各民族與國家間問題的叢書之第一冊，是我的老朋友橋本萬太郎教授編的，他是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語言學教授。這裏頭我寫的一長篇論文就是今天的題目。在裏頭我提了幾個問題，最主要是對漢民族的意識，中國人的國家意識，及中華意識做一個未成熟的整理和交代。這是我一直在日本探討的主要題目之一。其結果變成我這篇論文。其次，在愛荷華我沒料到會碰上陳映真。結果在《台灣與世界》第八、九期（分別在一九八四年二、三月出版）發表了上下兩篇的〈談「台灣人意識」與「台灣民族」〉。希望在座的鄉親與同學們趁我在紐約的這段期間，能給鄉弟多多批評和指教。我們可以好好地討論一番。

從邊緣到中心的史觀

爲什麼要從「自我的體驗」談起呢？照理說這種寫法是吃力不討好的。以一個傳統的中國知識份子之立場來講的話，是最笨的一種作法。爲什麼要赤裸裸地把自己的想法和過去的體驗交代清楚呢？把這些記錄下來，將來或許要吃虧，可能我是個大傻瓜所以才這麼做。我始終這樣想：「原則上搞社會科學

的就是應該擺開情緒的部份，把所研究的對象對象化、客觀化，保持一定的距離，然後才加以探討。把所有的感性部份丟掉，並沒有把它昇華，提高層次來結合科學研究的話，亦太過於枯燥。不一定能道出其所以然來」。因此我在東京這二十八年，經過種種的挫折，各色各樣的衝擊，發現到就是應該從自己生活的現實，或是生活歷史的現實，或是我既有的社會生活的現實做出發點來思考、來整理自己的問題。意思就是說千萬不能藉為「社會科學」而「社會科學」來自欺欺人。對自己也應該有所交代。從鴉片戰爭以來，我們中國知識份子經過很多很多的挫折，吃了許多許多的苦頭。但是不管在大陸、在台灣，或者是現在在美國，一些搞政治，參與政治的朋友們一直都不大公開地談這些問題，至少在我的狹窄的經驗來言是如此。這個問題就是人人罵的美國在成熟期資本主義下開花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我卻認為「個人主義」有正、反兩面，我們應該追求其正面意義，我希望對自己比較忠厚一些，善待自己一些，這樣對做學問、研究、待人、處事都可要好一點，不然的話，就像很多知識份子被人家牽著鼻子走，始終走不出自己的道路來。不仿美國，就學日本，老是依賴別人，老是高攀(或許該說低攀)，對一些權勢低頭，出賣自己，甚至出賣朋友，簡直是胡鬧，也相當不應該，總之，我這個題目是要對自己有所交代而談的。另外，從我個人生活來說，也是給我在日本生的孩子們留個記錄，讓他們能超越我，從他們的父親所經歷過、所苦惱過的行程和思路得到一點小小的教訓。對這個問題要交代的第三點則得從我半路出家談起，剛剛主席又誇獎我學問相當廣泛，這並不是事實。只能說我興趣很廣，肚子裏都是「油」(大家笑)，並不是學問。我這個半路出家也有它的必然性。過去我學農，學農業經濟，寫這

方面的論文，然後寫農村社會學有關的題目，博士論文寫的是農業史，我做農村社會學這方面的題目的時候，相當積極地利用文學題材（小說）加以整理、考證並精煉後做研究的「基材」。後來我寫糖業史也得利用我們老祖宗留下來比較多的文字材料，因為，諸位都知道，甘蔗糖業這方面根本不可能在考古方面留下研究材料來。所以我就找出當年都市生活的一些文學語文等記錄來，用社會科學、社會經濟史的方法整理出我的第一本書。在這個過程中，慢慢地我對所謂正統就形成一種看法。就是說，中國知識份子背負了相當重的歷史包袱，總是從歷史，也就是從過去的觀點來看問題，其實老百姓對正史都沒有太多的興趣。比如廿四史中的三國史，我相信除了唸歷史的人之外，很少有人去看它。但是《三國演義》看的人卻很多，不管它的歷史事實性如何。後來我就想到搞正統歷史的人很多，我何不從邊緣來圍攻呢？套一句大陸的術語就是「從農村包圍都市」，「革命」求勝的方式既然可以用，當然做學問也可以一試吧。那麼「邊緣」對我究竟是什麼呢？搞台灣史啊、搞華僑史啊、搞農業史啊，甚至在農業史裏我搞的是蔗糖史（並不是社會經濟史裏的主流。而是一個邊緣的東西），就是一些嘗試吧了。如此就慢慢形成了鄉弟的一種「史觀」。我在搞台灣史的時候亦是從另外一個「邊緣」的高山（原住民）諸族著手，我覺得高山族的歷史境遇太慘，沒有人替他們講話，因而我就代他們整理一些資料出來。當然，我沒有資格替他們寫歷史，但是起碼給自己一個交代。歷史上，我們客家人給高山諸族添了許多麻煩，或是傷害了他們，或是搶了他們的土地和財富。就這樣，終於編出了《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這樣講，諸位就可以發現到我總是在「邊緣」徘徊，不曉得什麼時候才能夠達到核心，中心地帶去。

我現在以為我的歷史觀體系在慢慢地形成。這是我第一次很冒昧地公開講出來。我的筆記本裏是畫了許多圓圈、箭號等等，在一步步地搞。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夠完成較有系統的一套東西來。另外一句題外話就是：我覺得很多的過去搞歷史的沒有用上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精神分析等方法，我希望能夠把這些方法導入歷史研究方法裏來。或能稱為歷史心理學的一種範疇新境界。

知識份子該對自己的思考與行為負責

在進入正題之前，最後一個想請教諸位的就是「自我同定」(identity)的譯詞問題。我不曉得台灣島內或大陸上寫文章的人不用這個翻譯詞彙。常用的譯詞「認同」還算不錯，但是比較適於動詞的場合，也就是英文的identify。但是把identity翻成「認同」，很有些時候會引起誤解，不很適當。所以我才想用「自我同定」。這個「自我同定」的「自我」當然跟「個人主義」有關係，這個非常值得我們留意與強調。就是說對自己的identity crisis (認同危機)如何解決，以及如何豎立自己的自我同定。也就是說，當為知識份子，該對自己的思考與行為負上責任來。時時刻刻都應該好好對待自己，老老實實面對自己，進一步要能對得起朋友、鄉土與民族。還得要禁得起歷史的考驗才好。就是我未成熟的一個看法，也就是為什麼我要赤裸裸地把我的看法說出來的主要因素，這在日本學界也是很少見的。

當我這篇文章發表以後，日本朋友來信說，引起了種種爭論和嘉評，我今天的一個如意算盤就是希

望諸位能夠給我一些意見，我回去後可以藉諸位的智慧來應付日本朋友方面的「挑戰」。

「黃帝子孫論」的質疑

現在言歸正傳。第一個要談的就是「黃帝子孫論」。我特別是要談我從小到小學這一段期間，黃帝子孫論在我家的情形。家祖父、家父當年常常一而再、日而月地要強調我們是黃帝的子孫，這當然是針對著當年日本統治者——一個外來的壓力，一個權勢，且是侵略民族相對抗而強調的。我是一九三一年出生，那一年，發生了九一八事件。等到「七七」的時候，我在唸小學。那時日本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要逼著我們改姓名，獎勵年輕人參與日本軍的侵略行爲。在這種情況之下，家父很怕我這個么兒將來會被同化成日本人。那時我的哥哥們，有的在東京、有的被動員徵備到南洋，只剩下么兒在身邊。天給日本老師灌輸「日本國體論」——萬世一系的天皇，偉大的大和民族和大和魂。家父當然希望能夠把這個么兒拉回中國人這邊來。中國有一句話「言教不如身教」。我們家過舊曆年第一天，所謂開正，要拜天公、祭祖、貼春聯……等等。拜天公的時間還得看當年的干支來決定。我相信家祖父和家父等老一輩是透過這些祭祖、拜天公，一而再地強調我們係黃帝的子孫等來教育我們這一輩，叫我們不能且不變成日本人。

但是我向來不是「乖乖聽」，常常要發些疑問。那時我在東京的哥哥希望我上中學時到日本去上學

，因爲在台灣受到日本人歧視，很厲害，到日本起碼還有那反動且保守的明治憲法的保障。千萬不能忘記，當年的殖民地台灣，連那老日本憲法都沒有被施行，當然無所謂憲法的保障。他常常寄書來，有次寄來一本松村武雄編的《朝鮮、台灣、支那神話與傳說》（我寫這篇文章時又看了一次，坦白說，編得不錯）。書上說黃帝是神話，是不存在的。我就向家父發問：「不存在的黃帝怎麼會是我們的祖宗呢？」爸爸說：「你怎麼這麼嚕嗦？聽爸爸的就對了，爲什麼要發問呢？」我反駁說：「爸爸您不是常教我們，別讀死書，要多發問的嗎？這個是書上講的。」他說：「可能是日本人有偏見，書上抄來抄去，要侮辱我們漢民族，侮辱我們黃帝的子孫，所以說黃帝不存在。」後來我向我哥哥求教，他就把司馬遷的《史記》寄來了。那時我才小學五、六年級，當然很難看懂囉！但是總也看得出來其端倪。《五帝本紀》第一講黃帝，司馬遷也只是當它是傳說，並沒說是實在的人物。只管說黃帝可能有些不妥，所以再找他的先一輩的炎帝也就是所謂神農氏來再加一層「武裝」變成所謂「炎黃子孫」或「炎黃裔胄」的成語來，流傳到現在。最近十年來，我一直在想如何用近代人文科學來對這些神話、傳說之類作下分析。是否可沿用社會心理學或精神分析來解釋？日本也有天照大神、神武天皇等。全世界各國都有類似的神話與傳說。我們爲什麼不能找出通用的方法，新的人文、社會科學來解釋它。不管怎樣，對或不對，我爸爸、我祖父他們始終是以爲黃帝是我們的遠祖，漢族的遠祖。深信他們是他的子孫，這個社會觀念我們絕不能忽略它，更應該加以科學的探討才夠時代意義的。

「黃帝子孫論」的政治應用

一九五五年秋天，我到了東京。本來對於三民主義，除了應付留學考試和預訓班受訓以外，都不大願意看與唸的。到了日本以後，反而想好好研究一下孫文、辛亥革命等。這樣就接觸到章炳麟、王船山、《黃書》，也看過《黃帝魂》、《革命文牘類篇》等等。王船山可以說是主張漢族中心國家並以華夷思想力主排外保種（漢）的開創人。黃帝的「存在」，我看了那些書以後，我斷定它只是一種象徵性的存在，精神所繫的一種存在。我猜我祖父和爸爸可能沒有看過這些書，一九七二年回台省親時，我還到老家去查了一下，的確沒有這類書的收藏。那麼他們為什麼會與王船山等人一樣地主張我們一定是黃帝的子孫呢？會不會是口碑傳下來的呢？他們當年的知識水平來言，當然分不出何為神話，何為傳說。他們更有可能沒有把神話和傳說分開來的欲求。當然，他們也不會想到更不需要去分。只有我們這些囉嗦的知識份子要搞這個區分了，定義了，分析了等等的的事情。（笑）。史記中的黃帝已不是神，而變為半神半人的「存在」。司馬遷把神話中的黃帝繪成帶有濃厚的「人」的味道來，但他只認為黃帝是傳說中的人物，並沒有確認他是事實的存在。我的解釋是：當年我們（算是說自認為的原初漢人或漢族吧）在中原以黃土平原和黃河來當做我們偉大的母親，向無能為力來馴服的大河黃河來討生活，還得向可畏的自然環境挑戰。斯時的漢人們為謀取鬥爭的勝利，還得假託「神通力」等，至於有關炎黃等的故事，卻反映

當年與大自然搏鬥的一種社會心理的反映。原初漢族人當年需要「超能力」來支持自己的社會行爲，由這種社會心理的反應逐漸造出一種黃帝子孫的說法。到了辛亥革命前夕，《黃書》、《黃帝魂》、《革命文牘類篇》等就再給倒清興漢革命攤出思想性的準備。它們說的黃族就是漢族，過去的神話、傳說中的人物慢慢卻變成促進排滿、保種（漢）革命、團結、統一的象徵。後來孫文一統的辛亥革命成功以後，當然，排「滿」就給沖淡了，逐漸提升爲五族共和，五族卻不排除滿族了。這種轉變以一個「中國人」來思考，我們應該如何解釋，也是一個很大且很有趣的課題。不共戴天的仇族一經過革命卻變爲共和的族伴。這一種邏輯的轉換，如何來做合情合理的解釋，又值得我們去探討的。

更有意思的是，這幾年大陸對台灣的統戰口號，一貫地呼籲「我們是黃帝子孫」云云，台灣國府要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也在大談其「炎黃子孫」。他們還一方面說：最好你們「台獨」不要搞什麼台灣民族啦，我們同是炎黃子孫云云。我仍然不做「乖乖聽」，就去查兩邊出的辭海。台灣中華書局發行的《辭海》（一九五九年四月台四版）的「黃帝」項等於抄襲《史記》，根本沒有近代人文科學一類的任何解釋。至於「炎黃」項卻加有「今我國人常自稱爲炎黃裔胄」。大陸，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辭海》（一九七九年版）的「黃帝」項則先明說「傳說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後再引《史記》等記事來闡述。另「炎黃」項亦先明示有「傳說中的中國上古帝王炎帝與黃帝」。

台灣國府講「炎黃子孫」不奇怪，因爲他們不要馬列，不講唯物史觀嘛。但是大陸中共就該不同的囉。大陸作統戰時又爲什麼也來個「炎黃子孫」呢？這不是怪怪的吗？怪怪是怪怪，但它打這個口號是

有一定功能才會繼續在打的。這就是值得我們探討的囉！被當爲統戰對象人們的心態究竟爲何？難道不值得我們去關心、留意的嗎？我們當然可以批他：中國共產黨啊！不要變成老修囉！你們的唯物史觀要好好保持囉！你們自己編的辭典明說是傳說，怎麼可以用來作統戰的口號人物呢？批儘可以批，但實際上這種政治口號有它存在的合情、合理性，有它發生效果的社會心理基礎。或許被統戰的人們，無意識的具有接受這種口號的心理基礎（不被統的當然是例外）。不然大陸當局老提這個幹嘛？這次我來美國一年，就發現很多過去搞台獨的鄉親們到北京去了。大概他們動搖了，他們是否對「台灣民族論」失去了信心，回過頭來，承認他們爲炎黃子孫的一份子？我並沒有譏笑、中傷人家的意思。而只是以爲這種心態值得我們去分析就是了。反而又可以說，自廖文毅以來叫了三十幾年……我們不是中國人，我們是台灣人，我們已自成爲「台灣民族」，對中國人，中華民族不但有別，還另具有「民族仇恨」，講了大半天，好像是「空喊」。

在此我順便給諸位，介紹一些小插曲（episode）。一九五〇年末期到一九六〇年代初頭，大概因爲鄉弟是客家系，加上在同學會愛說話又能用日文寫一點小文章的本省人的緣故，有些鄉親來遊說我，要小弟去看他們的廖（文毅）大總統。但我看完了廖著《台灣民主主義》後，我認爲檻樓一套，那一套行不通，不值得我浪費時間去訪問他。過些時候有一位同學來邀我去看邱永漢，那一位同學說，邱是在堂堂皇皇的日文大雜誌《中央公論》、《文藝春秋》等寫文章，不至於是檻樓一襲吧！我說邱的日文很美可佩，但他的邏輯我不能贊同。另外我問那位同學，邱會不會是「小政客」來唬人的，搞台獨怎麼取

「永漢」這個筆名呢？他恍然大悟，嘿！戴學長，我不會想過這個問題（邱的本名為炳楠）。這一次來美國，去年暑假前在灣區有位「新相識」，來了個電話，邀我參加世台會，另外問我想不想與陳唐山見一見面。當時我對美國僑界一無所知，當然不知道陳氏為何許人。經過新相識說明以後，我向她發問，唐山是不是本名？本名還可原諒，若是筆名的話，會不會再來個「邱永漢」呢？她忙著在電話那一邊說，唐山大概是本名……。唐山先生將來何去何從，我個人無法預料亦無多大興趣。但邱永漢財神爺（日本商人對他的稱呼），他已自認「炎黃子孫」回台賺他的錢，前幾年搖身再一變，又成爲日本公民去了。愛罵人的在日華僑們裡，甚至於有人打起問號：「邱會不會再從日本公民，升級變爲日本皇民？」「可嘆可嘆！」這個是後話。

「台灣光復致敬團」（追錄(1)）的遙祭黃帝陵

另外一件值得我們在此一提的，則大概光復快爲一週年的時候吧，由林獻堂先生、姜振驥（為客家系人士，於抵抗「割台」戰爭中勇敢犧牲的姜紹祖烈士的獨子）先生、葉榮鐘先生等士紳們組了「台灣光復致敬團」回了大陸作上了「光復致敬」的儀式。

「台灣光復致敬團」，由丘念台（代表團顧問）先生和林獻堂（本被推為團長，但受長官公署當局之反對作罷，該團終於不設團長職）先生率領晉謁了蔣介石國府主席，宋子文行政院長，王雲五內政部長，白崇禧國防

部長等送上「國族干城」的錦旗與蔣外，另託蔣轉贈五千萬元給陣亡將士家屬爲慰勞金等的現實「政治秀」外，他們還飛到西安，再由專車轉赴陝西耀縣，遙祭了黃（帝）陵。這一種政治上的「現實」和「宗教」合一之回歸祖國「儀式」，值得不值得我們今人，用上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精神分析方法來分析與解釋一番呢？鄉弟認爲是大大值得去做的。

目前手頭上（因在旅途上）資料不夠，將來有機會把今天的一些話印成書時，我會補上代表團名單和祭黃陵文的。但在此我可以先提一下，代表團裏雖有福佬系、客家系的人數安排，但獨缺高山諸族（原住民）代表，至於「祭黃陵文」（追錄②）則由葉榮鐘先生起草，經過獻堂和念台兩先生審閱定稿的。

我希望最近的將來，能找上機會，另草一文來介紹「台灣光復致敬團」的來龍去脈，今天就不再多言了。

尋根，族譜與中原意識

諸位都知道，前不久《根》這部著作和電視在東亞亦風行一時，在日本、台灣也煽起尋根熱。東南亞的華人，華僑界又是一樣。反正生活水平提高到了一種程度，一般人都會想起家譜、族譜之類的。我們戴家也新搞了一個。還有遠祖的相片呢！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戴家的族譜豈能有個黃帝「玉照」（眾笑）。真有意思呀！那時我們家的總管大哥還在世，我就寫信問他，族譜裏那張「玉照」怎麼弄來

的。怎麼用「今人」古裝照相來唬自己。根本不知模特兒爲何許人，還要我們戴家後裔來祭拜，不是胡鬧嗎？他老人家含糊其詞，但卻讓編譜的「業餘文人」賺了一大筆。這亦可說幫台灣創出「就業機會」，相助並促進了「台灣經濟的景氣」（哈！）。

我們家的店號是「晉和」，晉當然是指山西省的太原。這也有段故事。我爸爸那時教育我們是黃帝的子孫，當然要談到中原。但我始終不是「乖乖聽」，就問他：「中原在什麼地方？」我爸爸說是在河南附近。可是我一查，我們的店號是晉和，是山西的太原囉，河南到那裏去了呢？會不會以前的河南包括太原，或是後來分離了呢？我爸爸素來討厭日本話，這時卻用日本話罵我真是「唔路塞」（指噁味，討厭的人）（眾笑）。我就說：「你不是說要我們好好發問，學習才能進步嗎？怎麼又罵我『唔路塞』呢？」我們的祖宗靈牌和祖墳的墓碑上都寫的是「譙國」。我就問我爸爸在那裏，是不是在中原呢？他說不知道。好，我就去查。給我查出來了，原來是河南省上丘縣，當然得託福大陸的地殼以及地名無起過大變化。我就說：「我們的祖宗靈牌和墓碑上的兩個字與我們的店號距離相當遠。那時船也不甚大亦可能很好，當然沒有飛機囉，怎麼會差得那麼遠？」我爸爸大概沒法回答我，就說：「我們偉大的正統祖先，在周朝時被封於譙州，就是中原逐鹿那段時間，我們戴家被封了，由『州』變成『國』，就是『譙國』。這一下，你就得服氣了吧？」我說：「還是不大服氣。我們家那麼偉大的話，爲什麼跑到台灣來冒險？首先要過『烏水溝』，也就是現名爲台灣海峽的險，那時候好危險！到了台灣還要跟高山諸族（原住民）打仗，常有可能被斬頭的，這是很危險的。」他一方面翻我們家的老族譜（不是剛才說的有照片的族

譜，另外有一本老族譜），並指著族譜說我們的祖先多光彩，好多的秀才、舉人。我說：「沒有吧？那有那麼多秀才、舉人呢？如果我們戴家都是秀才、舉人的話，我們應該像林本源一樣囉？奇怪！我們家的秀才、舉人都不靈光？」（眾笑）我爸爸又罵我「唔路塞」。差一點要挨揍。

因「雜種」挨了耳光

最絕的是，有一天我的外祖母到我家來，那時她七十幾歲，她很漂亮，鼻樑高高地，客家山歌唱得好得很。我突然問我爸爸：「外祖母會不會是平埔番？」我馬上挨了一個耳光。我爸爸說：「你這個混帳！我們家怎麼會有『雜種』？」我說：「哥哥寄給我的書——達爾文的進化論和門第爾（Mendel）的有關『遺傳法則』之書——說雜種是好的。為什麼你要罵我、打我？」我爸爸說：「你混帳！什麼『雜種』好！我們戴家怎麼會有雜種？」我說：「雜不壞嘛！從進化論、遺傳學來講，越雜越有希望啊！」（眾笑）當年，我想法不外是承認家父的中原正統說，再加上與平埔族混血不是可以培育更上一層樓的「雜種」嗎！但長輩卻不能接受。中國話的「雜種」是罵人的話，其實就是有一點混血又不至於傷大雅才對（哈！）。但我爸爸絕不讓如此的說法。當時他會有那種激烈反應是很有意思耐人尋味的！他雖然唸過漢書，我相信不會看過太多的書，但他身體中充滿了「黃帝子孫」觀與「中原正統意識」，心理上始終認為是大陸中原那邊南下且過海來的正統客家人。關於混血，我相信客家人和邊疆民族混血，該是

常見的，你看李光耀，如果把他請到東京，日本人一定說他是朝鮮人。李的面貌很像「平均」的朝鮮人的面貌啊！朱德據說又是客家人，大塊頭，可能比較接近北方人的所謂漢族。葉劍英在相片和電視上看與丘念台故老先生一樣，較為斯文些。我自己嘛！我相信有一點高山諸族（原住民）的血統吧（眾笑）。現在胖了許多，以前黑漆漆亦是很 smart，大家叫我「black」（眾笑）。踢足球時，大家認為我是很兇猛的。有關我們家，自囿於「黃帝子孫論」和「中原正統」意識的故事，就此暫時結束。

客家人與閩南人

現在我講第二個題目，就是「中原、客家人」。我想，我如何地慢慢認同自己為客家，當然是先確上有非客家後，才會逐漸地做下自我認識，認識到我自己是客家人。我生在中壢，我們家的小醫院在中壢街上，店也在街上，平常碰到的都講客家話。有一天回去鄉下的家，忽然碰到有人講我聽不懂的話，後來家母告訴我他們是福佬，是閩南人。我們通常叫做「福佬仔」。我們彼此間的生活很少有過衝突，住在我們鄉下家的隔壁是我們家的佃農。他們是閩南底客家人，原本是閩南人，後來遷來客家村莊住，又種我們的地吧，他們平常在家裏講福佬話，但在外面則講客家話，慢慢地年輕的一代，二代就客家化了，所以我們說他們是福佬底或閩南底客家人。然等到我上中學以後，就再發現我們的周圍日本人變多，數了，鄉下只看到小學校長與警察大人及他們的眷族是日本人，但在中學的同學，四分之三是日本仔，

剩下四分之一才是當年稱謂本島人的台灣人，偶爾可尋出一、二位山人（全校裏）。這就是當年的新竹州立中學的情況。當年的日本人學生很霸道，常常欺侮我們，我們本島人之間逐漸發現我們同受日本人的欺凌。但是我們互相之間介有語言不通，生活習慣不同，好像氣質亦不大一樣。客家人一般較多出身於農村，商人比較少，像我們家既是醫生，又是地主，再兼營布店和碾米廠是很少有的。而當年我同班的其他客家人不是小學老師的兒子，就是中小地主當年被分類為「貸地業」家的兒子，或是醫生的兒子，生意人的子弟甚少。但福佬人同學，他們的出身較「雜」，因他們住新竹市、桃園街（當年新竹市是一大州城，客家城鎮的中壢還沒有現在的繁華，福佬人的城鎮好比桃園、竹南都要比中壢，苗栗街要繁榮，起碼在我幼年時期是如此），他們間還有「大」商人的子弟，習慣於商場及商人討價還價一般的生活，顯然地他們的表現較為「敏捷」，較為「狡猾」，較為「油條」。我們覺得閩南系同學很靈，很會對付日本人。我們甚至認為閩南人狡猾，不老實，不忠厚。而我們客家人直繃繃的，說打架就打架；閩南人則說我們「阿呆」（笨蛋）。另一方面，我們也覺得閩南人不易團結，客家人則比較團結。為什麼呢？其實很簡單。客家人大多數是鄉下出來的，對於都市的商業社會沒有什麼認識與體驗。閩南人則見的場面多與廣，較為「世故」或成熟，很會適應。由於這個區別，客家人和閩南人同樣受日本人欺凌，但我們之間卻難於構起「被迫害者」間的共識與連帶團結。原因不外是以下幾種。第一，母語有別。第二，氣質有異。第三，彼此間的信賴感亦不易建立。第四，日本人的挑撥離間政策促進我們本島人之間的分歧。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當年的山地（原住民）青年同學在我們新竹中學者，始終受到日本人的「特別」

庇護，他們講日本話比我們靈，他們不會說福佬話，客家話，他們的母語我們不懂，當然不可能站在一起，我們之間建立關係尙要等到光復後。

客家是什麼？

由於這個閩南人與客家人的不同，後來我就問家父，「客家是什麼？」他說，「客家就是講客家話的人，是從中原來的。」還說我們客家是正統的漢族，再問他正統是什麼，他就答不出來了，反正他確信是中原正統出身，跟閩南人不一樣。甚至我們父母都有一種偏見，認爲閩南人髒，不愛洗澡（眾笑）。其實，我祖母，我媽媽梳頭髮的髮型、穿的客家衣服、唱的山歌都有客家的特殊風格，當年的福佬鄉親很可能在背後罵我們客家人「土包子」呢！（笑）

到了光復後，我的視野慢慢擴大了。幫我擴大視野的第一個人就是我家大哥。他從南洋復員回來，告訴我們南洋華僑裡，有很多和我們講同樣客家話的。甚至於有同我們家母、祖母梳同樣髮型頭的，穿「大婆衫」的婦女們。他還進一步在台北給我們家添購了一本羅香林原著《客家研究導論》的日譯本。

我們那以前，只知道中壢靠海邊的客家人講「海陸」，我們家母就講「海陸」客家話。但我們家常用的卻是「四縣」。另外有位嬸母來自於台中的東勢角，她們家講的是另外一種饒平客家話，已自台大退休現爲淡江大學教授張漢裕先生就是講饒平客家話的。這些命名統統來自於對岸大陸故鄉的地名。

我詳讀了羅著以後，我發現客家在大陸上的分佈都在「邊陲之地」，不毛的「邊疆」之地。也就是說多散居於 marginal land。後來我再發現台灣的客家分佈亦是一樣，在「山腳」地帶，在福佬系所佔據的平野部份與山地諸族退據的高山地帶之間。南洋亦有類似的歷史情形。

這般分佈的來龍去脈，我們今天不加以討論，我只在此地提一提，我們客家人士的潛意識裡面有雙重、三重錯綜複雜的「邊疆意識」在，卻是事實。

邊疆意識

在大陸已居於邊疆，遷台後再來個邊疆。再加上在台灣的客家人數只佔有漢族系台灣人的十三%的少數，被歧視是理所當然的。日據時代被日本人歧視，在漢族中還得受福佬系人們的疏離、歧視。這些情況足夠形成客家鄉親們錯綜複雜的「邊疆意識」。

來會的鄉親們，千萬別誤會我在「訴客家人的苦」，在唱客家人的哭調。鄉弟不過是在試圖發現問題所在而已。我一直認為自囿於低層次的「被迫害意識」者是難於獲得「勝利者之碩果」的。我們爲了解決問題，需要發現問題的所在，然更需要加以分析，以便解開我們問題的癥結，可以藉而克服我們的問題。更想把自己的看法昇華且提高我們彼此間的精神境界。何況，福佬系鄉親們既然亦有人在主張，福佬通於「河洛」。以此作據尋他們自己的根於中原的。我們就可知「中原正統」意識和「邊疆異端」

觀是具有其普遍性的。問題不只局限於客家鄉親們。其實古老一點的國家，不管它是東方或西方，多多少少都有中原和邊疆或正統和異端之對抗或「間距」的狀況。就連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加拿大都有類似的問題。中國或許是因為太古老，國土廣大，問題較為巨大與深刻些。

值得我們注意的卻是美國。一般來言，邊疆觀或意識往往是曲折錯綜亦複雜的，通常帶有濃厚的「卑屈」和反面的潛意識在。但美國卻少有此種性格。

一般白人系美國人的邊疆觀不單沒有負面的價值，反而把它提升並與 frontier spirit 連結在一起，它還具有正面的，開創新境界的理想，拓荒冒險的崇高精神的涵義。我們還可以在其文學裏面，找出強有力地反映開拓者精神的作品類。我現在請教諸位，能否在我們的福佬系台籍作家的陳映真或者在客家系台籍作家的鍾肇政等人的作品裡找出類似 frontier spirit 的「進取性格」和「傲骨」來。

近幾年來，張俊宏提出「草地人」，楊逵提出「草根性」，雖然難免帶有些美國文化中的 grass roots 的味道，但也值得我們去留意它。

話說回來，中國知識份子的傳統看法中的邊疆觀通常卻是與「土包子」、「鄉下佬」、「落後性」、「流放」和「放逐」一類負面價值連結在一起的。

對不起，請諸位再一次回到我們戴家的事例來。我們家祖父、家父輩，他們繼承了遷台來的父祖們的血液、風俗習慣以及不甚很高的文化水平。他們以開拓者且最低層農民的「身份」飄洋過海來到台灣，確實是清朝期中國的邊疆之地。他們忙於討生活，他們得向自然界搏鬥，得時時刻刻提防先住台灣人

(Native Taiwanese) 的「出草」而力圖擴展他們以及他們雇主的開拓前線。他們還得與福佬人（有時是泉州人，有時卻是漳州人）械鬥槍地盤，確保水源。因此我們父祖輩很不易獲得安寧的生活。當我們家好不容易成長為小地主的時候，卻來了個兇暴的異族侵略者——日本人。

他們雖然不曾作過心理剖析或精神分析，但他們的確確是需要找出能使他們精神安定下來的「依靠」。套最新的詞彙就是群體的「自我同定」(Group identity)。他們還需要在觀念上找出他們團結的核心。「正統」性的「象徵」。這個不就是「黃帝、中原正統」等的觀念嗎。這一類觀念的相對觀念卻是「邊疆異端」觀。諸位大可批判我，說我戴某人既然在講社會科學，怎麼好把父祖輩的感情都引出來灌進研究對象裏去，不但如此，還用上你父祖輩不會想到過的新詞彙來解釋問題。我只好回敬說，這些不過是鄉弟的一個小小的新嘗試而已，請多多指教就是了。

我們在日本的客家老鄉們，多年前組織了客家同鄉會，另外又組織了姐妹團體崇正協同組合（等於國內的合作社）。一九八〇年的十月上旬，我們還主辦了一次世界客屬懇親會。

在這次大會上，我觀察了來自各地的客家鄉親。他們的國籍各色各樣，有些鄉親連客家話都已經不會說了。一俟日本的各大報登載了我們開大會的顯著消息後，居然有些未見過面的鄉親來電話，說是幾代前是客家人，但現在已入日本籍，客家話、中國話一概不會說，能否加入大會，參加大會。

他們的熱情真感人。我發現他們所懷有的中原正統意識相當強烈且相當地普遍。

會後我也聽到背後有人罵我，批評我，說是戴某，思想並不保守，為啥子還開歷史的倒車，搞什麼

「泛客家主義」一類的話。

「自我同定」不是等於「泛客家主義」

藉這一次的良機，我想表明一下。我並不是泛客家主義者，更不是唯客家主義者。我到處表明我是台灣出身的客家人，不管對任何國人或地方人，當然包括在排外閉鎖的日本人社會也有所主張。鄉弟沒有瞞過人更沒有瞞過自己。我主張客家人並不意圖與非客家人鬧情緒甚至於搞分歧以及促進分裂。原本的意思在，如何豎立我個人的「自我同定」和客家群體的自我同定。我認為連自己的「出身」都不敢主張它的「固有的尊嚴」時還談些什麼？知識份子的一切社會行爲的「基點」在於此。就假設我媽媽是位包小腳的窮家出身，我仍然不會掩蓋與逃避我出生的「秘密」的。我當然不會猶豫，去主張與我媽媽臍帶連繫上的「自我同定」。因為這個是「命運」的，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亦沒有什麼可逃避的。成人時，我們爲了自己的生活與生存當然可以嘗試「非命運」的「自我同定」的選擇。我們可以不讓子女再包小腳，我們可以爲爭上游，向日常生活博鬥，甚至於我們還可以選擇我們願意歸屬的國籍或公民權。此外，只要對方答應，我們又可以選擇新娘子或新郎。但千萬不能忘記，任何個人無法更不可能有機會和權利去事先選擇自己的親生父母親的。

我不懂爲何有些人，向來不敢表明自己的「出生」爲何許人，一旦因有「小便宜」（好似飛機票啊，

幾十塊美金啊)可賺，他會突而來的道出，我父親原本是……，然一到對他表明自己出生有不利時，又再來一變……，嘿那些沒有什麼可計較了可涉及的啦……，少數者的語言，文化將會被磨滅……會被同化埋沒的囉……可以不談……。奉持「有奶是娘」哲學的，爲了一時的生活方便亦可「認賊作父」的人們，有何臉皮來主張「革命」，來整理「本位」文化。

「明天」的台灣以及全世界，客家人應該與高山諸(原住民)族，與福佬人，與大陸各省人與日本人以及與美國人等共同致力謀取和平共存，光明的日子才是我的理想。我真不懂，爲什麼還有人會懼怕我們主張客家人意識，要謾罵我們開客家人世界大會之盛舉。他們盡其所能在掩蓋他們自己的投機心理的不安，倒反而要來謾罵我們的正當作爲客家佬的「自卑心理在作祟」，真是無恥！

歷史的「真實」與歷史的「事實」

下面，我們談一下，有關歷史的「真實」和歷史的「事實」有關的問題。我們先前已分析過，客家人在流浪求生存的路程裏頭，他們急切需求精神上的「寄託」，中原終於變成他們的價值中心同時亦成爲一種歷史的「真實」。中原在何方，有無其「事實」已不成他們探討的所在。

老百姓們，一般而言，在日常生活裏頭，他們並沒有太多的欲望和精力花在分別闡明歷史的「真實」與「事實」的。他們亦不善於分層次來做它的分析。

各位都知道，以客家系農民為核心展開的太平天國運動過程裏頭，洪秀全自認為是基督的弟弟，他那有可能是基督的弟弟。事實上洪秀全為基督的弟弟，雖然不會是歷史上的「事實」，但後來逐漸在運動過程中醞釀成歷史的「真實」隨而捲入並動員了不少信徒，參與運動。不可否認，洪秀全的「信念」終於轉換變成他自己的歷史的「真實」且擴大牽住了當年文化水平不甚高的低層農民群眾。但我們又不可不承認，歷史的「真實」與歷史的「事實」間的「差異度」過巨，最後還是要穿幫的。太平天國終於又見沒落和崩潰是個最好的事例。那一種歷史的「真實」畢竟是非科學的且又是虛構的，破綻只是時間問題的必然歸趨。

類似的例子，可以找希特勒與東條英機來闡釋。希特勒的「日耳曼民族為世界最優秀的民族」一說，東條的「大和民族優秀論」以及「大和魂論」，「萬世一系的天皇國體神聖說」等等，當年雖能給一般德國人、日本人尤其是懼共反共的中產階級以上人士灌上迷湯，醞釀一時的「愛國」的假熱潮，但最後還得穿幫，挨上原子彈等的悲劇。

前「近代」時期的農民運動尚可利用「迷信」來推行。但二十世紀以後的改革反體制運動則再也沒有可能利用「迷信」，非科學的邏輯來獲得勝利碩果的餘地了。這一點我們絕對不能忽視。不然我們的悲劇將會很不客氣的降臨到我們頭上來。

最近我發現，圍繞著我們台籍僑界甚至於島內「黨外」界正在醞釀有「接受『台灣民族論』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一種怪氣氛，並唱「台灣民族優秀論」的高調。我得敬告諸位，這一種氣氛和順耳

的高調或許能得勢於一時，但搞不好，處理不妥，很可能會變成「台灣式法西斯主義」的「鬼胎」。如此的話，它將引起的災禍將是無窮。

沖昏了頭的人們、鄉親們，當前一聽我如上的話，他們當然會大罵我，罵我「胡路塞」，還好他們尚未掌權，若掌了權的話，他們非把我關進監獄裏不可。

我們鄉親的大多數人是屬於聰明人，爲了明哲保身，對於這些問題都不願碰。只有我這個「胡路塞人」又是「傻瓜」的人才會提這些問題。總之，希特勒認爲他們的日耳曼民族是最優秀的。日本軍國主義者也夜郎自大地大誇他們的國，大談他們的大和民族優秀論與大和魂無敵論。史實已告訴我們，他們有過甚多的老百姓噶了「迷湯」後被捲入漩渦裏頭。他們誤信了它，惹起不甚小的災禍，害人傷己還殺了不少人，賠了甚多的命。

我們客家父老包括我們家父，認爲我們是中原南下來的正統漢族，又是最純正的。因爲他們不曾掌過權，亦沒有利用它來搞過政治，說一說，信一信且無傷大雅亦不至於惹過禍來，尚可說有其可愛之處。大陸上的客家人如何想法我不甚清楚。但東南亞的客家人，很多都抱有很類似我們家祖父、家父一樣的思路與情懷，真叫人驚奇。

這一點也是促使我來嘗試探討上述一些問題的原始動機。不管那些思路，心態正確與否，還是值得我們去整理與分析的。

我介紹了半天客家鄉親的心態，恐怕諸位非客家人的朋友們不易懂，現在我可以向諸位介紹一部英

文書是韓素英寫的，*The Crippled Tree*，是她的自傳體小說。

韓素英介紹她的家史，述及他們家是從廣東省的客家莊遷移到四川去的。他們父叔輩都已經不會講客家話，但他們還抱持有客家意識和其尊嚴。她介紹了他們家的葬禮的形式，「洗骨」，「檢骨」，裝於金斗甕。在「走反」時還得揹著金斗甕逃難，這些可以說與我們家的作法完全一樣，真叫人驚奇（一聽眾插話高聲說：閩南人也有同樣的作法和講法，叫做「金斗甕仔揸腳聽」）。韓並沒有高唱客家沙文主義，她只是在闡述她的家史與她生長之過程而已。

華僑與華人

現在，我講第三個題目的「華僑」。鄉弟一貫地在日本學界主張，我們應該把華僑和華人在政治與法律上的範疇界定清楚，千萬別再馬虎混淆不清，叫別人生疑招起殺身之禍。

好比我們夫婦，住在日本已超過四分之一世紀，但仍然保持中國國籍拿的是台灣國府護照。因日本的國籍法是以「血統本位主義」為依據，所以我們的三個兒子雖出生於日本，未曾回過台灣或大陸，他們拿的亦是台灣國府護照，因而我們全家可以稱為華僑。

我們有些親戚，不管在日本或在美國已入當地國籍者，我把他們界定為日籍華人或美籍華人。鄉弟不但希望他們能自己好好在政治、法律的範疇上搞好定位外，我還勸告他們千萬不要參預台灣以及大陸

有關的直接政治。因為他們已經不是中國或台灣國府的公民故也。但他們可以仿效「出嫁的女兒」或「被招婿的男兒」關懷本家的家務事的方式，保持一定的距離來關懷故鄉的政治。這個當然既可以又應該被容納才是合情合理的。但千萬不能亦不要超越自己的「定位」來直接參與海峽兩岸有關的政治。

實際上，說出來容易但實踐起來卻不甚容易。除了本身需要有充分的覺悟與堅守居住國的法律外，還得有關方面的諒解及多方面的協助才能達到理想的境界。

過去，不管是台灣國府，大陸中共的當局都犯有「墨守成規」，「根深柢固」的老毛病。總認為中國人的後裔一概為中國國民或中國人。不管他是否已改了籍，入了現居住國的國籍。

往往有關當局，有意或許無意地把中國人的涵義搞成含糊混淆不清。

美、日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第一，因為華僑、華人人口不大，第二，其政治、經濟社會的基礎穩固，並不很懼怕華僑、華人力量。

但華僑、華人人口眾多，且剛從殖民地主義體制脫離不久，議會民主政治剛剛起步，國民經濟尚未成形，社會上百孔千瘡且百端待舉的東南亞諸多新興國家的情形卻完全不一樣。

雖然東南亞的華僑，大多數已逐漸加入當地國籍變成當地籍的人。但他們在目前還經常被逼，面臨各種危機與厄運。

引發危機和厄運的主要來由可分為兩大方面：第一，為當地土著民眾、輿論界、知識界以及政府官員所抱有的普遍反華情緒和反華政策。今天因為時間不充裕，鄉弟不便多分析與介紹。在此我只限於第

二來由，也就是華僑、華人本身以及他們先人之故國有關當局所惹起的側面來加以分析與介紹。

甚至外國有識之士，總認為華僑、華人不願隨俗，更不易被同化。日本學界甚至認為華裔人士一般比起日裔人士，對「故國」之歸屬感特別濃重且強烈。

我個人倒是認為，中國人出外真能隨遇而安，在末節瑣事上亦的確能入鄉問俗。但在基本的生活規律上或在「文化」的核心部門，一般來說，華僑、華人都有固執其中華人性（CHINESENESS），並有把它連綿地續傳下去的欲望傾向在。

尤其在第三世界圈子生活的華僑、華人界為甚。

眾人皆知，我們中國人普遍地懷有中華意識、中華思想。在背後曾經主要支持它的卻是華夷思想。華夷思想在作崇時，華僑、華人容易在主觀上自惹疏離感。幫助這一種疏離感的「不間斷性」（continuity），還有，他們謀生活，求生存的客觀環境與客觀條件。

當地人民和社會、政治不接納他們，甚至於歧視或疏離他們時，他們更願意，更容易或被逼得不得不更堅持並延綿他們的中華人性，甚至是華夷思想。

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正在動盪，華僑華人的居住國與他們父祖的故國都起了莫大的變化。

人們對國籍、公民權的看法，有關於它的選擇（包括放棄原國籍或公民權以及取得新居住國的國籍或公民權）和態度都在變化中。

圍繞人們的生活價值體系、價值觀念亦逐漸走向多元化。華夷思想，在主觀、客觀上都變為不便亦

不易維持的保守思想。

土著語文的興起，華人教育的後退，英文教育的取代，教僑界的有心人士深感恐惶應付不易。

「落葉歸根」與「落地生根」

華僑、華人有關居住國政府逐漸開放其入籍門戶，台灣、大陸的政情並沒有讓僑界人士放手走上「落葉歸根」之路，反而有促進其走上「落地生根」道路之趨勢。

本來，「落葉歸根」的生活哲學應該是附屬於華僑的。華僑本為出外打工，只圖借宿僑居，並無準備長留國外或定居的。有朝一日，他們總是準備衣錦還鄉的。但「落地生根」的生活哲學卻是屬於華人的。他們已入當地籍，爲了謀生活與求生存，他們亦準備作下長留甚至於定居的打算。一般而言，華人的回鄉省親，掃墓祭祖不過是一時性的。

最近二十年來，僑界正面對著轉型、震撼、挑戰的時代而在徬徨。他們又正面臨著自「落葉歸根」（華僑）轉換爲「落地生根」（華人），求生存的既曲折又艱難的道路。他們往往會掉進認同危機的困境而忙圖掙扎，但卻不易整理出其思路或合情合理的自我解釋。

在此，我很願意把我多年來在日本探討下所成的未成熟的想法披露出來。

首先，我認爲華夷思想對中華人性雖有重疊的地方，但其內涵，我們應該把它們界定清楚。華夷思

想表面上具有排外並藐視異族的涵義在。我認為該把它藏進歷史博物館的檔案箱底裏去。但中華人性卻不一樣。

中華人性應該歸類於 ethnicity 的範疇來認識的。ethnicity 可以當做種族或民族的集團特質來解釋。由共認有供奉的祖先之多種家族，氏族或部族構成了 ethnic group。ethnic group 常常彼此間保持有共同的語言、宗教、風俗習慣等等的文化諸特徵，這一些文化諸特徵，我們便叫它為 ethnicity。有關「中國人」或「中華民族」的 ethnicity，我把它擴大又叫做中華人性（CHINESENESS）。有些朋友很可能叫它做「中國人性」來使用。

我們，下面繼續把 identity 與 CHINESENESS 連起來探討，圍繞著我們華人自我同定的困境問題。

起先，我得主張。自我同定可有多元的。大分類起來，第一類為政治、法律的自我同定。第二類為文化、社會有關的自我同定。

我認為政治、法律是人工的，華僑改籍，然而入了居住國的國籍，這個只不過是加上了法律上的手續而已，國籍者，也只是個人與國家的合同關係，最多也不過是個人和國家之間在政治、法律上的一種結合關係而已。就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三博士的例子來闡釋，他們已取得了美國國籍，他們已成為美籍華人。他們在政治上當然得向美國國旗表示忠誠，當他們行使他們的美國公民有關的權利和義務時，所必須依據的法律當然是美國的法律。但我們不會見到他們有改己姓名，有放棄中華人性而所行動。

意思就是說，他們雖然在政治、法律上選擇了對美國的自我同定，但他們仍然可在社會、文化上保持對他「故國」有關的自我同定。這兩者之間並不發生對立以及衝突才是人的常情。

我認為華人們，能保持並繼續發揚光大他們的中華人性，也就是豎立社會、文化的自我同定於其出身的 ethnic group（種族和民族）並不妨礙他們在美國求落地生根之行爲。楊、李、丁諾貝爾獎三博士的類似例子，同樣亦可在美籍日裔人士群中，好似夏威夷的有吉州長、前共和黨上議院早川代議士等人的生涯上找出見證。

這些在美國可行的事例，在日本以及東南亞卻是不易行得通。當地的政府、社會逼著華僑改了中國姓名以後始准入籍。另又盡其所能，在法律上，社會規範上加上多種的限制和規則，逼使華人慢慢磨損我們的 ethnicity。甚至於想盡辦法，來抵制華人繼續發揚光大他們所持有的中華人性，並順利培育出「有根的下一代」的正當社會行爲。

愛鄉者的悲劇

實際上戰前的日本，借題發揮慘殺了朝鮮人。東南亞亦一樣，排華事件窮出不盡。歐美白人世界，歧視猶太人的事例不勝枚舉。

尤其最近幾年，印尼、馬來西亞、印支半島特別是越南，反華事件常假藉華人對當地社會、文化、

宗教不願認同，更對當地政府、國家不會有過自卑的忠誠。當地政客一而再地利用種族主義來做他們的反華勾當。

故國，心有餘力不足，加上已改籍不方便發言或許是遠水救不了近火，真是無能為力。華人社團更是一盤散沙，並沒有能夠尋出合情合理的對付方法。更沒有弄出一套理論來向居住國有關部門試作溝通和公共宣傳。

據我多年來的觀察，華僑、華人所懷有的鄉情是濃厚的。「美不美鄉中酒，親不親同鄉人」便是一對反映上述心情的句子。

華僑、華人的愛鄉，回饋鄉土的念頭，卻往往被誤解為「愛國」的行爲。「愛國」的慣用語術上的國字，一般來言，所指的涵義上多為局限於鄉土而言才是事實。除了特殊的少數例子以外，它根本與認同於某個政權或政黨是有一段距離的。尤其是以華人身份來高喊「愛國」的話，當然容易引起居住國有關當局和人員的注意與反感。累積起來搞不好將引發殺身之禍的。

悲劇往往出在誤解與種族歧視主義的反華情緒與政策上。不但當地有關當局和人員如此，故國人士甚至於華人本身往往亦沒有搞清楚，政治、法律的自我同定和社會、文化的自我同定是有別的。我且相信不但有別，更需要分別善待兩者，才能真正認識問題的根源，尋出解決問題的要訣。

有關文化上的自我同定，常常要涉及到個人的信仰以及「靈魂」，精神層次等問題。至於有關社會上的自我同定，亦常常帶有血緣、祖傳、生理語言 (body language) 等等，換句話來說，是屬於「命運

」上的，無法選擇甚至於無法改變的一種自我同定。

所以說，政治、法律上的有關自我同定，雖然有選擇和更改的餘地，但它的更改並不能又不該牽動同一個人的有關文化、社會的自我同定才合情理的。在人的本性與日常生活的常情裏來言，有關文化、社會的自我同定是不易亦不能臨機應變地更改才是真實。雖然它有可能逐漸被沖淡，但這個該另當別論。

在前幾年，我終於提出了 Paradoxical Dynamic Identity 的概念。暫且可翻為「既矛盾亦動態的自我同定」。我認為一般華人以及在外面的其他僑裔人士，好似日、韓、猶太裔人士，不管他們有無意識，他們總會懷有上述的多重且錯綜的自我同定。同一個體內，抱持有一見好似矛盾，卻並不絕對矛盾相對抗的雙重或多重的自我同定，並沒有什麼不公平，不正常的。入籍以後，一個人老是花心計掩蓋自己的「根」或民族特質的，他將只能掉進 one of them 沉沒於大海裏頭去。他又只能變為扮演不痛不癢且不甚光彩的小人物角色吧了。如此的話，不但對那個人本身，或對接受他變為新公民的國家社會都不會太多的益處。

不敢或不能接受自己出生的事實，又不敢或不能對已出生的尊嚴有所主張，甚至於不敢或不能面對現實，依據自己已有的 ethnicity 來發揚光大自己的才能者，要在堂皇可見天日的「事業」裏獲得成功與勝利的碩果是絕無僅有的，這個才是世界上的史實。

背井離鄉者求生存之道——結語

時間已剩下不多了，我們來個暫時的結尾話。中國人的分支以及其後裔的華僑、華人，一般來言，他們亦懷有與我們先前談及的中原意識和邊疆觀極為相似的心態。尤其是，受過中文教育，出外第一代或年齡屬於老壯年那一代人為甚。

他們或許是他們本人，出國外謀生活、求生存的鬥爭場合裏難免遭遇到疏離、歧視以及包括生命危險的多種困境。他們常會感有寄人籬下，討生活的孤獨感，心中往往很是徬徨。失落感，不安全感不斷地襲擊他們。我們在海外飄泊多年，保衛著自己的後代而討生活時，常常又會感覺到我們本身是否將變成無「根」的浮萍一種存在。類似缺乏一份「有所屬」，「有所靠」，「有所託」的生活困境體驗，自然而然地讓人們感受到人生的懸空與迷惘。

現在在北美僑界呈現的，同鄉會、教會有關活動之活潑的一部份社會心理基礎又可藉此來解釋。人們為上述失落感所驅使，人人都有需求去追尋一些當前且暫時的「保護傘」或某一種心理上的補償。

大陸為原先出發赴外地者，往往上述心態反映在華夷思想，中華意識以及強烈的歸屬感（歸屬於鄉土為其中心內實）上面。

台籍的華僑、華人，因受過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加上光復後在台灣的挫折與遭遇，他們的心態

，雖然老年一代人與老「華僑」（包括華人）們具有相同重疊的部份。但因為台籍僑界大多分佈於北美、日本（南美者據說有甚大差別，因鄉弟未曾親睹，不便多言）等的所謂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華夷思想已相當淡薄，甚至於可以說少見其痕跡。

當前，我們在北美可以看到的「台灣意識」，「台灣人意識」，「台灣民族」的培養推廣「運動」以及「台灣話」的普及教育運動，除了有他們的政治意圖外，我們又可藉先前的心態剖析來認識其深層裏的社會心理基礎。他們的領導層很可能正在嘗試著「脫胎換骨」之作業。「故鄉·台灣」的處境驅使他們去追尋新的「取代」象徵和他們台美族獨特的一些且暫時的「寄託」或補償。

台籍的中產階級以上人士，往往因其生活歷史背景的關係，有甚多鄉親自囿於「現代主義」（歐美白人與日本人透過資本主義的發展所帶來的價值體系與觀念），轉而看賤台灣國府，大陸中共以及「大陸人」之不正常心態。另外因其出身階級及其宗教信仰又再進一步驅使他們患上拒共，即拒中共的心理，這些作祟以後再形成他們抗拒「大陸人」的心態甚至於提升擴大為反華的情緒。

這一點，我們值得留意。我這個客家系台灣人，甚至於還覺有無限的悲哀和道不盡的內疚。

我總認為政治、法律上自我同定的選擇是一時的。我們千萬別搞錯，有關社會、文化的自我同定是具有「命運」性且具有半悠久性的特質。

我們雖然可以變換我們的信仰象徵或價值的中心類似黃帝與中原。但我們自己的 ethnicity 是該為擇善保持並且該加功夫發揚其光大，才不至於徬徨和失落的。我們正面臨著，如何在外國教育出「有根

的下一代」的重要課題，我們有何多餘的精力去「剪斷」自己的根，去自我徬徨之苦呢？我願與我親愛的鄉親們，同學們，不管來自於何方，我都願意透過切磋琢磨，相勉互勵的方式來一道追尋我們共同的且最合情合理的，更合乎發揚人性的求生存之光明方途。（眾鼓掌）

（於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

——原載《台灣史研究》（遠流出版）

追錄(1)「台灣光復致敬團」

黃朝清 台中市參議會議長
林為恭 新竹台灣省參議會參議員

林叔桓 台南台南市救濟院院長
葉榮鐘 台中台中市人民自由保障會委員

代表林獻堂 台中新當選國民參政員
姜振驤 新竹新竹縣參議會議員

李建興 台北台北縣瑞芳鎮長
張吉甫 高雄屏東市參議會議長

鐘 番 新 大同商事公司董事長
陳逸松 台北台北律師公會副會長

追錄(2)「祭黃陵文」

台灣光復致敬團，耀縣遙祭黃帝陵文曰：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十二日，台灣光復致敬團代表林獻堂，李建興，林叔桓，鐘番，黃朝清，姜振驥，張吉甫，葉榮鐘，陳逸松，林為恭，職員丘念台，陳沂，陳宰衡，李德松，林憲等，於台灣六百五十萬同胞，脫離日寇統治，重歸祖國版圖一週年之期，特從萬里海外，飛歸我中華民族發祥故土秦隴之郊，志切趨陵，繼為兩阻，相距兩百里，未厥前行，謹以心香祭品遙祭於我民族奠基遠祖軒轅黃帝陵曰：

緬我民族，肇源西疆，涿鹿一戰，苗蠻逃荒，南針歷數，書契蠶桑，武功文化，族姓斯展，賢傑繼起，周秦漢唐，內安外攘，國土用光，追尊遠德，國祖軒皇，遂於明末，鄭氏開台，閩粵漢裔，東渡海限，驅荷抗清，披闢草萊，聲威遠被，祖業不廢，互三百載，物阜民方，甲午不幸，乃淪倭寇，彈盡援絕，民主奮鬥，五十年來，慘苦痛痲，壓迫剝削，欺聚騙誘，嚮往故國，日夜祈救，八年戰爭，民族更生，舊恥盡雪，舊土重享，自由解放，全台歡慶，察功祖德，日月光明，時將週歲，特向告祭，稍致微敬，遠溯先世，天雨阻道，期復鞠愆，二百里程，乃不能前，郊原布祭，瞻望纏綿，橋山蒼蒼，河渭湯湯，千秋遠祖，尚其來饗。

身份與立場

——環繞台灣史研究的基本問題

1 開場白

事情是這樣的，檜山先生在東京期間，和本人同屬於一個同仁性質的研究會。前些時，檜山先生在電話中邀請本人講一些台灣史問題。本人一想，接到台灣史演講的邀請，在日本這還是頭一次。很奇怪，的確從來沒有被邀請過。

本人從一九八三年三月底開始，一年為期，接受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和哈佛大學的邀請赴美訪問研究，也訪問過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多所學校，所受到的演講邀請，主要還是以台灣史為主題。在日、美兩國之間，知識界活動的情況為何有這樣的差別，值得質疑。這次本人算是在無意之間發現了這個問題。

只是，時間荏苒，工作纏身，中間又去了美國一年，且立教大學素來對教員的工作量要求得相當繁

重，這些因素都使我無暇更仔細地思考檜山先生的付託。

各位也知道，岩波書店的《世界》雜誌，今年正值創刊四十周年。他們似乎在進行著一些特別企劃，據說要以一年時間發行一系列的四十周年紀念特刊。本人和《世界》也有些淵源，《世界》的編輯部便邀我無論如何得給他們寫一篇小論文。

屈指算算，我在日本滯留也快滿三十年了。因此，他們提出如下的構想，把我的滯日三十年和《世界》的四十年重疊來思考，寫一些像「東京生活中的台日關係」一類的主题。

於是我把他們的意見和前面所提的檜山先生的付託，一併考慮，重新思考主题，並接受了演講的邀請。也可以說是把本人滯日三十年的軌跡，和基於此產生出來的一些想法，趁各位先生的好意帶給我的機會稍加整理，就教於各位，說不定又是一次獻醜，敢請各位多包容與指教。

2 爲何研究台灣史

研究台灣，可以說是一種孤獨的追求。

儘管日本與台灣的關係非常深，戰後日本卻少有人認真地加以研究。因此有些研究生到我研究室來，表示要做這方面的研究，我卻不得不回說研究了以後不方便找職業或位階，免了吧。不過我總要補充一句說，如果有更大的研究視野，比方說，以全中國爲對象，然後把台灣做爲其中的一個主题而選修，

那我贊成。

最近，我們的研究團體——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的成員，由三十位增加到四十位左右，以後可能還會成長。且會中的文學研究組，已經有一些成果了，最近開始出版「台灣現代小說選」。第一冊以《彩鳳的心願》，第二冊以《終戰的賠償》為書名，由東京·研文出版社出版。

當我們提議出版的時候，研文出版社的山本社長是勉為其難地接受的。想不到出了兩冊後，好評如潮，現在變成由出版社鼓勵我們再多出三冊以便合成五冊，頗令我們同仁高興的情況呈現了。

還有，研究會中少壯派中心人物若林正丈君，於前年完成了一本相當大部頭的書，叫《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他目前在東大當助教，研究會中除了若林君外，還有一些同仁已經取得副教授的位階以及學位。今後會有著作論文等陸續問世，請各位多期待和指教。

研究會創設十年以來，這些可以說是辛苦十年歷程的一點小成就。

最近無意中自檜山先生那邊聽到各位服務的大學也正在籌備著台灣研究計劃，覺得非常高興。一直想著，有機會一定得來拜訪；那不僅是同行之間的禮貌，只要有人肯研究台灣，本人除了感謝之外別無他話。並不是因為本人是台灣出身的中國人，才有這樣的感受。這些事情是和本人現在要報告的，三十年來的想法有其本質性的關聯。本人將站在更大的格局，更高的觀點上，向各位報告我未成熟的想法之一二。

老師們和諸前輩們，經常告誡我們說：做研究的時候，必須常常自問因何而做學問，或者，為何研

究歷史等。在我來說，爲甚麼研究台灣史呢？何況我本來是在農學院念農出身。我搞台灣史，理由何在？各位想想，只要我們不自行放棄批判的知性，做爲一個社會科學者，或者是一個人文科學者，其研究目的應該是透過研究對象，做好批判性研究，向社會、人類做出貢獻，才是我們的努力目標。只是，本人是台灣出身，卻住在日本，專搞常帶批判日本「近代」的、日本統治期台灣的研究，這似乎顯得特別與他有異。

現在把剛才石堂先生（筆者按：當天的司儀教授）介紹過的那本《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社會思想社）出版後不久發生過的一些事情稍爲報告一下。

這本書定價一萬三千圓，對身爲日本人的各位顯然是一本「苦澀之書」，卻出了三刷。本人很感謝日本的讀者先生們出了這樣高的價錢買了這本書。

書出後不久，有一次，一位匿名的男士，我想可能是傾向右翼的人物，打電話給我，辱罵且恐嚇我說：「你是甚麼東西！住在日本領高薪，還罵日本！是何道理！你這個清國奴，給我滾回去！」

我答說：「請等一等，究竟你有沒有看過我那本書呢？書裡面利用的所有資料，都是在菊花紋章（日本皇室徽章）下的作業成果。雖然我們不知道是不是在天皇陛下直接指示下的作業，但總是你們天皇陛下的官僚體制中的產物。我們曾經花了十年時間，和一些日本人的研究會同仁發掘秘密檔案和官方資料，做爲參考而整理撰寫出來的書。如果你是看過後仍然有異議，那我將樂於和你見面討論。」

結果對方改變口氣，說：「是的，我瞭解了，讓我買一本來看看。」便結束了他的電話。

我相信經過了這場小鬧劇，我的書多賣了一本，不過以後再也沒有來過類似的電話。就像這樣的情況，在日本研究台日關係史，是一項頗感心理壓力的事情。在這個意義上，日本社會是讓外籍人士常感受到心理壓力的社會。我們不是說美國社會樣樣好，不過在那種尊重個人主義的社會裡，個人的意見或言論好像比較有保障，也比較能互相尊重。當然，美國的言論也有不自由的地方，其他種種缺陷也不少，但以總體來論，像日本那樣以集團抑或團隊主義為基調的社會規制力，那種看不見的壓力，美國似乎要少一點。

一方面長期「滯日」，一方面從事於以日本殖民統治期的台灣為中心的歷史研究，對我來說，幾乎是天天自己鬥自己；不僅如此，如何在不違背良心的妥當形式下，建立起能為日本社會所接納的邏輯與說明，不但是緊張，亦是非常嚴酷的課題。

不過，說來也許有一點自負，從另一方面來看，那種緊張感到頭來卻促進了我做為一個人的成長，這一點也是現在我所相信的。當然，這需要有前提——我的確有過「人的成長」，或者，正在成長，且已受到了第三者的肯定。

總之，我是在這樣的信念下走到今天，這是事實。

辛苦是辛苦，不過，我還不至於完全孤立。一直到現在為止，有些日本人朋友、前輩、老師們，都在公私兩方面給我支援和鼓勵。

今天，我想把我的恩師之一的東畑先生的事，稍為提一提。都是些私人間的事情，很不好意思，請

有所見諒。

其實，我們夫婦倆，都受教於東畑先生。師徒之交，期間不短，但我們向來不曾訪問過老師的家，連賀年片都沒有寄過。只是出書的時候，經常在第一本上面簽名贈呈，請老師過目批評係我的一貫做法。

記得是一九八三年的三月二十四日，是我將出發到美國去的前一天。我突然間感覺到一種不祥的預感。一年後回來，是不是會看不到老師了……就是那一天的奇怪感受，我們夫婦倆頭一次訪問了東畑老師家。

老師很高興地接待我們，眼裡卻含著淚水。

「戴君，你不是住日本住厭了，接受了美國方面的邀請呢？」原來老師誤解了我的美國之行。老師接著說：「當然，有不少無聊的日本人。不過你的發言很寶貴，希望你一直在日本努力下去，不吝給日本人鞭策……」老師言重，令我感動。「如果碰到無理取鬧的傢伙，你不用忍聲吞氣，告訴我！我絕對支持你、保護你……不是在你面前講好聽的話，你的批判性言論是很出色的……一個社會對學術性批評的容納力的大小，和這個社會的成熟度是成正比的……」

老師這樣贈送給我鼓勵的話並且替我饒行。令人感嘆的是，我們連老師的告別式都無法參加。在柏克萊接到訃音，只能在異地遙致哀思祈願東畑老師的冥福。

3 我的信念

其次，我要把我的信念和研究的態度，向各位說明一下。一個人在某種緊張的情況下，持續地從事於「知性的思惟和研究」，必須具有某一種信念。

我在研究途中發覺，身為台灣出身的中國人，只一味地訴說殖民地支配下的「怨恨，艱辛，受辱」，實在沒甚麼用處，頂多從此陷入一種自厭心理罷了。寧可一方面重視「怨恨，艱辛，受辱」的感性當為「原動力」，不逃避它，正視它，一方面卻努力將其克服與昇華，把自己提高到理性認知的層次，這才是自己做為一個研究者的最「基本」的命題。

在日本的學界，台灣研究說得上是孤獨的追求。因此，它與職位的取得與「好名愛出風頭的學者」們的行動模式，可以說毫無關聯。

我，曾經爲了超越自己，爲了自立爲更自由的一個人，更爲了正確地接受纏繞在自己身上的「責任」，開始寫了形同自願且自行套上重「枷」的一類台灣史研究評論。

還有，當我想到不尋常的台日關係史，中日關係史，乃至日本對亞洲的關係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候，我也進一步確信，通過我們中國人和鄰國日本人所必須共同擔當的，甚至時而伴隨著痛苦的歷史事實，兩國人民之間彼此確認不可分的鄰人關係，這決不是沒有意義的事情。

我的覺悟是，在充滿矯飾和虛構的「現況」下，爲了忠於自己，我們必須自行洗滌自己的靈魂。如今想來，我是在不知不覺之間，自行培養出如下的一種信念——或許，那個被「人世間」所忽略了的「東西」，或者說，從流行中被遺留下來的「存在」——台灣，在那裡面我們可以找到解讀中日關係（包括台日關係）及日本對亞洲關係的過去和未來的歷史真相的鑰匙！這樣既是豁然開朗又是「反挑戰」性的一種信念。

說來也許有點冒昧自負，爲了和有良知的日本友人共同確認身爲亞細亞人對未來歷史性的責任感，也有繼續台灣研究的必要，這的確是我當前的想法。

說得再具體一點，整理環繞著台灣的日本殖民支配的歷史事實，思索將它的意義在亞細亞整體中適當地加以定位，從而向日本朋友的各位提示日本今後對亞細亞的應有關係方式的規範，我相信這是可能的，也是應該的。

我曾經自己對自己訓誡過，要超越「怨恨，艱辛，受辱」，要從事於真正關乎亞洲和平，乃至世界和平的「知性行爲的運作」。

我這樣的想法和做法，幸蒙東畑先生以及前文部大臣永井道雄等多位先生多方面的支持。不用說，他們幾位先生的支持，使我在言論活動上獲得很大的鼓勵。

4 昭和三〇年代環繞台灣的知性的、感情的氣氛

我在一九五五年秋到日本來，原本打算暫住兩年後再轉去美國，沒想到一住便住了三十年。

說到自一九五五（一九六五年（昭和三〇（四〇））這一段時期中的，日本的某種知識界的情況，或者說，以東京爲中心令人感受到的，戰後日本與台灣，國民黨政府周邊一般的知性的、感情的氛圍，究竟如何？一句話，那是非常特異的。其特異處，今天絕大多數的學生是難於想像的。那有一些不得不如此的因素和時代背景；總而言之，是中共革命的衝擊，激盪了人心。人們覺得中共是亞細亞明日之「星」，和象徵著希望的「青鳥」。很多人對中國大陸懷抱著非常大的期待。就是這樣的時代。

一般說來，日本人有一種根深柢固的「習性」，總是把國家與政府，政府與社會，社會與家族，家族與個人之間的關係，做一種集團主義等同式的看待。除非是具有相當高度的知識水平的人，或者是懷有積極意義的個人主義自覺的人，否則要把自己從這種集團主義的束縛中解脫，是很不容易的。

集團與個人之間的問題，既是不同層次但又糾纏不清，頗難用同一途徑來釐清並解決的課題，一般說來兩者之間是難於機械地理解和處理的。很多人不分層次，不考慮媒介，既用形式又用一直線的態度看問題。例如，我從台灣來，一般人總是把個人、國民和政權相連，在一條直線上窺視我；他們對於甚麼樣的人住在台灣，過著甚麼樣的生活，都不甚瞭解。

有趣的是，當初在我身邊的一些學友，甚至對我懷有相當濃厚的警戒心理。雖然大致說來，思想進步的學友多，開始還是有「戴某，是不是來自台灣的國民黨特務？」這樣的猜疑。背後有人說，他的日語很好，可能是來做間諜的。這些，我初來時並沒有察覺到。

有些朋友等到彼此的交情深了以後，才私下道歉說：「老戴，那時候懷疑你，很不應該。」這樣的小插曲，所表示的是，日本人較不容易把一個人從他所歸屬的集團、民族、政權、社會中分開來，純粹地就其個人層次觀察某個體特有的做法與想法。

說來令人悲哀，有些人也不讀一讀我的著作《台灣與台灣人》（研文出版），就說「戴可能是台獨」；也有人因為我不會訪問過大陸，就中傷說，戴可能是國府的間諜。所謂的啞口無言，便是我聽到這些無聊話後的寫照。

財界龍頭的經團連前會長植村甲午郎先生曾經說過：「蔣介石總統向你們國人提倡『以德報怨』，我絕不能忘記。我將終生在睡覺時不把腳伸向台灣的方向。」這些話對我來說也是一種很大的衝擊。我漸漸瞭解到植村先生一般的感情，的確存在於日本的舊世代和保守的領導層中間。

但在另一方面，絕大多數的新生代，那個年代可以說是向北京一邊倒的，而蔣介石被他們視為負面形象的人物，所得的評價很低。因此，蔣介石統治下的國府台灣，自然引不起新生代日本朋友們的興趣，台灣變成了「盲腸」一樣的存在。這種感情，我都能大致理解，但不便苟同。

可是，現實上的台灣住有一千萬（當時）人口，只用「一個中國論」的「台灣盲腸觀」輕易地加以

概括定性，實不足以反映現實，也屬不負責任的做法。這和日本曾經殖民支配了台灣五十年的嚴肅的史實與其歷史意味的再檢討，本來是不同層次上的問題。而有趣的是，人們常常把這兩種問題混淆在一起，幾乎所有的人都不想去瞭解它的真正意義，也不願去碰它，當然也就不會有甚麼研究了。這是令人困惑且感遺憾的事情。

5 對矢內原忠雄先生的期待與失望

下面我繼續報告一件帶給我頗大衝擊的事情。這是收錄在矢內原忠雄先生的全集第十九卷，寫於一九四八年十月的《管理下的日本——終戰滿三年的隨筆》中的一節。

我和矢內原先生的「相逢」，有過如下的經緯。

我有一位遠房親戚，也是中學學長的陳先生，是東大畢業生，曾經是有澤廣已教授門下的一員。一九五四年年尾，我向他請教，我有可能去日本留學，應該做些甚麼準備呢？他勸我，首先念那一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

各位也許不知道，矢內原先生的名著《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戰前在日本本土雖不曾遭到禁閱處分，在台灣卻因總督府當局作梗，該書不准在台灣上市。我們一般台灣人，要到戰後才能讀到這本書；或者從被遣回歸國的日本人教授等人手裡購進，或者到大學圖書館去找來閱讀。

理所當然地，我變成了《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的俘虜。進了東大後，也和一些台灣留學生組織讀書會研讀它：學友中甚至出現了把矢內原先生當「神」崇拜的一部份人。

我把矢內原先生的宗教以外的著作，隨手蒐集，加以鑽研。那時候，他是我們東大的校長。在我進行研讀的過程中，我逐漸發現，日本朋友中也有矢內原崇拜者和批判者之分。

不久，我終於遇到了摘要上的那一段文章：「日本殖民統治政策中的同化主義，在其思想基礎上，和法國所施於其殖民地之同化主義有異。」這一段還看得過去。再下去：「在法國，其根柢的思想是，天賦人權和萬人平等的、普遍性、全人類性的民主主義。因而，政策推行走過頭的弊害，顯現在於這過早地把尚未被理解的『自由』、尚未被渴望的『解放』，賦予尙處在低度開發階段的殖民地原住民。」這實在不能不說是萬分可悲的、不可原諒的說辭。

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當年反抗權力，寫就《滿州問題》而被逐出東大的矢內原先生，何以有此一文……悲痛與哀切，幾乎使我不能自己。

這種說法，和美國帝國主義者曾經一再拖延菲律賓獨立的實現時所使用過的「藉口」，有何區別呢？我對矢內原先生，完全失望了。

至於，我也覺悟了。我們要注意《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的侷限性。我們不能讀死書，被它所述惑，我們要確立閱讀者這一方面的主體性。特別是台灣人讀者，尤其不能忽略這一點。

我再念下去：「與之相反，日本的同化主義，根柢是皇室中心的民族主義，因而一旦推行過度，立

刻變成了絕對主義權力下的強制統一，對民族自覺的壓抑。我不認為日本的殖民地統治全屬於有害者，我想，至少在經濟的開發以及普通教育（筆者按：小學教育）的普及方面，是替殖民地社會帶來了永續性的利益。」

這一樣，帶給我更大的傷感。

這樣，他的觀點和說法，只有一個「結果論」了。每次到名古屋（中京大學位於名古屋）來，對於道路與地下街井然有序的情況，都覺得令外地人佩服。名古屋的街道房舍很清潔，說來也是所謂的戰災復興的成果。當年受到美軍飛機 B 24、B 29 的轟炸，卻帶來了 scrap and build 的過程，才有這樣面目一新的大城市及地下街的出現。可是我們不能因為有了豪華地下街，就來肯定當年的美機空襲和戰爭吧！問題在於：矢內原的看法和感受，並不止於是他一個人所獨具。

三、四年前，在福岡舉行的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名古屋的一位某私立大學的 A 教授，有過如下的發言：「並不能說大東亞戰爭的所有影響都是負面的。舉例而言，像印尼的蘇哈托總統這樣的人材，是日本培養出來的，這就是正面的成果了……」（大致如此）。

所有出席該討論會的外國籍學者，都愕然相顧了。

下面我要提一個比喻，也許有點過份，但請包涵：日本對「原子爆炸病症」治療方面的水準，是世界醫學界中很出色的。為甚麼有此成就？那是因為患者很多，其他衍生出來的有關問題也很多，日本醫學界不能不全力以赴，才有今天的成就。那麼，我們爲了企求「氫彈症」醫療技術更上一層樓，是否應

該請求蘇聯給我們丟一個氫彈呢？我們能否用上矢內原的邏輯說，因為促進了原子彈受爆關係醫學的進步，原子彈轟炸「並不全為有害」這樣的話呢？

日本人的這種感覺，和非日籍亞洲人那方面的歷史感覺之間的出入和差距，正是圍繞在「歷史教科書問題」上，造成日本與亞細亞其餘地區及國家間的摩擦的一部份原因，這一點我在當時就指出來了（〈對日本的忠言——身為一個亞洲鄰人的評言〉，《世界》雜誌一九八二年十月號）。

我相信，當議論殖民地支配的功罪時，應把支配的動機、支配的過程以及支配的結果，總合而論，才是應有的態度，正確的方法。

現在，我們暫時不問動機與過程，但是，把「普通教育」的成果，和「經濟開發」的成果留給台灣，那絕不是日本人的本意；真相是：因為戰敗而無法把這隻「名為『台灣』的乳牛」帶回日本。且以上所謂的「成果」，能不能成為永續性利益，還要看台灣人這方面的主體性能力和作為如何而定。

很遺憾地，我不能不說，矢內原先生不具有對我們這一方面——也就是被統治者——的「心靈」的理解「力」和相惜「弱者」的感情。我們實在無法接受那種不加限定的一般性邏輯。

從那一次以來，我痛切地感到，透過矢內原批判，我們必須確立我們自己的邏輯、解釋和主張，不然我們無法做好研究，更沒有可能盡到社會所付託給我們做學者的使命。

要進行矢內原批判，很難有適當機會。特別是在東大，矢內原的崇拜者頗多，幾乎欠缺批判這樣的氣氛和狀況。不過我還是在我們留學生的同人雜誌上發表了一些札記。

記得是中（共）、日建立邦交前夕的事情，在《朝日新聞週刊》上，有竹內好先生和不久前逝世了的橋川文三先生共同主持，以人物為中心的「近代日本與中國」特刊的系列企劃。我也接到了執筆邀請。在這個系列企劃中，唯有我寫了三篇。那完全是出於竹內先生向來的「虧欠台灣」的好意性的補償。不過這些文章後來也和別人一視同仁地只被摘錄兩篇編為《朝日選書》第13與14號。在《近代日本與中國》的上卷，有我的〈伊澤修二與後藤新平〉，下卷裡有我寫的〈細川嘉六和矢內原忠雄〉。

〈細川嘉六和矢內原忠雄〉一文，登在《朝日新聞週刊》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號，很湊巧，發刊第二日，在東京某一大飯店，有「中日邦交建立紀念晚會」（正式名稱是否如此，已失念）的召開，據報載出席者中有大內兵衛先生、伊藤武雄先生等聞名之士。「中日復交」運動曾經是已故細川嘉六先生戰後活動中的主要項目，因此當天的晚會也招待了細川夫人，據說那個集會具有一點「慰勞紀念晚會」的意味。聽說在那席間，我的論文廣泛地成了大家的話題，大內先生竟然一再激賞，問伊藤武雄先生執筆者的戴是何許人。

過了三天，到研究所（亞細亞經濟研究所）上班，東畑先生透過秘書邀我去面談。

實在沒有想到，身為大老的東畑先生，把那些為青年人辦的雜誌每一期都仔細過目。

「戴君，你寫得相當精彩呀！你把矢內原批判到這地步，很難得……我是他被逐出東大後從農學院被邀，代他在經濟學院兼課。我從來都沒有想到願和他一起喝酒的。東大裡面也有令人討厭的傢伙……」云云，先生講了很多鮮為人知的話，令我吃驚。

再過幾天，細川夫人託人傳話邀我替嘉六先生作傳，更使我惶恐。當然，我自感不力，只好婉拒。「時效」已經過了，所以我才把這些小插曲公開。總之，何為歷史的「真實」，我們大家都拚命追求其真實，但我們究竟能得知多少？很遺憾，我們還得繼續質疑下去。

在研究工作上，問題的提出比較容易，至於要真正解明問題，那可是一件大事。

6 東畑精一先生與台灣

有關東畑先生廣泛的活動業績，是眾所周知的。不過意外的卻是，先生對台灣農民的高評價，知者不多。

在先生的昔年名著《日本農業的展開過程》（一九三六年，岩波書店）中，有這方面的描述。因時間關係無法引出原文，只把我記憶中的「論旨」大約介紹一下。

有兩個重點：第一，是對台灣農民有關商品經濟之敏捷反應，及對於台灣農村商品經濟實際情況的洞察，給予台灣農民高度評價。第二，是對台灣農村的農業用水，亦即灌溉系統的優良性的舉示。

東畑的觀點，不用說，是對日台兩地的農村與農民的比較考察後所提出的。這在今天，也許令人難於相信，當時對被支配民族的台灣農民，被支配的殖民地社會——台灣的傳統技術，給予高度評價，是一件需要相當道德勇氣的事情。且也需要對觀察對象的社會與人群，具有一種沒有「翳障」的眼睛和證明

的「心靈」，更需要活潑的思考力。我們說東畑先生是一位出眾的自由主義者，備有「知性的誠實（intellectual honesty）」者，實不為過。

在同一時期，日本流行著幾種說法：「台灣是生蕃之國」、「落後、骯髒、瘧疾猖獗的瘴癘之地」，最好的形象充其量亦不過是「出產香蕉與木瓜而四季常夏的土地」。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狀況下，身為一個清醒的社會科學家，東京帝大教授能透過他的實地考察瞭解台灣，寫出真實的台灣，的確是很難得的業績。

這位東畑先生，有一天在閒談中向我說：「戴君，日本實在太對不起朝鮮人。和朝鮮半島相較，我們日本統治台灣的情況還算好的。」

當然，我立刻反問：「為甚麼？」

先生回答說：「那是因為在殖民地台灣，生產力有了發展，而在朝鮮卻沒有能夠做到這一點……」不愧是經濟學家的東畑式判斷。

我卻做了如下的回答，同時也提出了質疑。

「如果先生肯承認日本對台灣殖民地化的動機不在於慈善事業，且在其過程中也伴隨著毒辣、殘酷的彈壓史實，我願意對老師的判定的某一方面予以同意。」

不過，即使如此，還是有些疑念。很多日本人給予後藤新平極高的評價，認為在台灣殖民地支配的不少「成果」，是出於他的手腕與政策。我們台灣人也認為後藤是個可敬畏的對手，對於他的厲害做

法和鐵腕政策，也覺得雖然遺憾，卻不能不嘆服。

然而，我們還是不能把後藤新平認做孫悟空抑或猿飛佐助（筆者按：日本通俗小說中身具奇術之士）的。後藤「神話」的最大缺陷，是遺漏了當時台灣社會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和既有的條件，及變成統治客體的「台灣人」的「人」的條件等。先生曾經在《日本農業的展開過程》中明示過，舉出過的觀點，正是該神話所遺漏了的主要部份。

殖民地支配的結果，或者「成果」，非他，正是支配的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相互「傾軋」和「結合」的綜合性產物，我要指出的是這一點。如果後藤真正具有「神通怪力」，為何不把他的策略帶往朝鮮半島去實施呢？真實的情形是，即使把他和他的方策移向朝鮮，也將毫無作用的，因為朝鮮半島有其特殊的主、客觀條件所以然也。

東畑先生頷首表示同意，並且說：「你的那篇獻給仁井田君的論文〈清末台灣之一考察——並試論如何科學地認識日人治台史〉，收錄在《仁井田陞博士追悼論文集·第三卷「日本法與亞細亞」》實

在寫得很好，我也得到了不少啓示。」如此般地誇獎了我。

7 殖民地支配對日本庶民亦屬不利

我另外還有一位恩師，神谷慶治先生（歷任東大農學院院長，現為名譽教授）。有一天，因為討論會的研

討搞得很晚，所以就留下來和老師及學長們共進晚餐，老師說：「關於台灣的砂糖，我有一句話。台灣人的確遭到糖業資本家的剝削，日本的糖業資本家在基本上是靠這種榨取而成長，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戴君，希望你不要忘記，日本的一般消費者，也是受害者。因為保護關稅，我們日本人消費者也被迫以比國際糖價還高的價格購用台灣砂糖……」

乍聽之下，我吃了一驚。那是一九五七年初夏，記得我還就讀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

這是遲來的領悟。有關殖民地支配的「關係」，具有這一般錯綜複雜的多重結構，我還是第一次被迫而想及。

自從受到神谷老師的啓迪以後，我發覺到「被侵犯的一方」||被殖民的一方，也有其「責任」。不能單純地自以爲是純粹的受害者，不能一味只追究對方的責任，而必須同時究明本身內在的「責任」，把雙方面的有機性關聯明確化，且施加銳利的分析。我把這樣的想法加以邏輯化，一直主張並編入我的方法論裡迄今。

8 對馬克思主義派學者的失望

大約在同一時期，經由幾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教授們的努力，有關日本資本主義研究的戰後成果，逐漸地問世了。我當然期待著他們的研究和探討必是包括殖民地——台灣、朝鮮、「滿洲國」——問

題。但是當我拿到書而發覺這些問題完全受忽視而欠缺時，那種失望的心情是難於表達的。

由隱字極多的戰前岩波版《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講座》（筆者按：因受日本當局的檢閱，甚多關鍵之處開了天窗）相較，學術水平不但沒有超越，反而「後退」許多。

即使那曾經惹起昭和史論爭的《昭和史》（若波新書），對發生在一九三〇年的台灣霧社蜂起事件，也只用六行字處理。這種「問題意識」的欠缺和「薄弱」，實在教人寒心。當然，日本近代史研究者的射程，至今剛達到沖繩列島（也就是琉球列島）而已，對他們來說，台灣是太遙遠了，根本還難得進入他們的視角。

這種「視角」的欠缺，「射程」的不足，到底意味著甚麼？為甚麼日本的各位學者先生，若無其事地「飛越」過台灣？我想了很多，頗不易理解。

是不是台灣太小，不值得一顧……這一點也揣摩過。

矢內原先生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問世以後，社會科學方面比較完整的台灣研究的著作，大概只有川野重任先生的《台灣米穀經濟論》和高橋龜吉先生的《台灣經濟論》兩本。

為甚麼在戰後的日本學界，缺少對過去的台灣支配的再檢討和歷史定位的學術性作業呢？

在我們台灣人方面，也要負一點責任。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具有日本本位的《台灣殖民統治史》都不曾在戰敗後的日本出版，即使我們台方學者想批判也沒有素材可以批判的。

9 庸俗論調的橫行

在如此的真實情況下，只能看到有關台灣的既粗糙而又不正確的印象論橫行於敗戰後的日本，的確令人困惑和深感遺憾。

這裡讓我介紹一個印象論的惡例。記得是十一、二年前的事情。在《柳田國男研究》雜誌的企劃下，由有賀喜左衛門先生、谷川健一氏、宮本馨太郎氏和本人四個人開了一次座談會。在那次的座談會中，專攻日本史的宮本教授對本人說：「戴先生，歷任的台灣總督中海軍出身的多，所以在殖民地統治方面相當順利（暗指日本海軍比較開明），朝鮮方面因為都是陸軍出身，所以毫無政績。」（大意如此），這句話讓我大吃一驚。

五十年之間，台灣歷代總督十九個中海軍出身者，其實僅有三位。那第一位，也就是初代總督的樺山資紀，實際上是半途由陸軍移籍海軍的軍人。另外兩位是太平洋戰爭前夕的小林躋造，和戰爭發生後的長谷川清。像這樣錯誤的印象論並不是宮本氏一個人所獨有，而這樣誤信著的人也不在少數。所以即使當場糾正宮本氏，問題還是很嚴重地遺留下來。

再介紹一個俗說吧。是十四、五年前的事情了，記得是在「亞細亞政經學會」召開的學會中發生的。某大學的一位M教授，對殖民地支配的成果方面，滔滔不絕地發表著台灣與朝鮮的比較論。他的結論

是，因為台灣氣候溫暖，所以日本人比在寒冷的朝鮮搞得順利。好一個地理唯物論！於是乎我質疑了：「那麼，比台灣更溫暖、天然資源更豐富的南洋，也就是現在的東南亞一帶，特別是印尼究竟又如何呢？光從氣候這一方面來說明台灣，好像不太……」我的話還沒問完，那位司儀先生大概顧慮到報告者的面子吧，插嘴說等散會後再由兩位做個人討論比較好，草草地宣佈休會了。

這一類庸俗論調及印象論，為什麼這樣輕易地橫行於日本呢？我曾花精神檢討過這個問題。

依我的想法，第一個原因是認真從事台灣研究的人太少。第二個原因，是來自於台灣人這方面的「反應」，間接地支持這些庸俗論調及印象論。

關於第一個理由，這裡不再重複。下面，我繼續簡單地報告一下，我認為的第二個理由。

10 台灣方面的「責任」

在那一篇〈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中，我試著把被殖民地化前夕的台灣，從下述的三個焦點加以整理：

(1) 寄生式地主制度在台灣已相當成熟，形成了具有相當數量的中產階級。

(2) 樟腦、蔗糖、茶葉等國際商品，已有相當規模的產量，並輸出於國際市場。米的產量已有剩餘，也已銷售到對岸的大陸市場。

(3) 以此社會經濟條件為前提與背景，晚清在台灣推行了洋務運動，亦即近代化運動（實施土地調查、鋪設鐵路、海底電纜、引進機械化製糖法等）。這一番洋務運動的「成果」，後來變成了方便殖民地化銜接新政的架構，與日本的殖民地開發事業相結合，對後藤與兒玉的台灣施政發揮了「正面」作用。

因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歷史轉機（日本戰敗），台灣終於回歸了祖國——中國。

所謂的回歸，也就是台灣自既存的日本支配秩序中脫離，進入當時正由重慶復員至南京的國民政府（國民黨政府）的政治經濟秩序（內實卻是一片混亂）中的一段過程。

在這一過程中，發生了許多摩擦和衝突。當然，主因是國民政府派來的接收機關與官員的失政。終於在回歸後不足一年半的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晚上，發生了有名的「二·二八暴動事件」（以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晚間的黑市香菸取締事件為導火線，發展為全島性反政府暴動）。暴動招來了彈壓，有相當數目的台灣菁英失蹤並犧牲」（農民與勞工幾乎沒有參加這一次的民變）。

到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政權成立於北京。由於「二·二八事件」的後遺症和對中共政權的忌避心理，流浪在海外的台灣人中上階級人士之間，從五〇年代初開始，產生了台灣獨立運動，當時的運動中心在日本。

整個五〇年代期間，邱永漢先生的政治言論活動（主要以《中央公論》和《文藝春秋》兩雜誌為舞台），便是這個運動的一個反映。還有，凡是對台灣懷有關心的一般日本人，大都會看看王育德先生的《台灣》，這也是屬於同一類政治主張的書。

邱、王兩位前輩的「說辭」，日本人聽來當然很順耳。連老學人矢內原先生都無法處理不同邏輯層次的問題，則一般日本讀者更無能抗拒邱、王兩位的「甜言蜜語」，那也不足為怪。

當然，即使在邱、王兩者之間，也有行動模式和思考方法上的微妙差異。不過大致說來，他們都認為台灣是因受過日本的支配而得以近代化；他們都討厭國民黨，認為晚景不長了，但對於可能接踵而來的中共合併台灣之舉，也覺得是難於接受的事。他們有這樣的共通心情。說實在的，這樣的心情在台灣的中上層階級並不罕見，在台灣的中上層階級，特別是那些曾經從日本的台灣支配價值體系中獲取過「分嗜利益」機會的人們，不知不覺之間已經變成了「日本秩序與殖民地支配價值體系」的俘虜。尤其在青壯年世代中，在一定範圍內是存在著上述一類心態的。

不瞞各位說，我有一位遠親（現已逝世），也是懷有這樣觀念的代表性人物。他是被徵派到海南島的日本陸軍的一員，開始是由於服從命令，後來是因為惰性，當日本軍的馬前卒，搞些軍政方面的下層工作。日本戰敗後，當然，具有台灣人身份的他，離開了日本軍隊。海南島的中國人指責他「身為中國人一份子的台灣人，還替日本軍隊跑腿……」使他「狼狽」不堪地回到台灣來。他並沒有自覺自己有任何「責任」和罪過，一念怨恨在日本戰敗後海南島期間的遭遇，而參加了「二·二八事件」。一度繫獄後被援救出來，此後心情苦悶，至死還夢想著台灣獨立。

當然，他是位親日派，有舊識的日本人到台灣訪問，他殷勤招待，各處陪遊、開宴席，還得罵國民黨幾句。

與我那位遠親同年代的人們，愈是上流階級，愈不會說中國話——北京話，但日語卻很拿手，甚至連母語（屬於中國方言的，一般被稱為台灣話的閩南語及客家話）都說不出口，這是實情。

今天與會的各位中間，一定有不少人曾經訪問過台灣，而遇到過一些日本話流利、懷念著日本人的、五十歲以上的台灣人。在這一類型的台灣人的內心「深層」，部份藏有剛才提到過的因素，這一點希望各位能給予關懷及理解。

報告了我遠親兄弟輩的事情，我想順便再提一提我的二哥的想法，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二哥大我十歲，還在世的話，今年應該是六十三歲。他早年留學東京，因為念的是法科，逃不過「學徒從軍」，幹到「曉部隊」（日本著名船舶工兵隊伍的隊名）——俗稱海賊部隊的軍官。好在日本投降得早，檢回來一條命，是個所謂的波茨坦中尉。終戰後不但不回台灣，連家信都不太肯寫。父親不放心，叫我順道到日本去看看究竟怎樣了。

因為當時我已經申請到美國大學的獎學金，本來是想到美國去留學的。到了東京見到了他，他卻說：「你不要急，先在東京念兩三年書再去美國不晚……」

我回答說：「我討厭日本人，我不願意留在日本。」他吃了一驚。問我理由。

什麼理由！在殖民地台灣遇到過的日本人，形象太壞了嘛！在校園生活中，經常被日本人同學辱罵為「清國奴」；特別難過的是挨那些留級的太保日本學生揍。軍事教官、劍道老師、國語（日語）老師等，動不動就開口罵「清國奴」、「支那人」，這種痛苦的受辱記憶，在離終戰僅十年的一九五五年，

當然還很鮮明且生動地，帶著個人的屈辱感、挫折感，存留在我的腦海裡。

聽完了我的牢騷，二哥以平靜的語氣說：

「你的專攻將是社會科學，可是，你卻以個人的體驗而憎恨著日本人，氣度太狹小。我們的確受過日本人的欺凌，我的軍隊生活尤其悲慘，但我們所應憎惡的對象，應該是把日本人驅向作惡的那種帝國主義的體制和機制才對。一般的日本人，雖然層次稍有不同，也同樣是那種體制的犧牲者。站在個人立場恨那些別的日本人有什麼意思？連這一點感情上的障礙都克服不了，還想留學做社會科學研究，幹麼？……」二哥很嚴肅地訓誡了我一頓。

二哥年齡比邱、王兩位大兩、三歲，我們家是醫生兼地主，也經營碾米廠，在這方面和邱、王兩前輩的出身家庭背景沒有太大差別。可是他對邱、王兩位的論調不滿，常說「這些人太輕浮」，看不起他們。

我想過，為什麼有這樣的差別。大概是幼年期的教育背景的不同所帶來的吧！我們兄弟都受過祖父的嚴格管教，祖父是一位漢學家、民族主義者。在我們兄弟姊妹之間，沒有一個進入日本人小學校當共學生（聽說，我祖父婉拒了日本當局的勸誘）；那些共學生的家庭，多數若非日本當局的買辦、協力者，也是機會主義者。

我的二哥還有如下一段話：「你應該努力去原諒日本與日本人，因為被納進一種體制裡面的個人，只是個可憐蟲。一般說來，個人即使懷有滿腔善意，也做不出甚麼。以我來說，我並沒有自願什麼學徒

從軍，一切都是強制的，如果拒絕到底，一定要被抓去坐牢，有良知的日本人同學，心情都差不多。我們真正念書的大學生，哪個會真心替日本軍部打仗呢？那只是送死而且毫無意義的，但怕特務及憲兵的鎮壓而沉默『遵命』的呀！」聲調裡還含著怒氣。

不久，五味川純平的《人間條件》（筆者按：著名的反戰實錄小說）成了暢銷書，二哥與我都耽讀了。我把書中主角梶的苦惱，和二哥的話揉合在一起，用我自己的方式重新思考過「戰爭、體制與人」的本質性問題。

11 個人善意的侷限性

最近，日本人中間的一些所謂舊台灣關係者，用自費出版等方式，發表了不少「回憶錄」之類的文章，我都盡量收集閱讀。不過，對於日本人的「善意表現」，我實在感慨系之。

一般說來，在台從事過教育的人士，都是在充滿善意的回憶中，主張自己當年是如何地拚命努力從事教育過。遺憾的是，在我所看過的範圍內，沒有一篇文章是檢討殖民地體制下的教育的正負面意義和侷限性的。

六〇年代後半以降，台灣的經濟好轉了，日、台之間的來往變得頻繁，一些台灣老人招待昔日的日本人「恩師」，變成了風尚。

日本與台灣，同屬於儒家文化圈，重溫師徒故交，尊師重道雖是好事，也可以說是很平常的事。不過有人把這類的招待與歡迎，自負為美談，不問青紅皂白概括日本在台教育都是好的。甚至有人趁此而證明日本的殖民地教育對台人全是善、是成功的文化傳播，故意造成「美麗的誤解」。這樣的社會現象使我們吃驚。

我著作的讀者裡面，有一位以前的台灣公學校（台灣人子弟的「小學」）教員，對這樣的風氣很憤慨感嘆，寫信給我說：「我也收過邀請信，因為覺得心理上還沒有充分的準備，所以這兩三年之間大概不能成行。如果我去了，我要先行向從前那些學生們謝罪，然後向那家以前教過書的學校提供獎學金或者捐贈一些樂器，到時候還請戴教授多多指導。」像這樣具有良心的日本人老教員，才是日本人的光榮。

歷史告訴我們，無論那一種殖民地體制，不論東洋式或西洋式，都是罪惡彰顯的體制。可是，非常令人遺憾的是，這一份理解，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浸透到一般日本人社會中間，對此本人深懷危懼之念。

12 台灣人和朝鮮人

有時候聽到對本人有好感的一些日本朋友說：「戴先生，你們中國人，特別是台灣來的，都很溫和，也很重禮貌，給人印象很好。可是那些朝鮮人，動不動唱反調，不顧情面。」云云。

一般的台灣人，聽到這樣的話就有點飄飄然了，總要趁著對方的口氣聊表同感，並和那位發牢騷的

日本人一起來個「朝鮮人批判」——不過，與其說批判，倒不如說是背後罵人。像這樣的場面，不難遇見。

有關日本人和朝鮮人之間的「相互厭惡」的問題，已經有很多分析和議論，今天不必由我來再提出。今天我要澄清的是，我對殖民體制下的台灣與朝鮮的差異，以及由此類差異所呈現的各種現象的社會科學屬性之未成熟的解釋。

前面我已經說過，殖民地化以前的台灣，早已經有寄生地主制的廣泛存在。因此，日本人地主無法打進台灣的農村部門，更不用說生根了。

那麼，朝鮮的情形如何？有東洋拓植株式會社，日本人地主在相當的範圍內又浸透到朝鮮的農村領域。因此，農村農民階層的兩極分化呈現了，在那分化過程中被擠出來的貧窮者，或被帶往日本，或自動到日本討生活。兩地距離近，也有關係；總之，往日朝鮮人在日本四島的從業範圍廣、人口多，這就是遠因之一。貧民們來到日本後，多數當然只有混進最低的社會階層；民族的偏見以及社會的偏見，更因為來日朝鮮人的職業種類和所得的低賤而不斷地增幅下去。

朝鮮是整個國家被殖民地化，有李王家與兩班（朝鮮人貴族之稱謂）的存在。兩極分化的結果，以朝鮮「共產黨」為首的激進抗日革命運動，頑強地展開了。

當時，台灣也有過「共產黨」，但比較弱質，人數也少。台灣史上不會存在過獨立的國家體制，貴族只存在於山地少數民族的「酋長」制社會中。原來台灣是中原——中國大陸國家——的國內邊疆殖民

地，日帝對台灣的殖民地化，只是把中國邊境上的南海一孤島切斷，納入於日本經濟圈的外緣，這就是全部的史實。在這個過程中，台灣人不能和中國大陸人民共同體驗中國的奔向「近代」的胎動，尤其是重新被編進日本殖民地體制中的，以地主階層爲中心的中上流階層爲然。

因爲是個孤島，抗日運動在台灣沒有庇護地。但台灣海峽的對岸，至少在形式上還存在著「祖國」，對台灣人來說，無論在物質上、精神上，都是在台抗日運動的「庇護地」，有時成爲「避風港」。

台灣的農產生產力，以甘蔗與稻米的連作方式而提高。糖業帶來了就業機會，以寄生地主爲核心的中產階級的數量相當地大，發揮了維持台灣農村相對性穩定的作用。來日的台灣人，多數爲中上層階級出身的留學生、貿易業者。當然，他們所從事的抗日運動，差不多是以溫和的改良主義爲主調，台灣人在日本人印象中的形象，自然不至於太惡劣。「有錢的少爺」總是顯得懦弱，甚至讓一般人感覺得有點可愛的吧。人數方面，最多時也不會超過五萬人。台灣人的勞動者，在日本幾乎看不到，只有二次大戰末期被徵用到軍事產業的少年工和一部分青年工是例外。以上這些因素，才是台灣人與朝鮮人對待日本及日本人的行動方式的本質性差異的由來。庸俗的強調「民族性」之差異來說明日本人對台灣人和朝鮮人的不同形象觀，我認爲這是不科學的。因而我當然不能苟同。

不過，我的評價是，住日朝鮮人的「好唱反調」，使戰後日本變得「豐裕」了，尤其在文學的領域上，這種「好唱反調」產生了正面性的「刺激」效果，由而產生不少純文學的佳作。在音樂界、運動界也繼續地發生正面性的「衝擊」，係眾人皆知的實況。

13 台灣獨立運動的支撐

台灣與朝鮮之間的差異點，還有兩大項。

其一，不曾聽說過朝鮮有「山地少數民族」的存在。日本有倭奴，台灣有以泰雅族爲首的少數先住台灣諸民族——一般被稱爲高山族或山地同胞的人們。

其二，據說朝鮮半島上，雖有以意識形態爲中心的南北對立，卻沒有民族對立。即使有，也不過些許的「地域主義」屬性一類的對立。

可是，訪問過台灣的日本人，有時候會從一些日語流利的台灣人的口中，聽到諸如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和對立、「台灣獨立論」、「罵倒國民黨」、「反對中共論」等論調。

在朝鮮半島，基於意識形態的持續對抗狀態，有廣泛的、民族統一的悲願的基調性呼籲。幾乎聽不到分離獨立一類的論調。

在台灣，當然有國民政府主導下的反共、反中共運動的持續；除此，在台灣島「內」之外，還有以台灣人中上層階級的滯外子弟爲核心的「台獨」運動。

這些人倡言「台灣民族論」，既反對國民黨政府，也反對中共過海來台。他們主張，台灣民族已經形成，他們已不是中國人，因而沒有和中國大陸統一的理由云云。

他們的台灣民族論相當牽強。台灣島內，的確有外省人與本省人的對立和省籍矛盾的存在。主要的原因是「二·二八事件」的「傷痕」還沒有痊癒，國府體制的民主化遲緩。不過，我認為，它的本質是屬於地域主義對立的層次，而並不屬於民族對立層次的問題，兩者之間有其根本性的差別。

本來，被稱為本省人的人們，九成以上是在明、清期間，爲了開拓新地而由福建、廣東兩省渡過台灣海峽，來到這個國內殖民地台灣的人們的後裔。做爲反國府、反中共、反中國的邏輯前提而提出的「台灣民族」，即使環繞著台灣的島內及國際條件已經出現且被容許，爲了達成充分的成熟，我認為今後還得經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想把台灣民族的成立求之於歷史，過去的「痕跡」，不能不說是件頗難建構道理的事情，若一定要尋求「台灣民族」的歷史根源的話，只好向「台灣少數先住諸民族」去覓。但迄今，高唱台灣獨立建國的台灣民族論者甚少對「台灣少數民族」問題有過深刻的探討及反思。

認爲台灣民族論太牽強的另一批體制改良主義者，推行著台灣內部的民主化運動。這就是所謂的「黨外」運動的一部份流向；因爲時間有限，無法深入詳論。不過我要指出的一點是：受日本的殖民地化和五十年的支配，正是台灣民族論被唱出的遠因之一。我希望日本的各位先生瞭解這一點，也希望各位多多地考慮，當民族內部的分裂抗爭到了熱血奔騰的時候，因爲是「近親」，其相憎加深，一搞不好會促成相互殘殺一類「淒慘」的大悲劇。

14 山川均氏的《殖民政策下的台灣》

台灣獨立運動是一部分台灣人的心聲、主張，這一點沒有錯。不過若給予過高的評價，或者日本朋友在感情上把它和自己對台灣的「鄉愁」混在一起，錯認政治生態的流向，我則覺得頗有危險。

在矢內原先生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出版前不久，山川均先生也公開了《殖民政策下的台灣》（戰後被收進《山川均全集》第七卷，勁草書房）。前者主要的「資料」提供者，是當時東大在籍者中的台灣人菁英及其周圍的人們；而後者的資料來源，是不同於東大菁英份子的台灣人左翼份子，兩者走著不同的道路。

如上所述，自殖民地時代以來，台灣人的思想活動和政治行動，是具有多面性的。因此，如何掌握台灣的現狀，如何繪出台灣人的一般形象，要完成上述的課題，是需要花上一些精神和相當的努力的。對台灣人以偏概全，不去洞察他們的生活曲折、複雜的心理結構，只顧表示些輕率的「口惠」性「理解」或「善意」，說不定將招來意想不到的「反彈或抗拒」，這一點我藉這個機會必須提醒各位。

15 日本的回歸亞細亞和台灣模型的提示

我原本要向各位報告我對研究的信念與態度，結果把態度的部份說漏了，讓我再補充一下。

自六〇年代中期到七〇年代中期，大約十年的期間，我在亞細亞經濟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那是整個亞洲因越戰和中國文革而發燒著的年代。日本資本主義一方面留意於那些情勢的發展，一方面全面推動著「新南進政策」和它的亞細亞回歸相關聯的一系列動作。美國爲了防止越南革命的波及，推動以品種改良爲中心的「綠色革命」，在馬尼拉設立了IRRI（國際稻米研究所），拚命想造出高收穫量的優良品種。在這個過程中，受到注意的品種之一，是台灣的「蓬萊米」。

在台灣，輸入代替產業的培育初步地上了軌道，接著因「加工出口區」的設立而鼓勵勞力密集型的輸出加工業，台灣經濟的高度成長，開始受到了世人的注目。

由於這兩者相乘的好形象，方便做爲亞洲開發中國家的模範，台灣模型遂廣被宣傳，特別是由日、美兩國所提示的台灣模型，很容易把議論帶進對殖民地時期台灣的、沒有立場且具輕浮屬性的評價。

我在亞細亞經濟研究所的期間，在身邊經常聽到這樣的議論，漸漸地感覺到一種危機感。

日本企業對亞洲的投資逐漸增加爲主調的日本向亞細亞之回歸，當然地又將日本與亞洲之間的摩擦、日本人與亞洲人之間的「齟齬」，赤裸裸地呈現出來。

雖然有不少有良知的日本人，呼籲大家去理解亞洲人的「心靈」，但好像沒有什麼效果。隨著日本的經濟大國化，人們愈來愈習慣於「矯飾」，愈來愈看不見社會現象和事物的「本質」，不可一世的驕傲的新生代也逐漸出現了。

不知不覺之間，我變成了日本與亞洲之間的「邊際人」。我的苦惱也愈來愈深。追求如何遏止摩擦和「齟齬」的惡化、如何建構亞洲與日本的芳鄰關係，變成了我寫評論的重要課題。

我發現，妨礙日本人對亞洲認識和國際化的要因之一，是日本人沒有機會真正體會到被殖民、被支配的痛苦性經驗。日本是唯一沒有體驗過亞洲共有的被殖民化「病理」的幸運國家，這一點當然是可喜的。可是，被支配當然會產生些病理，支配人家也同時地帶來些殖民者又頗難免的另一類的社會病理，本來還是有機會通過這種自己獨有的社會病理去反省，變「禍」為「福」的。戰後的日本人的確有過這種機會。

可是，日本現實中所展現的現象卻是：不但不反省，對自己在台殖民統治的「成果」仍然有讚美兼自我陶醉的一種風尚，甚至歌頌舊日子為好日子的社會氛圍。我深感這一種風尚蔓延下去將危害亞細亞的和平，於是，我積極展開了我的言論活動。《與日本人的對話》（社會思想社，一九七一年）、《日本人與亞洲》（新人物往來社，一九七三年）、《探討「亞洲在日本」》（平凡社，一九七三年）、《邊際人的獨白》（龍溪書舍，一九七六年）等就是我在這一期間的小小業績和紀錄。後來，從這些文章裡面，再選出適切的部份，出了一本文庫本《新亞細亞的構圖——尋求芳鄰關係的展現》（教養文庫·社會思想社，一九七七年）

。書中，我嘗試從更廣泛的視野，向年輕一代的日本朋友披露了我未成熟的一些觀點並提出了我由衷的呼籲。

16 「共犯」結構的自我揭發

在前面所提的一連串研究及寫作裡面，我所提出的視角有幾個方面，其中最被認為「新奇」的，是對被侵犯方面的一些責任的摘出和指責。

同時我也指出，在侵略與殖民地經營的過程中，被侵犯一方的「共犯結構」，若不經過事後確認與自我揭發，則意圖把它昇華為歷史教訓，並使這個教訓共有化，是非常困難的。

以我戴家為例吧。我們戴家一方面在抗日運動中遭受到血腥的彈壓，在殖民地體制下承受過無限的民族歧視；可是，另一方面，做為被編進殖民地體制下的地主家庭、自願去肩擔殖民地醫學使徒的角色，卻也有機會積蓄一些財產。在後面這一點意義上，我們戴家不但處在「共犯」者的地位，同時也可以說是屬於分嗜殖民地支配利潤「殘渣」的「特權階層」吧。

初期的侵略、統治過程中，「嚮導」都是由我們漢族系台灣人中間的「自家人」來扮演。後來，從「同胞」中間繼續產生了買辦和合作者，為了分一杯「殘渣」而賣力過。

又，殖民地主義與侵略戰爭，不用說它會帶來物質層面的破壞和財富的收奪，更糟的是，它會不分

青紅皂白地，把「侵犯者」和「被侵犯者」雙邊的人性破壞殆盡。我將提議，日本的各位先生，若有可能的話，經常和亞洲的民眾一起來反芻並反思這一系列並不甚愉快的史實。把侵略戰爭的悲劇、長崎與廣島的悲劇，進而把殖民地支配的歷史教訓，收進自己的歷史教訓裡面來，加以正確的定位，大家共同來描繪出更光明的遠景。

17 暫時的結論：展望與盼望

以上，拉拉雜雜地講了許多。在我來說，瞭解台灣和台灣人全體的過去的史實，一如瞭解我們台灣關係人士的個人來歷，同樣的重要。同時，我也相信，爲了把台灣的過去和未來，連接在中、日關係（包括日、台關係），連接在日本與亞洲的關係，甚至鉅接在亞洲和平、世界和平上面去思考，這份整理及瞭解的工作非常重要。因此，身爲日本人的諸位先進，實在不應該放任這種「失落台灣研究的當今性缺陷」狀態繼續下去。

其次，台灣史不僅是台灣全體住民本身的歷史，同時也是中國史的一部份，在這個意義上，更可以延伸其脈絡至東亞史、世界史來思考今後的課題。台灣史、中國史、東亞史、世界史等各部份之間，共有著有機性關聯自不待言，如果沒有這樣的視野去掌握問題，恐怕不易體會亞洲近、現代「時代精神」的來龍去脈，更遑論去理解其真正的內涵及其流向。

根據以上的觀點，我願重新提出下面的幾個課題，和各位先進一同思考，當爲我對往後研究工作的新挑戰。

(1) 近日來，甚多人士高唱著「世代不渝的中日友好」關係的建構，不過，我們先要把頭腦冷靜一下，不能光喊一些口號。我們要分析解明，日本人是如何通過台灣支配，而在歷史上強化了對中國人的「偏見」。把這段經緯分解清楚後，再把它變成一種歷史教訓，做爲建構中日友好關係的一個基礎。

(2) 日本在台灣殖民主支配體驗，對其後日本對亞洲關係的形成，究竟扮演了何種角色？又帶來了怎樣的影響？我希望對其思想、政策的擬定和實施，以及統治技術等方面試予考察和整理。我期待透過這種課題的研討及完成，來摸索、甚至創出日本與亞洲之間應有的新的關係模式。

(3) 住日外國人中過半數是朝鮮人，做爲剖析在日朝鮮人問題的一個新的視角，解決在日朝鮮人問題的一個途徑，我想若能研究好日本對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和朝鮮，所作的一切行爲並加以總結，同時進行一種比較研究是不難找出其因應對策之線索的。通過比較研究和分析，相信能得到更多的史實和觀點。又，比較研究如有成果，當然也有可能對日本近、現代史的研究帶來新的刺激。在這一點上，務請各位協助和指教。

做爲第一歩的嘗試，我受邀和在日朝鮮人教授姜在彥先生，在《三千里》季刊（在日朝鮮人文化界創辦的著名刊物）第四十一號（一九八五年二月一日號）上面，已做過一次題爲〈殖民地下的台灣與朝鮮〉的對談，不久就會出刊，務請各位過目並不吝指教。

多煩各位靜聽，謝謝各位。

（本稿係由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之演講紀錄加以補正）

——原載《台灣結與中國結》（遠流出版）

兩個尺碼與認識主體的確立

——應該加強日本和台灣史的研究

過去三十多年當中，台灣社會發生了史無前例的變遷並面臨了新的挑戰，台灣從未有過如此般的工業化，沒有過像現在台北人口那麼集中繁榮，那麼高的物質享受水準。隨之而來，也發生了許多必須面對的社會問題。台灣社會正面臨著轉型的階段。

未談到台灣之前，先從日本說起。七〇年代，日本出現了許多「日本論」、「日本人論」，也就是日本人爲自己尋找出路因而爲自己下定位的有關討論，如雨後春筍般的問世。從日本的歷史來說，「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的老師是中國；「明治維新」以後，是學習西方，最後以「德國模式」力求其近代化。戰後，他們又一轉，變成向美國學習、找模式。主要的內容除了科技以外，一方面是他們的經濟和經營方式，另一方面是美國的法治人權，和各種社會科學教育。

到了七〇年代，日本逐漸從吃兩顆原子彈戰敗後的慘境，重新站起來，成爲經濟大國。在這個日本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日本論」和「日本人論」的出現，表示他們發現日本快沒有老師了。以前跟中國學的，似乎都變成了博物館的「老古董」；戰前，學習德國的納粹，其慘無人道帶給人類鉅大的災害，

戰後的日本也不能再學習德國；戰後英國自己的「病」相當重，法國的政治小黨太多，分歧對立，也搞不起來，義大利亦積重難返。戰後只有學習美國，但後來發現美國社會也面臨著很大的危機，經濟慢慢衰退，並且也出現了反戰運動、嬉皮運動、黑人運動，還有毒品問題等等，美國也不可學，因而新的老師和模式找不著了。

1 即將面臨新的挑戰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已無老師可學，所以要確認自己是那一種社會制度，要搞清楚自己的歷史和民族性。我們不能只看到哈佛大學傳高義教授寫的《日本第一》，以為從那一本小書裡就可以學到賺錢的秘訣，我認為，果真如此，那是太天真，亦是台灣社會的急功近利型病態。我覺得我們應該去認識日本的文化，日本的歷史，和日本的長處。《日本第一》也只是說「日本似第一」（Japan as No.1），而不是說「日本是第一」。這本書在北美銷路並不好，但日本人自己卻買得最多，高達六十萬冊。台灣有翻譯，大陸也有翻譯，好像看了這本書，我們自己也能發財似的，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我想要講的是，日本人之所以有那麼多「日本論」、「日本人論」類的書刊行問世，乃是日本發現自己找不到老師，找不到典範，找不到模式，需要自己重新確定自己，要把自己的座標軸和定位搞清楚，所以才有那麼多的書在討論。我不知道台灣的學術界或文化界是否有人指出這一點。

我之所以要提出這一點，是因為台灣也將和日本一樣，在未來的四、五年間，我們必須面對很大的新的挑戰，那個時候，我們也必須要搞清楚自己的歷史，把自己的社會定好位，才能找到自己該走的路，以及生活方式 (life style)、生活的追尋和取向。

我們在討論問題時，必須先對對象有所界定，把「焦點」弄清楚，才能進行分析。我要討論的對象，是四十五歲以上，現在成爲台灣社會中堅份子的台籍知識份子。以自己爲例罷，我生於一九三一年，也就是「九·一八」的那年，從小受日本殖民地教育，初中二年級時台灣光復了，初三開始學ㄉㄌㄜ，建國高中畢業後，唸省立台中農學院（現在的中興大學），服完預官役後赴日留學至今，我使用日本話生活的期間，比用中國話的期間長得多。我要討論的對象，就是像我這樣跨越日籍和光復稍後二個時期的台籍知識份子。

但我不是以「菁英份子」的優越觀點來看問題，我不認爲知識份子有什麼特別了不起。我曾經特別指出，「學歷」不等於「學力」。我所稱的知識份子，並不只是依靠「學歷」而言，而是著重於他的「學力」、言論、行爲、見識和對社會的回饋奉獻之程度。

2 日本尺碼和美國尺碼

像我們這樣受過日本殖民地教育的台籍知識份子，在早年接受教育的過程中，必然會不自覺地接受

日本人他們那一套價值體系。即使於日本在台的殖民統治結束之後，還留給了我們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克服那套日本殖民地統治所留下的價值體系，而新創出我們自主的價值體系。這種克服的工作，是一種思想層面的作爲，我們要如何朝這個方向努力？其實這個工作的真正內涵既不易懂，又是很費力氣，因爲大家生活得還不錯，尤其是目前的台灣，大家吃得好、穿得好，物質主義、現實主義、功利主義瀰漫了社會，一般人也就不會被迫花腦筋去反省並檢討這個不易被察覺的課題了。

由於許多台籍知識份子，未能充分克服遺留下來的日本殖民地價值體系或價值觀念，而使得我們看問題，免不了常常借用日本的價值體系或價值觀念，而沒有自己的觀點。我們不知不覺地養成了習慣，老是依據日本人的觀點去看問題、去判定事物。這就是我所說的「兩個尺碼」中的日本「尺碼」，它帶給我們種種的陷阱和困境。

光復之後，尤其一九四九年以後，台灣湧來了大批的大陸籍知識份子。大陸來的知識份子沒有台籍知識份子陷於日本殖民地長期統治的經驗，不但不具有「日本尺碼」，還因受「九·一八」以來的長期侵略而具有抗拒日本之一切事物的深層心理。

國府及台灣地區由於長期以來和美國的關係，人們另具有「尺碼」，我暫時叫它做「美國尺碼」。我曾言，台灣是一個海島，不免有「島氣」；日本是島國，日本人自己也自稱有「島氣」，台灣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就免不了沾染「島氣」中的「島氣」了。大陸知識份子雖然也有「美國尺碼」，有類似我們台籍知識份子的陷入他人「尺碼」的困擾問題，但在「島氣」這一點上，比我們台籍知識份子

可能要好些。不過，許多第二代的大陸籍知識份子也已經染有「島氣」了。

3 建立自己的尺碼

我久違了台灣十三年後，重新抑或頭一次參觀了幾個大建築物，例如國父紀念館、中正紀念堂、圓山大飯店等等，我發覺幾個問題。

第一，其設計背景的思考方式和美觀意識與日本完全不同。

第二，好大，這一類氣質有一點像美國佬。很可能是受到大陸性「風土」的類似影響。

第三，懷念大陸的補償心理反映在上述建築設計上。

不管如何，這一類「好大」的建築設計著想，在台籍老一代的思考方式裡是找不著的。

日本雖也有大建築物，但內部是「細緻」和「精密」的，大陸籍朋友常常會批評它，說是「小氣」，但從「能量」的消耗方面等來言，卻是另具有節省能源和「紮實」一類的觀點。不過「氣宇壯大」教人嚮往，心裡舒服。

要如何克服這些外來的「尺碼」，尤其是日本殖民地價值體系留下來的「日本尺碼」，這就需要在「對決」中，來形成我們自己自主的價值體系和「尺碼」了。我們台籍知識份子如果不能與日本殖民地價值體制「對決」，就永遠不能形成我們自己的自主價值體系和自己的「尺碼」，而在精神上，永遠陷

入日本價值體系中，自囿於「日本尺碼」，成爲它的精神層次上之附庸。

日本戰前所借的主要是「德國尺碼」，影響了日本人的社會行爲以及侵略行爲，終於吃上了兩顆原子彈，戰敗投降。

但是，戰後他們就揚棄了「德國尺碼」，日本社會的主流開始反省「德國尺碼」帶給日本的正負後果，批判了「德國尺碼」，而向美國學習。德文在社會上不再吃香了，萬人向英文一面倒。

到了七〇年代，「日本論」、「日本人論」出現，他們又要揚棄「美國尺碼」，建立自己的「尺碼」。這個似乎和日本民族性有關，他們總是不惜拋棄過去，而「向前看」。日本人有「忘年會」的風俗，在「忘年會」上，大家一齊喝酒，「過去的事情+忘記」讓它流逝，然後向前看，思考並計劃明年也就是未來要怎麼辦。

4 向前探索自己的路

而我們台灣在兩個「尺碼」的影響下，加上官僚主義的運作，大家生活得不錯了，但是，許多問題和挑戰也產生了。

由「十信」案的發生，我就覺得，這似乎是由「慢性肝炎」轉化成了「急性肝炎」。即使如此，我們台灣社會似乎還沒有反省和批判，更沒有由反省批判而「向前看」，來建立我們自己的「尺碼」，探

索我們自己該走的道路，而仍然沉湎在原來的兩個「尺碼」中，懶得自拔與自我摸索。

台灣社會之所以如此，也許是和中國人的「向後看」有關，總是揹負著過去的歷史包袱，想丟也難得丟盡，因而有礙於「向前看」。

我並不是主張要大家忘記過去，若要忘記過去，又何必研究歷史？其實，研究歷史也並不只是爲了過去，而是爲了當今和未來，找出歷史的教訓和取向。西方的歷史哲學家作如是之主張，中國的歷史哲學家又何嘗不如此！孔子主張「因、益、損、革」，司馬遷主張「通古今之變」，司馬光主張「資治通鑑」，也有人主張「鑑往知來」；連中國人過年的風俗也是「迎新送舊」，「爆竹一聲除舊歲」。

但是，在近代世界史上走向沒落和落伍之後的中國人，在專制的官僚主義體制下，似乎只能墨守成規，一成不變的抱著「祖宗家法」，而慢慢喪失了對過去批判及對未來展望的能力和精力。「無力感」瀰漫於社會，真叫人痛心。

今天在台灣，我們台籍知識份子固然缺乏對「日本尺碼」的批判精神，大陸籍的知識份子也常常缺乏對「美國尺碼」的批判精神。可是，在轉型期社會的我們卻必須直視現實，勇敢地面對接踵而來的許許多多「挑戰」，我們沒有自主體系的自我「尺碼」，又如何能掌握住自己該走的道路和方向？又如何獲得能力來解決我們自己的這些問題？

5 不能忘記自己的雙眼

在台灣，借著外來的兩個「尺碼」做爲現代化的典範，在其發展過程中，老一輩的世代產生了心態上的分歧，也發生許多不實的「虛胖」現象。社會上的事情，因爲我出國三十年，不很清楚，以學界的一件小事而論，有些人爲了「充門面」，在自己的著作後面列一大堆外文參考書，有些是不相干的，有些根本沒有「參考」到的。如果有學生問他：「老師，您的書裡哪些部份是參考這個書目中的著作的？」恐怕就有許多人答不出來，甚至連那本書都沒有見過。但是，我們如果要建立起自己主體的價值體系和「尺碼」，就必須把這個部份克服或揚棄，然後才可以突破，以更高的層次來討論一些問題。

我們要與外來的這兩個「尺碼」做好「對決」，來建立自己的「尺碼」，這是一種超越和揚棄的過程。在這個認識自己、建立自我的過程中，這兩個「尺碼」也有其作用，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它們也可以做爲我們建立自己價值體系「尺碼」的參考。在這個時候，我們確是需要借用日本人的眼睛和美國人的眼睛；只是我們不能忘記自己的雙眼，必須保持我們自己的眼睛。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即我們只用一個眼睛的時候，不容易察看，而要用兩個眼睛，甚至要用更多的眼睛（在腦子裡），在我們做學問的時候，才可以有多元的思考，多元的比較，才可能看得遠，看得廣，看得深。但是，如果只是一「虛胖」，以爲自己現在的成就已是很了不起，只會說些「曲學阿世」、捧場的話，而不再求長進，那麼我

們的自主性也就確立不起來。

6 大家一起來思考奮鬥

在我逗留美國一年期間（一九八三年三月、八四年四月），看到許多鄉親在美國奮鬥，他們提出了很多很多對台灣將來的看法。我是不搞政治的，而是站在學問學理的立場，來分析他們為甚麼會有那種主張和看法。

我想一提的是，有不少鄉親們喊出「台灣人是最優秀的」、「台灣民族優秀論」，這個我就要慎重的考慮一下。我們絕對不要自卑，但也不能「虛胖」——「虛胖」不是真正自主性的確立。「優秀」是什麼意思，希特勒喊日耳曼民族優秀，日本人喊大和民族優秀，結果帶給了德國和日本悲慘的結果，而且為禍人類，害人害己。我們還是要踏實一點。事實上台灣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沒有什麼特別太優秀。雖然諾貝爾獎也不是絕對的標準，但我們台籍鄉親至今還沒有人得到過（新竹鄉親，李達哲教授獲得一九八六年年年度化學獎是後話）。海外台籍鄉親們的這種空頭的「虛胖」，會把我們台灣人帶往何處，我是擔憂的。

當年賴和先生的事蹟還停留在大家不敢談的時候，有一位老前輩的詩人文學家，也是林獻堂先生抗日的夥伴葉榮鐘先生，有次在日本請我吃飯時，談到他的老友賴和先生。他說：「以賴和先生的詩才，如果生在唐代的話，他的詩一定可以留在唐詩選中；如果賴和先生在二、三〇年代的大陸，他一定可以

和魯迅等著名的文學家齊名。但是，可惜台灣的「池塘」太小了，賴和先生沒有能夠完全燃燒，來發揮他的才華。」

聽了這位前輩的話後，我一直在想，老先生對我講台灣是個「小池塘」，但這個「小池塘」是甚麼，是我們物質上的條件呢？還是我們精神境界的條件呢？他的意思，是不是希望我們台籍知識份子來克服這個「小池塘」的境界呢？我們台籍知識份子始終未能建立起一個思考的真正主體，確立自己的「尺碼」，是否又與未能克服這個「小池塘」的境界有關。我現在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請大家一齊來思考，爲了我們共同的前途而奮鬥。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日於台大校友會館四樓之演講錄音整理）

——原載《台灣結與中國結》（遠流出版）

我是怎樣走上研究「二·二八」之路

每一個歷三十多年而不輟地浸淫某一領域的學術研究者，其實都有著難以爲外人道的內在的深情，便是這深情引領著學術研究者即使上窮碧落下黃泉，或寂寞地踽踽於思索的道途中，亦不覺其辛苦。做爲一個二·二八事件及台灣史的研究者，我常在午夜夢迴的寂寞之中自問：是什麼力量驅動我走上這道路？是什麼歷史的或無由言說的深情可以令人一往而無悔呢？

記憶於是回到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〇年代前半期的往事，那些熱情而真摯的、帶著青春期的正直與理想主義色彩的同学的面容，那目睹憤怒民眾砸爛專賣局台北分局而驚心動魄的自己，以及一個因「白色恐怖」而自陷頹廢主義借酒澆愁的好友的面容。是那些年少時代被擺佈到歷史巨大變局中的心靈震動，引著我直至今日？抑或是大量的捕殺讓流寓日本的我全心要解開這命運之謎呢？理性的認識與感性的深情交相繞纏在心中，連自己都難以分辨。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五日我出生於桃園縣中壢附近客家村莊的小康家庭。光復時，我正就讀於新竹州立新竹中學二年級。台灣復歸中國，對台民是一大喜訊。國府來台接收時，我也夾在歡迎群眾中，手拿

中華民國國旗和國民黨黨旗，抱著歡欣鼓舞的心情，熱烈迎接國府官員與中央軍的到來。

當時接收新竹中學的是甫從廣東中山大學畢業不久的辛志平校長。辛校長在竹中奉獻心力辦學四十年，作育英才無數，蜚然有聲。但當時稚嫩的我卻對他的廣東國語與私德的傳聞頗有意見，因而插班轉學到台北的建國中學。建國中學校長陳文彬（「二·二八」後避難到大陸，熬過「文革」客死北京）原為日本法政大學教授，在東京時即有頗高的聲望，光復後返台致力發展教育事業，網羅不少東京帝大等名校畢業的留日高材生至建中任教（像台大醫學院小兒科陳炯暉、泌尿科江萬燧等教授就曾在建中兼課），建中遂成頗有號召力的名校。我在建中唸書時，正臨學制的改制期間，寄宿於改制中的台北高等學校及剛創制的台灣省立師範學院附近的住宅區（當今的泰順街），那個有池塘、夜深人靜的地區，原為日本高級官僚或台北高等學校教職員的宿舍，戰後很多從日本各帝國大學或高等學校回台的台籍學生寄居此地，形成各路英傑聚會的「梁山泊」。雖然有一點早熟，正值青春騷動初期的我，卻很崇拜這些留日且出身名校，博覽群書學識豐富的學長們，受到他們頗多薰陶。

「二·二八」發生之際，我讀初三。二月二十八日的上午，因有親戚在台大醫院服務，我到醫院看他們。自醫院樓頂遙望了包圍長官公署的請願群眾，並聽到了那不吉利的機槍慘叫聲。同天下午我還到了城內專賣局台北分局附近，目擊了憤怒的民眾在砸爛分局並焚毀專賣品。

有些流氓模樣的青壯年，則仿效日本人頭綁白布巾，口罵「支那人」、「清國奴」，不分青紅皂白地找出外省人毆打出氣，連就讀於台北女師附小（現台北市立師範實小）的外省小孩也無法倖免，慘遭拳打

腳踢後，還被推入學校前的深溝中。連我也因閩南語不甚靈光，而被迫唱日本國歌，以證明台灣省籍身份。這些情景，對年輕而富於正義感的我造成很大的心理衝擊。我當時固然也對大陸來台行政官員、士兵的貪污橫暴等無理的種種深表憤怒不滿，但總覺得這樣非理性的暴行騷亂，終非正道，眼見許多無辜受毆打者一波一波地被送進台大醫院，心裡非常痛心難過。至於戰災過後不久，物資甚為匱乏，還焚毀專賣品等，叫我惶惑及惋惜。

三月一日，早上到學校等上課時，有一位從日據私立台北中學（今泰北中學）插班過來的高年級學長到我們班上來，他帶一點江湖流氓氣，語氣激憤地辱罵國民黨、外省人，鼓動我們跟他上街行動。但由於他出身私校，我們出身公立學校的同學，年輕氣盛，不懂事，對他心存鄙視，而且他除了情緒性的煽動字眼外，也未見有足以服人的理由，因此，我們班上沒有一個同學附和跟隨了他。待我回到「梁山泊」，那些從日本名校回來、社會科學素養深厚的學長，對「二·二八」卻有不同的看法，他們雖也批評國民黨，但反對毆打外省人的暴力行爲，並以社會科學作深刻的分析，令我大爲佩服。

不久，建中校長陳文彬被捕，英語教師王育霖（日本台獨領導人王育德之兄）失蹤。家父怕我出事，當即把我帶回中壢老家監管。

「二·二八」後，大陸國共對抗的情勢愈形嚴峻。國府的政治腐敗，失去民心，軍事上也逐漸轉衰，大陸青年學生普遍左傾，學潮四起。一九四八年至四九年，大批大陸知識青壯年到台灣的學校任教，其中頗多思想左傾，不少爲中共地下黨員者。我們肯下工夫的台籍學生慢慢地開始有能力閱讀中文刊物

，當時大陸深具影響力的報刊，像《文匯報》、《大公報》、《觀察》已湧入台灣，早熟的學生無不至圖書館爭相閱讀，左翼作家魯迅、巴金、茅盾等人的小說、雜文也風行一時，成為台灣知識青年一睹為快的作品。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本地的青年學生也開始對大陸政局的變化熱切的關注，與大陸來台學生們匯合，搞起活動和學運來。

國府在大陸軍事節節失利，一九四九年大批軍隊撤退來台，佔據了校舍，學校只能上半天課，而「四·六」學潮（一九四九年紀念「五·四」的前期活動所惹起的）後，國府又大肆搜捕活躍的學運份子，我的同學、學長、老師或被捕，或逃逸大陸，一時風聲鶴唳，時局既隕，學習環境迅速惡化，遂令我興起遠離這「是非之島」的念頭，一方面「想飛」，另一方面「想溜」。加以，當時五十之齡新遭喪偶的家父竟迷戀上一個酒家女，將其娶回家中，令我深為不滿；國亂如麻，又遭家變，高中尚未畢業的我經此雙重刺激，就「偷」了父親的錢換成美金，跟一個琉球人商定，以兩百元美金及三大袋糖為條件，由他幫我經過琉球偷渡到日本，投靠東京的二哥。我先給了琉球人一百美元定金和三大袋的糖，十月下旬如約到竹南附近後龍的海口等待出海，誰知苦等一個多禮拜，琉球人卻久候未至，於是才知被騙，只有打消念頭，廢然而返。

一九五〇年六月，我高中畢業，韓戰爆發。國府在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後，獲得美國的軍事、經濟援助，為了更進一步地鞏固對台灣的統治，遂開始實行「白色恐怖」，大肆逮捕並撲殺左翼人士。我許多學識超卓、愛國、正直的同學、朋友、師長紛遭繫獄、槍斃。我為免遭無端牽連，並遠離中壢老家

，遂決定不在台北讀大學，轉而投考台灣省立（台中）農學院，一試中第，就在台中唸了四年大學。這一段可以說是我在台灣實踐既「半飛」又「半溜」的歲月。

在台中有個值得一提的同學林曲園。他日文造詣極高，又深諳尼采等西方哲學思想，是個熱血浪漫的優秀青年。他家世好性格又豪爽，支援了因「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牽連而需避風頭的朋友。此事甚少人知道，只有一位「變節」成為特務的惡棍察覺，以向官府告密揭發相威脅，一再地向他敲榨勒索金錢，林君被迫花錢消災，心中陰影始終揮之不去，遂陷於消沉頹唐，似乎還有自演「頹廢主義」（Decadentisme）的模樣，經常借酒澆愁，縱情聲色。五〇年代後期，他得償宿願到巴黎深造，但因身體耗弱，心情悒鬱，竟罹肺病，終乃不起，一個富於才情的善良青年竟爾早逝於巴黎異鄉。從林君的遭遇，使我痛感在「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亂局中，人格卑劣，趁火打劫，大幹出賣、敲詐勾當的台籍人士實在也不乏其人，加害與受害的雙方決不能簡單地以省籍判然二分。

一九五四年大學畢業，在預備軍官第三期訓練中，我通過留學考試，然後在一九五五年秋天負笈日本，終於得償遠離「是非之島」的夙願。

從一九四五年盛夏到一九五五年深秋這十年間，我經歷了台灣光復、「二·二八」、「白色恐怖」這段台灣社會政治翻騰攪擾不已的多事歲月，其中摻雜了欣喜、憤怒、悲哀、壯懷激烈的各種複雜情緒。我的許多朋友、同學、師長在「二·二八」、「白色恐怖」中，有的冤死莫名，有的慷慨赴義，有的身繫囹圄，飽受身心摧殘。另一方面，我也眼見耳聞了數之不盡的公報私仇、政治權力傾軋、鬥爭、欺

騙、勒索、出賣等卑鄙醜陋的邪惡行徑。可以說，人性的崇高與卑劣、真實與虛偽在這過程中，交互呈現，做了最徹底無遺的展露。對這些我不能無感於衷，於是發願要把「二·二八」、「白色恐怖」的源頭、過程做全面的探討，既為剖解未明的疑惑，也可為當世與來者之借鑑。

一九五六年四月，我進入日本東京大學就讀，就開始著手搜集「二·二八」史料。我找出「二·二八」當時的《大公報》、《文匯報》、《觀察》等報刊，閱讀了莊嘉農的《憤怒的台灣》、林木順的《台灣二月革命》、唐賢龍的《台灣事變內幕記》、王思翔的《台灣二月革命記》、行政長官公署初編《台灣省二·二八暴動事件紀要》、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新聞室編印《台灣暴動事件紀實》、台灣正義出版社編印《台灣二·二八事件親歷記》、勁雨編《台灣事變真相與內幕》、江慕雲的《為台灣說話》、國防部新聞局掃蕩週報社編《台灣二·二八事變始末記》等書。舉凡周邊狀況的有關文獻，像：沈仲九主編《台灣考察報告》、福建省縣政人員訓練所編述《陳（儀）主席的思想》、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印《陳長官治台言論集第一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行《外國記者團眼中的台灣》、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人事室編印《台灣省各機關職員錄》（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發行）等，都是我熟讀的對象。尤其能看到《一九四九年美國對華白皮書》的英文本（*United States Relation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of 1944 ~ 1949*）及賈安娜、白修德著《中國暴風雨》（或《中國的雷霆》）的英文本（*Thunder Out of China*）獲益真不少。這兩本批判及抨擊國府的美國書籍，提醒我對同樣的事物可有多元的視野來比較思考，從而增多閱讀，使我初步了解到，勝利前後遠東及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等的大

景況。在日本，我一邊專力於本行的學術研究，確立在日本學術界的地位，養家活口，一邊「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地搜尋「二·二八」有關史料與資料。

六〇年代，台灣文學界耆宿吳濁流先生數度來日，我協助他出版《亞細亞的孤兒》等書，提示「二·二八」相關資料並與他討論「二·二八」，敦促他寫成記錄「二·二八」的《無花果》。國府監察委員丘念台先生在奉派來日疏導留學生時，我也與他就「二·二八」深談多次，明白了原來國府和國民黨並非鐵板一塊，其中派系傾軋鬥爭激烈，實非一般不諳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台籍人士所能想見，而國民黨及國府有關人員也決不能等同於外省人、中國人。此後，我還訪談了葉榮鐘、王詩琅、楊達等前輩，對「二·二八」有了更清楚的了解。

一九八三年春夏之交，我正在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訪問研究，葉榮鐘先生的女兒葉芸芸女士爲了籌備《台灣與世界》月刊在美國發行，特地到柏克萊看我。我建議她開闢專欄，整理有關「二·二八」事變的史料。我認爲，「二·二八」是當代對台灣影響極爲重大深遠的歷史事變，對中國現代史（當然包括台灣史）及東亞的和平有獨特的重要性，必須對之作出公正而客觀的省察，總結這段歷史經驗，才能有助於台海兩岸的和平與中華民族的團結。

當年的國府雖然沒有明令禁止「二·二八」的研究，但人人自危的社會氛圍下，當然就沒有人敢去碰它。當局對整個事變諱莫若深，極盡掩蓋之能事。經歷過「二·二八」的世代，對當年國府接收人員的貪婪殘酷與鎮壓事變時的凶狠毒辣，雖有極深的憎恨與惶恐，但在國府戒嚴高壓體制下的台灣島內，

除了偶爾私下吐露幾句憤懣之詞外，只有嚙默不語，不敢聲張；而戰後出生的世代則靠著父母輩的一些傳聞，擷取一鱗半爪，滋長出不斷增高的憤懣與抑鬱。「台獨」人士則利用國府的不當禁制措施，置「二·二八」的歷史真相於不顧，反而利用其「黑盒子」製造些神話，誇張失實地大作政治性的煽動蠱惑文章，有意無意地藉此製造仇恨，加深省籍矛盾，以求擴充政治資本，趁而建構其「台灣民族論」及凝聚其「台灣人意識」，企圖為奪取政治權力鋪路。這種作法只會造成歷史悲劇的惡性循環，無法療傷止痛，達到吸取歷史教訓的目的。而大陸中共方面也不脫政治掛帥的窠臼，多年來只藉著紀念「二·二八」因應「解放」或「統戰」的需要，卻鮮見對「二·二八」本身做客觀的總結及學術研究。

為此，我遂自一九八三年八月起，在美國發行的《台灣與世界》雜誌上以「梅村仁」的筆名開始連載「二·二八史料舉隅」，將我搜集到的史料分篇、整理、注釋並考證，逐月發表，目的在提供鄉親資料和一些看法，並期待能就正面層次來刺激有關「二·二八」的研究。這個連載後來引起海內外人士的重視，直至一九八四年四月初我返日本，看時機認為預期的目的已達成後，適可而止，便留下一些「餘韻」重要史料」而自主地停載。

在《台灣與世界》連載中，有不少機會和葉女史面敘及書信的往來。不久，我發現了她的才華和條件。她的家庭背景（她先尊葉榮鐘先生帶給她的餘蔭）和持有美國護照（方便走動）這些甚難有人能夠兼備的條件，正是她能夠作好採訪「二·二八」有關人士的絕妙大前提。我向她建議，小心被拖下「政治」的漩渦，只要能保持不涉及「政治」並固守學術研究立場，妳可以完成任何台籍有識人士都無條件完成的業

績。

近年，葉女士開始把她的採訪紀錄結集成書，公諸於世，其中有關「二·二八」的佼佼者，當爲《證言二·二八》（人間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二月）。

我們兩人，一直懷有合撰通俗本「二·二八事變」的計畫。本於我過去一貫地作法，是先公開資料方便學術界同好之士的利用，以期公平競爭，互相提升研究水平，回饋社會，繼之著手學術專著的撰寫，完成通俗本卻是我每一個個案研究的最後一段的作業。

一九八五年後，我能返台，返台機會增多後，我發現上述一類的執著和作法在價值觀混亂、知性的誠實不被尊重的台灣頗難適用，有可能被投機分子趁機惡用，將有爲害台灣學術界之嫌。

我們所注目的「二·二八」的研究動向，逐漸大白於世。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及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的研究報告將於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前公佈。我們終於決定，我們非國府、非中共、非「台獨」（他們的立場振幅相當地大，暫以「台獨」的概稱來代稱）的第四個立場的初步研究報告，也應該在同一个時期披露，仰請社會諸賢的批判及斧正，這才是公正堂皇的作法。

由而，我們倆將多年累積下來的研究心得及認知總結合撰成此書，第一篇和第三篇由戴國輝，第二篇則由葉芸芸執筆，因我尚留在台灣故，最後的定稿及校正則由我一人負責，以供關心「二·二八」者參酌。本書的完成雖未及參看海峽兩岸未公佈的官方典藏史料，但我們依多年搜集所得的材料與親訪見證人，將整個事變作一宏觀而科學的分析，相信不無一得之愚。

我始終認為，只有站在公義、公正、不偏不倚、客觀理性的學術立場上來探討「二·二八」事變的全貌，才能接近事變的真相，才能有效地撫平歷史創傷，從而將悲劇性負面經驗轉化為正面的歷史鑑識。因是立意撰述通俗本（自感不夠通俗，差強人意）故，我們考慮到讀者諸君閱讀時不感枯燥及瑣碎而盡量免去註腳，方便一讀能終篇。在可預期的將來，我準備完成精磨細琢的「二·二八」學術研究專著及資料彙編，斯時，筆者當然將作必須作的一切交代。

爲了完成這一本書，我們得過無數前輩和朋友的幫助，我們應該感謝。

我們特別得感謝的有吳克（《美洲時報周刊》副總編輯）、杜繼平（同前周刊主任）兩兄。他們讓我有機會先連載（自第三四八期（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十一月一日號）至第三五七期（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一九九二年一月三日號））一部分，不但在整理原稿上拔刀相助，還讓我享有再推敲的機會。

還得感謝的有我內子林彩美，和葉女史的先生陳文典博士。林彩美女史有時幫我騰清稿件及整理資料，陳博士和林女史他們兩人分別當爲第一個讀者，常常提出一些尖銳且具批判性的可貴觀點來鼓勵我們撰述。

必須特別作好交代的是，本書書名的來由。詩人楊澤博士（《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任）當他把本書第十一章〈統獨爭議的本質與導向〉選登於《人間副刊》時（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另取大標題「愛憎二·二八」，這個給了我們啓示，終於決定以此爲書名，謹向他致謝。

遠流出版公司的王榮文發行人非常寬容，一直等待並支援我們完成這本書，資深編輯林淑慎小姐幫

忙整理及校正，讓本書不致有太多錯誤，我們由衷誌謝。

我們在撰述過程中，一而再地確認了我們應該堅持的立場和撰述的態度。第一，我們就事論事，不褒不貶。第二，我們只準備並冀望對歷史能作好交代，但不準備遷就任何個人及社會、政治勢力。第三，我們等待的是「世界史和人類史法庭」的審判及善意且具有建設性的批判和指教，但拒絕一切低層次的「假批判」及圍剿性、貼標籤式的無聊攻擊抑或耳語。

顯然，撰寫當代史自求冷靜、理性、客觀比力求正確來得容易。我們相信本書疏陋的地方必還不少，如蒙方家指教，深為感動。

戴國煇謹誌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日於台北

——原載《愛憎二·二八》（遠流出版）

對我影響最深刻的書和著者

可以分幾個階段來談：大學時代是羅曼·羅蘭和他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我先看家兄留日時攜返台的日文本，後來爲了兼學中文再看中譯本。斯時中譯本只有一種。是傅聰（名鋼琴家）之父親傅雷所譯，譯者係那時代法文造詣最高的中國人。但他從香港投「共」，出版商怕牽連，把譯者名字改動再復刻盜印。這些都是後來我到了日本以後才知道的事。

考進東京大學研究所後，雖然我的專攻爲農村社會學、農業經營學和農業史。但我最關切的課題，卻在於如何定位日帝殖民台灣之史實與其評判，矢內原忠雄的名著《帝國主義下之台灣》變成我細讀的一本，爲了更進一步的了解殖民統治在世界史上的意義，非常幸運地發現了法國猶太裔社會心理學家亞爾貝·敏彌（O.Euvers d'Albert Memmi）所著《殖民者的畫像和被殖民者的畫像》（日譯本簡稱為《殖民地——其心理的風土》）。這本書以及亞氏一系列的著作提供了我對殖民地統治剖析方法和多方面的切入點。

近十五、六年來，因我擴大了研究範圍，爲了解讀「華僑」的生活哲學及他們之華人化過程的「認同困擾」（identity crisis），我從社會心理學再延伸到精神分析學的領域，在此過程我發現了艾立克遜（

Erik H. Erikson) 的「認同」(identity) 概念與他一系列的理論可以引進套用歷史分析。事實上，已有心理歷史學 (Psychohistory) 的出現。因它係新方法、新學問，難免有其不成熟之側面。只要確認其局限性，我們是可以把它善加活用的。拙著《台灣結與中國結》(一九九四年，遠流出版) 便是驅使「認同」理論來建構的一些歷史解釋之文集。

其他《史記》、馬克思、韋伯、湯恩比等人的有關史論，都值得我們搞歷史的去閱讀並參考的。

我一直認為歷史科學係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所以我非常「不務正業」，連吳濁流、賴和、楊逵等人的文學作品也都是我喜歡讀的作品群。

未來努力的方向和期許

到目前為止對自己的研究業績還是不甚滿意，如有關二·二八想寫一本學術著作，但尚未著手。目前我比較滿意的作品是《台灣總體相》(一九八九年，遠流出版) 這本原版的日文書，在日本銷了二十一刷十萬冊，但已十年了，需要改版，因為還沒有把「李登輝時代」寫進去。另外答應了日本的出版社要為二·二八事件寫一本日文書。又想寫一本批判台灣知識份子的書，可能出版後會遭到圍剿吧！人總是不能不接受批判的。還有我的博士論文《中國甘蔗糖業史之展開》，雖拿到學位不久便印成書了，但是不是很完整，畢竟那是年輕時候寫的第一本日文書，希能重印。如果可能的話，希望能用日幣一百萬買進一

年的時間來延長壽命以資撰述（一笑）。學無止境啊，年輕人總認為還有很多時間，其實光陰如箭，時間是一下子便將流失過去的。

給同學的一些建議

初期，可以先看學人的傳記，多涉及著名政治家傳記、史家的傳記。參看他們是如何去思考以及追溯他們的心路歷程。又該從他們之研究方法的建構過程吸收方法，如我在唸農經的時候是找一些農經方面的的大師們的研究回憶一類文章或著作，參看他們的心路歷程，看他們如何做學問。搞歷史沒有兩樣，多看前輩學人的經典之作，不要老是在去找譯文，便宜、薄薄一類的書，難懂的書反而值得去挑戰。沒有關係，他們總有其獨特的看法。閱讀、思維、撰述（作札記類似也）是一套機制，善以運作這個機制的學人，一定是成功的研究者。多比較我們就會有新的觀點。遇到困境的時候要多看、多思考。初次寫論文時，常會說書看得不夠不能下筆，其實不是，寫讀思考是一套東西，寫之外還要一邊看，看了以後要想。下筆的時候都會生起從何著筆的躑躅，但我得勸告同學，別怕，大膽地先下筆，遇到瓶頸時再去看，看一系列有關的論文或著作。千萬不要抄襲而是要去思考，思考以後再吐出來，這就是我常講的主體性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的觀點是很重要的。

希望你們年輕一代除了中文一定要學好外，英文也是很重要的，至少要看得懂 News Week，1

定要掌握另一種文字，英文主要可以方便電腦的使用，如此才可以得到快速的資訊，而另外再學一種文字，多學習語文，就是可以多一些比較的不同觀點，日文方面是因為日本翻譯了很多書，而且品質都不錯。如果只看一個文字的論著，就可能鑽在牛角尖那兒，摸不著新的看法，有別的文字，就可以多一些切入面。

現在的你們頭腦是海綿狀態，一天起碼有三分之一要用來吸收知識並加深自己的認知，而且不要一個人看書，討論是很重要的，像日本三、四年級的課就是以研討課為中心。另外身體要好，多運動，書看太多不一定好，但是經典之作一定要看，主要是多去思考。進了大學便要做一個「大學人」，要具有知識份子該有的品味，公私要分明，批判可以，要富有愛心的批判，有進步性的批判並要保持希望，大家一齊來繼續努力！

編按：此文為戴教授九六年返台任教後接受歷史系學生的訪談所作，潤飾成文。

我並不是英雄主義者

——序台灣史探微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著者出版了有生以來的第一本中文書。題爲《台灣史研究——回顧與探索》（台北，遠流出版公司）。遠流的王榮文社長，告訴我銷售得不錯，一共印了四刷。但我一直對此文集不甚滿意。它並不是我有系統地把它編排結成的文集。一九八三年以前，著者除了有必要與國人知音通信外，很少用中文撰述文章。當台灣島內的知心朋友們，發現我的一些有關台灣史的論點頗有新鮮感，以及具有突破性觀點（這些都是朋友們所云者，並非著者在此老王賣瓜）時，他們督促我提供中文稿。但我的文章已成爲中文者不多。僅有的多半是朋友們代我日文譯成，在中文刊物發表過的。我便匆匆忙忙地把它搜集寄回台灣。經過陳宏正兄的引薦，初識王榮文社長，沒有意料到，他會那麼果斷，欣然同意並樂於出版該書。

繼後，筆者在遠流出版公司上梓了下記的一系列中文書。

《台灣總體相——住民·歷史·心性》（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六日）。

《愛憎二·二八——神話與史實；解開歷史之謎》（一九九二年二月十六日）。

《台灣結與中國結——辜九理論與自立·共生的構圖》（一九九四年五月十六日）。

有幸，一概獲得好評。但諸如中傷、毀謗、圍剿、孤立等逼我者隨而亦湧至，好不熱鬧。

我並不是英雄主義者，更不可能是唯我獨尊，自以為是的頑固份子。請讀者諸賢允許著者不謙虛地說一句「我在日本學界的挑燈夜戰，孤獨而行、實幹經驗，教我學會如何劃定自我的座標軸而不動搖。如何開拓自己的學術前線卻不躊躇。誠然，根本就不曾去介意那些無聊人士的諸多舉措的」。

記得，當我出版《台灣總體相》不久時，我便向王榮文社長提出，能否把《台灣史研究》停止發行，日後重新編排以嶄新體裁上梓的要求，他並無二句話，便答應下來。

一九九六年五月中旬，返台後，又發現我的台灣史研究相關觀點若要有新書，在「遠流」的出版系列中，頗不易找出合適的相應定位。一九九八年來，爲了籌辦幾個有關台灣史的國際研討會過程中與南天書局的魏德文社長有了多次深談機會。我一貫地遵守家祖父留給我的「可遇不可求」，待人並相處爲善之道。經過多次交誼後，我們兩人終於擬成一些合作出版計劃，本系列叢書可以說是第一個嘗試。

第一冊文集之所以題名爲《台灣史探微——史實與現實的相互往還》，是出自於筆者在日本之學術生涯經驗的一種反彈，日本的歷史研究者，尤其東洋史學界的前輩們，鮮見其在職時著書，多數學者都在退休時依靠門生們代其搜集、整理舊文等，並籌募樂捐而出其大部頭論文集爲常例。

著者一貫地，敬佩日本學者的自謙作法及敬業精神，惟認為他們只能見樹但看不透森林。因此日本人的史學者很少能作，抑或敢作歷史哲學性的大格局發言。

反看我們中國人的史學界，甚多人士都盼望，在世期間能圓滿其撰述通史之「美夢」。一個人撰述通史，談何容易。日本人常用「中國人的白髮三千丈式想法和表達方式」來笑諷中國人的好大喜功、喜愛吹牛、言而不實、大言不慚等等陋習。其實，我們自己的俗話亦有反映此類的比喻。諸如，「天下文章一大抄」，「天下烏鴉一般黑」等。不管如何，我們國人不很敬業、喜歡耍嘴皮、慣用影射、不尊重先驅者業績等等惰性倒是真的。往好的方面解釋，中國人之上揭「美夢」即便團圓，仍然是茫茫遠望森林，但難窺樹木之微。

如何克服、彌補或平衡上述兩極端的落差或是作法的隔閡，是著者多年來的夙願性課題，由而我提出了史學研究時務必保持「生活者意識」，並時時刻刻關切自己有無脫離「生活者意識」境地的重要性。所謂生活者意識便是不與生活現實脫節，而來省察歷史的具體流程。考察過程亦不可忽視史實與現實的相互往還（feedback）或其原理（feedforward principle）的適當應用。著者是否能運作得順暢，自當別論。這一本文集是我有意識地應用上記方法的一個小結果，尚不敢自滿地說是成果。勉強地，或許可以說是我獨立思考的一種小小呈現而已。

不斷地試圖擴充對歷史的能見度或透視度，亦是我的夙願性課題。擴充知識的獲得量和累積，當然是需要的。但知識之質量不能等同認知（或認識）的正確及深度。若要加深我人對社會事物及歷史暗流等

的精確認知，我們有需要支付相應的能量。去嘗試把零散的諸多知識組成具備有機性相互關聯的一種構圖。不然的話，零散或零亂的諸多知識，依然是「死」在原地，搞不活來。既是原地踏步又是搞不活的諸多零散知識，它僅是個社會性浪費，對我人建構真正的歷史認識係無濟於事的。

在編本文集時，著者一再地重新確認「世紀末思潮」在台灣彰顯的嚴重性。

人們祇在「自求多福」，不信任任何他人之懷疑主義瀰漫於社會。人人沉迷於眼前一時的「成就」及享樂主義。當今流行於世的「只要我喜歡，有甚麼不可以」，不過是這一類意識在語言上的反映而已。英文的「so what?」，法文的「et alors?」美國社會的「me-ism」(自私，自我中心主義)等之流行及影響老早已浸透到台灣了。

世俗的拜金暨拜官主義，亦吹向台灣學界。繼而「包工程」現象處處可見於學界的各個角落。拜屬性的「研討會」到處開，好不熱鬧。

傳統的阿諛、諂媚、厚顏、馬屁文化不但在島內復甦，更有向美、日兩國政、學界輸出擴張之勢。只爲了「博士學位」而搞(非從事)學術研究。有了博士學位，不關它的虛與實才可謀到「職位」。有了「職位」便可享受大半生之「名利」，難道它不是台灣式「大鍋飯」共犯結構是什麼？

本文集，若能給不願與上述「世紀末台灣思潮」同流合污之有識之士，提供些許正面性刺激的話，著者雖然又在冒犯「眾怒」，我還是認爲是值得的。

只要讀者諸賢能覺得，本書對樹立台灣史研究者真正的主體性將是有益的話，我也就十分滿足和感

謝了。

本著作的成書，承南天書局編輯部諸朋友，尤其魏社長親自爲我整理稿件付出的辛勞，是著者應該倍加致謝的。至於訪問著者，把我未成熟的想法整理成文的媒體界朋友們，除了致謝外，我還得向他們報告，著者的中文，近幾年來真託福，的確進步了許多；因爲他們都是我的中文老師。更使著者不能忘記的是，一群知心朋友的存在，他們不斷地激勵了懶惰的我寫一些反潮流的小文章，或逼我說些有心人聽起來不甚爽快的話。沒有他們的激勵，這些小文是成不了形的。最後，又得感謝他們的餽主意。本書，粗疏和謬誤之處在所難免，最後懇請讀者先進們多加雅正，是爲序。

一九九九年七月五日赴美前夕 謹識於新店梅苑

——原載《台灣史探微》（南天出版）

戴國輝最後告白

戴老師的最後一課

吳嘉陵

戴師母您好：

戴老師最後一天上課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五，課程爲「司馬遼太郎史觀與日本戰後史」，上課內容是延續這學期的天皇制內容，可能是學期末最後總結天皇制的內容，期末報告的名稱是「我觀天皇制與亞洲侵略」。自天母攜帶了七、八本的參考資料（均是日文），有關天皇報導的雜誌。有一本是小林善紀的漫畫《台灣論》，和老師在十二月二十日聯合報專談這書的資料佐證之。

上課提及日本天皇和中國皇帝、英國皇室的不同，因爲日本天皇是無性，自法律觀點來看非人也，但日本右翼也奉「他」爲神，因爲天皇無投票權、無參政壇、非國民一員，是超然的存在。（戴老師加上一句：這哪是民主國家？）但是英國皇室則是人民的一部份，是人非神。因此一些醜聞或政治責任則須受人民抨擊，但是日皇則不必負責如慰安婦之事（由此看日本和英皇的不同處）。以黑格爾名言點出日本天皇的責任：即「一個皇帝最重要的在於生一個繼承人」。以日本總理的民調聲望只有百分之十八、二十來看，日本仍是崇拜天皇的國家。又問學生如何區別國事與國政，如國事是和政權無關，國政是

屬於政治運作，日本天皇不參與國政，但國會出面召集，內閣若改組則由天皇答應，由此來觀日本天皇和中國皇帝的不同。

又提及美國黑人把美國國旗製成褲子，涉及有損國家之顏面，反問台灣有否同樣之事？同學回答沒有。（老師常會以現象來看事情或國家的本質，因此會有此一問）他引申出來說明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重視基本人權，故生命權、財產權不容侵犯，又反過來說台灣的黑道不應存在作為總結。

藉這次整理機會，回顧老師的上課內容，點滴匯成大海，他知道我們大部份不會日語，情願抄板書於黑板上，他知道我稍不用心聽他上課時，他當場喊我名字提醒我這段很重要，我很珍惜和老師下課一同走去停車場的短短十來分鐘，有時車內的路程係課後加強，他很努力要提升我們的學術水準，而學生總是用功不足。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午戴老師原本要我載老二去辦護照一事，因我不知道位置在哪及時間恐不及，於是未成行，老師自己想了想，說怕他的老二以為父親介紹了一個歐巴桑給他，老師說完自己在笑，我回頭笑老師時，發現那天中午的陽光很燦爛，停留在老師的身上。這是我對老師最後的回憶。

謹致 戴師母

學生吳嘉陵 敬上二〇〇一年一月十八日

（文化大學史博二）

編按：此文為戴國輝教授逝世後，文大史博所學生吳嘉陵寄給戴夫人的一封信，回憶戴教授最後一堂課的情形。

戴國輝最後的廣播節目錄音

——談小林善紀與《台灣論》

唐湘龍：你在收聽的是 News 98 〈下班一條龍〉，我是唐湘龍。現在在我旁邊的是戴國輝教授。他現在慢慢的脫他的衣服、慢慢的走到我們的位子來了，好，今天爲什麼請戴國輝教授？主要是今天的節目與台灣史的詮釋有關。我不曉得各位對台灣史有沒有花過時間研讀？我自己從念大學、研究所時代甚至於到服役，我大概花過一些時間研讀台灣史，不敢說非常了解，但是這幾年台灣的變化實在很大，因爲本土化的關係，特別是解嚴之後整個台灣史都在重新翻案，在一個重新定調的過程。有更多的史料解嚴之後被公開，大家亦較敢於談論過去不敢談的史實，台灣史變成是在台灣史學研究的一個顯學，台灣史不只是在台灣是顯學，連在中國大陸也是顯學。在台灣了解台灣是必須的，這是說對台灣過去的了解，像我手上這個書名《台灣四百年史》。從這麼遠的地方開始去做了解是更好了，若不能，最少對台灣過去一百年的歷史，從一八九五年後這個日本據臺之後的歷史，也需要了解。了解台灣史演變的過程，（對於台灣這麼複雜的移民社會所產生的政治面相及其造成的有關心理變化，是與文化、認同態度的影響有關）是非常有必要。過去我們的史學是偏向所謂的大中國史，台灣本身的歷史在過去的史學教育或歷史課本裡面都只



佔非常小的篇幅。當然，我們這兩天會去特別注意有關台灣史的問題，是因為日本的一位漫畫家叫「小林」的，他畫了一本《台灣論》，用漫畫的方式去表現他對台灣的一些觀點。除了表現對台灣的觀點之外，會引起廣泛討論是因為裡面還有對於李登輝政治角色的詮釋。即對李登輝給日本的殖民統治有相當高度的肯定，認為這是所謂的「良心統治」。甚至於提到說如果沒有日本的統治，台灣還是「海南島的水準」等等說法。這些說法會讓大家覺得有一點混淆，到底個人情感是一回事，但是以這樣子的一個國家元首的身分適不適合做這樣的談話，的確引起非常廣泛的爭議與討論。我們今天請到了文化大學史學所的教授也是東京大學的農學博士，日本立教大學的名譽教授，對台灣史非常熟悉的戴國輝教授來談這個問題。

戴國輝：大家好。

唐湘龍：戴老師因為講話比較慢一點，所以我盡量把多一點的時間留給戴老師，戴老師您這兩天爲了《台灣論》這件事情好像收集了非常多的資料？

戴國輝：本來昨天不是唐先生要我來嗎？

唐湘龍：對。

戴國輝：正巧我的兒子今天剛好來到台灣。

唐湘龍：他是從日本回來？

戴國輝：是的，他給了我一本最新一期訪問小林善紀的日本雜誌。也就是說《台灣論》出版了以後，小林在這個日本雜誌做了一個專訪。可以提供大家作參考。

唐湘龍：啊哈我現在手上拿了小林畫的這本《台灣論》。就封面印刷來看不像是一般的漫畫，畫的好像我們的布袋戲——雲州大儒俠。《台灣論》這三個字也非常清楚。我不曉得戴教授您看完這一本書了嗎？

戴國輝：當然。

唐湘龍：您看完之後的觀感如何？這兩天媒體有很多批評聲音，當然也有一些比較同情的聲音，認為應該同情這些受過日本統治的老一輩的情感的問題，您覺得這本書裡面所詮釋的台灣史觀，不管是透過李登輝的眼睛或是小林主觀的詮釋，到底反映了什麼？

戴國輝：我覺得這本書最重要的就是小林這個漫畫家，在日本書市的發展已經是到了高峰狀態的時候，可能想另外找一個新的刺激，恰好碰上有一批在東京的，主要是傾向台獨論的一些朋友，請他進來台灣，他沒有想到來台還碰到那麼多的親日派，統統幫他用日文講解，加上還請客大大歡迎他，其實小林過去對台灣沒有什麼太多的認知，與其說這個《台灣論》是小林的見解，不如說是那些台獨朋友自己沒有辦法表達出來卻透過小林把它表達出來的見解。

唐湘龍：所以，等於說小林的筆借給他們用了。

戴國輝：可以這樣說。

唐湘龍：是的，透過小林的筆，在漫畫上表達了某些不管是台灣內部親日派人士，或在日本的一些台籍，但比較有獨派傾向的人士的台灣史觀點。但這個觀點，特別是他們對台灣的殖民歷史統治功績的定調，當然跟我們傳統的史學的看法是有些差距的，戴教授您以研究台灣史的立場，如何去看待這一份？

戴國輝：我當然不同意小林的看法。小林自己也承認，他是屬於右翼的，也拚命想要把戰後美國帶給日本人的民主主義給顛覆。其背景是蘇聯垮掉了，現在日本對美國的需求，不像過去那麼大，但小林等人卻持不同的想法，另外就是說過去大家對中共、中國大陸都不是認識的很清楚，但是中國大陸自從鄧小平重新掌權以後，呈現了另一種局面，所以一些日本人對中共有些懼怕。這整個局面裡頭又碰上日本本身泡沫經濟，已經找不到出口了。……

唐湘龍：所以日本政府作了好幾波所謂的刺激性的動作，但到現在為止好像仍然沒有什麼太大的起色。

戴國輝：我們都知道自民黨一黨獨大也垮掉了，就是我在日本四十一年，要能夠把田中角榮以後的首相名字一個個講出來也不太容易……意思就是說……

唐湘龍：（哈哈）變化太快。

戴國輝：日本變化太快，年輕人又覺得沒有方向感。所以漫畫這個東西就容易討好，漫畫這東西也並不是絕對的不好，但是就是說漫畫有漫畫的生命力，所以現在日本的漫畫等於是一個消遣品的層次。

這些層次不高的漫畫是看了就丟的一種消耗品，但在年輕人這個情況之下，小林得到某些的社會肯定，成爲一個社會的 AUTHORITY，也就是說權威。

唐湘龍：也就是說日本年輕人透過漫畫在進行挑戰跟顛覆的動作！

（中間插入廣告）

唐湘龍：我現在手上拿的是最近這幾天被討論非常多的也就是日本漫畫家，小林善紀所畫的《台灣論》，它整個的編排像一本書一樣。《台灣論》三個字還是燙金處理，整個的印刷非常的精美，雖然裡面是漫畫的形式，但是跟一般漫畫不同，它還加上了很多包括導讀的部分，而且它還有廣告，像台南擔仔麵的廣告，基本上有一點兼做台灣旅遊書 GUIDE BOOK 的味道。書上畫的陳水扁，畫的有一點點微胖，書裡的史觀是，包括剛剛戴國輝教授提到的，是受到很多在台親日人士，以及目前在日本居留，但是獨派傾向比較明顯的這些所謂台籍人士的影響。這些史觀不能算是小林的史觀，小林本身在日本算是一個「非常右翼」的人士，但右翼的這些聲音，過去幾年在台灣島內都得到相當不錯的呼應，很多右翼人士都主動到台灣來，好像在台灣才能找到他們的精神，我一直很好奇，想藉這個機會請教戴教授，爲什麼李登輝現在在日本會這麼紅？

戴國輝：我不認爲他在日本紅啊。

唐湘龍：真的！喔，那是我們誤會了！

戴國輝：就是說我們只看到小林漫畫的那些報導。那你說像《台灣的主張》，這些書有那些人給它寫過書評推薦？

唐湘龍：以您對日本的研究，您並沒有看到這些較嚴肅的評論是嗎？

戴國輝：是啊。但是你看像李光耀，他自己寫的自傳，包括我們台灣都有人爲它推薦。最近李登輝不是接受拓殖大學的名譽教授嗎？

唐湘龍：對。

戴國輝：我最近就碰到一個朋友，他也認得李先生，對日本的情況也很熟悉，我們是不大方便說拓殖大學是怎麼的一個大學，但是我們認爲李先生是第一位台籍人士當上中華民國的總統，我想不論他的國王人馬也好，能夠幫他忙的人也好，應該選更有代表性的大學，給他一個名譽的博士學位。

唐湘龍：所以您認爲拓殖大學本身的代表性是不夠的？

戴國輝：不是說不夠，而是說那個大學拿了以後，別的大學不容易給，是不是？因爲他要考慮，那個大學可以說是跟台灣從後藤新平以來都有關係沒有錯，但是一般來講是屬於右翼的。

唐湘龍：右翼的大學？

戴國輝：拓殖的理事長、校長是滿專權的，不像日本一流的私立大學，都是透過教授治校，經過投票或怎麼樣，那麼假若有一天更有名望的，更有代表性的大學，要給李先生名譽博士的時候……

唐湘龍：可能就有一些顧慮!?

戴國輝：不應該先拿這個。

唐湘龍：反而被貼了標籤了，會不好的！

戴國輝：對，對，所以這一點我覺的爲什麼「國王的人馬」，連這一點都沒有給他更好的建議。

唐湘龍：可能最近「國王的人馬」都不太用功，沒有注意到這一方面的事。

戴國輝：我是不敢講啦。最近 SAPIO 這本雜誌……

唐湘龍：您手上這本雜誌裡面就是提到小林對於李登輝專訪的那篇文章。

戴國輝：對。

唐湘龍：我剛看了一下這份雜誌，這當然是我第一次看到小林善紀的照片，其實他滿帥的。

戴國輝：我們沒有見過面，但是他是漫畫家，他對既成秩序的挑戰，會得到年輕人擁護沒錯。

唐湘龍：日本年輕人的反叛其實是對日本整個戰後秩序所建構起來的那一套價值觀的反叛！

戴國輝：開始的時候大概不至於那樣。越走越變成這個樣子。這個是對既存的文壇啦，或是對既

存權威的挑戰，但若論漫畫家，日本一流的漫畫家，他算是老幾？

唐湘龍：那我們看了這篇報導之後，裡面有許多李登輝的談話，其實滿有爭議性的，譬如說他對這本《台灣論》好像評價很高，甚至於說看了這本《台灣論》之後，其他的台灣史好像也不用看了。好像惟我獨尊的感覺，但是如果這樣子的話，您也看過《台灣論》這本漫畫，您本身也研究台灣史這麼長的時間，您會看出《台灣論》這本書真的有這麼高的代表性嗎？就是說李登輝本身的史觀有沒有任何的

問題，您怎麼樣看它的詮釋？

戴國輝：我只能說李先生主政的十二年，常要跟非主流鬥爭，然後他又很愛講話，所以太忙，根本沒有時間看書，才會講那種話。你看這個專訪裡頭，他明講「他有電腦，但是他不要上網」就是不要用 INTERNET，為什麼？因為他有行動電話，人跟人之間的交流，應該由肉身來交流。台灣人不知道李登輝這些，台灣能夠看這個雜誌、懂日文的人，我想不會太多，也沒人注意到專訪說什麼。

唐湘龍：我想非常少的。在台灣也買不到。

唐湘龍：李登輝跟達賴喇嘛很熟？……

戴國輝：是好朋友，他是喜歡這樣講，他在他的《台灣的主張》裡面也說他跟微軟的 BILL GATES 很熟。

唐湘龍：好朋友！

戴國輝：這個未免太簡單化了。

唐湘龍：也滿膨脹他跟某些人的關係。

戴國輝：我們假如不要太認真的話，他對小林說的溢美之詞，講台灣史的所有問題都在這漫畫裡頭，其他書就不用看了，不要當做一個真話來看也無所謂。

唐湘龍：就把這些話當客套話來看。

戴國輝：是不是？

唐湘龍：不要太認真對待。

戴國輝：對。但是他本來是一個學者，學者從政，然後我們老百姓支持了他十二年，他現在好像目中沒有一個真正……

唐湘龍：再打斷一下，我們稍後回到現場。

（廣告）

唐湘龍：節目時間的最後一段，在現場的是文化大學史學所，也是研究台灣史非常知名的戴國輝戴教授，戴教授今天帶來《台灣論》的日本原版，以及小林訪問李登輝的這一篇專訪的原版雜誌，剛剛跟戴教授談了一些，他似乎對於不管《台灣論》本身也好，或專訪本身的一些內容也好，似乎都有一些批評。最後七分鐘我想跟戴教授聊一下，就是說因為李登輝在不管是《台灣論》這一本書也好或那篇專訪裡面，我們都可以感覺到李登輝他似乎對於日本的殖民政策有相當程度的肯定，我覺得就是說以您研究台灣史的立場來看，您不同意他的一些公開講法：包括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是一個所謂的「良心統治」，對台灣殖民的成功，才讓台灣今天有一個比較進步的風貌等等，您的看法如何？

戴國輝：我想這是對過去社會的完全誤解。我們都知道李光耀受英國的菁英教育，但是李光耀在新加坡奮鬥的時候，他又反殖民、又反帝，但是他沒有反英國，這是兩碼事。但是李先生現在已變成什麼反帝、反日本帝國主義也沒有了，這個就是失去了自己的立場。

唐湘龍：作爲一個國家領導人的立場。

戴國輝：但是我認爲他是自我迷失，那麼李光耀他批判反殖民、反帝，對他的國際聲望，有沒有影響？

唐湘龍：沒有影響。

戴國輝：沒有影響。然後對他英國的關係也沒有影響。爲什麼李先生硬要全面肯定日本統治了我們五十年才能夠親日呢？他沒有聽過日本一流的學者的發言，那些人曾經跟我講，你們的總統是「可愛的總統」什麼都用日本話告訴我們，但是不是我們可敬的總統。

唐湘龍：是可愛，但並不是可敬的。

戴國輝：是。這句話給我很大的衝擊，但是他接班的時候，我想，包括外省朋友也好，大家都期待他，期待他什麼呢？他可以反殖民、反日帝、反國民黨的封建體制，同時也要揚棄克服我們台灣內部的這個落後的部分，但是現在看樣子，他應該反的沒有反，就是說國民黨過去跟日本的關係，主要是爲了保住政權，所以主要是作情治機構的情報交流，爲了反共匪，反中共，但是老總統也好，經國先生也好，對日本還是保持一個距離，現在李先生以爲他可以因爲是學者總統、是民主總統，而自負，人家誇獎他是民主總統，這個時候他仍然走上了親日本右翼，然後把日本的殖民地統治，應該批判的部分不講一句，這種情形他究竟要跟美國的走上民主、走上人權的部分怎麼掛鉤？我就不曉得。

唐湘龍：其實落差是非常大的。

戴國輝：是。非常大。

唐湘龍：我之所以會問戴教授這個問題，其實是我在研讀台灣史的過程中，我剛開始接觸當然也是解嚴之後啦，那時候剛好我在大學念書，您的一些著作是我們非常重要的閱讀材料，當初我讀的時候，您的作品給我一種感覺，就是您對李登輝其實有相當程度的同情與支持，但是在最近我看過您的一些公開的談話或著作裡面，似乎對李登輝批判性的味道增加了很多，我想要特別問您，是不是您對他原來有一些期望但後來失望了……

戴國輝：不是，這個問題我相信外界對我有這種看法是應該的。但是另一個方面我的意思就是說，應該批判的時間到了，我不希望我們第二次選出來的陳水扁總統，假如他也跟李先生這樣走下去的話，這個越走越窄，李先生已經走得滿窄，本來他可以走得更廣、更健康的，但是他自己搞壞了，今天或許沒有太多時間來分析，但是這樣的做法他還認為這個要傳給陳水扁，所以李登輝這次的專訪裡也說，這一個七、八年中共裡面一定會變化。

唐湘龍：對，他有提到這部分。

戴國輝：這個有問題的，我們最重要的要能夠忍耐的住。李登輝講了多少次這個，意思就是說他八十歲的人，不在其位，要繼續教訓人家，以為陳水扁一定要聽他的，不然會犯錯。那麼這一種情形出現的話可能會給我們台灣帶來很大的災害。……

唐湘龍：因為時間關係，我們可能下次再找時間再繼續跟大家聊，我們今天到這個地方，也謝謝戴

教授。 Bye-Bye 。

——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飛碟電台 News 98 〈下班一條龍〉專訪

戴國輝沈默了一年（後記）

林彩美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戴國輝對晚年生活情景的嚮往。所以結廬於新店山上，為的是要在安靜、時間充裕的境地來好好思考與著述自殖民時代迄二〇〇〇年的台灣史，做為他的終生課題。

晚年生活思考著述台灣史

他在心裡早就做好準備於一九九六年就職立教大學屆滿二十年，可以領到年金做為生活保障安然渡晚年時辭職。他在日本居留四十二載，雖然基礎都打好在日本，但他研究的主題之一為台灣近現代史，台灣才是他無時無刻都放在心上的。他要在精力充沛的時候毅然宣布歸鄉，把剩餘的人生獻給台灣，為台灣做些事，就近寫台灣。還有他費了四十多年收集滿屋的（據他的估計為六萬冊）資料與藏書也是他要搬回台灣的原因之一。這些書與資料雖然可是他勤筆耕、頻演講、多講學與省吃節用所換來的純屬私人的寶貝。但他一貫的作風是不死藏，學生、同學、研究團隊（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的同仁，誰都可來借用。有

時他甚至把鑰匙交給人去自由使用。他律己甚嚴，認為學者要具備學識、學德與學養，後來他自己也領悟到他的想法太天真也太理想，因為在日本與台灣都有學者借書甚至整套的書而賴著不還的事情發生，那暗中摸魚的就不可得知了。在日本偷花的小偷是見容的，不知偷書或賴著不還的又怎樣？他不只吝借書給人家，他也提供很多孤本與珍本，給剛創業的學弟或學生去復刻，方便學者做研究也幫他們把出版事業基礎打好，而他只拿回幾套送朋友而已。後來這些出版社也出版他主持的學術研究團隊的學術刊物。他在日本與台灣都非常用心和出版社與媒體建立良好的關係。他不但提供給學生和研究同仁研究資料，甚至連點子都給，還介紹出版社給他們，受益者應該不少。他自許自己「不為名、不為利，只為台灣人立足於中華民族之林，以及中華民族立足於世界人類之林，志在學術，志在立言著書，能耐住孤獨、艱苦身在扶桑獻身工作。」（抄自一九八九年戴國輝小記事本）

「遠離政治」是一般台灣人的生活智慧，也是他的信條，從一九五〇年他刻意避考台大，去念省立台中農學院，到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負笈扶桑，總算成功地避開了政治。然而卻因六十年組織東大中國同學會，當了第一屆、第二屆總幹事與舉辦讀書會，被人打小報告，不見容於駐日大使館，被列入黑名單，隨後我與戴先後被吊銷護照。大概因會則聲明，廣泛容納在東大擁有學籍的中國人學生與研究員為會員；政治中立，堅拒政治性金援為默契之故。中國同學會總算延續下去，但到了一九八〇年四月出版的二十一期會報赫然變色，會名也被竄改成東大台灣同學會。創會先輩的苦心、理念被抱狹窄意識形態的一群人蹂躪無遺。

一心愛台在日曾組東寧會

東大農經的東畑精一老師退休去主持亞細亞經濟研究所，一九六六年戴取得東大農學博士、被延攬進入亞經研所當研究員。六七年亞經研所出版戴的博士論文《中國甘蔗糖業之展開》一書，使得戴在日本學術界享有一點小名氣，他「打鐵趁熱」勤寫稿、上報或發表在雜誌上、應邀演講、座談會甚至上電視。這些收入加上每月薪水他就更放手收集資料與買書。六九年東大研究所的三個學生若林正文、松永正義、宇野利玄慕名而來，請戴主持研究會仰求他指導。他先婉拒，但拗不過他們的熱心懇求，又目睹日本歷史學界對台灣史的冷漠，終於在七〇年夏組織東寧會（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的前身）會員三十多位，有教授、醫師、經濟學者、學生等，有美國人、澳大利亞人、日本人與中國人參與。不設會長，沒有會則而只有三個默契，一不要期待、二不要受「正統」與既存框架的束縛，三不要把「政治」帶進研究會。每月定期開一次會，出版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會報發給會員。到了七八年就開始出版會刊《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每年一冊，主要刊登年輕會員的研究成果。團隊的學術性大著《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就是在社會思想社於一九八一年六月三十日初版第一刷發行而獲得學界的關注與好評。戴被出版社與研究同仁推舉為編著者。因此書揭發日本在三〇年霧社起義時，日本當局對付山地同胞，以正規軍和近代武器與毒氣，使之死傷慘烈的史實，也是日本學者不願碰觸的禁忌。戴義不容辭具名為編著者，

果然受極右份子的書信與電話恐嚇。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因年輕會員已成長各有所就，例會出席率降低，創會時的默契與理念起了分歧，所以出版第六期會刊的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日決定散會。

戴國輝不因受恐嚇而畏懼，更感到要建立良好的中、台、日關係，歷史不能遮遮掩掩，應攤出來檢點，加害方應道歉、賠償，就該道歉、賠償。被害方應記取歷史教訓，可恕但不可忘，才不致重蹈歷史悲劇。所以戴主張我們應知日，不能媚日，也不是抗日與反日，方能與鄰邦建立和平的芳鄰關係。

受李招攬感受「伴君如伴虎」

戴搬回台灣之前已得到文化大學聘為專任教授的默許。卻恰逢第一次民選總統李登輝高票當選的政治熱情。李要戴當國安會諮詢委員，幫他研究日本，又說這個職位很閒可看書，戴考慮再三，李登輝是他的研究對象，借此又可獲得十足的臨場感來撰寫台灣史，又不與權力有牽扯。戴、李關係早在李未出道的六、七〇年代就有，然後就是八七年李登輝當副總統，戴回國在南園（聯合報）開會（八月二十二、二十三日）時，蘇志誠打電話說李登輝希望戴去談話，約好二十七日四點戴由二號門進去晉見，兩人暢談了一個多鐘頭，李登輝要戴每次回國務必與他聯絡，基於這種交情，戴不好推辭，就當起這一年一聘、全無保障虛有其名的職位。當初如聽李言提早退休回來，沒有立教大學的年金，那真不堪設想。戴於一九九〇年八月的小記事本欄裡就已記下「伴君如伴虎，喜怒莫測」的警句，為何又接受李之招攬，莫非

是魔鬼撒旦的耳語使他迷魂？不！戴是清醒的，他只是愛台灣，想盡一臂之力幫李把台灣帶向富饒之地「迦南」。唉！這一年的演變，似乎我們的摩西已自墮為奴隸（媚日的前輩），也只有等他們的凋萎，我們且把期待寄託約瑟亞吧！

我受不了李登輝血口噴人、無情無義的用人哲學。我也要對出席李敖電視節目的尹教授說話，虧得您是學歷史之人，您說戴國輝不是不申請歸化日本，而是申請也不會獲准，還拿金美齡這種人來並提。試問您經過查證嗎？沒經過調查信口開河，對戴國輝傷害何其大？我相信您不存惡意，您們之間曾經是「老戴」、「老尹」之關係啊！

戴國輝已沈默一年，只好由我代為申辯，儘管他生平不愛申辯，常以「彼亦人子」來恕人，但希望不要再以「無稽之談」來傷害他。

——原載九十一年一月八日《中國時報》

附錄

戴國煇生平略傳

夏珍

他有一室藏書，台灣名作家吳濁流老先生驚嘆讚譽為「蓬萊第一峰」，他卻不是駐足流連書庫的腐儒，而是行萬里路，識天下人的現代知識份子，為文著述，除了靜態的史料匯集，還經常性地遠赴各地考察，盡最大可能訪查事件當事人。

他潛心學術，遠離政治塵囂，拒絕政治爭端，他卻絕不拘泥於象牙塔，從不稍減於對現實政治的關注和研析。在威權的歲月，他敢於熱心主持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長期推廣日本崇正公會（日本客籍同鄉會）活動，創辦並主持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一九七〇～八七）。

他是農經博士，卻皓首窮經於台灣史，卓然成一家言，他強調出生尊嚴不可拋棄，卻絕不以排斥他人做為主體認同的依據，強調從個體認同到民族認同，因此，他昂然自許為「出生於台灣的客家系中國人」。即使長期旅居日本，仍堅持持用中華民國護照，對日本殖民政權批判不遺餘力。

他，就是戴國煇教授。一位執著於學術尊嚴，立論堅拒政治干擾的讀書人。因為甘於學術自主的寂寞，因為無視左、中、右派的譏評或壓力，即使三面不討好，亦絕不從流俗為轉移的執著，成就台灣知

識份子的典型。

戴國輝教授，生於一九三一年，桃園平鎮。一九五五年赴日留學。一九六六年以《中國甘蔗糖業之展開》，獲得東京大學農學博士。一九七六年任教於日本立教大學，歷任史學系教授、系主任、研究所所長、國際中心主任，並在學習院大學及一橋大學兼任教授，是第一位在日本皇族學院任教的中國人。旅居日本四十年，於一九九六年返台定居，任職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日辭卸，專任文化大學歷史所教授。

台灣光復初期，戴教授正就讀於新竹中學初二，國府接收台灣，他亦手持國旗，身處夾道歡迎的群眾之中；隔年轉學到建國中學，目睹二·二八事件，對軍警格殺請願民眾之舉痛心，亦對非理性民眾殘酷魯莽的暴行騷亂，深不以為然。歷經光復、二·二八、乃至白色恐怖，長達十年政治翻騰的歲月，戴教授毅然決定遠離是非島，於中興大學農學院畢業後，即赴日專研農業經濟，同時間，展開對二·二八史料的搜集，追尋真相，撫平歷史創傷，從而將悲劇的負面經驗，轉化為正面的歷史鑑識。

一九八三年起，戴教授即以「梅村仁」之筆名，在美國發行的《台灣與世界》連載「二·二八史料舉隅」，此為日後出版《愛·憎二·二八》之濫觴。從非國府、非中共、非台獨的第四個公正立場，給予二·二八正確的歷史評價。

從二·二八出發，一路追尋到白色恐怖，戴教授遂對政治陰影下滋生的認同危機，有揮之不去的沈重感懷，並為文書下《境界（邊緣）人的獨白》，自嘆為「在境界上徘徊的人」，而此境界並不以國界

為限，而是在文化、精神境界上的徘徊。

不同於部份迷惘於認同困境的菁英或一般民眾，情緒性地以歷史斷層建構虛妄的國族圖像，戴教授從歷史流程上溯日帝殖民，同為台灣認同危機的「共犯結構」。自春帆樓一紙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後，意味台灣和大陸同時形成近代國家的過程，同時被割斷，被棄情結糾雜著歷史脈絡，形成台灣住民錯綜複雜的心態。

國民黨政權遷台後，台籍中產階級和知識份子，一方面具有疏離感，一方面又缺乏足夠時間和當權者建立「共識」，在歷史進程中，頓失定位，其「台灣結」逐漸向深層累積。由歷史脈絡廓清，戴教授遂著述《台灣結與中國結》，在體諒中更期許台灣社會能從衝突矛盾中反思，重新建構自我同定的社會需求，把健康的「台灣結」（台灣意識），與新格局、健全的、具有說服力的「中國結」（中國意識）連結在一起，動員一切活動開創新局。

戴教授關注的研究主題，除開上述二·二八事件真相探討，探索「自我認同困擾」，第三個軸心即「漢族系的台灣人如何看待原住民」的問題。戴教授不諱言，「這是對原住民懷有原罪感」。從七〇年代初，在東京組織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開始，即著手霧社事件，花了整整十年時間，編撰《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附帶搜集高砂義勇隊的相關資料，他的研究受到日本史學界的重視，甚而因此遭到日本右翼激進派的恐嚇，認為他揭穿當年日本殖民台灣的黑暗面。

戴教授卻從不改其職志，身處日本，對日本殖民政權予以嚴厲批判。他認為「在歷史規律中，殖民

體制絕不會帶給被殖民者家園任何好處，即使或多或少存在著善意，但卻也是在殖民體制中，充當加害者的角色，或被架構成一種點綴的小配角。」對中國人而言，寬恕不能等同於遺忘。更不能等同於把一切史實付諸東流，一筆勾銷。

縱觀戴教授一生著述，不屈從權勢，無畏壓力，不媚於時俗。人在日本，不附和殖民政權美言；同情台獨論者，卻不贊同狹隘的台灣民族論，更不苟同台獨建國主張；對國民政府遷台初期政治高壓手腕，絕不吝於批判。既不偷安於異國，亦不識時務而敢犯忌，真正做到「不覓封侯但覓詩（史）」的知識份子襟懷。

戴教授一生，有美眷林彩美女士相伴，結褵四十七載，育二子一女，興宇、興寧、興夏，取其宇宙、台灣、中原華夏之意，與戴教授畢生職志相貫穿，均學業、事業有成，人生完滿，可以無憾。唯生前仍掛念總結殖民時代、兩蔣統治時代、李登輝時代的四部台灣史巨著，未竟全功，僅完成《台灣史探微——現實與史實的相互往還》、《台灣近百年史的曲折路——寧靜革命的來龍去脈》兩冊，黯然辭世，事無全美，令人唏噓。

林彩美女士猶記初識戴教授，一對精亮的雙眸，宛若黑夜明星。戴教授清明澄澈的學術胸懷，磊落無私的論學態度，在統獨糾葛的台灣學政界中，亦不愧為一顆明星，為正道治史立下典範。明星已墜，典範長存。

戴國煇事記

西元	歲	個人事記及社會動態
1931	1	4月15日出生於桃園縣平鎮鄉北勢村（與張光直博士同年同月同日生）。 8月5日蔣渭水卒。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發生。
1932	2	3月偽滿州國成立。5月26日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決向總督及日拓務省要求台灣全面實施自治制度。
1933	3	6月14日日拓務省否決台灣地方自治案。7月27日台灣自治聯盟要求施行民選之地方自治。8月18日日本當局議採收台鮮米移出日本本土加稅制度。11月1日訂立「全台同胞集團移住十年計畫」。米穀統制令實施於日本全國，台、鮮、樺太實施公定價格，台灣損失尤大。
1934	4	9月日政府召林獻堂等三十餘人論決停止籲請設置台灣議會運動。
1935	5	10月10日台北舉行「台灣施政四十週年紀念博覽會」。
1936	6	4月16日全台人口共五、二一一、四六二人。6月23日日政府獎勵來台移民，將人口過剩負擔嫁責殖民地。沙山成立「秋津」移民村。12月12日西安事變。
1937	7	7月7日中日戰爭爆發。9月25日強召台灣青年充大陸戰地軍伕。
1938	8	入學宋屋公學校一年級。 5月28日、6月1日各地次第成立日本移民村。

1946	1945	1944	1943	1942	1941	1940	1939
16	15	14	13	12	11	10	9
<p>日中等學校禁止使用日語。</p> <p>1月25日開始公民登記。7月15日台灣人口六、三三六、三二九人。8月27日光復致敬團林獻堂等飛上海。9月14</p> <p>省立新竹中學初中部三年級。</p>	<p>省民姓名回復辦法。12月29日物價上漲高達光復當初數十倍。</p> <p>10月25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正式成立，陳儀擔任首任行政長官。12月9日公佈台灣</p> <p>日皇下詔投降，台灣歸還中國，大戰結束。8月16日辜振甫、許丙、林熊祥等參與日本軍參謀台灣獨立計劃。8月</p> <p>台籍官吏待遇與日籍官吏平等。4月3日林獻堂、簡朗山、許丙三人為救選日貴族院之議員。8月15日收音機廣播</p> <p>1月22日盟機五〇〇餘架空襲沖繩島及台灣。3月3日全台中學生編成「防衛警備隊」防美軍登陸。4月1日改善</p> <p>州立新竹中學二年級。</p>	<p>入州立新竹中學。</p> <p>8月20日台灣全島入於戰場狀態，實施台籍民徵兵制度。10月台遭轟炸死傷慘重。</p>	<p>「。12月1日強抽學生兵入伍補「學徒出陣」。</p> <p>4月3日皇民奉公會設「台灣青年少年團」。11月30日強召台、鮮留日學生赴前線，於東京日比谷舉行「壯行大會</p>	<p>4月實施台灣特別志願制度（強迫台民參軍）。</p>	<p>10月11日東條英機組新內閣。10月21日變更移民政策轉向南方移民。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p>	<p>日本推行皇紀二、六〇〇年，台灣開始有人改姓名。11月25日日政府發表台籍民改日姓名促進要綱。</p>	<p>5月19日小林總督對記者說治台重點為皇民化、工業化與南進三政策。</p>

1954	1953	1952	1951	1950	1949	1948	1947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p>8月15日立法院通過都市平均地權實施條例。</p> <p>省立台中農學院農經系畢業去鳳山受預官二期訓練後轉台中復興崗砲兵學校，又與張光直同學半年。</p>	<p>訪台。4月24日公佈耕者有其田條例台灣省實施細則。6月3日台灣省第一期補充兵開始訓練。11月8日美副總統尼克森訪台。11月27日韓國總統李承晚訪台。</p>	<p>1月7日台共省委員及幹部發表脫黨宣言。3月8日中日和約全文發表。10月31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正式成立。</p>	<p>29日保安司令部發表「共產黨組織檢舉肅正概況」。</p> <p>1月7日第一回縣市長選舉。7月24日台灣省養女保護運動委員會成立。7月25日省政府公佈第一期徵兵令。11月</p>	<p>建中高中部畢業，迴避台北是非，南下考省立台中農學院農經系。</p> <p>4月30日日本省戶口總檢查零時起實施。5月舟山撤退。5月23日二·二八事件審理終結。6月13日公佈「戡亂時期匪諜檢舉條例」。6月18日原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以謀叛罪被槍殺。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6月27日美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蔣介石在台灣宣佈「復行視事」。</p>	<p>日警備總司令部發佈全省戒嚴令。12月7日中央政府移轉台灣，大陸失守。</p> <p>2月4日公布實施「三七五」減租。4月6日台大、師院「四六」學生運動發生。4月26日各地物價暴漲。5月20</p>	<p>當建中高中部二年級B班班代表。高三的張光直當學生自治會長，戴當康樂股長。</p> <p>10月25日台灣省博覽會開幕。12月12日台灣銀行發行一萬元券。</p>	<p>1月9日參加台北學生聲援北京學生「沈崇事件」遊行。2月插班建中初中部三年級。9月建中高中部一年級。（日本學制為4月開學，中國學制為9月開學）</p> <p>2月27日菸酒公賣局取締私菸，引起台北騷動。2月28日發佈台北區臨時戒嚴令。3月2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立。3月10日下令解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5月5日長官公署撤廢。</p>

1961	1960	1959	1958	1957	1956	1955
31	30	29	28	27	26	25
<p>外長聲明反對兩個中國。11月1日台灣省立中興大學創立（集合原省立台中農學院、法商學院、行政專科學校）。</p> <p>3月民營的《公論報》（社長李萬居）的經營權落入張祥傳（國民黨員，台北市議會議長）之手。6月30日沈昌煥</p> <p>農業的發展現況與展望」。</p> <p>5月當選第二屆東大中國同學會總幹事。7月1日以總幹事身分邀李登輝在該會之農學部分會演講，講題為「台灣</p>	<p>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高等軍事法庭處判雷震十年有期徒刑褫奪公權七年。</p> <p>3月11日國民大會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修正案」（總統兩任次數改為無限制）。4月1日王育德創辦「台灣青年」，王以此展開台灣獨立運動。4月26日東西橫貫公路完成。9月4日《自由中國》社長雷震被捕。10月8</p> <p>5月東大中國同學會成立當選第一屆總幹事。創辦會誌《暖流》。</p>	<p>達十八萬人以上。8月25日中印國界第一次武力衝突發生。11月實施「大陸來台國民調查」（外省人調查）。</p>	<p>4月考入東大農經系博士班一年級。</p> <p>5月15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正式成立。8月7日台灣海峽情勢緊張，全省進入備戰狀態。8月23日八二三砲戰。</p>	<p>6月11日美第七戰鬥轟炸中隊從日本移駐台灣。10月31日楊振寧、李政道獲諾貝爾物理獎。</p>	<p>4月考入東京大學農經系碩士班一年級。</p> <p>4月9日省府通令實施都市平均地權。4月10日議決「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組織條例」。5月1日省省戶口普查處成立。</p> <p>12月1日省政府遷往台中辦公。</p>	<p>考取教育部舉辦留學考試11月23日赴日留學。</p> <p>1月14日立法院通過中美共同防禦條約。2月10日大陳島住民一四、四八三人全部撤退台灣。</p>

1966	1965	1964	1963	1962
36	35	34	33	32
<p>3月以《中國甘蔗糖業的展開》獲東京大學農學博士學位。4月獲聘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囑託（顧問）。</p> <p>3月中共文化大革命開始。3月21日蔣介石連任第四屆總統。</p>	<p>1月31日亞細亞文化會館華僑會。4月14日學士會館會徐慶鐘。4月23日請教留學生問題去見穗積五一先生。7月3日《暖流》（東大中國同學會會誌）的編輯會議。8月3日於「東南商事」會林以德夫人，為購屋與之商洽。8月31日二男興寧出生。9月11日朝鮮問題研究會訪問金氏。</p> <p>5月14日在日從事台灣獨立運動的廖文毅歸台。6月8日蔣介石接見廖文毅。7月1日美對台經濟援助自本日停止。10月29日孫科回台參加國父誕生百年祭。11月12日慶祝孫文百年祭行特赦，魏廷朝減刑為四年，謝聰明減刑為五年，彭明敏隨即釋放。12月4日任命廖文毅為曾文水庫建設委員會副主委。</p>	<p>二哥戴國堯東京過世享年四十四歲。</p> <p>1月11日以暫時停止對日本製品的政府採購做為對日報復措置，市民衝入日本大使館。1月20日停止放映日本電影。</p> <p>3月6日國府聲明台灣是中國的一省。6月4日石門水庫完工。8月28日全省二六七所小學供應20萬學童營養午餐。9月20日印行〈台灣自救宣言〉，台大教授彭明敏，學生謝聰明、魏廷朝以叛亂罪嫌被捕。</p>	<p>3月18日參加四川飯店徐慶鐘宴會。徐啣命來疏導留學生並延攬人材回台。4月8日會柯王岳（味全董事長黃烈火經柯給戴獎學金）。5月11日於亞細亞文化會館訪穗積五一。6月4日東大中國同學會迎新會於東大山上會議所3號室，會費二五〇円。6月13日二兄手術。7月20日於東京大飯店（新宿）丘念台歡迎會。丘啣命疏導台灣留學生。10月19日東大山上會議所以尾崎秀樹為中心的聚會。</p> <p>6月2日第三屆省議會成立（議長謝東閔，副議長許金德）。9月1日花蓮港開放為第三國際港。9月28日高雄縣長余登發被停職。10月4日中日友好協會成立（會長廖承志）。</p>	<p>5月26日長男興宇誕生。</p> <p>2月24日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逝世。10月10日台灣電視公司開播。11月22日中國政府發表對印度實施停戰。12月1日中國軍由中印國界自主撤退。12月26日簽訂中蒙國境條約。12月27日締結中巴國境協定。</p>

1971	1970	1969	1968	1967
41	40	39	38	37
<p>吳濁流旅日（4月17日～5月22日）為商榷自著在日本出版事宜與訪友，曾任敝舍。戴與同好者頻開東寧會（多在星期六下午，後發展為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與華人研究會，常受邀演講並在雜誌、報紙寫文章。2月17日演講於「東洋經濟」。3月10日於長期信用銀行5F講演「馬來半島的華僑與現地社會」。3月23日江丙坤來亞細亞經濟研究所。3月29日與黃烈火氏懇談。5月3日吳濁流歸京與竹內好老師相會。5月20日瀧川勉（亞細亞經濟研究所</p>	<p>1月31日去千葉、北習志野看正在施工的書庫與住宅現場。2月8日講「台灣民間信仰的特徵」於成城大學。3月5日去京大人文研究所。3月24日會陳逸松。晚間六點林以文會長（華僑總會與地球飯店會長）宴請於地球飯店。3月29日自川崎市生田搬家到千葉縣船橋市西習志野。4月5日論文〈台灣經濟の戦後展開と今後〉。5月16日東大中國同學會總會（一年一次）。11月27日竹內好老師慶祝會。2月16日夜間郵局開始營業。通過公教人員購宅補助辦法。4月23日國防部公佈「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11月8日第一座核電廠於石門破土興工。</p>	<p>8月帶領亞細亞經濟研究所的同仁擬赴東南亞做調查研究。受彭孟緝大使的懇請，出國十三年第一次回台訪問。9月22日與彭孟緝大使會見。10月28日華僑研究會。11月13日台灣研究會。11月1日中國電視公司正式開播。</p>	<p>2月8日京大人文研究所開會。2月9日去枚方市訪天野貞一老師。2月10日給陳德仁、陳舜臣二氏電話。7月10日國家安全會議通過戡亂時期指導綱領。9月1日全省九年國教開始實施，各國中開始註冊，國小學童畢業均免試入學。</p>	<p>2月26日上TBS放送。4月獲聘日本亞細亞經濟研究所調查研究部為該所第一位外國籍研究員。4月22日於東京農大，神谷老師演習（討論方式的課）。每月一次例會。9月17日二兄三週年忌於壽屋旅館。9月23日於東大山上會議所東大中國同學會。「國家安全局」成立。2月7日省府會議通過將田賦的三〇%劃歸鄉鎮財源，自7月1日實施。7月1日台北市升格為直轄市。</p>

1978	1977	1976	1975
48	47	46	45
<p>9月27日、10月13日與日本客屬崇正總會的鄉親一行，參加美國三藩市世界客屬第四次懇親大會（每二年舉行一次）並擔任日本崇正總會報紙《客家之聲》編輯（日文，創刊號是一九七八年四月一日）。</p> <p>3月21日蔣經國當選第六任總統、副總統為謝東閔。5月20日第六任總統、副總統在國父紀念館宣誓就職。南北高速公路全線通車。6月5日中共因華僑問題紛爭停止對越援助。12月16日總統發佈緊急處分令，軍事全面戒備，維持經濟穩定，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延期。</p>	<p>3月11日、4月2日約三星期的美國之旅。遊洛杉磯、聖地牙哥、史丹佛、迪斯奈、賭城、三藩市、夏威夷等地。訪問了許多移民、留學美國的華人朋友、看美國社會與大學諒必對華人研究有助益與心得。</p> <p>1月8日周恩來逝世。3月1日台灣省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成立。3月11日台灣省展開第一梯次全面實施平均地權規定地價工作。4月5日天安門事件。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毛澤東逝世。10月24日美駐台軍事人員將保持一千人左右的顧問團繼續工作。11月11日蔣經國指示省糧食局無限制收購稻穀，使農民安心耕作。11月19日中壢事件。</p>	<p>爲了孩子的教育以及自四月受聘爲立教大學文學部史學系教授方便上學與授課爲由，3月30日家搬至東京都杉並區宮前3-12-6。同時辭去亞細亞經濟研究所主任調查研究員之職。開始每月一次在白宅開沙龍，廣邀日本社會有學養有見識之士（如武見太郎日本醫師會會長、松本重治國際文化會館會長、小倉武一日本農政會長伉儷、謝國權名婦產科醫師神谷慶治恩師、名建築家郭茂林），共享時論與杯羹。參加後藤新平研究會、殖民史研究會，對華僑研究已有心得，常做相關演講，積極參與客屬崇正會活動。</p>	<p>日本文部大臣聘戴爲第一位外國籍諮問委員。參加其「文明懇談會」例會曾以「和魂和才」的獨創見解做報告並收進《歷史與文明的探求》（上）（東京·中央公論社一九七六·六·一〇發行）。</p> <p>4月5日蔣介石逝世。4月28日國民黨通過蔣經國任中央委員會主席與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8月15日第一座離子交換膜電透析法精鹽工廠通霄精鹽廠竣工生產典禮。12月16日行政院校定補助二十億加速農村建設。</p>

1981	1980	1979
51	50	49
<p>學習院大學兼課，一橋大學兼課。參與日中經濟協會會誌編輯會議（每月一次），東寧會每月例會。1月15日上日本電視。《立教》編輯會議的參與。李·約瑟研究会每月例會。1月17日～20日，2月1日～10日，鹿兒島大學集中講課。2月25日讀賣文化中心講「華僑の榮光と苦惱」。3月9日～3月11日研究所學生集中訓練。3月19日韓國商工會議所演講。4月1日～4月3日大學部學生集訓。5月18日在日本經濟新聞演講。7月3日立教教堂演講「アジアから見た日本」。8月1日國分寺演講。8月18日在國際文化會館開始與阪谷先生，訪談松本重治、岡崎嘉平太、伊藤武雄三老共同的回憶，編成「われらの生涯のなかの中國」一書。9月6日～9月8日學生集訓。9月28日朝日新聞社演講。10月22日ICU國際基督教大學演講。11月4日中央公論對談。11月18日日中經濟協會座談會。</p>	<p>每月第三星期五、五點半為李約瑟研究会。4月21日6點半與王拓相會。5月16日日本NHK電視拍「新日本日記」輯錄「華僑與日本社會」為題請上電視，NHK放映日期為5月20日與24日。7月6日第二屆國建會，戴以海外學者的身分參加。10月5日世界客屬第五次懇親大會在東京都品川的太平洋旅館大廳開幕，世界各地與會者超過千人，10月6日其會移至大阪舉行。朝日新聞於11日特別以大篇幅報導會後座談會全內容，並介紹華僑與客家。</p> <p>1月1日台、美相互防衛條約失效。2月29日中共第十一期中央委第五總會決定恢復劉少奇名譽，胡耀邦當選總書記。5月15日退出世界銀行。12月3日在北京開第一次中日部長級會議。12月14日胡耀邦總書記全面否定文革。</p>	<p>7月6日參加第一屆國建會。7月18日安排康寧祥與朝日資深記者吉田實見面於立教大學。8月18日～8月24日去新加坡。10月2日盧修一到立教研究室訪問，籌借博士論文資料。10月13日戴安排許信良在東大山上會議所向同鄉做報告。10月14日戴安排同鄉們宴請許信良並替許募款。12月8日本年最後一次沙龍兼忘年會，郭茂林先生光臨敝舍。12月16日～17日到福岡UNESCO參加日本研究國際研討會。12月18日～12月21日鹿兒島大學集中講學。</p> <p>1月1日發表中共與美國外交關係正常化。台美斷交。1月11日開辦出國觀光護照。2月26日中正國際機場正式通航啟用。3月11日中、美互設大使館於北京，華盛頓關閉台灣駐美大使館。4月26日美在台協會開始業務。6月29日桃園縣長許信良處刑兩年，停職處分。7月6日第一次國家建設研究會。10月12日許信良舉家赴美途經東京逗留數日。10月25日IOC理事會決議中國回歸世運，中華民國改名殘留。12月10日高雄美麗島事件。</p>

1983	1982	
53	52	
<p>1月6日京都演講「私の日本『近代』」於比叡山飯店。1月10日惠泉女子短大講課。1月29日〜31日戴研究班討論會的學生集合於千葉的家集訓。2月12日東江樓客家會忘年會（農曆）。2月25日安排邱垂亮於日中經濟協會演講。戴送別會（3月將赴美一年）。3月3日戴、陳鼓應、邱垂亮座談會於東江樓。3月21日交千葉家的鑰匙與三萬日元給林正子（林衡道先生的姪女）管理書庫。3月25日請一年長假，以訪問學者的身分訪美。搭中華〇〇二班機，自東京赴舊金山（國輝、彩美、興夏），興宇、興寧留東京上學。4月4日興夏上美國小學。4月22日去舊金</p>	<p>2月5日去博多演講。2月7日〜10日鹿兒島大學講課。3月17日於東京國際文化會館拜訪費孝通。4月19日大阪今橋俱樂部演講。5月9日〜10日在廣島演講。5月27日「台青研究會」開始。7月24日〜26日與研究班討論會的學生在千葉的家共炊集訓。7月28日〜31日去博多演講。8月1日於東江樓歡迎陳若曦（《伊縣長》著者）。中央公論社座談會。8月2日安排康寧祥去NIRA演講。8月5日東京「私大連」座談會。8月6日安排康寧祥與日本記者的懇談會。8月13日接受朝日ジャーナル訪談。上朝日電視台晚間十一點節目。8月16日〜9月5日帶立教學生組團訪問菲律賓的少數民族與之文化交流。9月6日訪「中報」社長傅朝樞於東京帝國飯店。9月24日山川出版座談會。10月16日於早稻田奉仕園演講，「アジア民衆と政治——『華僑』のいきざまをめぐって」。10月27日戴對李・約瑟做訪談於NIRA。11月7日於東江樓與楊遠會面。11月12日於熱海對私大連研修會演講。11月16日日中經濟協會座談會。11月19日名古屋演講「華僑問題を考える」。12月4日韓國青年商工會演講。12月14日於立大向學生演講「アジアの中の日本」。12月17日「中報」座談會於帝國飯店。</p> <p>2月13日禁止進口一五三三項日本產品。2月26日東京地裁駁回台灣籍日本兵遺族的補償請求。3月30日中國外交部針對美國在移民問題把台灣當作單獨國家提出抗議的備忘錄。7月26日教科書問題中國向日本正式提出抗議。8月17日對美售台武器問題台美發表共同聲明。9月22日英國首相沙契爾夫人訪問中國。9月26日日首相鈴木善幸訪中國。</p>	<p>1月19日中國駐荷大使召回，改派代理大使。2月20日荷蘭正式決定對台輸出潛艇。3月23日恢復參加世運。8月20日中國成功以一基火箭打出三個人造衛星。11月26日李登輝當選台灣省主席。12月10日中印國界交涉十九年後重開於北京。</p>

山假日飯店看張德銘。4月28日陳鼓應家請客，葉芸芸自DC來談創辦《台灣與世界》雜誌。戴以筆名梅村人整理二·二八史料，自一九八三年八月該月刊3號起連載「二·二八史料舉隅」。5月7日為五·四記念集會演講。5月21日郭德金老先生訪柏克萊的小租屋。因來訪者有一大批「台灣思潮」的同仁，車隊由LA開來，屋中擠滿大人小孩。5月23日日本前東大教授丸山真男在UCB演講，晚上有晚會。7月17日於舊金山機場接興宇與他的日本人同學，他們三人準備租車到美國各地旅遊一個月。9月13日陳星瑩（陳逸松女兒）驅車帶國輝、彩美、興夏自柏克萊出發去黃石公園。10月4日戴去芝加哥。10月5日中午與陳映真、小蔡、林孝信聚餐。10月6日住五十嵐曉雄處（芝加哥）。晚與陳鼓應、林孝信長談。10月7日在哥倫比亞大學演講「研究台灣史經驗談」。10月11日與非馬長談，自芝加哥回加州。10月16日《台灣與世界》派對，老鄧家趙夫婦、孫隆基、小王、陳星瑩、葉芸芸等。10月17日已由柏克萊搬到Albany寄房租給房東許太夫。10月25日戴飛DC，陳文典（葉芸芸丈夫）接機，住陳家。10月26日開始整理座談會稿（應是與陳映真對談的「台灣人意識與台灣民族的虛像與實像」）。10月28日夜宿李哲夫家。11月3日與李哲夫座談「台灣的社會發展與省籍問題」。11月7日在胡鑫麟（故台大名眼科醫師）老家長談共度一日。11月8日燕京圖書館。11月9日上午燕京圖書館，下午與張光直哈佛大學教授會談。11月10日下午燕京圖書館，與Ezra Vogel（寫《日本第一》的哈佛教授）會談。11月11日上午燕京圖書館，下午赴LA。11月12日參加廖運和兄（中壢人）女兒婚禮。11月14日參觀加州大學中文圖書館。11月16日晚宿好友馬必陽五姊馬必棟家。11月21日回Albany家。12月1日寄稿給王耀南（《中報》），寄信給張光直。12月2日陳映真演講。12月3日陳映真來宅午宴。12月13日去LA。12月14日亞美國書館見劉宜良（江南）兄。12月15日柏克萊大學演講。12月19日在LA訪問。12月20日《論壇報》請中飯，赴Rose Hill為王光逵（司馬桑敦）掃墓，晚看電影「垂簾聽政」。12月21日《中報》社長傅朝樞請中飯。晚參加LA華人街獅子會與阮大方長談。12月23日晨金英（姪女）送到LA機場回SF。2月2日美國務卿訪中。5月1日法密特朗總統訪中。7月4日中國外交部要求駐京各國大使館在台事務所停止發給簽證。9月1日南韓客機在上空被蘇聯軍導彈擊落，死者二六九人，其中二十四位台灣人。9月25日美國防部長訪中。10月12日科威特的美法大使館等六處同時被炸。10月23日駐貝魯特美部隊樓被炸，死亡二百人以上。11月15日美上議院採決「台灣決議」。11月18日中國以「台灣決議」為內政干涉提出抗議備忘錄（照會）。12月19日中國統計年鑑一九八三年版發表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餓死一千五百萬人。

1月15日林海音在UCB的教授俱樂部大廳演講，戴與她會面。1月19日聽楊振寧博士演講。1月24日寄稿給林孝信。1月27日給葉芸芸（《台灣與世界》的代表）寄稿，每月一次。1月29日《台灣與世界》辦派對。2月1日飛LA。2月2日晚上宴請市岡夫妻，馬必棟、蘇西於小東京，鄉姊鐘翠香女士與夫婿西山虎夫開的日本餐館，夜宿馬必棟（馬必陽五姊）家。2月3日於UCLA演講，晚市岡宴請我家於湖畔朝鮮菜館，老譚、蘇西陪，夜宿五姊馬必棟家。2月4日南下聖地牙哥。2月5日赴地娃那。2月6日看了海洋世界，晚歸Albany。2月11日打電話給江南（劉宜良）。2月20日寄房租，訂《美麗島》雜誌年費八十美元，轉寄日本。2月22日林孝信來訪。2月23日與孝信、李遠哲共進午餐。2月24日與李宗一共進午餐，陳鼓應、易高國、伯淵相陪。2月26日去LA住老羅小馬家。3月6日寄稿與信給高信疆。3月7日賣車三五〇〇美元，房租六三八美元。3月8日赴紐約。3月10日在哥大演講。3月11日與韋名座談會。3月16日飛LA。3月17日回SF。3月18日舊金山好友們歡送我們。3月20日富田虎男立教大學教授自日本來小住。3月25日LA演講。3月31日舉家回日本，由LA經由夏威夷。4月28日立大熱海寮集訓（東寧會）。5月17日給NY寄稿（《台灣與世界》）。5月29日晚走訪鄰近的中央通訊社資深記者李嘉。6月4日寄《民主台灣》稿。赴惠泉女子短大演講。6月19日王曉波到日本。6月22日晚間六點於東江樓舉辦王曉波歡迎會。7月13日寄稿給洪銘水、王耀南。7月21日赴神戶演講。7月27日蘇慶黎赴美經東京小住。8月9日新加坡大使館晚宴接受大使（李炯才）邀宴。8月19日張光直來日。9月19日研究班集訓。9月24日與味全黃烈火董事長餐會於帝國飯店。10月3日回請李炯才大使於東江樓。10月9日寄二、二八事件相關稿給王曉波。10月15日江南被暗殺陳星瑩電話相告。11月5日寄第三、四次稿給王曉波。11月14日「日本事情講座」開始。11月27日惠泉女子短大講「日本の中のアジア」。12月9日若林正文常到千葉家書庫借書與資料。12月12日朝日文化中心講「香港問題と華僑の動向」。12月24日「三千里」對談。

1月4日經建會核定環島鐵路網計畫案總經費二百四十三億。2月22日鄧小平提示「一國兩制」的台灣統一案。3月23日中曾根康弘首相訪中。4月12日中華航空就航世界一周航線。4月23日《人民日報》登載徹底批文華論文。4月26日雷根總統訪北京。5月9日經建會主委俞國華指出本年經濟成長率為七·五%，每人所得近三千美元。5月18日高雄海底隧道開通。5月20日蔣經國連任第七任總統，李登輝任副總統。5月26日鄧小平言明一九九七年派遣軍隊去香港。10月3日鄧小平言明澳門主權回歸，採香港方式，香港的台灣關係機構，一九九七年後可繼續存在。10月7日西德首相科爾正式訪中。10月15日作家劉宜良（江南）在美國居所被殺。12月19日英國首相沙契爾夫人訪中，與趙紫陽總理簽訂「香港回歸同意文書」。

1986	1985
56	55
<p>1月1日於福華飯店，會高惠宇與沈君山暢敘。1月2日張德銘（當時立委）餐敘。1月3日於吳伯雄家用早餐，搭吳的用車由總統府二號門入內見副總統李登輝，單獨與之長談。1月4日民眾日報高雄演講。1月7日返日。1月16日與陳鼓應約會於東江樓、朝倉書店例會。1月20日會江春男（司馬文武）於東江樓。1月21日中經濟協會</p>	<p>1月17日開始朝倉書店，每月一次例會為《圖說世界文化地理大百科中國》的出版（88年6月）做討論與準備。1月18日中經濟協會編輯每月例會。1月21日中京大學演講「台灣史をめぐる諸問題」。1月25日東寧會每月例行研究會。2月1日TBS電視座談會。2月5日中午馬樹禮代表擬宴請，因被召回國接中央黨部代表而取消。3月2日立教大學棒球隊台灣遠征結團式於立教大學總長室舉行。3月7日立教大學棒球隊由羽田機場搭華航班機，總長濱田（亦為棒球部長）與戴領團。返日。旋回台參加楊達葬禮。3月19日夜會康寧祥於新宿王子飯店。3月22日安排康寧祥記者會。5月25日慶祝恩師神谷慶治教授八十大壽。6月16日~17日全國客屬崇正會。6月24日成城大學演講。Identityと言語—台湾の場合—。7月30日~8月2日帶留學生於富士山集訓開研討會。8月9日參加新加坡大使的晚會。8月23日國立教育會館演講「東南アジアの華人社会」為題。8月31日於希爾頓飯店與沈君山會面。9月4日邱延亮夫婦來小住。9月12日~19日香港買書。10月22日寄稿給台北《牛頓》雜誌高源清，「兩個尺碼吳濁流論」。10月2日川崎市教育委員會演講「私が見た日本と日本人」為題。11月10日~13日做「青年の船」的講師，由橫濱到台灣，返東京。11月14日慶應大學演講「中國人が見た日、中、米關係」。11月19日講演於東京文化學園。11月26日清泉短期大學講課「日本の中のアジア」。11月30日江東區民中心演講。12月22日赴台灣。12月30日《牛頓》雜誌社長高源清到飯店共進早餐。12月31日上午十點半訪馬樹禮秘書長。</p> <p>2月6日馬樹禮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3月9日中國人口十億三千六百零四萬人。3月20日日本人口一億二千零三十三萬人。4月1日日本電信、電話、香煙開放民營。5月11日美商務長官訪中。6月3日台灣紅十字會拒絕中國提案的離散家族的會面。7月23日中國元首第一次訪美，李先念國家主席簽訂中美原子能協定。8月15日日本軍的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於南京開館。9月13日新加坡李光耀總理正式訪中。9月20日南、北韓相互訪問起步。9月18日中曾根首相的靖國神社參拜，引起北京學生的半日示威。10月2日西安反日示威。10月13日布希副總統訪中。10月16日成都反日示威暴動化。11月28日中國加盟亞洲開發銀行。12月25日蔣經國總統聲明「不由蔣家出總統繼位者」。</p>

編輯月例會。1月25日受邀韓青（韓國青年商工會）懇談會。2月17日見高源清於池袋王子飯店。2月25日東寧會例會本年度開始。3月18日一橋大社會學部會議室參加懇談會。3月23日立教大學謝師宴。3月25日立教畢業典禮。東寧會做報告。4月5日立教大學入學典禮。第一次科長會，被推舉為文學部史學科科長（二年）。4月11日岡崎嘉平太先生派對於東京王子飯店。4月12日一橋大學講課（每週六）。4月15日寄稿給《日本文摘》（《牛頓雜誌社高源清》）。4月22日日中經濟協會座談會。4月28日弘文堂三德氏來千葉家取序文（《もつと知りたい台灣》）。5月1日安排《日本文摘》座談會於記者俱樂部（東京）。5月16日李嘉家（商量座談會）。5月19日赴明治大學講課（每週一）。6月12日立大每週四有連絡會與教授會，科長會。6月13日與松本健一（麗澤大學教授、評論家）會面談關於會談事。6月16日亞東協會新聞組鍾振宏（長年朋友）相會。洪小姐（《日本文摘》編輯）第五次見面。邱延亮抵日。6月17日弘文堂出書（《もつと知りたい台灣》）宴會。6月21日延亮赴美，於東京大飯店開國建會（會前會）。YMCA演講「留學生にとつての日本語學習について」。7月1日去日本經團連會館演講「最近10年間の台灣社會構造の變化と台灣人の意識の變化について」。7月10日綠蔭書房南里友樹借去《警察沿革誌》三冊（複刻用）。7月11日給江炳倫寄信與稿。7月14日、15日福岡UNESCO開會。7月19日、20日神戶韓國青年會議所演講。8月1日晚上中野演講「東アジアと日本—台灣の視座から」。9月12日杉並區教育委員會演講會。9月25日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東寧會做台灣警察沿革誌有關報告。9月27日慶應大學演講。9月28日沈君山來談「國兩制與台灣政界話題」。10月22日NIRA下河邊氏對談。12月7日李哲夫來日。12月10日高源清會於紀國屋書店。12月12日與星野芳郎對談於ZEROX。

1月7日解除日本商品94種進口禁令。1月10日日本在瀋陽設立第三個領事館。1月11日中美海軍在南中國海第一次共同演習。2月22日豐田汽車與國瑞的合併計畫認可。中國人口十億四千萬人。4月7日希臘首相訪中。4月12日中國採行義務教育法，公布民法通則。5月19日台北示威遊行要求解除戒嚴令。6月1日北韓金日成國家主席指定金正日繼承者。6月7日中國表明參加在韓舉行的亞洲大會。6月28日新加坡李光耀總理夫婦公式訪台。7月1日中葡第一次澳門返回交涉在北京舉行。9月28日台灣成立民進黨。10月7日美國防部長訪中。10月12日英女王以國家元首首次訪中。10月15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決定解除戒嚴令及禁止結黨方針。11月8日中曾根康弘首相訪中。12月6日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增補選舉民進黨躍進。12月15日上海蘇聯開設領事館。12月31日中國報導國產原子能潛水艦遠距離航海成功。

1月3日新宿見邸垂亮。1月4日林毓生自美來，住杉並區的戴家。1月8日每月第一禮拜四有連絡會（全校）、科長會、教授會。1月10日朝日文化中心講課。1月17日朝日文化中心講課。1月20日清泉女子短大講課。2月8日在千葉書庫，丁果來借書找資料。2月16日中經濟協會編輯月例會。2月18日民進黨訪問團開派對。3月12日給中山大學寄稿（台灣）。3月14日朝日文化中心講華僑問題。4月4日任立教大學國際中心主任（四年）。4月11日一橋大開始（每星期六）。4月14日寄《鏡報》、《九十年代》、《廣角鏡》訂購費。4月15日學習院開始（每星期三）。5月25日經團連講演（講師謝禮很高，10萬日幣）。6月25日「日本事情」講座開始。6月26日《世界》座談會。6月29日陳映真在東寧會演講。7月4日飛紐約。7月8日郭冠英請客，陸（鏗）兄陪。7月11日到華盛頓市。7月12日李哲夫教授處演講。7月15日由紐約返成田。7月21日慶應大學辦國際中心懇親會。7月27日《29日當日經連研修所講師。8月16日台大演講。8月22日早上九時自《聯合報》社上車往南園開會。8月23日在南園開會做報告：從日本看台灣社會未來十年的發展——並試論與評估台、日對未來的因應力（responsive-ness）之異同——。8月26日到廣州街拜訪蔣彥士。8月27日上午十點到司法院拜見林洋港。中午聯合報余紀忠社長招宴。下午四點由總統府二號門進入見李登輝。8月28日晚上與余玉賢農林廳長會餐。8月29日早上訪問台大大陸研究社。下午到「客家風雲」演講，講題為「日本往何處去？」吳伯雄家晚宴為之圈請二十八位學界、媒體、企業、出版、政界、醫學界各行菁英共享盛會。8月31日出發返東京。9月11日下午二點林瑞明成大教授來室（在立大做研究學者）。9月25日馬紀壯代表請宴。10月6日西武Stadio 200講演有關台灣電影事宜。10月26日陸鏗從美國來，為之安排在《朝日》上報（吉田實訪談）與在日中經濟協會演講以籌湊旅費，住戴家。10月28日送陸到李嘉家。11月9日《10日去高知講演「中國人が見た日本の國際化」》。11月21日見許常惠。11月24日經濟企劃廳「アジアと日本——定住中國人が見た日本の國際化」演講。11月29日馬代表請客。12月2日國際中心在戴家開忘年會。

1月3日北京開設金融市場。1月5日文匯報發表大躍進損失一千二百億元，文革損失五千億元。3月26日中葡簽訂決定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澳門歸還中國。2月17日越南新設經濟關係委員會以促進與西方國家的經濟交流。4月16日日本人每人GNP一萬八千美元，超過美國人的一萬七千七百美元。5月8日聯合國事務總長正式訪中。7月15日台灣解除戒嚴令，外幣管理緩和。7月28日解除香港澳門觀光旅行的限制。10月25日中共第13屆四大規定中國社會主義的現狀是「初級階段」「黨政分離」為目標。11月2日探親（大陸的親族訪問）開始。11月3日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給新任趙紫陽中共總書記祝電，是中蘇關係惡化以來首見之事。11月16日李光耀新加坡總理訪台。

1月7日今年第一次連絡會、科長會、國際中心委員會、教授會（每月第一禮拜四）。1月8日立教開學。1月19日惠泉女子短大講課「日本の中のアジア」。1月23日國際文化會館松本重治派對。1月26日沈君山來日。1月29日飛台灣。1月30日參加台灣史研究會於金華街政大公企中心綜合大樓二〇二室。1月31日台灣史研究會，見余玉賢於國賓飯店（上午七點半）。2月1日台灣史研究會，於司法院見林洋港，晚客家聯誼會宴請講「我觀義民廟之祭祀」。2月4日上午十點半見李登輝於總統辦公室，晚上沈君山宴請。2月5日下午與康寧祥、張德銘一起見面，晚上「人間」宴請。2月6日上午九時訪問蔣彥士，下午演講。2月7日返東京。2月18日魏廷朝演講（日中經濟協會）。2月19日在東京記者中心講演「異文化社會と『華僑』」。2月21日新加坡大使館慶祝晚會。4月17日客家大會。4月24日國建會前會。5月28日～6月6日赴台。6月6日下午參加在台大校友會舉辦的「客家風雲」。6月7日上午十點見蔣彥士，返日。6月26日NHK到千葉家書庫借資料。7月16日與魏廷朝見於池袋。7月25日～8月5日參加國建會。8月2日上午十點總統府二號門入內見李登輝。8月4日下午一點五十分愈院長座談會。五點二十分出發去總統府。8月5日早上見蔣彥士於廣州街二號。8月7日去金門訪問一天。8月8日台北飛新加坡，李炯才大使招待。8月12日新加坡飛香港。8月19日香港經由台北返東京。9月7日～10日信州大學集中講課。9月22日練馬區公所演講。9月28日馬代表招宴於國際文化會館。10月5日答應共同通信社寫書評。10月6日練馬區公所演講。10月20日於池袋駅南口（高）惠宇，同步至東江樓，五十嵐（曉夫）內村（剛介）同席。10月21日～23日東京到廣島講演，再到大阪參觀神戶華僑博物館，回東京。10月27日～11月3日第一次到中國大陸，同行者立大總長浜田夫妻、國際中心主任赤木洋子，目的是到天津南開大學與之結姊妹校簽合同。11月10日東京新聞記者來採訪有關與南開大學結姊妹校事宜。11月16日遠流出版社王榮文社長來日本。11月17日安排他參觀岩波書店、岩波書店倉庫、東販、日販、三省堂書店。11月30日與南開大學回訪的校長一行人員會餐。12月8日教員研究會講課。12月9日於中央郵局（東京駅對面）見魏廷朝。12月17日於御茶水勤勞者會館主持「留學生と日本人」討論會。

1月1日台灣解禁報紙的創刊與增頁。1月13日蔣經國逝世（77），李登輝升任總統。1月27日李登輝就任國民黨代理主席。3月11日物理學者、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長張憲義上校逃亡美國。3月13日世界最長的青函隧道開通，連絡船八十年的歷史閉幕。4月14日阿奎諾菲律賓總統訪中。4月17日北京大學撤去毛澤東銅像。4月18日台灣開始

受理寄大陸的書信。7月3日李光耀新加坡總理訪台。7月20日俞國華內閣大改選。8月5日解禁輸入大陸原料。8月12日大陸探親緩和到四親等。8月25日日首相竹下登訪中，30日答應第三次內借款為八千一百億圓。9月12日解放後台灣客船第一次入上海港。9月16日中央研究院三學者出席在北京召開的第二十二回國際科學連會總會。9月20日中國表接受國際原子能機關的檢查。10月29日韓國解禁中國觀光，11月2日第一批觀光團進入中國。11月3日決定大陸住民訪台原則，決定參加大陸文化活動原則。12月20日大陸留美學生五人初次訪台。12月31日《人民日報》批判「台灣的彈力外交」。

1月10日惠泉學園短大講課。1月11日學習院開始（每禮拜三）。1月13日一橋大學開始（每禮拜五）。1月21日赴台。夜沈君山來訪。1月28日於台中時報廣場演講「試論二・二八事件研究之視角與方法——兼談日常用語與學術用語之差異與界定」。1月29日晚上七點於耕莘分院四樓演講。1月31日晚上七點《民眾日報》演講。2月6日返日。2月22日、24日去鹿兒島講演。2月28日國立公民館演講「台灣——植民地からライバルへ」。3月4日相模原市南文化中心講演。4月4日沈君山來日，會於希爾頓飯店。4月27日、28日到大阪演講。5月1日與李香蘭會於Capital東急。5月13日日本研究會演講。5月19日余範英女士招宴。5月20日講演。5月23日月刊《知識》座談會「東シナ海の近代」（暫定）。5月25日、26日福岡講演「台灣の近況と中、台關係の今後」，返京夜宿千葉家寫稿。5月27日自千葉返京去國立教育會館。6月1日在經團連演講「最近の台灣の政治經濟情勢について」。6月14日經團連會館二十一世紀俱樂部演講「留學とは？」。6月16日立川公民館演講「台灣から見た昭和」。7月5日給遠流寄稿件。7月16日、22日松山大學集中講課「NIE Sの近代化と現狀」。7月22日、28日集中講課於四國學院。7月26日興夏高二申請赴美當一年交換學生。8月15日由羽田出發飛台北。8月16日、18日時報文化基金會開討論會。8月19日中午客家總會演講。8月20日三點到俞家拜訪俞大維老，七點《人間》雜誌演講。8月21日台史會座談會。8月25日、26日中山大學演講。8月30日晚上十點與李遠哲會於華西街擔仔麵。9月3日由台北飛華盛頓DC，給在美留學的興夏寄錢與郵包。9月9日由華盛頓DC飛紐約。9月15日由紐約飛芝加哥。9月17日由芝加哥飛日本。9月20日由日本飛台北。9月23日丘如華朝上來接，遠流辦活動講「台灣人的命運與認同」。9月26日返日。9月27日參加東京王子飯店歡迎蔣緯國晚會。10月6日、8日廣島演講。10月20日寄彭銘華（姪女）林叔品《台灣總體相》（岩波新書《台灣》的中譯本）。10月23日日本亞細亞航空公司演講。11月9日

下午三點半赴總長室喬樞有關立教棒球隊再次遠征台灣之事宜。11月17日穗積五一夫人生日慶宴於金華飯店。11月22日飛台北（與台北棒球協會交涉立大棒球隊住宿事宜）。11月27日訪東海大學（爲交涉立教棒球隊訪台做親善比賽事宜），王曉波來飯店。11月28日返日。11月30日東京六大學棒球賽，立教大學棒球隊得冠軍開慶祝優勝晚宴。12月1日三省堂書店原稿（〈台灣—日本殖民地—戰後的演變〉）三千二百字。提報告五張。12月5日下午六點於私學會館爲中、高中社會科研究會演講「台灣」。12月11日晚上八點半於國際文化會館與陸鏗吃晚飯。12月18日開始寫三省堂書店所託原稿。12月22日飛台北。12月24日到鹿港看好友林曲園尊父林坤元大夫。12月29日國關中心報到開會。12月31日中午十二時《光華》雜誌陳淑美小姐來福華客室採訪。

1月20日人團法通過，民進黨成爲合法政黨，進入政黨政治時代。3月6日李登輝訪新加坡。4月7日《自由時代》社長鄭南榕自焚。5月19日詹益樺於總統府前自焚。6月4日北京發生天安門事件。

1月1日好友吳祖澄來訪（農學院同學、台糖副總經理）。1月2日遠流出版社社長王榮文來訪。1月5日張昭鼎清大教授同行見尤清。1月9日返日。1月19日國建會（例年暑假於台北召開該會的事前工作）。1月22日東京王子飯店王紀壯代表招宴。1月23日東芝講演。1月24日濱田總長召見（立教棒球隊遠征台灣事宜）。2月23日帶立教大學棒球隊到台灣做棒球友誼賽四夜五天，住台北棒球協會。2月25日晚間六點、八點與侯孝賢、朱天文相會（爲日本即將放映「悲情城市」的事宜做喬樞）。2月26日與馬英九中午餐聚，晚間八點半與侯孝賢重聚。2月27日返日。3月13日看「悲情城市」。3月29日千葉家研究生集訓，魏廷朝也參加。4月5日沈君山來訪。4月28日飛台灣。4月30日立教大學總長濱田到台北。5月1日與濱田氏拜會海工會、教育部、北市政府、台大，並致謝立教大棒球隊遠征台灣時的關照。5月2日與濱田氏赴台中拜會市政府、東海大學並致謝，夜泊日月潭。5月8日返日。6月2日於經團連十樓ZEROX聚會。談日本とアジア（II）——近代化をめぐる諸問題の再考——。6月4日給立大經濟俱樂部講「國際社會における經濟大國日本の役割——定住外國人の目から見た日本——」。6月5日去東京入國管理局與亞東關係協會辦理與夏留學美國所需文件與簽證。6月10日給研文出版社原稿。6月11日與夏從美國回來渡暑假。戴國輝去台灣，同行者郭茂林與福士、箕原等，郭的組織計畫小組做環島旅行，以準備給李總統一個國土開發的建言，但李忙於政爭，似無暇分心。6月15日返日。6月17日主婦會館（主婦之友社）演講「從李總統就任演講談起」。6月22日神戶演講「これからの台灣情勢を東アジアから考える」。6月23日乘國

內線飛機去山形講課。7月4日宮崎電視來室訪問，去郭茂林建築事務所。7月6日中野區文化中心演講「近代日本與中國①從台灣談②從中國大陸談」(I)。7月11日到 Palace Hotel 參加亞細亞論壇第二回東京會議。7月13日中野區文化中心演講(II)。7月14日 Capital 東急飯店開國建會(預備會?)。7月20日NHK宮崎先生來研究室(爲了「霧社」的錄像)。7月29日、8月3日羽田乘飛機去四國學院集中講課。8月5日飛台北。8月6日李總統召見(郭茂林同時見)。與郭去味全。8月9日去香港開會。8月17日返日。8月26日興夏飛美，從德州轉到 Maryland 讀高三。8月29日到東芝(川崎)爲其研修會講課。9月1日爲日本各行業同好組成的「萬會」做講師，「激變する中、台を考える」「客家のこと」。9月17日李哲夫來家小住。9月21日國建會(本鄉學士會館)。9月26日《廣辭苑》稿子完成(岩波辭典)。9月29日聽馬漢茂演講於東大(用中國話)，講題爲「東西兩德對現代中國文學的接納」(馬漢茂博士(德人?)爲西德魯爾大學東亞研究科教授)。10月26日飛台北。10月28日找中國時報季季小姐請李霽野老寫許(壽裳)、台(靜農)、李(霽野)、沈仲九爲何來台?(不知結果如何?)於耕莘文教院演講。11月5日返日。11月10日廣島外交論壇演講。11月26日研文出版社送新書來。12月4日帶遠流出版社一行去參觀弘文堂，三德氏關照。12月6日帶遠流一行參觀岩波書店。12月8日遠流一行到千葉家參觀書庫。12月13日山西大學來校做表敬訪問。12月14日在家宴請中國留學生。

3月3日學生抗議老國代選總統及修憲，靜坐引發「野百合學運」。3月21日李登輝當選第八任總統。5月10日李煥請辭，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長。5月20日發生「反軍人千政遊行」。5月22日李登輝記者會表示一年內終止動員戡亂，任滿後將退休。

1月8日「日本農研」開新年會。軟禁半世紀以上的張學良九十大壽慶生於圓山飯店，西安事件又勾起人間關心，NHK採訪張放映的反響極大，「西安事件」爲宴會熱門話題。1月26日在戴家開「萬會」新年會。2月10日於東江樓「國建會」宴會。3月4日侯孝賢與朱天文來到千葉家書庫找資料。3月28日求見李登輝。3月29日遠流出版社陳雨航來(談出書事宜?)。3月30日上午十點出發去新港，王榮文來。晚間六點半侯孝賢來飯店。4月2日特別演講於橫濱山下町產業貿易中心9F「華僑的今日的課題とその展望」。4月3日晚上給在東京的曾永賢打電話。4月10日侯孝賢一行來千葉家的書庫。4月11日下午五點慶應大大學院8F講「中蘇關係」。4月13日乘新航SQ2去洛杉磯。4月15日由洛杉磯飛華盛頓DC在陳文典、葉芸芸家，興夏(寄住陳家)、李哲夫夫婦等爲戴慶祝六十一歲生日。4月25日彩美飛洛杉磯再轉機，27日到華盛頓DC。5月3日夜宿紐約林雪黨、許達三好友家，住

近處的王月慶（台中農學院同學）也來聚首。5月4日探訪林忠厚氏給郭正昭電話。5月6日探訪潘家牛氏。5月7日返華府探訪王啓蒙氏。5月14日國輝與彩美飛倫敦。5月15日參觀大英博物館，巧遇王榮文遠流社長，一起去拜訪戴瑞明代表。5月16日訪英國立教學院並演講「國際人與國際化」。5月19日參觀劍橋。5月20日飛德國法蘭克福，住球友町田先生家。5月21日參觀附近的古城堡等名勝古蹟。5月22日赴Bon，去日本留學過的越南華僑Hen來接。5月23日散步於萊茵河畔，赴Köln坐夜車去柏林。5月24日郭恆玉請客看「柏林之壁遺址」。5月27日去看Munice新市廳舍、教會及中央驛。5月28日赴德國博物館。5月30日由Munice去Zürich，在此過夜不滿意。5月31日去Luzern，在此過夜不錯。6月1日去Basel，還好。6月2日去Strasbourg一泊。6月3日離開德國去法國，住離巴黎很近的陳慶浩、譚惠珍Epinay的家。6月4日學坐電車去巴黎，看科學院與美術館。6月5日到南法Nice住一夜。6月6日去摩納哥巧遇國鐵罷工改乘公車，賭輸300法郎。6月7日朝去Cannes，在朝市越南人賣萬金油與人參酒，因越南無商品，回歸期未定，得看湊足旅費。乘TGY（鐵路）三分前趕到，坐頭等安然抵巴黎。6月10日返華府。6月13日到舊金山與金湘泉等老友們相聚，夜宿邵中權家。6月14日到洛杉磯住西山虎雄、鍾翠香夫婦家。6月16日返日。6月24日亞細亞21世紀俱樂部獎學金論文審查。6月25日與唐（松章）君見於紀國屋書店，為其寫博士論文（有關印尼華僑問題）提意見（①華僑問題，②九·三〇事件）與指點書與資料的收集。與弘文堂三德氏見於目白（為新書《もつと知らない華僑》事宜）。7月1日乘UA81飛香港（彩美同行）。7月4日飛北京。7月5日參觀故宮與景山公園。7月6日參觀天壇。7月7日參觀盧溝橋。7月8日遊長城，逛街購物。7月13日飛烏魯木齊市（民族委員會安排）。7月14日天池。7月16日吐魯番盆地，訪葡萄溝蘇公塔。7月22日飛越大沙漠（西遊記的火炎山映著夕陽，著實燃燒著似地）到廣州。7月24日飛梅縣，參觀嘉應大學，改由陸路租車一路南下，到永定—南靖—船場、天寶—漳州—廈門。在永定去訪吳家崇祠（吳伯雄祖父回去過）與李登輝家崇祠，參觀客家土樓（世界遺產）。7月26日到廈門。7月27日參觀華僑博物館。7月28日遊廈門與鼓浪嶼。7月29日訪廈門大學，陳碧笙老教授談吳石，並建議他寫回憶錄「我與台灣」。7月30日飛上海，逛古書店。7月31日晨與僑連討論會，下午訪華東師大，晚看上海雜技團，技術高超。8月1日寄立大六大包書，《文匯報》複刻本最值。8月2日飛北京，陳星瑩（逸松小女兒）相會。8月4日玩頤和園接觸良多。8月5日與民委連繫致謝。8月6日～8月8日參加會議（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8月9日參觀首鋼，參觀釣魚台，參加會議者與吳

學謙、楊斯德、王兆國等合影並晚宴。社科院宴請中餐，晚上民族委員會接去看民族歌舞團。8月11日拜訪台聯，中午郭平坦兄招宴，晚民委宴請。8月12日葉紀東兄來接，晚上台盟晚宴。8月13日在台灣研究所講「東西德問題」，由北京赴長春。8月15日看農村，下午於吉林青華書店收益不少，寄書二包。夜宿長白山賓館。8月16日赴吉林，看養鹿場。8月17日由長春赴瀋陽與陳水（建中同學）共餐，夜宿鳳凰賓館。8月18日由瀋陽赴天津，南開大學老樊來接，夜泊南開寧園。8月19日逛天津新華書店，南開母國光校長宴請。8月20日見李響野老談得甚好，返北京。8月22日張光直哥哥張光正來訪，寄書兩箱回東京。8月23日返日。8月28日飛台北，直接到政大教職員宿舍五樓，把行李卸下，在此將住半年。戴在政大史研所兼任教授，並將長年的宿願「二·二八事件」寫一本書，彩美隨行。9月2日返中壢，玉英姊謝世，晚上陳宏正兄招宴，有李怡、王杏慶、邱近思、王榮文、王震邦等同席。9月19日到政大歷史系、中午去參加亞細亞論壇第三回台北會議。9月21日開始上政大八點十分的課。9月24日上午九點由總統府傍門進入見李登輝，王炯明來接。向李報告歐洲之行（統一德國之話題）、大陸之行（作物、農村之活力、他的老家永定的情形、北京會議〈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的情形），二·二八事件的話題與接班人事（建議不特意培養，不分省籍、有國際見識）。下午上課。9月28日杜繼平來宅。為《愛憎二·二八》著書擬以口述方式請杜代為起稿事洽談。台視來電話要戴談「中日歷史恩怨——從經濟、民間、文化談——」。10月8日中時記者來訪。10月12日開始準備外交部的報告。10月19日外交部5F505室報告「目前日本戰略思想問題」。10月22日政大演講「從二·二八看統獨問題」。10月24日近史所演講「對二·二八研究的一些想法」。10月30日葉芸芸從美國來。11月3日與蔣渭川女兒與女婿高欽福見面。11月8日於國關中心與吳安家見面（謀借二·二八史料）。11月14日給徐征（二·二八受害外省人）夫人電話。11月21日演講「有關日本戰略思想的一些考察」。12月8日宋屋國校校慶，趕赴慶典。12月11日華視視聽中心演講「台灣與現代中國——自歷史脈絡來整理台灣與大陸關係」。12月18日於世新演講「二·二八與統獨爭議」。12月19日政大歷史所演講「對二·二八研究的一些看法」。12月20日訪王作榮部長。12月21日於國際會議中心聽李遠哲演講。12月29日興宇、興寧自日本，與夏從美國回來相聚，請政大球友聚餐於圓滿飯店。12月30日戴家全體與朋友和學生分乘兩部車一路南下，第一站岸內糖廠，由甘蔗收割到製成糖的全部流程一一參觀，下午遊尖山埤風景區，到新營糖廠招待所，適逢好友曾裕郎廠長的慶生會，同樂一晚。12月31日在糖廠技術服務處演講「二十一世紀亞太地區的發展與台灣」，之後又南下。中午在台南杜康樓，南部的同學吳

子謙兄等歡迎我們，夜泊高雄劉添貴家。

2月23日總統府國家統一委員會通過「國家統一綱領」。3月28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會長李登輝）成立。4月22日內戰條款廢止。4月28日海峽基金會代表團訪問大陸。5月16日「台獨建國聯盟」成立（台中）。5月17日「懲治叛亂條例」廢止。10月13日民進黨綱採納「台獨條款」。11月12日與中國、香港同時加盟APEC。12月16日台灣環島鐵路完成。中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成立。12月26日蘇聯最高會議共和國會議宣言蘇聯邦消滅。

1月1日高雄火車站與陳良潮會合，一路往墾丁，又繼續南下，遊墾丁國家公園，夜宿墾丁。1月2日墾丁出發一路北上，四時趕到味全埔心牧場。在此我們訂五桌，共六十人，宴請彩美的同學與國輝親戚們，夜宿牧場。1月3日興寧、興宇返日。1月6日興夏返美。1月11日《天下》雜誌座談會「從歷史探索21世紀的台灣」，參加者：王作榮部長、陳其南、費景漢、戴國輝。1月15日錢部長在府上招宴。1月17日政大歷史所華視採訪二·二八。1月22日中研院近史所演講「我對台灣史研究的心得及期待」。1月27日九點半華視來政大歷史所採訪。2月6日、8日台東行。2月14日國關中心演講「試論『自立與共生』的遠景」（辜丸理論之萌生）。2月19日美國之音來訪。2月21日《聯合報》高惠宇小姐交稿，華視謝小姐交稿。2月24日東吳大學日文系演講「戰後日本に於ける台灣文學研究」。2月25日下午四點好友廖運逢兒子結婚典禮於老爺飯店。3月1日在台中農學院參加系友會，夜宿鹿港林坤元伯家（採訪二·二八有關事宜）。3月3日在高雄發電廠演講「二十一世紀的亞太地區和台灣的前景」（受戴廠長邀請）。3月9日下午五點半於國賓林衡道先生招宴。3月10日於福華江南春建中同學宴請陳暖玉老師（音樂）與夫婿汪先生。3月14日時報採訪。3月16日下午二點光華小姐（陳淑美？）來政大研究所採訪。3月19日外交部房金炎先生招宴於府上。3月23日10、12時國關中心，14、17時黨政研討會。3月24日黨政研討會，9、12時社會，14、17時經濟。晚間六點半光華雜誌招宴。3月25日十一點曾永賢來史研所，一道去外交部，晚上丘如華招宴，王榮文也出席。3月26日講演「二十一世紀亞太地區的發展與台灣的遠景」，晚間六點半陳宏正兄招宴於季園，同席有侯孝賢、沈君山、張昭鼎、戴等。3月28日選題「近代中日關係研究」與日本學者討論事宜。九點半從總統府正門進去，李登輝召見四十分鐘。3月29日李友邦學術研討會。3月30日與陸工會主任秘書楊明恒見面，就「近代中日關係研究」交換意見。3月31日許育銘八點來室，上午一起去黨史館。4月1日錦橋圖書公司與曾永賢見面。4月2日羅吉煊董事長招宴於北投彰化銀行招待所。4月5日一年假期屆滿，結束半年在政大的兼任教授職務。

，戴出發返東京。《愛憎二・二八》準備就緒。4月6日到立教大學辦復職手續。4月7日彩美因故遲兩日返東京，寄給在美的興夏四千美金。4月8日給葉芸芸寄五千美金（明細：稿費一千，興夏二千，興夏寄養費二千），興夏寄養陳家。與內川千裕（草風館出版社社長）三德洋一喝杯酒於水道橋。4月17日飛台北。4月18日八點去外交部。下午一點十分李將軍（友邦）紀念會於蘆洲。4月20日政大道藩樓演講「我的日本經驗」。4月21日返日。4月22日東江樓宴請岩波書店米濱與楊威理，為楊寫葉盛吉（台大醫師，共產黨嫌疑而犧牲）給搭線。給神谷恩師寄《愛憎二・二八》與《華僑》，給蔡劍深寄《愛憎二・二八》與《台灣總體相》。4月23日於御茶水尼克萊堂23F演講。6月15日在亞細亞經濟研究所開「近代中日關係研究討論會」，台灣蔡禎昌、日方小島麗逸、矢吹晉，戴做司儀兼翻譯。6月20日蔡禎昌與戴抵京大會館，參加「近代中日關係研究討論會」。6月27日在二十一世紀獎學俱樂部演講「孫文とアジアの革命」。7月5日孫觀漢教授來日本就醫，戴關照並介紹好友小澤醫師的醫院。7月12日吳克來圓山大飯店相會。7月14日外交部開會江丙坤加入，返日。7月27日飛北京投宿皇苑大飯店，參加「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7月28日台研所宴請。7月31日台聯會宴請。8月3日上午拜訪台盟，下午逛王府井。8月5日遊長城。8月6日彩美、興夏看京戲。8月10日去天津，夜宿南開大學。8月12日去濟南，夜泊山東大學留學生樓。8月14日去曲阜，在此過夜。8月15日登泰山。8月27日赴台。9月8日於新潟縣立教育中心講「台灣歷史の現狀」。10月14日《世界》稿到期。10月18日台灣專題討論會。11月7日、9日在京都開亞洲論壇會。11月10日惠泉學園短大講「アジアの中の日本」。11月20日出發去洛杉磯。11月25日到舊金山。11月30日回東京。12月18日飛台灣住福華。12月21日在台南。12月22日在高雄。12月23日錢復外交部長家做日本報告（日本情勢）。12月25日吳克來、沈君山來飯店。12月28日中時來攝影「日本近代化的世界史的位置」。12月29日訪問朱朝陽先生。1月18日台日國會議員聯誼會成立。2月22日公開「二・二八事件報告書」。4月9日開放金門島為觀光地。4月19日要求總統直選，民進黨示威六天。4月28日台灣出身原日本兵的補償訴訟，日本最高裁判所做出不承認戰後補償的第一次判斷。6月23日中國人口據一九九〇年七月的人口普查十一億三百零五萬人。7月6日日本政府對慰安婦問題公開謝罪。7月7日外交部正式對日本政府要求慰安婦補償。8月1日動員戡亂時期關係法律全面廢止，廢止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成立海岸巡防司令部兼軍管區司令部。8月22日與韓國斷交。11月4日G A T T經過21年以觀察員身分復歸。11月7日金門、馬祖的戒嚴令解除。11月23日「《聯合報》不買運動發生」。

1月1日自台返日。2月19日許遠東（故中央銀行總裁）來日見於帝國飯店。2月22日飛台（看選舉？）。2月28日返日。3月4日寄給興夏一萬五千美金。3月15日與陸鏗兄見於帝國飯店。3月23日飛上海（彩美同行）。3月28日到蘇州購書兩包。3月29日夜到南京。3月30日看第一檔案館。3月31日寄書三包，看南京大屠殺紀念館與太平天國紀念館。4月5日去北京。4月6日五點半去文化宮，民族委員會高處長招宴。4月7日返日，任立教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史學專攻主任（二年）。4月12日佛敎國際討論會，講「台灣に於ける私的『佛敎體驗』植民地時代の思出，庶民の佛敎受容とキリスト敎受容との比較において『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から思う」。4月14日創立一個新的嘗試來打破因循守舊的教學方式，並方便學生。在立教大「東洋史概說」一門課，試行公開教室方式，由上田、戴、森、設樂四敎官輪流每禮拜上一次課，順序各講東亞、中國、東南亞、西亞的古代、中世、近代、現代。開始是四敎官公開討論會「時代區分是什麼？」每講完一個時代開一次公開討論會，然後再討論「對亞洲史研究的展望」，最後做總結。4月23日給蘇志誠（總統）寄信，參加小島麗逸新書出版晚會，談「台灣地區現代化與二十一世紀的亞太地區兼談海峽兩岸關係之展望」。4月28日於東洋史概說的公開教室講「中國古代史」。4月29日飛台灣，帶一千萬日幣（合二百三十二萬台幣）回來，似已有意置產於台。5月4日施明德招宴。5月8日隨王榮文去其好友的麗橋山莊暢懷玩一天，同樂者有山莊主人賢伉儷、王榮文與其家屬、葉芸芸、楊茂秀教授初次相見歡，夜宿山莊。5月10日總統府接去見李登輝。5月11日張昭鼎教授告別式。十二點半公共TV採訪。下午二點半由朝代飯店出發，沈君山來相送返日。5月14日與楊六生（楊茂秀胞弟，服務於東京辦事處）上校相會於紀國屋書店。5月16日與唐松章會於紀國屋書店，唐兄爲博士論文事頻與戴見面。5月18日給蘇志誠寄信與剪報。5月27日吳大猷先生寄快遞。6月11日去浦和東武飯店演講「華僑、華人の生き方を考える」，受在日本朝鮮人埼玉縣商工會（尹茂理事長）之邀。6月15日日本鄉學會館、林金堃代表晚宴。6月21日於澁谷站忠犬銅像前與周明相會。6月30日於東洋史概說的公開教室講「中國中世史」（司馬光與資治通鑑）。7月16日飛北京。7月21日成都逛書店。7月22日中午到樂山住民族招待所，下午參觀郭沫若故居。7月23日遊峨眉山、萬年寺，晚返成都，住西藏飯店。7月26日到重慶，寄書六包。7月27日看大足石雕，夜泊大足。7月29日自重慶乘船，晚遊萬縣。7月30日三峽。7月31日岳陽樓，到武漢泊麗江飯店。8月1日黃鶴樓。8月7日紹興賓館。8月11日飛北京。8月16日台研所講課，「從兩德統一敎訓看海峽兩岸關係的今後」。8月21日飛日。9月5日飛台灣。9月6日曾永賢來朝代飯店

見面。9月10日在外交部做日本報告「日本政局の現状と今後」。9月12日到清華大學造訪張（昭鼎）太太，一同去掃墓。9月13日曾永賢來接，至總統府見李登輝。9月15日中時記者來採訪，晚上林院長（司法）招宴。9月17日返日。9月27日東京王子飯店鑽石社舉辦演講會，講「21世紀亞太地域の政治經濟を展望する」。10月2日返台。10月12日東京文化會館聽胡乃元演奏會。10月16日在東京女子大學講「毛澤東と現代中國」。11月19日凱悅報到參加亞洲論壇會。11月22日晉見李登輝。11月23日返日。12月13日台灣立法院外交委代表團訪日，僑政委在東京大飯店開派對，與謝聰敏長談。12月31日伊東由加利莊家族旅行至1月2日。

1月18日第一期立法委員卸任（四十五年六十期）。2月1日第二期立法委員一六一人就任，立法院長劉松藩，副院長王金平。2月4日郝柏村內閣總辭職。2月23日連戰就任行政院長。訴求台灣獨立，三萬人遊行（台中）。3月27日全人代選江澤民總書記為新國家主席，江再被選為國家軍事委員會主席，江就任黨、政、軍三權最高權位。4月10日北京京劇團台灣初訪。4月27日辜汪會談於新加坡，29日簽訂協定。7月19日民進黨大陸訪問團（團長謝長廷）。8月4日外交部就慰安婦問題對日要求賠償。8月10日新黨結黨（代表趙少康）。8月31日中國就「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發表白皮書。9月7日台灣地區政治受難者互助會發表一九五〇年代的政治犯死刑執行八一九人以上。

1月12日東洋史概說考試，結束一學年的公開教室，興夏返美，帶去九千五百美金。1月21日給遠流林淑慎小姐寄稿（《台灣結與中國結》）。2月2日赴三條苑見曾永賢與楊六生，一起吃晚餐。2月4日曹瑛煥（韓國人教授）來日，泊於池袋首都飯店。2月24日赴台，陳映真等人來。2月25日凱悅候沈君山來訪。2月28日返日。3月11日給遠流寄校正稿。3月25日立教畢業典禮。3月26日返台。3月28日訪遠流出版社。4月6日下午二點與楊憲宏去楊漢之兄家拜訪。4月7日曾永賢來飯店，下午返日。5月17日與吉田實座談會。5月24日在東洋文庫演講「歷史之中的華僑」。5月26日給蘇志誠（總統）去信。6月2日飛台，映真們來共進晚餐。6月4日去總統府，下午三點半於誠品天母店與許信良座談會，詹宏志當主持人。6月7日與魏廷朝、謝聰敏、許介鱗、李阿青、許信良共進中餐，話題為五月十五日成立的彭明敏文教基金會與總統直接選舉。6月13日在國際中心（立大）講「悲情城市と二・二八事件」。6月16日演講「アジア經濟發展の現状と日本の役割」。6月25日與徐崇懋見於池袋第一客棧。7月26日寄東洋文庫稿。7月27日國輝、彩美乘中國國際航空飛機飛北京，住宣武區南菜園大觀園酒店。8月1日

興夏自美飛北京。8月12日去內蒙古，弔王昭君墓、騎馬。8月14日大同出發赴北京，依興夏之願住進北京飯店。8月16日北大史學系座談會，午餐在全聚德。8月18日晚乘車赴太原。8月19日朝抵太原與郭潤偉（立大留學生）電話連絡，晚受山西留學立大學生款宴。8月20日去五台山。8月21日由五台山出發，途中參觀閻錫山故居。8月22日「慕名悠遊杏花村，柳青美酒飄然醉」，遊杏花村國輝即興作，玩天寧寺。8月23日參觀喬家大院，受山西大歡送宴，晚間八點半出發。8月24日到北京書城購書。8月25日興夏先回東京，擬趕回美國上課，國輝、彩美赴天津任進津利華酒店。8月26日天津台聯會邀午餐。8月29日返北京。8月30日晚在又來順與托和提（立大留學生）家共餐。8月31日飛日本。9月2日寄蘇（總統）信。9月4日黃昆輝招宴於都飯店。9月9日飛台灣。9月19日返日。9月22日約楊六生於紀國屋書店見面。10月6日雙十節前夜祭於大倉飯店、平安之間。10月14日與南開大學來訪者午餐於聖保羅會館。10月26日查江南造船廠資料，每日新聞土田來訪。10月28日、31日參加在橫濱舉行的亞細亞論壇會（Asia Open Forum）。10月31日陪曾永賢鄉兄短遊詠「楓樹未紅大佛寺，秋遊鎌倉情已至」。11月7日、9日遊仙台詠「萬樹斑斑紅天守閣，怪巖奇石秋意渾」，偕美遊秋保（溫泉）而作。11月11日於立大演講「マスコミから見たアジアと日本」。11月13日寄興夏九千一百美金。11月14日讀賣記者來室訪問。11月26日、27日堺市博物館「楓樹斑斑龍興山，萬會歡聚雪陵庵」「楓樹斑斑南宗寺，枯山水遊憶利休，方丈威容清茗趣，萬朋歡聚酒興醉」，一九九四菊花之季與「萬會」遊，戲作於雪陵庵。

1月1日日本等十二國旅客5日以內免簽證通過通用。1月29日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選舉。3月1日一九九三年末中國人口十一億八千五百萬人。3月31日浙江千島湖包括台灣旅客二十四人在內，三十二人被慘殺事件發生。4月11日法首相對江澤民國家主席言明「不賣武器給台灣」。4月15日莊銘耀海軍總司令因購買武器濫職事件引責辭職。4月24日國民黨臨時中央委員會通過由下屆總統為民選與憲法部分修正案。5月1日民進黨主席施明德就任。5月6日永野茂門日法相撤回「南京大屠殺為捏造」的暴言，7日辭職。5月26日克林頓美總統發表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6月1日中央銀行總裁梁國樹就任。6月10日中國地下核實驗。6月27日日本奧真理教松本沙林事件發生，死者七十人，受傷者五十二人。8月3日國民黨中常會郝柏村副主席批判李主席「一人修憲」，李反駁為偏見。8月9日李登輝接見世台會重要幹部。9月1日司法院長林洋港辭職，後任為施啟揚。12月3日台灣第一屆民選市長現任宋楚瑜當選，第一屆民選台北市長為民進黨的陳水扁當選。

1月17日文學部好友高橋秀教授最終講義（退休前最後一次公開講課）演講。1月25日寄給張光直等《台灣總體相》《台灣結與中國結》等書。1月27日寄安藤彦太郎元早大教授《愛憎二・二八》《台灣結與中國結》兩冊書。1月29日蘇志誠來電話說李登輝託購岩波文庫全套。2月10日給中時寄稿，寄書給曾永賢。2月15日接歷史研究會的稿約，五月底二萬字，暫題為「戰後50年在『台灣』に讀み解く」。2月18日學士會館城仲模晚宴。2月19日讀賣原稿開始寫，將登於《THIS IS 讀賣》雜誌，一萬字，暫題「二元論的台灣認識を正せ」。3月10日寄信給丸山（讀賣）。國建會。3月15日寄興夏一萬美金。六點半東京大飯店李雲漢氏招宴。3月16日回請李雲漢氏於新宿朝鮮料理。六點、八點文部省懇親會於日白立門徒飯店（Richmond Hotel）。3月19日寄國統會相片，給陳昭瑛信。3月20日給蘇志誠與李登輝信。3月22日伊香保溫泉與楊氏（六生）、安藤住一夜。3月26日返台。3月28日沈君山來朝代飯店。王曉波等聚宴於朝天鍋。3月30日總統召見郭茂林父子。3月31日訪問楊漢之兄宅。4月6日總統府2F會議室，第三屆研究委員第一次會議。與映真於金石堂喝咖啡。4月7日中央研究院見李遠哲。中央通信社見施克敏。於福華江南春與玉法、雲漢、永敬、三井飲茅台。4月8日第十次全體會議總統府3F大禮堂。4月10日返日。4月19日「吉野作造」稿約三千兩百字四月中。4月25日名古屋NHK來室。5月17日紀國屋書店會場六生。5月19日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於都飯店舉行。5月21日寄興夏三千美金。6月15日飛台灣。6月16日見政大鄭校長。6月17日曾永賢來共進早餐。國際青年活動中心講「從『馬關條約』一百年告別中國」遊行談起。6月18日返日。7月10日寄李總統信。見三省堂伊藤氏於紀國屋書店。7月15日返台參加國建會（於凱悅飯店）。7月16日報到。曾永賢兄來室。7月17日在凱悅正門等郭純佑（郭茂林子）到總統府一同見李登輝。7月19日陳映真來。王榮文來。7月20日總統召見。7月21日政府新形象研討會。晚宴。7月22日閉幕式。7月23日飛香港。7月25日入深圳住站傍香格里拉飯店。7月27日飛江西，夜宿南昌。7月28日由南昌到廬山。7月30日開會（海峽兩岸學術討論會）。8月2日景德鎮。8月5日由南昌飛北京。8月18日、22日成田飛高雄參加Asia Open Forum。8月25日蔣義斌來大門等，一同去訪問孫主任（文大史學系系主任）。8月26日弔大姊。8月28日訪文大，與王教務長、林校長、張董事長談一九九六年後專任事。8月31日吳克兄來。朝代飯店大廳等吳祕書長。總統府二號門進入晉見李登輝一小時。曾永賢託信。9月2日飛東京。9月4日飛北京。9月6日桂林。9月10日香港。9月13日成田。9月29日去福岡UNESCO演講。10月3日西荻窪車站接林照真（中時記者），她來查「白團」，戴給

她指點與意見。10月4日於紀國屋書店見唐松章。10月5日NHK前田氏來採訪有關他參加的三個會議——一九九五年國建會、紀念抗戰勝利五十周年（香港）、Asia Open Forum。10月14日與矢吹晉在機場碰頭出發參加台灣大學教授許介麟召開的專題討論會。10月15日戴講「出埃及記與台灣民主化」。10月16日總統召見與會學者專家並交談。房金炎次長招宴。上新店山上看房子設計。10月17日潘國史館長招宴。台視來飯店大廳。10月19日在立教禮堂講「台灣の近百年と日本——私の體驗からのアプローチ」。10月20日新宿文化中心看電映，「脫出」。10月28日給蘇志誠（總統）寄信。10月31日返台。11月2日郭茂林先生來接上山（新店）。與曾永賢共進午餐，曾的學生張榮豐（對戴有歧見，兩國論策畫者之一）陪。11月3日去看楊漢之兄。去看孫大川主持的雜誌社。11月5日訪魏廷朝捐一萬。11月6日總統府二號門入，總統召見。11月7日返日。11月16日寄給《台灣與世界》（在美發行的雜誌）小文。11月22日《中國導報》記者來訪。11月24日在國立公民館講「台灣における日本の植民地支配」。12月2日立法院投票日。12月7日給興夏寄一萬四千五百美金。12月25日NHK大門（國際局中國班、前田昭明氏）錄音，講近一年的中台關係，江八點、李六條、四評六彈的評價，分析這次選舉新黨的躍進（21）與一國兩制推出枱面的原因。12月29日去千葉書庫取《警察沿革誌》與《金瓶梅》。

1月17日阪神大地震（日本）發生（M7.2），死者五、四三一人，負傷者二六、八〇一人。1月30日江澤民提相互往來等八項提案，稱之為江八點。2月15日中國人口十二億。2月19日美原子能航空母艦通過台灣海峽。2月28日李登輝總統代表政府正式對二·二八道歉。3月1日全民健康保險實施。3月20日中央銀行總裁因病辭職，後任為台灣銀行董事長許遠東。東京地下鐵沙林事件發生，死者十七人，負傷者五千五百人。4月8日李登輝總統對一月三十日的江八點，以六項目的方針因應，稱之為李六條。4月11日上海的地下鐵全線開通。4月16日馬關條約一百周年，要求台灣獨立一萬五千人上街示威。6月9日李登輝總統於康奈爾大學演講。7月17日國家建設研究會。7月18日新華社發表21日、28日於東中國海公海上，實行飛彈試射。8月10日中國發表8月15日、25日再次的飛彈發射演習。9月1日李登輝總統候補，指名連戰為副總統候補。9月3日江澤民國家主席批判日本的歷史認識。9月24日民進黨第二次預備選，選出彭明敏為總統候選人，謝長廷為副總統候選人。10月21日陳履安總統候補，指名監察委員王清峰為副總統候補。11月15日另由國民黨自主參選的林洋港總統候補，指名同是國民黨副主席的郝柏村為副總統候選人。12月3日國民黨取消林洋港與郝柏村的黨籍。12月9日林洋港、郝柏村以公開文書批判李登輝主席「毀黨叛國」。

1月20日開始構想最終講義（退休前的一次公開講課II講演）。1月24日最終講義。晚宴於立大第一學生食堂。2月21日給文大孫主任寄表格（申請專任教授）。3月4日十二點於新宿中村屋3F見長野女士（為戴的新書《台灣という名のヤヌス》畫封面）與伊藤雅昭氏，並給他最終原稿磁碟片。3月17日與小林弘二（《朝日》記者）氏一起飛台看選舉。3月18日參觀二・二八紀念展。晚間七點與小林等晚飯於朝天鍋。3月24日交給戴興盛四萬美金、四百萬日幣（購屋金的一部分）返日。3月25日畢業典禮（立大）。3月27日去政大系裡填表格（申請兼任教授）。4月2日由總統府二號門進去見祕書長。下午四點見了懋時國安會祕書長。4月3日返日，開始年金生活，每月四十八萬六千八十七日圓。4月8日飛北京。4月13日飛貴陽。4月14日遊黃果樹公園。4月15日遊紅楓湖苗寨、侗寨。4月16日飛海南島、海口。4月17日遊蘇東坡五公祠。4月18日赴三亞泊興隆溫泉，興隆農場為印尼、馬來亞華僑經營的。4月19日由興隆回三亞夜泊三亞，夜聽春雷。4月20日訪天涯海角，訪鹿回頭，下雨，夜泊三亞。4月21日回海口，對海南島的印象，俗氣、過剩投資、外華內貧的典型。道路、水、電氣（電信）都有，剩下的問題是勞動者的質、衛生環境、水的處理（大樓內）與管理問題。4月24日由北京飛東京。4月25日與吳克泰兄（來東京）會晤。4月27日於立命館大學法學部演講「台灣戰後史と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ジレンマ」。寄給李登輝信（為擬邀請諾貝爾文學獎的大江健三郎與岩波書店社長訪台事做報告。為李「諾貝爾和平獎」活動的一環）。5月3日至總統府（見李登輝）。5月4日總統府見吳祕書長與丁懋時祕書長。5月6日時報林照真來旅館大廳要請戴為之寫序文（林照真著有關白團的書）。5月7日訪王作榮部長。5月8日飛返日本。5月9日新書《台灣という名のヤヌス》三省堂樣本出來。5月11日新書出版派對。5月17日日本各界友人為我們舉行歡送晚會於銀座東急飯店，與會者一百五十名，溫馨情篤感人。5月19日返台。總統選舉。5月20日晴天，李（登輝）之勢，不知有止境。5月21日由昨夜下起雨來，李氏真可謂幸運兒也。5月23日台大演講「光復後歷史經驗與台灣知識份子」。5月24日同上講「二十一世紀前夕台灣知識份子之主體性的建構」。一流知識份子暨學者（必具備）的十力：勉力（體力氣力）、努力、知力、直觀力、持續力、判斷力、批判力、創造力、表現力、領導力及膽力（女性）。5月25日由一號門進總統府。5月31日總統府送聘書至敝舍。6月5日名譽教授（立大）審議。6月7日上班，一號門進內。6月13日映真來聚餐（為陳信德先生日文著作翻中文出版事洽談）。6月15日拜訪埔心牧場黃烈火仙。6月16日聽胡乃元演奏會。6月17日殷宗文局長來訪，局長送禮。6月19日會議於祕書長室。6月29日曾永賢透露一小時之內（消息

（即傳遞過去（「可疑者」約有20人），語出驚人，府內諜影幢幢，莫非是自己影子嚇自己？莫非已開始疑心暗鬼去精存蕪了？6月30日中午文大蔣義斌、歷史系孫主任來宅小敘。7月5日戴飛日處理雜事，為搬書回台做安排。7月10日名譽教授祝賀會於池袋首都飯店25F。7月11日於都飯店駐日代表招宴。7月15日搬貨（書、家具、畫等）。7月18日返台。7月23日祕書長室開會。8月6日貨物抵基隆港，胡象賢去辦通關。8月8日曾顧問開會。8月10日興夏回來台灣學中文（師大語言中心）。8月20日曾顧問室開會。8月24日（25日開始整理搬回的圖書。8月28日國史館演講。9月3日曾顧問會議、專案小組第三次會議。9月11日潘館長光臨敝舍。10月8日東海大學演講「知識份子主體性的建構」。10月12日去彭榮次（李登輝台日關係重要民間連絡人）別墅訪問，此人由批金（美齡）到擁金與李右傾軌跡一致。10月19日陳永善（映真）研談：①新書翻中文事，②序文，③《世界》雜誌事，④白色恐怖國際研究會之事。成大蔡教授來訪。10月22日楊漢之先生過世，戴到楊宅並送靈柩赴火化場。祕書長政情報告。10月25日亞細亞論壇會在大阪舉行出席參加。11月5日返台，準備黃教授演講稿（陽明大學）。11月8日選富邦六十萬元，尚剩二十四萬九千零三十一元。11月23日參觀於力霸大樓7F舉行的「五十年枷鎖」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照片展，陳映真主辦。11月28日戴飛日。11月30日《史苑》（立大史學會出版）之憲約稿。12月2日與莊銘耀代表吃早餐於大倉飯店5F。12月7日參加鹿港坤元伯告別式。12月14日東大校友會講「日本體驗四十年」於環球俱樂部。12月16日訪王院長（回復頗慢也）。12月18日去交流協會回訪。12月26日當代日本綜合研究會第一次來宅開會，宋明順、張捷昌、蔡禎昌、曹瑞泰、林蘭芳、李朝津、戴各氏與會。12月28日台南訪問顏世鴻大夫，夜宿台糖招待所。

1月21日連接北京與香港之間的京九鐵路全長二、三八一公尺完工，起點的亞洲最大的北京西站開業。2月14日一九七九年的中越戰爭以來中斷的連接中國與越南的國際列車又恢復了。中國大陸人口十二億零七百七十八萬人。2月27日捷運木柵線開通。3月8日中國軍導彈發射演習，共計發射三枚地對地導彈於台北北部與南部的海域。3月12日中國軍在台灣海峽南端，開始九天的海空兩軍的演習。3月13日中國對美傳達「對台灣無攻擊意圖」。3月18日中國軍在平潭島周邊，由陸海空三軍做全國軍事演習八天，至25日終了。3月19日中國軍陸海空三軍全國演習在台灣對岸的福建省開始。3月23日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李登輝、連戰的國民黨候補得票率五四%的大勝。5月20日第九屆總統李登輝、副總統連戰就任。5月24日拉法葉型巡防艦第一艘「康定」號入左營軍港。6月15日民進黨黨

七屆黨大會，選出許信良為黨主席。7月1日李登輝總統與民進黨主席許信良會見。8月23日發行的蔣緯國自傳《千山獨行》，發表其父為戴天仇，母為重松金子。8月29日江澤民國家主席會見台灣全國工業總會（高清愿理事長），訪中團發表「政治不干涉兩岸經濟」。9月1日北京連接深圳的中國大陸最大的交通大動脈京九鐵路開通，全長二、五五三公里。駐港英軍由九月一日分四階段撤退。9月27日阿富汗塔里班反政府勢力制壓首都，政權崩潰。10月6日建國黨成立，主席李鎮源，副主席林山田、會長彭明敏。10月15日在野黨主導被否決的核四發電廠興建法案，通過立法院。10月21日桃園縣長劉邦友與縣議員等九人在公館內被襲擊，八人死亡。日大藏省命令陷入巨額債務超過的阪和銀行停止業務，此命令為戰後第一宗。11月5日美民主黨克林頓總統再選。12月31日宋楚瑜台灣省長提出辭呈。

1月2日莫那能、陳映真、王曉波等來宅，晚於國際學舍用餐。1月5日連文彬大夫與二公子昭志、曾永賢、張榮豐來宅，中午在敝舍用餐。1月8日帶蘋果去探望張光直（生病已出院）。1月28日於遠流開會。2月1日倪搏九顧問、蔡鼎新董事長、劉瑞生先生在敝舍聚餐。因倪顧問介紹蔡先生為圖書室寫招牌。2月6日除夕，回中壢老家拜祖先。2月16日葉榮鐘夫人施織織女士生日赴台中慶生。2月17日總統召見。2月19日下午三點於遠流開日本綜合研究會。每月例會一次。2月25日十二點正中書局會徐勝（韓人）君。2月26日左營參加拉法葉級巡洋艦編入式典，總司令顧崇廉上將為建中同學，同時受邀的有李厚白、厚業兄弟、黃士嘉、唐松章等。3月3日呈研究報告給總統。3月4日推薦蔡隆盛（日本野村證券公司課長）君，許遠東中央銀行總裁來電話願見蔡。3月7日中央銀行許總裁召見蔡隆盛。3月10日孫大川兄來。（推薦孫給李總統，李召見孫三十分鐘）。3月18日去原住民委員會看孫大川兄。3月29日小倉武一先生夫妻來台住圓山大飯店。訪合作金庫3F李連春先生（糧食局長時代的老相識）。4月3日託徐勝帶書給韓國朋友。4月8日許遠東總裁來電話，問蔡隆盛①何時能回來，②希望的職位與薪金，③詳細的履歷表。4月9日飛日。4月10日東京代表處與代表懇談。4月12日在家與興寧談他蓋房子的構想。4月13日立大濱田總長夫妻招宴於第一生命地下日本料理店。4月15日給曹瑛煥漢城西江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寄《台灣という名のヤヌス》。赴亞細亞文庫收集李登輝所要的文獻。4月16日矢吹晉、武見敬三氏會餐於新大谷飯店16F。4月18日中午莊代表招宴。晚小倉武一府上招宴。4月28日呈上手信，並送岩波文庫解題三冊給李總統。4月29日於中央銀行見許總裁並送上蔡隆盛資料。5月1日於晶華飯店歡送顧崇廉上將出國當大使晚宴。5月3日孫

大川在國際學生餐會。陳大姊（楊漢之夫人）來訪。5月23日中央銀行許總裁召見蔡隆盛。5月31日林中斌伉儷來訪。6月1日戴小娟（姪女）嫁女。6月8日李政光兒子婚禮，於來來飯店。6月17日亞細亞二十一世紀獎學財團論文審查委員會。6月18日會岩波書店岡本「世界」編輯長。6月24日呈送日文報告給李登輝。6月25日呈送中文報告給李登輝。6月26日交流協會隈丸優治氏會於希爾頓大廳。7月4日去泰國（彩美同行）。7月5日許代表夫妻招宴（夫人顏粹咩為彰女同班同學）。7月6日許代表來接去吃海鮮。7月9日李國用早餐。7月10日許代表的黃祕書來送機返台。7月23日在家宴請後藤利一、隈丸優治、黃肇松、孫大川、羅吉煊諸氏。7月27日去清華探望張昭鼎兄家族、公子於校門口等候，張夫人出國不在。中午沈君山兄宴請於清華，我們夫婦與邱近思共四人。7月31日去見劉泰英談李登輝紀念圖書館事宜。但李已無心於文化事業，談不出結果。8月1日胡鑫麟先生與陳文典先生來宅。8月10日興宇到台北，直接接到淡水打高爾夫球。8月12日興宇的女朋友三笠小姐來。8月14日、15日國輝、彩美、興宇、三笠小姐遊花蓮。8月16日邱創壽先生宴請，邱、戴兩家聚餐於世貿大樓瑪瑙廳。8月17日興宇、三笠返日，卻因興宇入境時不知須辦役男該辦的手續而出不了關，費了一番周章。8月27日赴交流協會後藤利一氏家宴。8月28日興夏辦戶口（因出生日本在台灣沒有戶籍）。9月4日《聯合報》王震邦兄來。李總統訪中南美共十六天。9月23日邱創壽夫婦招宴，另有柯建銘、顏慶章兩夫婦。戴國亮父子來訪。9月25日給陸委會張（？）林（中斌）寄稿本（美日指南）。9月28日於國父紀念館演講廳講「試論新歷史的構想與建構」，中華歷史學會舉辦。10月3日葉家（二姊夫）告別式。10月15日師大地理系講「日本的近代化與殖民、移民政策」。10月20日福華地下月桂廳（國史館書評會）。出發至福岡 UNESCO開討論會，住福岡東映飯店。10月23日議員會館與杉浦氏晤談。與莊代表敘餐於六本木瀨里奈。10月27日於六本木瀨里奈與馬副代表夫妻會食。10月28日代表處派車來接送羽田機場回台。10月30日於政大外交系講「美日安保合作新舊指南的比較分析」。11月3日興寧來台。11月7日武見敬三君來。11月13日福華大廳會晤郭茂林氏。11月14日呈資料給今上。11月15日南下成大授課。吉田實（原朝日記者）訪台。11月27日於山王飯店大廳會杉浦議員與莊代表會餐。11月29日縣市長選舉投票。12月5日完成國史館稿件。12月12日原住民委員會。12月13日國安會。12月20日邱創壽兄嫁女兒，於晶華3F舉行婚禮。

1月10日中國一九九六年的粗鋼生產量一億三十五萬噸為世界第一，日本九、八七七萬噸為世界第二。2月19日鄧小平過世（92）。3月30日江澤民主席談「中國統一後，副主席的職位，從台灣迎接人材」。4月28日白冰冰的女

兒白曉燕十四日被誘拐，二十八日死體被發現。5月2日李登輝召五院院長、各部長開治安緊急會議，並向國民道歉。5月4日因治安惡化，五萬人大遊行，要求總統謝罪與更換內閣。6月18日台灣師範大學發表調查報告，關於一九六一年發生的「四六事件」，當時一百餘學生被逮捕。7月1日香港主權由英返回中國，行政長官為董建華。7月18日國民黨與民進黨合作，制憲以來最大規模的修憲工程完成，新黨退席。7月28日憲法追加修正。8月21日連戰內閣總辭。9月1日蕭萬長內閣起步。11月8日中國長江三峽水壩工程，長江的本流被攔截成功。11月24日日本創業滿一百年的山一證券公司發表停止營業。11月29日二十三縣市統一縣市長選舉，民進黨由六增加為十二，國民黨由十五降到八。

1月2日團拜。1月3日到國父紀念館。評呂(？)強論文(斷之為騙稿費)。1月11日長野ヒデ子母女來台住敝舍，戴文英(堂妹)嫁女在內政部為福樓舉辦婚禮，日本來客長野二女士也參加。1月25日胡鑫麟先生過世家祭。去新竹文化中心參觀民運先驅蔡式毅先生資料展覽會。2月12日辦民俗台灣研討會於國立圖書館台北分館。2月22日晶華21F北客廳送交流協會後藤利一氏，小丑彭榮次愈來愈醜，遠哲、崑巖見解可也。2月26日後藤利一惜別宴。2月27日國安會。台北出發去澳洲(彩美同行)。2月28日墨爾本。3月4日悉尼。3月6日黃金海岸，宋欽章兄夫婦來接(宋兄招待)。3月8日新加坡。3月9日返台北。3月15日葉紀東兄見於希爾頓大廳。3月16日政大外交研究所演講：「日美安保之新解釋與指南」。到宜蘭林忠勝董事長辦的私立中學參觀。興夏學費三萬元。3月17日老闆突然來室(沒預告不敲門)，問及訪澳事與研究近況，(吳)伯雄不准訪(大陸)由老人(？)直接溝通。3月26日送宋欽章夫人蔡富美書與稿(尊翁蔡式毅先生的《蔡式毅行迹錄》代序稿)。並結清籌借款項。3月31日探望動手術的廖運逢兄(竹中前輩鄉兄)。4月7日阿部史子、美紗等立大同一班學生晚宴兼慶生(戴生日為4月15日)。4月9日與興宇、興寧、彩美聚餐於西荻窪家族為戴國輝慶生。4月12日中壢老家重劃委員會開會。4月25日希爾頓與周青面談。4月26日陳映真來宅，為陳信德著《現代日本語實用語法》(人間出版社)平林千鶴(陳夫人)女士序文事宜做推敲。4月27日錢復外交部長宴會。4月28日與曾永賢兄談：①人民元，②國企改革與朱鎔基。4月30日來來大廳會張建國民(日本華僑在台投資發生糾紛)。5月6日吳伯雄基金會成立。5月15日國家音樂廳客家音樂會。5月17日《聯合報》何振忠君來宅。5月25日曾永賢國策顧問對田弘茂、許介麟二兄有評語。5月29日淡江大學演講「日本親美入亞之路」。6月2日謝金河、郭正亮、黃清龍、莊佩章諸兄來宅，家宴，談得

頗歡。6月4日赴日。6月5日莊銘耀代表會見。附內川千裕草風館社長《證言台灣高砂義勇隊》（林えいだい著，草風館出版）書款七十冊（2800円×0.7×70=137200円）。6月11日下午三點半會最高法院林明德院長（建中同學）。6月15日帶興夏去見和泰汽車董事長蘇燕輝先生（商量碩士論文實習事宜）。6月19日赴日，收集當前工作所需的書，自民黨調查會《外交政策の指針》97/3版；《日米安保體制の今日的意義》96年版；《日米安保共同宣言と今後の安全保障》97/4版；データハウス《台灣ロビー》本澤二郎。6月22日自民黨事務局會早坂義弘（立大畢業生）君。雅敍園細川日本料理，馬乾意副代表邀宴。6月24日何振忠（《聯合報》）君來電話（請戴談「二十一世紀初的東北亞與台灣」有關的話題？）。6月26日何振忠君來宅。6月30日國軍英雄館送別林處長（？），兩林對話很玄妙。7月4日準備演講稿：①扶輪社，②社會大學（變與不變）。7月8日來來12F一品廳東門扶輪社開會講演（開拓新的價值新的時代？）。7月9日社會大學授課，反應尚可。7月14日農委會午宴，大三元2F。7月18日長庚開球，錢復部長、邱創壽兄二對夫婦同遊，話題為張瑞猛（？）與鄭淑敏、蘇志誠二密使當事人。7月20日孫大川來室。在孫辦公室討論。7月21日帶馬乾意（已退休回台）兄去見和泰汽車蘇董事長。7月24日訪廖運逢氏。7月27日體驗，去第一銀行中山分行2F黃士嘉兄畫展。在國賓後巷傍春日日本料理會餐。7月30日見林明德（最高法院）院長（建中同學）。7月31日中廣新聞部2F錄音室。晶華飯店地下2F江戶麒麟與諏訪、門馬理良（以上交流協會）、楊渡、徐宗懋、孫揚明（？）會餐。8月1日國際學舍餐廳送別邦仁（姪孫）赴美晚宴。8月10日給亞太司司長張金鈞先生電話。8月11日任權廷君邀宴，還有陳仁端、遠藤兄（均為東大農經系同窗）等自日本來的遠客。8月12日平鎮地政事務所辦手續。8月13日接受中時記者張慧英小姐訪問。8月14日國史館朱副館長來宅。飛澳洲（彩美同行）。駐墨爾本辦事處沈祕書來接。晚在華埠上海館用餐，可也（味道）。8月16日李連輝夫妻來飯店（澳洲移民）、興夏傳真送來中時8月15日稿。8月18日赴墨爾本辦事處訪問梁英斌處長與沈祕書，交談甚愉快。8月19日飛悉尼，沈祕書來送行。8月20日朝林肇基（澳洲移民）醫師與林小姐來接，去看他的房子，晚林醫師請客，又約數位移民共敘，以了解台灣移民的生活與感想。8月21日乘計程車赴機場，飛黃金海岸，適逢移民開同樂晚會，我們也去湊熱鬧。8月23日由佈里斯本飛新加坡。8月24日返台。林明德（建中同學）院長宴請於來來2F，顧崇廉將軍、簡又新、李厚白（建中同學）、唐松章等同席。8月26日圓山飯店與宋欽章夫妻會餐。8月29日晚在家宴請和泰汽車蘇經理及幾位同事，以感謝接納興夏畢業論文實習。9月3日原住民民

委員會孫大川副主委召開會。9月11日國史館(周瑋環)小姐來宅送稿。9月18日上午十一點二十分會永賢顧問見面。9月22日大三元蘇起兄招宴。9月25日日本PHH研究所訪談李總統於大溪官邸,每天約錄三小時,7、8次可成書(《台灣之主張》,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七日。中文譯本改題《我的主張》,遠流出版,內容有更改)。9月28日南天魏德文兄同赴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10月2日孫大川兄處會餐。台大校友會館齊老百年冥誕。敦化北路蓮園,客家文化界、學術界鄉親聯誼晚宴,黃旺秀董事長做東。10月4日東方球場,與邱創壽兄球聚。10月9日伯仲基金會與黃旺秀兄談。10月15日原住民委員會籌備會(台灣高砂義勇隊歷史回顧、系列活動、研討會,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三十一日)。10月17日歐亞學會稿約三千字。10月19日會曾永賢閒談、陳碧炤兼四所、戰略暨和平研究所,國關(中心)無用也(李登輝不能掌控)。10月20日借給曾永賢兄《政壇秘聞錄》,師東岳著。楊(六生?)來訪問聊簡(又新)代丁(懋時)、李可能再選、房(金炎)接莊(銘耀)推測。10月21日出發飛福岡開會(UNESCO)。10月22日與林榮代(《證言台灣高砂義勇隊》著者,日本草風館出版)、森川(林榮代祕書)氏用餐。10月23日休息喝咖啡,朝日記者三木君來訪。10月24日飛東京。10月25日去看興宇預定蓋房子的土地,晚上一起用餐。10月27日訪莊代表。返台。10月30日張慧英(中時)小姐來一號門。11月2日正中書局會魏老闖(南天書局)討論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將展出的台灣高砂義勇隊歷史資料回顧展佈置事宜。11月6日飛關西(日本)。11月9日赴東京。11月14日會高橋秀(立教退休教授、好友)氏於吉祥寺。11月15日新宿中村屋4F與矢吹晉、鈴木、星野三兄會餐。11月16日出發返台。11月17日高橋秀氏來台。於老爺飯店會高橋秀兄。11月20日孫大川處開會,秀氏返日。11月21日成大上課(當日飛機往返)。11月26日信義俱樂部「東亞區域安全與發展論壇」討論會。與原委會主委華氏談。11月28日胡象賢來接,赴國父紀念館演講「日本的社會教育與一般市民生活」,巧遇王永慶台塑董事長。吳坤燦兄、徐小姐(台大法律系)等人禮金四千元。12月1日孫大川處拿資料。魏德文氏來宅。12月7日彭主委(農委會)晚宴。12月15日赴國安局簡報。12月16日到永和市竹林路竹林小學與丘校長(丘念台先生千金)會晤。12月17日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看展覽會準備的情形。晶華3F宴會廳讀賣新聞支局開局宴會,編輯局長老川祥一、支局長河田卓司。12月18日國賓12F謝大法官聚餐,小島麗逸到台。12月19日伯仲文教基金會、原住民委員會座談會。12月21日高砂義勇隊歷史回顧研討會。12月26日六點會林和星(旅日華僑)。麗晶大廳會林一(音樂家林二胞兄、日本昭和醫大教授)。12月29日伯仲基金會見葉日和總經理與呂代書。12月30日信義俱

樂部當代日本綜合研究會，該會自此由遠流出版社移至此，繼續每月的例會。

1月24日縣市議員與鄉鎮市長選舉，國民黨勝利。2月16日印尼飛台北中華航空班機在台北中正機場著陸失敗，墜落住宅，乘員乘客一九六人，住民六人死亡，許遠東中央銀行總裁夫婦等罹難。2月21日台、美對WTO加盟問題會談五年共十七回，達到合意。3月17日第九期大選出朱鎔基為總理。4月5日世界最長的吊橋明石海峡大橋（日本）三、九一一公尺開通。4月11日建國黨主席許世楷。6月7日林義雄當選民進黨主席。6月9日日本政府承認台灣旅券七十二小時的入國免除簽證。6月13日台灣地區鄉鎮市代表與村里長選舉，國民黨佔優勢。6月25日克林頓總統到西安，將做九天的中國訪問。6月27日克林頓與江澤民會談，在卸下核彈照準等達到合意，明言「三個不支持」政策。6月30日克林頓於上海與地方指導者的懇談會，再次明言「三不」政策。7月1日江澤民國家主席談「香港的一國兩制對台灣有榜樣效果」。7月6日香港新國際空港開港啟用。7月24日交通部與台灣高鐵聯盟，就高速鐵路建設簽訂契約。9月24日民眾院通過「國防授權法案」，將台灣包含在戰區導彈防禦體系。10月14日海基會的辜振甫理事長與海協會汪道涵會長的民間高層會談於上海開始，距93年4月新加坡會談五年半。

1月3日去台南，夜泊劍橋飯店。1月6日孫文研討會。1月12日新豐開球與謝森展（謝）森中球聚。1月14日於民謠餐廳與陳映真餐敘。1月15日林明德院長來電話。范德助公子婚禮於來來B2。1月20日（日本）綜合研究會茶會。1月28日來來金鳳廳B2志揚（吳伯雄長子）開派對。新聞局長程建人宴會於晶華20F。1月29日送丁（懋時）米英雄晚餐。2月6日返台。2月8日伯仲基金會董事會。2月9日與曾永賢顧問談（府內風雲）。2月11日林口球場與隅丸（交流協會）球聚。2月15日返中壢老屋祭祖，並第一次宣示老屋解決方案。2月18日長庚球場與鍾振宏（原駐以大使）、邱創壽、范德助。2月20日東華開球同聚者為隅丸、朱昭勳律師。2月27日小溪地球場與鍾振宏、余玉堂（原警政署副署長）球聚。3月5日邱創壽家宴受邀。3月7日與蔡清彥國科會副主委打球。3月10日於桃山（日本料理）與郭冠英（新聞局）BBC記者談西化與台灣。3月12日與《新聞》林文政等敘餐於極品軒。客家晚會。3月14日中午陳國彥夫妻（原師大教授）招宴，宋明順（原師大教授）夫妻列席。3月15日中午寶船，曾永賢、胡俊秀、林希鵬餐聚。3月16日於信義俱樂部開當代日本綜合研究會。3月23日赴日參加國際研討會。3月26日訪莊代表。與社會思想社交涉《霧社蜂起事件——資料与研究》譯成中文在台出版事宜，得到同意。3月

27日大媳婦娘家三笠家家宴於橫濱。3月28日返台。4月2日找徐立德談李之事。4月4日西華3F元廳會佐佐淳行(原日本內閣保險室長)。4月5日耕莘文教院楊逸紀念會。4月6日國安會議。交流協會山下所長家宴兼隅丸氏送別會。4月8日赴日。4月9日東京飯店2F咖啡廳與社會思想社浦田編輯部長洽談，戴國輝編著《霧社蜂起事件——資料と研究》的中文翻譯出版，取得同意。4月10日大兒子興宇與三笠小百合舉行婚禮於東京。4月12日返台。4月14日開始準備成大、逢甲大之稿件。4月21日希爾頓大廳，宋欽章、宋霖岳(同為宋屋國小同班同學)聚餐。4月24日興宇、小百合出發渡蜜月旅行於義大利共十六天。4月26日晚田中(在中野學校)二次大戰時日陸軍訓練特殊間諜的訓練營)學習過)之子來電話。4月28日於寶船借給胡俊秀張秀哲著書。4月30日七點交流學會山下所長家宴，夫妻同伴，有黃世慶(心臟科)大夫夫妻、曾永賢、鍾振宏夫妻同席。5月1日與王曉波閒談時事，斯時連宋配甚囂塵上。5月5日寄稿子給穗積一成(穗積五一(戴保證人)之子)。5月11日曾永賢來說，李登輝難於下手，告要重編(曾永賢應是掌握內幕或間接傳達戴不受續聘，其實戴早就感到宮中非棲身之處，萌生去意已久，只不知何時開口，躊躇之間先被將一軍，悔不當時遺恨千年)。5月15日成大演講「台灣現代史的幾個問題」，夜泊成大。5月16日涂永清教授來接，向台中出發，去逢甲大學參加「丘逢甲、丘念台父子及其時代學術研討會」當第七場評論人。專題演講主講人講「我所認識的丘念台先生」。5月17日台大校友會館1F會文大王吉林所長。住進台大醫院。已被通知不續聘為國安會諮詢委員。5月18日體檢出院，胡象賢(三年來的司機，多蒙照顧，感謝!)來接。5月19日李登輝預定召見，卻改期。殷宗文、曾永賢於桃山歡送。劉處長陪著辭行。交返錢(付到月底的新水又追收回去)、鑰匙及別針，步出府外，無官一身輕，兩袖清風。5月25日寫稿〈從奈伊博士的戰略思考考察東北亞三大火藥庫之未來〉。5月28日大三元范姜群生招宴。5月31日與林和星餐敘。下午四點半吳伯雄來電話，問戴今後之去處，曾有無交代？似乎試探有無殃及池魚。6月2日政大最後一堂課。李登輝取消召見。與唐德剛等餐聚於永福樓。6月3日與陳映真會於重慶南路。6月4日於伯仲基金會與吳伯雄談三十分。士林中正路口(會李薰山(李登輝加入中國共產黨介紹人之一))。6月7日台北東區扶輪社開會於國賓12F樓外樓，講「美日安保對兩岸未來的影響」或「近代中日關係對未來台灣的影響」。6月9日朝赴桃園縣新屋鄉領土地補償金。6月11日李登輝召見。南天書局預付一百萬日幣版稅。6月12日報到，台大第二學生活動中心自由時報辦研討會(？)。6月14日南天書局預付十五萬元。6月15日赴日。6月16日給武見敬三議員秘書齊藤打電話。於雷關大廈與郭

茂林、福士昌壽紋餐。6月17日參議員會館521室訪武見敬三議員。6月20日與三笠家人餐聚，（父親節），興宇請客。6月21日贈送興寧一百萬円。6月23日返台。6月24日政大戴振豐論文審查，訪南天書局。6月25日與魏德文、孫大川會。6月26日成大學生來宅。一起吃飯。7月5日魏德文來宅點看要放到新書上的照片。7月6日出發去夏威夷（彩美同行）。7月7日到達夏威夷，晚吃披薩，購球具，宋欽章夫婦與宋大小姐昭儀自美國來會合。7月8日到夏大購書，中午在北京飯店戴請，晚宋欽章請日本料理。7月9日晚間九點五十分從Honolulu飛Maui住宋先生別墅。7月12日從Maui飛Honolulu（國輝與彩美準備飛賽班島，看二次大戰困擾日軍的日美激戰地）。7月13日從Honolulu先飛Guam，晚上給台北的興夏打電話。7月14日到達賽班島，投宿球場旁的俱樂部，設備簡陋，一晚一百七十六美元。天氣潮濕又熱，真難熬。除了高爾夫球場，服務業之外，幾乎沒什麼產業與特產，民生用品，仰賴夏威夷，為美託管區有美軍駐守軍事重地。7月15日坐一趟免費公車去繞了一次，除了幾處購物中心，幾乎就沒有什麼可參觀。7月16日國輝一人打高爾夫，一百零四美金。7月17日國輝一人打高爾夫。乘日航飛機到成田。7月19日給館齊一郎寄三萬円與小文一篇（館齊一郎東大農經系同窗，在編神谷慶治恩師紀念文集）。去水道橋三省堂，給邦敏（姪孫斯時在日留學）寄錢。7月22日去東洋經濟（出版社）訪大貫英範出版局長。7月24日參加興寧在千葉縣船橋市西習志野新蓋房子的上梁儀式。7月25日出發回台北。7月30日於緬甸餐館與王曉波餐敘。7月31日大三元宴請政大企管系研究所于老師、于師母、王榮文，戴家三人感謝老師對興夏的照顧。8月8日台中三姊（李姊葬禮）。8月13日付宋欽章三百四十萬本票（為代墊房屋款之一部分）。8月14日苗栗之遊（魏德文、胡俊秀、李元勳、李、林希鵬夫妻、戴夫妻），夜泊通霄鎮南和李老家。8月15日苗栗之遊與友人分道南下台中，夜宿富王飯店。8月16日晚社會大學台中上課，講「李登輝時代——這是什麼樣的年代」。8月17日乘火車返台北。大三元，楊六生、余玉堂、蔡清彥、范姜群生、鍾振宏皆來，曾永賢缺席，傳出殷宗文肺癌，簡又新可能接。8月26日大三元曾永賢招宴，「許文龍以一百萬元購彭榮次」話題當下酒菜，說三道四。與彩美在衡陽路碰頭一同去天母。8月27日蔡禎昌來接，耕莘醫院急診。8月28日住院，興寧自東京來。8月30日轉院到台大醫院。9月10日出院。9月15日下午內科門診王正一教授。9月16日文大開始上課。9月17日國史館開「台灣史料的蒐集與運用學術討論會」。第二場討論會主講人講「我在日本蒐集有關台灣史的史料暨資料的回顧」。9月18日國史館開學術討論會。信義俱樂部潘館長宴請。9月19日付宋欽章六萬二千五百元。清掃天母房子，陳良潮幫忙。9月21日

台灣大地震死傷損失慘重，彩美在日本電話不通。戴與陳封平（斯時為興夏男友）、興夏去天母，宋欽章夫人送桌椅。9月22日台北社會大學講「傾聽歷史的聲音」。9月23日赴市公所遷戶口到中山北路七段。9月28日於台新開支票四十五萬還宋欽章，下午郵局停電不能辦。9月29日蔡素貞（文大博士班學生）來接。文大上課。台大醫院門診，預約耳科、內視鏡科。10月2日訪莊教授於遠東聯合診所，感謝轉院至台大醫院時的協助照顧。10月13日上午內視鏡檢查。10月16日早上南下成大，晚上返台北。10月17日虞義輝主任（國安局）來宅，為撰寫博士論文事宜與國輝商量。10月19日早上到吳府，餘鍊兄送畫。10月20日內視鏡檢查。10月25日助聽器二萬五千元。借給南天魏德文兩本震災史，新竹、台灣昭和10（一九三五）年。10月27日內科門診。10月29日新店家門口等車子。總統府一號門進入，開會，楊三民所所長、王治國文大碩士、陳福成台大總教官、徐（立德）、吳東明。10月30日南下成大，夜泊台南，體重六九·二公斤。10月31日離開成大，趕赴圓山飯店報到。晚宴，體重六八·八公斤。11月1日看唐（松章）論文，體重七〇·四公斤。11月2日第七次討論會於故宮行政大樓大廳，體重六九·六公斤。11月3日碰上周順圭（六〇年代在東大同時期留學的上海人〔？〕，現住美國。體重七〇·八公斤。11月6日飛台南，夜泊台南，體重七十公斤。11月7日成大，返台北，體重七〇·八公斤。11月8日侯君（國史館）在政大等。台大校門會林和星，夜泊天母，體重六九·二公斤。11月11日飛羽田。11月13日晚在橫濱三等親家晚宴。11月14日返台。11月16日亞泰飯店3F王震邦（《聯合報》）等人聚餐。龍應台局長、王曉波教授餐敘於復興南路朝天鍋。11月19日六福客棧與木宮圭造（東大農經系研究所同班同學）朝餐。11月20日中山人文社研會議廳開東亞海洋史與台灣島史座談會。11月21日成大，晚返台北。11月22日新生南路咖啡店與陳映真對談，晚不能吃，翌日內視鏡。11月23日內視鏡，兩個月後追蹤即可以，可不結紮。傍晚發高燒。11月24日下午耳科助聽器特別門診。11月26日孫大川大樓前候魏德文訪楊（翠華，楊克煌女兒）小姐，談得滿愉快。台大前緬甸餐廳與王曉波餐敘。11月27日開始準備文化大學演講（12月4日）「司馬遼太郎與我暨台灣」（暫定）。11月28日一起遊苗栗的友人們在敝舍晚宴。11月30日來來地下2F金華廳、西門扶輪社演講。12月4日文大演講於華風堂，「司馬遼太郎、日本、台灣與我」。12月7日十二點十五分新生南路陳映真午餐。12月12日成大上課。飛返台北。12月15日門口候虞主任義輝車子與主任餐敘。12月16日國家圖書館報到「中央與地方關係學術討論會」。12月22日當代日本綜合研究會忘年會。12月24日夏珍來電話。與夏珍餐敘。12月25日飛台南，成大上課。12月27日福華2F台商會，陳淑美也來。

1月7日市政府4F東北區文化局大會議室，商討二·二八紀念事宜。1月9日龍應台宅。1月11日國父紀念館。1月16日中壢魏廷朝告別式，香奠三千元。1月17日還南天六十萬元。1月18日預定乘長榮BR80二飛香港，晚至東莞，台商會。1月19日參觀靴廠PRIMAX，與葉宏燈（東莞台商子弟學校與東莞台商育苗基金會董事長、東莞東聚電業公司創辦人）談五小時，晚與婦聯會共用餐。1月20日葉董車來接，參觀歐式家具廠，午餐在大嶺山，郭董等三人敘餐。1月21日自東莞去廣州，住廣州中國大飯店，台幣二千八百元，不含早餐。1月23日自廣州到香港，住灣嘴港島香格里拉飯店，受日本時事通信香港支局長樺澤克彥之邀24日演講。1月24日集合。午餐。演講「台灣總統選舉——その現状と展望」。在飯店大廳洪哥（在港台商）來會。1月26日於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國際賓館開「50年來的香港、中國、亞洲學術討論會」。2月5日返台，廖運逢（竹中前輩鄉兄）夫妻來宅。2月7日去陳純真（陳虛谷三男）家聚餐，尉天聰、陳映真、王曉波、戴、陳五對夫妻新年會。2月9日內視鏡門診。葉芸芸來住。2月11日天母廣場「回轉桌」與楊六生吃早餐談一小時。2月15日飛日，請求外國人登錄證、印鑑證明各四份。2月16日去入國管理局辦手續，去神保町。2月17日上午與興寧辦事。新宿中村屋與矢吹晉、星野、近藤大博、高橋政陽、鈴木餐敘。2月18日辦再入國手續。紀國屋書店1F會金安榮子，一起用餐。2月19日訪莊代表。乘華航，返台北。2月20日Y M C A與林和星見面。於來來與朝日堀江會面。2月22日小林伊織（現就職TVBS電視）審查碩士論文於政大東亞所。普通門診小手術。2月26日與王震邦、夏珍聚餐。3月4日王榮文母堂告別式。柏楊八十大壽慶生於福華。3月5日台北飛台南成大教書。返台北。3月6日於福華與倪搏九總統府顧問、唐松章聚餐。3月7日與虞義輝主任在中山北路七段「回轉桌」吃早餐。柏楊與野口座談會（戴促成並做翻譯）。3月13日政大，去遠流請王麗雪（王榮文姪女）做報稅申告書。血液檢查。於希爾頓大廳會郭茂林。3月14日與夏珍餐敘。與近藤大博、辻田誠司、高橋政陽、橫堀聚餐於圓山大飯店。3月18日南下成大。3月19日返台北。3月25日與三和銀行香港調查班（箱崎太〔京大〕高橋克彥、橫尾忠生）早餐會於老爺飯店。Y M C A，晚「心に刻む會」。3月26日國科會審查論文。3月27日會夏珍。3月28日到柏楊家。3月29日晶華地下3F與夏珍餐敘。極品軒與檜山君等六人聚餐，遇徐立德，談政治情勢與人事預想，建議郭茂林去找陳（水扁）談。3月30日虞主任早餐會，談及宋楚瑜不會回（國民黨），曾文惠運美金赴美而過不了關，全額遣返，持兩本護照等甚囂塵上的小道消息。接受史學會學生訪問。福華大廳會郭茂林。3月31日飛香港再轉機飛北京。4月1日買了一本《北京四百名醫》做參

考選了三個大夫，預約後準備一個一個去看，由此中選定一個。4月2日看醫生、買書、休息、吃藥，專心為求醫來北京。4月9日返台，帶一禮拜的藥與藥方。4月11日宋欽章夫妻來天母家餐聚。希爾頓2F與王震邦（《聯合報》）會面。4月13日帶「出埃及記」錄像帶。研究室等韓國留學生。4月15日成大學生來上課於敝舍。4月24日台大校友會館徐世傑（六〇年代同在東大留學時的友人）。與王榮文、曾志明聚談。4月26日群芳，王吉林所長宴請。4月27日給大阪「心時刻會」的六田小姐寄資料。4月28日去三重看中醫。與蔡清彥、王榮文、我們夫婦在日本料理店聚餐，榮文做東。5月1日台大醫院舊大樓做腹部超音波檢查。5月2日中壢大嫂告別式。善導寺前逸鄉園與楊六生、范等人相會。5月3日訪謝金河於辦公室。來來金鳳廳B2羊會（羊年生，企、學、官界名人會）。5月5日來來，朝日鈴木。福華地下一樓，文大碩士班謝師會。5月6日於回轉桌與虞義輝吃早餐。成大學生來宅上課。邱明哲（建中同學、住東京）歡迎會。5月7日日本田中來電話，想要見面。5月8日會王曉波。5月10日門診。5月14日於美麗華與邱（創壽？）、范（？）打球，難得打三個P.A.R. 5月15日與王榮文長談。於泰順街會廖運逢。5月18日台大校友會館會阮美妹（二·二八受害者遺族）。去三重看中醫，十二日份的藥四千八百元，窮人生不起病也。5月21日晚上不吃東西，準備驗血。5月25日畢業考試。5月28日美麗華李阿青（台灣資生堂董事長）招待打球。與錢復、程建人（？）兩部長球聚。5月31日與夏珍在汀州路泰國料理店餐敘。6月1日於亞都，史4謝師會。6月2日於來來，桃山、矢島誠司（產經記者）晚宴。6月3日成大博士班來宅上課。6月4日成大博士班來宅上課。6月5日王作榮院長深談。6月7日於大三元柏楊招宴。蔡禎昌招宴。6月8日飛東京。買《國民的歷史》，大月書店。6月12日二十一世紀獎學金財團審查論文。6月13日見岩波書店《世界》編輯長岡本厚。見林建朗（岩波），在書店看新刊書，也看檔案法關係書，夜泊千葉興寧處。6月14日請書店以快遞寄書來，夜泊千葉興寧處。6月15日出發去永田町。參議員武見敬三與矢吹晉三人共敘。6月16日赤坂J.E.T.R.O別館，開中國研究懇談會。6月18日返台北。6月19日審查台大黃教授門生之論文，22日交還孫院長（文大文學院）。驗血，還宋欽章一百五十五萬日幣。6月20日新黨結黨於一九九三、八、一〇，以F.A.X通知岡本厚。6月23日老爺飯店，客家菁英論壇。6月26日來來大廳會陳淑美。天津街2號，台灣客家記錄影帶發表會於行政院新聞局視聽資料處第一科（怪哉，局中大官們來問安）。6月29日師大審查論文一千四百元。6月30日台大校門朱昭勳律師招待。晚間六點半新店捷運站福臨門餐廳，許育銘胞弟婚禮。7月3日因檢查八小時不能吃東西。7月5日下午四點半

亞太飯店會誼訪君（交流協會）。7月9日歷史學會於台大應用力學研究所國際會議廳。7月10日彰銀本行解約還宋欽章四十五萬元。國賓會廖運逢。晶華大廳，楊志堅（文大碩士生）來見。7月11日王公館與王作榮對談，中時夏珍記錄（第一次）。7月13日JANUS像七千元付趙太順（文大韓國留學生）。7月14日血液檢查，寄台胞證。7月15日國賓2F富宜春會禮積一成，張氏宴客。7月21日檢查血液。7月22日榮懷遠廳，倪博九總統府國策顧問夫人公祭。7月23日天母大門等楊志堅。葉榮鐘新書發表會。西華3F漢廳晚宴。7月24日給旅行社電話。國賓會廖運逢（爲了校對魏廷朝譯、戴國輝編著《霧社蜂起事件——資料與研究》事商榷）。7月25日於王公館與王作榮對談（第二次），辦好郵局支票一百萬元還宋欽章。7月27日與王曉波、吳瓊恩餐敘於緬甸料理仰光。7月31日血液檢查。8月1日總統府祕書柳嘉峰安排見陳水扁，預定50分鐘。8月8日丁懋時請辭資政（《聯合報》）。8月9日王公館與王作榮對談（第三次）。台大校友會館林小姐送機票來，一萬八千一百元。門診。8月11日南天書局。視聽覺劇場吳守禮新書（遠流）發表會。8月13日飛大阪。給六田電話。給東京角田英一（亞洲二十一世紀獎學財團）電話。8月15日晚「心に刻む會」派對。8月16日飛東京。8月18日宋欽章、蔡富美夫婦投宿上野Park Side Hotel，晚上上野相會，宋請客。8月19日宋欽章來看北習志野（船橋市）興寧的新房子。8月20日宋欽章夫婦來興宇新房子就近的車站自由丘會合，興宇請客。8月23日由成田飛北京。8月27日興寧由東京飛北京與國輝、彩美會合。8月28日王榮文在北京住金朗飯店，馬以工也在北京。8月29日國輝、彩美、興寧飛黃山，晚上泊山下。8月30日上黃山，住山頂。8月31日飛上海，去領會上海的變化。9月1日返北京，給馬以工電話。9月2日於光明診療所接受指壓。9月3日興寧先回東京。9月4日看電影「生死抉擇」。9月5日去大連。9月6日去旅順港，參觀日露戰爭激戰之山頭20高地，巧訪「生死抉擇」的鏡頭，旅順港風景極佳。9月8日由大連飛北京。9月12日C A九二五由北京飛成田。9月14日於公證人役場（做遺書）。與岡本厚、馬場、莫君晤談，夜泊興宇家。9月15日返船橋興寧家。9月18日返台北。9月19日王公館與王作榮對談（第四次）。師大正門會蔡禎昌。9月20日與近藤大博早餐會，辻田誠司也來。文大上課。門診。9月21日體重七二·八公斤。9月22日在天母公園見到劉添貴（宋屋公學校、竹中學弟）之姊及羅吉煊，羅到敝舍小聊。9月23日於聯經會王津平。9月24日宋欽章邀請日本料理。9月25日體重七十三公斤。9月26日體重七一·四公斤。於水源市場正門送陳菽芊（姪孫女）書，祝考取台大。聯經會王曉波。9月28日與王作榮對談（第五次）。10月3日誠昌咖啡廳與徐宗懋見面。10月4日國賓

大廳會鍾雷章（鄉弟）。10月6日晶華飯店會陳振盛（寫李登輝故事後與李不歡）。10月11日門診。王正一大夫說恢復得好。10月12日宴請彭明敏、女祕書、羅吉煊夫婦與千金共七名於芳群。10月13日聯經與陳映真會面。10月14日王院長作榮對談（第六次）。希爾頓大廳會王津平。老爺飯店大廳會朝日新聞台北支局長田村宏嗣。10月15日圓山大飯店12F蔡清彥長男婚禮。10月16日與馬永成主任電話連絡。10月19日寄書給林叔品、丁果、葛英、馬必陽、楊六生。晶華大門送蔡隆盛書。老爺飯店送陳純真書。10月20日由正門陳總統召見。與莊銘耀國安會祕書長會談。聯合報大門送王震邦與林琳文書。到總統府正門會柳嘉峰祕書。10月22日誠品見吳克。10月23日國安會倪祕書交書類（遠流）。立航林小姐送來機票。10月24日與王作榮對談（第七次）。10月25日飛福岡UNESCO開會。10月28日福岡飛東京。10月30日於郭茂林事務所與郭談。於新宿與岡本厚談，夜泊興字家。10月31日返台。11月4日於王公館與王作榮對談（第八次）。11月6日真相TV採訪。11月10日楊建銘（文大藝術系學生）送自己的畫來，四萬五千元。11月11日老爺大廳與福田（立大畢業生）吃早餐，傍晚陳封平母親胡女士來敝舍。11月15日來來17F一品廳，演講「東北亞情勢新動態與台灣的去向」。門診。11月17日會莊銘耀祕書長。11月18日王公館與王作榮對談（第九次）。11月20日於緬甸料理店仰光與王曉波餐敘。11月21日聯經隔壁咖啡廳與陳映真喝咖啡。十二點敦化遠東大廳會唐松章。11月25日王院長作榮對談（第十次）。11月26日東京放送高橋政陽到台灣。11月28日若松（日外務省分析官）來新店敝舍訪問。12月2日於中山北路七段「回轉桌」前會虞主任。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開「百年來海峽兩岸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反省」學術研討會。12月3日東吳大學開學術研究會第六場。戴為評論人，評王曉波論文「日據下台灣民族運動及其兩條路線——林獻堂與蔣渭水的比較研究」。12月5日岡本厚、谷口長世到台。在國賓大廳等他們。12月6日總統府車子來國賓接。與岡本厚（岩波『世界』編輯長）谷口長世同去訪問陳水扁，台日雙方由戴國燁做斡旋、調整、連絡，幫忙擬訪問提問的項目，戴只期望陳水扁不要被李登輝牽著鼻子走，與中國大陸建立良好關係，讓台灣的未來在政經安定下繁榮，所以他不做台面人，不具名，以促成好事為快，題目為「我已坐在對話桌的這一邊」，內容項目為現代是「和解」「對話」的時代／「一個中國」的定義／尊重中華民國憲法／軍事演習的事前通告，做釀成信賴氛圍的措置／日本殖民地支配，不愉快但是歷史的一部份／終止核四是自己的信念。登載在《世界》二〇〇一年二月第68號。晚宴於晶華20F。12月8日到福華。見陳（水扁？）見莊銘耀。12月9日福華45亞太發展論壇。12月12日《世界》以傳真送來訪問稿，由戴校對，順順句。12月13日馬永成

2001	
71	
<p>1月1日發燒，到大直診所打點滴，情況改良，回家半夜又發燒。1月2日興寧返日，反對到台大急診的建議，準備再去大直取藥，1月3日再去台大門診，結果情況惡化，1月2日下午到台大急診，做應急處置時已開始神志模糊。1月3日轉入內科病房。1月5日進入加護病房，興宇、興寧自日本趕回。1月9日敗血症休克，與世長辭，時下午五時三十分。</p>	<p>派王超亮司機來新店敝舍取稿回總統府，讓陳水扁過目。下午許瓊丰論文（碩士）審查。12月14日日本史。12月15日（台灣）中部抗日仕紳的思想與行動，記事本上這天寫下的，戴國輝腦子裡去來的是什麼？12月16日大恩館11F擴大院務會議（文大）。12月19日國史館周琇環小姐來取稿（《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中文譯稿）。12月28日在研究室，興寧自日本帶小林《台灣論》來，蔡素貞帶他回甲桂林接了《台灣論》趕去唐湘龍主持的電台與之對談。12月29日文大博一最後一堂課程為「司馬遼太郎史觀與日本戰後史」，這天總結講日本的天皇制，期末報告的題目是「我觀（日本）天皇制與亞洲侵略」，正好小林善紀的《台灣論》經中時特派員介紹到台灣而引起很大的風波，戴帶了7、8本有關報導天皇的雜誌之外，還帶了小林《台灣論》和12月20日在《聯合報》上戴專談該書的資料佐證，評論《台灣論》。下課後由吳嘉陵（文大博一學生）送戴到中山北路七段附近的方家小館，宋欽章夫婦與宋昭儀（大千金）夫婦，戴家（國輝、彩美、興寧）聚餐，宋先生請客歡迎興寧之後，大家慢慢徒步回甲桂林，興寧去辦護照。12月30日與李薰山會於中山北路七段台銀前。12月31日戴家（國輝、彩美、興寧、興夏）與陳封平用餐，晚上戴對大家特別是年輕的三個人講了很多話。</p>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二時林彩美謹識

編按：「戴國輝事記」由戴夫人林彩美執筆，因節省篇幅及便於讀者閱讀之故，裁減為以上的四萬餘字。戴教授一生行誼可分旅日的一九五五年前、滯日期間的五五年至九六年，及九六年返台後三階段，因於年代久遠及記憶的深淺，亦可見大事記內社會動態及個人事蹟的消長情形，戴夫人個人感情亦在其中可見，特此說明。

戴國輝著作、發表及相關評論文章一覽表

西元	歲	單行本（自著、單行本所收）・登載雜誌、報紙、論文、隨筆、書評、演講、座談等
1963	33	11月 糖業在台灣經濟所佔的地位（《今日之中國》第一卷第六號）
1964	34	2月 日本統治と台湾知識人―某助教授の死と再出發の苦しみ（《暖流》5）
1967	37	《中国甘蔗糖業の展開》（アジア經濟調査研究叢書129）アジア經濟研究所 7月 台湾の産業と經濟（《台湾・香港・マカオ》國際情報社）
1968	38	8月 日本人による台湾研究―台湾舊慣調査について（《季刊東亞》4）
1969	39	2月 台湾―特需經濟からの脱却を模索（《エコノミスト》47―8） 7月 台湾―（日本におけるアジア、アフリカ、ラテン、アメリカ研究）（《アジア經濟》10―6・7）
1970	40	3月8日 座談 中国研究者の造反と自己批判（「批判にゆれるアジア研究」波多野／セルダン／戴）（朝日ジャーナル） 5月 「清末台湾の一考察―日本による台湾統治の史的的理解と関連して」（《日本法とアジア》（勸草書房） 6月 台湾經濟の戦後展開と今後（《朝日アジアレビュー》1（2）） 10月20日 岡田讓博士と台湾（《アジア經濟資料月報》12卷10号） 12月15日 国民党の土地政策の歩みの一側面―湯惠蓀教授の追悼を兼ねて（《アジア經濟》12―1）

1972	1971
42	41
<p>1月 中国『社会史論戦』紹介にみられる若干の問題―紹介と研究の間(《アジア経済》13―1)</p> <p>1月1日 石原莞爾と中野正剛 松澤哲成/戴國輝(《現代の眼》13卷1号)</p> <p>2月 《台湾農業の戦後の展開》(《台湾の農業》上(アジア経済研究所))</p> <p>2月 「台湾民報」のこと(《龍溪》1)</p> <p>2月 樺山資紀と水野遵―近代日本と中国(《朝日ジャーナル》14卷5号)</p> <p>2月22日 日本工業俱樂部講演「ニクソン訪中と華僑の動向」</p> <p>3月8日 大阪講演(題不明)</p> <p>3月22日 中国アジア貿易構造研究センター(講演速記録) 東南アジアの華人問題―華僑研究と華僑観を考える</p> <p>4月28日 《論文エコー》「ニクソン訪中と華僑」</p> <p>5月 伊沢修二と後藤新平―近代日本と中国(《朝日ジャーナル》14卷19号)</p> <p>5月 郁達夫訪台の周辺(《中国》102)</p> <p>5月23日 名古屋商工会議所講演「東南アジアの華僑について」</p> <p>6月 華僑観の誤解を解く―「落葉歸根」から「落葉生根」への苦悶と矛盾(《中公経営問題》11―2)</p> <p>6月20日 東洋経済座談会</p>	<p>《日本人との對話》(社会思想社)</p> <p>3月 東南アジアの華僑経済―私の華僑小試論(《アナリスト》17―2)</p> <p>9月11日 書評 尾崎秀樹著《舊植民地文学の研究》(《週刊東洋経済》特大号9―11)</p> <p>10月 對談 やぶにらみの中国(特集・中国人と日本人―どこが似ていてどこが違うか)(《別冊経済評論》―増刊号)</p> <p>10月 台湾略史(《高等教育》23卷10号 社会科資料No.8)(實教出版)</p> <p>11月 對談 「思想方法としての台湾」 戴/新島淳良(《新日本文学》No.292)</p> <p>12月 台湾の詩と眞實―羅福星の生涯(《アジア》6―10)</p>

1974	1973	
<p style="text-align: center;">44</p> <p>「台湾征討」《日中關係の基礎知識》（有斐閣）</p> <p>「日露戰爭以後の台湾統治と抗日運動」《日中關係の基礎知識》（有斐閣）</p> <p>「矢内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台湾》《滿州問題》」《日中關係の基礎知識》（有斐閣）</p> <p>「後藤新平《日本膨張論》」《日中關係の基礎知識》（有斐閣）</p> <p>「吳濁流ほか《夜明け前の台湾》」《日中關係の基礎知識》（有斐閣）</p> <p>2月3日 霧社蜂起と中国革命—漢族系中国人の内なる少数民族問題（上下）（《思想》596、597）</p> <p>3月 「東南アジア華人研究の新視角」（編著）《東南アジア華人社會の研究》上 研究參考資料223（アジア經濟研究所）</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43</p> <p>8月 《華僑の研究》第1集 特別調査No.2（經濟人發展協會 國際資本運動調査会）</p> <p>7月30日 研究会報告「李家莊の變遷」から中国革命における農民問題（農林中金有樂町ビル二階會議室）</p> <p>2月 對談 日本の植民地政策と台湾 戴／尾崎秀樹（《中国語》157）</p> <p>2月 霧社蜂起研究の今日的意味—台湾少数民族が問いかけるもの（《思想》584）</p> <p>《日本人とアジア》（新人物往來社）</p>	<p>7月17日 農林中金講演</p> <p>7月18～19日 名古屋中日新聞講演</p> <p>9月9日 名古屋市講演</p> <p>9月28日 豊田市講演</p> <p>9月29日 座談会 「七億の隣人にとつての日本」（《朝日ジャーナル》）</p> <p>11月13日 徳島講演</p> <p>12月 中国「社会史論戦」と《讀書雜誌》の周辺（《アジア經濟》13—12）</p> <p>12月 細川嘉六と矢内原忠雄—近代日本と中国（《朝日ジャーナル》14卷52号）</p> <p>12月5日 日本外務省講演</p>

	1975
	45
<p>3月26日 書評 宮崎義一著《現代の日本企業を考える》（《エコノミスト》52巻13号）</p> <p>4月 書評 再録《東京新聞》昭和49年1月19日号より 藤村通生著《日清戦争―東アジア近代史の轉換点》（《圖書》296号）</p> <p>6月 「伊沢修二と後藤新平―近代日本と中国」《近代日本と中国》上（朝日新聞社）</p> <p>8月 「細川嘉六と矢内原忠雄―近代日本と中国」《近代日本と中国》下（朝日新聞社）</p> <p>9月 （共著）「9月30日事件前後のインドネシア華人・華僑事情（研究参考資料224）」</p> <p>9月 （編著）《東南アジア華人社会の研究》下（アジア経済研究所）</p> <p>9月 座談 「アジア」論のための前提 青木保／戴（《展望》189号）</p>	<p>「15年戦争―善意と侵略の間」竹内好編《アジア学展開のために》（創樹社）</p> <p>モハメド・アリの「火種」（《展望》193号）</p> <p>1月24日 何が「本名」を答えさせなかつたのか？（《アサヒグラフ》No.2678）</p> <p>2月 華僑から華人へ（於アジア経済研究所第二十一回月例講演会）講演要旨 第七集 アジア経済研究所</p> <p>3月 台湾抗日左派指導者連温卿とその稿本（《史苑》35―2）</p> <p>4月 台湾をめぐる皇民化運動の展開―元皇軍兵士「中村輝夫」の生還から（《展望》196号）</p> <p>4月 日本丸は何處へ往く（《Vision・現代Vision》V.12―No.4）</p> <p>5月 近代台湾と日本―台湾留学生OBの台湾研究（UP31）</p> <p>8月 「華僑」研究における若干の問題（《現代中国》50）</p> <p>8月1日 インドシナ激變と「華僑」問題（《経済評論》24巻8号）</p> <p>12月12日 批評と紹介 安藤彦太郎著《日中関係の視点》（《朝日ジャーナル》Vol.17, No.53）</p>

1979	1978	1977	1976
49	48	47	46
<p>2月 私たちにとっての日本語 (《立教》 No.88)</p> <p>《台湾と台湾人—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求めて》 (研文出版)</p>	<p>《私の日本体験》 (ぎょうせい)</p> <p>《客家之聲》 (編) (日本崇正總會)</p> <p>(校訂) 連溫卿著「日本帝国主義の台湾に於ける土地收奪の過程(1)(2)」 (《史苑》 37-1 [76], 39-1 [78])</p> <p>8月 「わが新聞批判」アジア報道を読む (《世界》 393号)</p> <p>11月 思い出の教師 いまも疼くいまわしい蠻聲 (《子どもと教育》)</p>	<p>3月 無告の民「華僑」—激動する東南アジアの中で (《中央公論》 92-3)</p> <p>3月23日 Great Debate on Japan and Japanese Related to Nation's Loss of Aim (The Japan Times)</p> <p>7月 對談 大学の新生を期待して 永井道雄／戴 (《立教》 No.82)</p> <p>1月31日 「華僑」はなぜ国家をつくったか—シンガポールを中心に、東南アジアの諸問題を考える— (《海外投資事情》 No.67)</p> <p>1月 座談会 東南アジアの心と近代化—アジアの人は怠けものか— 青木保／木田南夫／山川滋／小泉允雄／戴 (《海外市場》 27號303号)</p> <p>《新しいアジアの構圖—芳隣関係創出を求めて》 (社会思想社) (現代教養文庫 939)</p>	<p>《境界人の獨白—アジアの中から》 (龍溪書舎)</p> <p>「日本人が把えた植民地化以前の台湾農業像」 加藤護編《現代日本農業の新展開》 (お茶の水書房)</p> <p>報告「アジアと日本」 戴／アナンタン／中根千枝《歴史と文明の探求(上)》 桑原武夫・中根千枝・加藤秀俊編 (中央公論社)</p> <p>8月27日 批評と紹介 田中宏編著《アジア人との出会い》 (《朝日ジャーナル》)</p> <p>9月 座談会 美味求真と農の復権 神谷慶治／川本彰／戴 (《現代ビジョン》 13卷8号)</p> <p>9月 金メダルの囚人たち—オリソニック雑感— (《経済評論》 25卷10号)</p>

1981	1980
51	50
<p>12月 客家系「華僑」のこと（《国際協力》308号）</p> <p>1月 日本の植民地支配と台湾籍民（資料紹介）（《台湾近現代史研究》3）</p> <p>2月 内側からの「華僑」論―東南アジアを中心に―（《アジアと日本》86号）</p> <p>3月 座談会 中国国籍法制定の意義とその背景―近代国家・国籍・民族・国民・市民とは何か 澤木敬郎／田中宏／戴（《日中経済協会会報》92）</p>	<p>6月 「華僑」の起源と現状（《歴史と地理》No.287）</p> <p>7月 文化接触の場としての大学とその周辺―私の日本体験論から―「文化接触と日本―閉ざされた社会から開かれた社会へ」（79.3.19～21）国際学生セミナー報告書「文化接触と日本」（財）大学セミナー・ハウス発行</p> <p>8月7日 私の研究テーマ 三つのターゲット（《エコノミスト》57巻32号）</p> <p>11月 私の朝鮮体験（《季刊三千里》20号）</p> <p>11月 鼎談 民族と文化―国際社会における日本― 西山千明／神島二郎／戴（《立教》No.91）</p> <p>12月 東南アジア「華僑」資本と国境（《経済セミナー》No.299）</p> <p>《華僑》（研文出版）</p> <p>「客家とは何か」 中川学編《客家論の現代的構圖》（アジア政経学会）</p> <p>2月 講演 華僑―その實像と虚像（79.11.26）（《経團連クラブ会報》2月別冊号）</p> <p>2月 日本の植民地支配と客家（《歴史と地理》No.294）</p> <p>2月 書評 小笠原莊子《旅ころも》（《立教》No.92）</p> <p>5月 親日派と知日派（《月刊NIRA》V.2-No.5）</p> <p>7月 座談会 イスラム・中国・日本の性と家族 板垣雄三／川本彰／戴（《月刊NIRA》V.2-No.7）</p> <p>7月 （この人と一時間）ボヘミアンといわれる華僑が果たした文化経済の足跡―戴國燾氏に聞く（《月刊イニシアテヴ》・中小企業政策研究所発行10巻6号〔103号〕）</p>

- 3月 最近の台湾―第三次国共合作の可能性（《月報明日の九州・山口》No.248）
- 5月21日 「留学生の父」第3世界を透視―穂積五一先生（《毎日新聞》夕刊）
- 6月 《台湾霧社蜂起事件》（社会思想社）
- 8月25日 河本大作と霧社事件（研究ノート）（《朝日新聞》夕刊）
- 10月 座談会 中国社会の今日と明日 エズラFヴォーゲル／吉瑛煥／戴（《日中経済協会会報》No.99）
- 10月 移民の末裔にとつての祖国―アメリカの「日僑」と「華僑」の生きざまを問う（《中央公論》96―13 No.1142）
- 台湾及南支那視察日誌（資料紹介）（《台湾近現代史研究》4）
- 3月 座談会 台湾の現状と第三次国共合作（《中央公論》97―3）
- 5月 台湾現状與國共第三次合作 李嘉／陳鼓應／戴（《七十年代》148期）
- 6月 令我臉紅的四十年前往事（《中華雜誌》第20卷6月号）
- 7月 鼎談 日本と中国の違いを知る―相互理解の可能性は…… 村山孚／長野広生／戴（《日中経済協会会報》No.108）
- 8月 一枚の名刺から―ニードム先生との出逢いを思う（《歴史と地理》No.324）
- 8月27日 インタビュー―中国を知ろうとする文教族はいるのか（「教科書」につまずいた自民党）（《朝日ジャーナル》24巻3号）
- 9月 講演 第3次国共合作の可能性を分析する（2月5日福岡ユネスコ、九州・山口経済連合会共催 第22回現代アジア研究会に於ける講演内容の轉載）（《日中経済協会会報》110）
- 10月 池田敏雄氏追悼記念特集 序・資料紹介（《台湾近現代史研究》4）
- 10月 解題資料紹介《台湾及南支那視察日誌》（《台湾近現代史研究》4）
- 10月 日本への助言―アジアの隣人として（《世界》43号）
- 10月 座談会 分断された民として日本に注文する（《中央公論》97―10）

1984	1983
54	53
<p>12月 フイリピンで考えたこと（《圖書》（岩波書店））</p> <p>1月 座談会 海峽兩岸の現状與統一問題 李嘉／夏之炎／傅朝樞／戴（《中報月刊》第36期）</p> <p>1月 一台湾作家の七十七年―五十年ぶりの來日を機に語る 楊達／聞き手／内村剛介／戴（《文藝》）</p> <p>1月 特稿 「台湾當前局勢與民主統一前景」座談會 陳鼓應／邱垂亮／戴／西倉一喜／田畑光永（《中報月刊》第36期）</p> <p>3月 講演 華僑社会をめぐる諸問題（主催 私立研修福祉社会82.11.12）（《昭和57年度一般研修報告書―国際交流関係―》發行：日本私立大学連盟）</p> <p>5月 アジアからの「地の聲」を聞こう 岩波書店編集部 《これからどうなる 日本・世界・21世紀》（岩波書店）</p> <p>5月10日 〔五四對台湾知識份子的影响〕 《中國時報》（美西版）</p> <p>12月 「中国人にとつての中原と辺境」《民族の世界史5―漢民族と中国社会》（山川出版社）</p> <p>12月 《われらの生涯のなかの中国》 阪谷芳直共編（みすず書房）</p> <p>3月 「台湾人意識」「台湾民族」的虚相與真相 戴國輝／陳映眞（《夏潮論壇》）</p> <p>3月 研究台湾史經驗談 戴國輝コロンビア大学講演（《夏潮論壇》）</p> <p>7月21日 講演 「アジア新時代」―「華僑」サイドから考える（サマーフォーラムイン Kobe'84 經營者セミナー）</p> <p>7月24日 座談会 レーガン・中国・朝鮮半島―安定化を模索する東アジア 曹瑛煥／辻康吾／戴（《エコノミスト》62卷30号257）</p> <p>8月 對談アメリカと香港からみる中国大陆・香港・台湾 吉田實／戴（《日中經濟協会公報》No.132）</p> <p>8月 對談 台湾社會發展與省籍問題 李哲夫／戴國輝（《夏潮論壇》）</p> <p>10月 日本植民地支配與台湾藉民（人與社会）</p>	<p>12月 フイリピンで考えたこと（《圖書》（岩波書店））</p> <p>1月 座談会 海峽兩岸の現状與統一問題 李嘉／夏之炎／傅朝樞／戴（《中報月刊》第36期）</p> <p>1月 一台湾作家の七十七年―五十年ぶりの來日を機に語る 楊達／聞き手／内村剛介／戴（《文藝》）</p> <p>1月 特稿 「台湾當前局勢與民主統一前景」座談會 陳鼓應／邱垂亮／戴／西倉一喜／田畑光永（《中報月刊》第36期）</p> <p>3月 講演 華僑社会をめぐる諸問題（主催 私立研修福祉社会82.11.12）（《昭和57年度一般研修報告書―国際交流関係―》發行：日本私立大学連盟）</p> <p>5月 アジアからの「地の聲」を聞こう 岩波書店編集部 《これからどうなる 日本・世界・21世紀》（岩波書店）</p> <p>5月10日 〔五四對台湾知識份子的影响〕 《中國時報》（美西版）</p> <p>12月 「中国人にとつての中原と辺境」《民族の世界史5―漢民族と中国社会》（山川出版社）</p> <p>12月 《われらの生涯のなかの中国》 阪谷芳直共編（みすず書房）</p> <p>3月 「台湾人意識」「台湾民族」的虚相與真相 戴國輝／陳映眞（《夏潮論壇》）</p> <p>3月 研究台湾史經驗談 戴國輝コロンビア大学講演（《夏潮論壇》）</p> <p>7月21日 講演 「アジア新時代」―「華僑」サイドから考える（サマーフォーラムイン Kobe'84 經營者セミナー）</p> <p>7月24日 座談会 レーガン・中国・朝鮮半島―安定化を模索する東アジア 曹瑛煥／辻康吾／戴（《エコノミスト》62卷30号257）</p> <p>8月 對談アメリカと香港からみる中国大陆・香港・台湾 吉田實／戴（《日中經濟協会公報》No.132）</p> <p>8月 對談 台湾社會發展與省籍問題 李哲夫／戴國輝（《夏潮論壇》）</p> <p>10月 日本植民地支配與台湾藉民（人與社会）</p>

1986	1985
<p>56</p> <p>1月1日 日本とアジア―回顧と展望―（《西原育英ニュース》No.3〔財〕西原育英文化事業團）</p> <p>《台湾総督府警察沿革誌》（復刻企画）（綠蔭書房）</p> <p>11月 《シンポジウム》私の国と日本―異文化接觸を通じて学び考えること―（《立教》No.115）</p> <p>11月2日 昭和60年度幸市民大学講座『日本人』その心と課題（幸文化センター'85.9.28～11.16 主催：川崎市教育委員会）6・私の見た日本・日本人 戴／ジョニー・ベネデイクト</p> <p>10月 《戦後日台関係を生きる》（《世界》480号）</p> <p>座談会 ひとさし指の思想 李恢成／金秀一／大沼保昭／戴／黃美和／田中宏 アジアにたいする戦後責任を考える会（《戦後責任》3號）</p>	<p>55</p> <p>11月 座談会 アジアとともに―いまなぜアジアに目を向けるのか― 小西正捷／野村浩一／戴／梅原弘光／大郷博（《立教》No.111）</p> <p>11月 鼎談 在日・在米の朝鮮人・中国人 曹瑛煥／戴國輝／姜在彦（《季刊三千里》40号）</p> <p>12月 座談会 台湾老社会運動家の思い出と展望（《台湾近現代史研究》5）</p> <p>《中華舊禮俗》張祖基編 橋本萬太郎／戴解題</p> <p>《台湾史研究―回顧と探索》（遠流出版・台北）</p> <p>《談陳火泉、吳濁流和邱永漢的文学》 回國參加楊達葬禮後演講於國聯飯店（《前進》雜誌）</p> <p>3月 台湾史研究をめぐる諸問題（《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5卷2号通10号）</p> <p>4月13日 《猶記當年擁抱時―戴國輝談楊達》（《前進》雜誌）</p> <p>6月 《台湾老運動家の回憶與展望》 戴國輝／若林正文（《文季》11〔台湾〕）</p> <p>6月9日 《東南アジアの中国系住民 居住地への貢献と孤立》（《週刊朝日百科》No.492・《世界の地理》No.86）</p>

	1987
57	
<p>2月 シンポジウム 21世紀への留学生政策の展開をめぐる――大学の考え方と對應――セッションII：報告，セッションIII：パネル討議第五回JAFS夏期研究會集，7月30日～8月1日於：日經連人材開發センタ―富士研修所「第5回JAFS夏期研究會報告書」所収</p> <p>5月 編著《もっと知りたい台湾》（弘文堂）</p> <p>7月 座談会 中国・アジア情勢はいま：――東南アジア・台湾海峡・朝鮮半島と日本――吉田實／若林正丈／戴（《日中經濟協會會報》155）</p> <p>8月25日 自文化・社會現象評析日本大選（《民眾日報》）</p> <p>9月8日 戦前の台湾で生まれはじめられた日本に立ち寄ったまま31年（《毎日新聞》夕刊）</p> <p>11月 探索日本的新嘗試（《中國時報》）</p> <p>12月 日本の友人へのメッセージ―今日の日本・その勘どころ（《思想の科学》No.84）</p> <p>12月 「儒教文化圏論」をめぐる（《世界》）</p> <p>誌上シンポジウム 對談 「齊民要術と東畑先生の思い出」 戴／下河辺淳（月刊《NIRA》V.8―No.12）</p>	<p>1月 儒家思想與日本近代化――澁澤榮一 的個案探討並試論「和魂洋才」與「中體西用」之差異（《孫學》2卷1期（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p> <p>1月 誌上討論 いま中国・革命・思想を検証する 「商業的の中国の近代産業社会への轉機」袴田茂樹／岩田昌征／戴／大室幹雄／内村剛介（《日中經濟協會會報》162）</p> <p>1月 講演（母の会）イデオロギーとしての日本語留学生と私達の歩み28号東京YWCA「留学生と母親運動」</p> <p>2月 （對談・技術と人間27）混沌の時代――アジアと日本 星野芳郎／戴（《グラフィケ―ション》No.29〔通28〕富士ゼロックス發行）</p> <p>2月19日 異文化社会と華僑・華人</p>

第2回「大学と科学」公開シンポジウム—アジア その多様な世界— (87.2.19—20 プレスセンターホール)

《アジアその多様な世界》 発行：シンポジウム《アジア その多様な世界》 事務局

3月 対談 轉換期の国際関係と台湾・アジア 下河辺淳／戴 (《日中経済協会会報》163)

3月 誌上討論 いま中国・革命・思想を検証する(2)「商業的中国の近代産業社会への轉機」 袴田茂樹／岩田昌征／戴／大室幹雄／内村剛介 (《日中経済協会会報》163)

4月 誌上討論 いま中国・革命・思想を検証する(3)「中国人の商業主義とマルクス主義」 内村剛介／岩田昌征／袴田茂樹／戴／大室幹雄 (《日中経済協会会報》164)

4月 丘念台與二・二八前後 訪問／戴 (《人間》)

4月 私之三冊《雨夜譯》《インディアスの破壊についての簡潔な報告》《ユダヤ人問題によせてヘーゲル法哲学批判序説》(圖書44〔岩波文庫創刊60周年記念〕87.5臨増)

5月25日 日・中近代化の比較分析—「和魂洋才」と「中体西用」の分かれ目—(第十三回中国問題研究会)

6月 國際關係變動下の台灣 下河邊淳／戴 (《日本文摘》17〔2卷5期〕日本文摘雜誌社・台北)

8月 各界トップが推す「この本」 リー・クーンチョイ著／花野敏彦訳《南洋華人—国を求めて》(サイマル出版会)《週刊東洋経済》87.8.8/15合併号

8月 國際問題研究シリーズ No.4 (中国問題研究会講演録) 社團法人日本在外企業協会

8月22日〜23日 講演 從日本看台灣社會未來十年的發展—並試論與評估台、日對未來的因應力 (Responsive-ness) 之異同—(於南園)

10月 座談會 台灣・變化の底流は何か 陳映眞／松永正義／戴 (《世界》506号)

10月10日 我觀「中國結」與「台灣結」之爭論—藉心理歷史学 (Psychohistory) 視野的幾點剖析 (「中國結」與「台灣結」研討會論文) (《中國論壇》25卷1期)

10月25日 座談會 突破中國結與台灣結的困境 (《中國論壇》25卷2期)

- 11月13日 座談会 開放と改革——中國は本気で變わる!? 立ち遅れを直視した第13回党大會 陸鏗／吉田實／戴（《朝日ジャーナル》V.29—No.47）
- 12月10日 シンポジウム 21世紀への留学生政策の展開をめぐるⅢ—留学生の日本の大学入学資格と教育上の問題について パネル討議「留学生の大学入試と今後の展望について」 司会：戴 パネリスト：草薙裕・岡田英樹87.7.29（水）セッションⅣ（第7回JAFS夏期研究会87.7.27～29 於：日経連人材開発センター—富士研修所「第7回JAFS夏期研究会報告書」所収 発行：外国人留学生問題研究会（JAFS）
- 12月15日 国際時代の青年の役割（基調講演）85.11/11（月）'85「青年の船」報告書—新しき水平に向けて— 発行：在日本大韓民国青年会中央本部
- 〈儒家思想與日本近代化——澁澤榮一的個案探討，並試論「和魂洋才」與「中體西用」之差異〉 收入正中書局《論語與算盤》附錄。本論文由二論文整合而成①〈儒家思想與日本的近代化——澁澤榮一的個案探討〉（《當代》〔台北〕第六期，一九八六年）②〈「儒教文化圈」論之一考察，「和魂洋才」と「中體西用」の分水目〉（《世界》〔岩波〕一九八六年）
- 1月 「一中国人の見た日本国際化」講演会要旨（於：高知商工会館，87.11.10）JETRO《高知貿易情報》No.236/87.12/88.1月号發行：ジェットロ高知貿易情報センター
- 1月16日 東京学者專家座談会「蔣経国逝世帶來的冲撃与影響」 卓南生／戴国輝／若林正文／吉田實 聯合早報（シンガポール）
- 1月18日 我所知道的李登輝先生（《聯合報》）
- 2月（インタビュー）健康的アジア認識を育むには、人間性をとりもどすアジアへの「旅」を！（インタビューアー：高山薫）村井吉敬／城戸一夫／越田稜編著《アジアと私たち》Ⅲアジアから見た若者のアジア認識（三一書房）

- 3月20日 国際化への多元的接近—市民とスクラムを組ながら—(立教大学／豊島區教育委員會「大学公開講座」87.12.12 戴／北山晴一／村瀬信也／ウイリアムス、R・O・D) 戴「定住中國人が語る」(抜粋掲載「ひろば—豊島の社会教育」44号 豊島區教育委員會社会教育課)
- 4月 李登輝總統下の台湾—台湾、何處へ行く(《日本貿易会月報》No.409)
- 4月 日本接觸系列講座：日本爲何要奪取台灣？ 高陽／戴／尹章義 日本視台灣爲寶島(戴) (《日本文摘》27〔3卷3期〕)
- (話題二)台北與東京の都市文化觀察 戴／策劃 同上
- 6月 《圖說世界文化地理大百科 中國》編訳：戴／小島晋治／阪谷芳直(朝倉書店)
- 6月11日 歴史與社會新探—阿爾薩斯、魁北克的比較研究來看台灣問題(《台灣史研究會訊》第五期)
- 7月24日 元日本軍・台湾人將兵遺族の疼き(《わだつみのこえ》No.86)
- 10月20日 《台湾—人間・歴史・心性—》岩波新書(新赤版41)(岩波書店)
- 11月1日 戴著への書評：《台湾—歴史・人間・心性》(岩波新書)・《産経新聞》(火)近畿大古屋奎二
- 11月4日 「やはり王權神授説の国」から「當然の心配」まで—知日派外国人が見つめる天皇ご病氣と自肅ニッポン—《週刊朝日》
- 11月7日 戴著への書評：《高知新聞》(日)
- 11月20日 戴著への書評：《静岡新聞》(日)
- 11月21日 戴著への書評：《讀売新聞》(月)朝刊、《朝日新聞》(月)西川潤、熊本《日日新聞》(月)、《新潟日報》(月)
- 11月25日 戴著への書評：《週刊朝日》日号佐藤忠男
- 11月28日 戴著への書評：毎日新聞(月)朝刊
- 12月 紹介 謝新發著《誰にも書けなかつた日本人》(《中国研究月報》V.42 No.12〔No.490〕)
- 12月 日本の天皇裕仁の位置づけに對する中国人の觀點(《中國時報》88.9.25—コメント)アジア民眾法廷准備会編「海外紙誌に見る天皇報道1988.9.21—11.4」(凱風社)

- 12月5日 戴著への書評：日経新聞（月）夕刊
- 12月6日 中国大陸「走馬看花」——歴史の深淵をのぞき見て（《毎日新聞》夕刊）
- 1月20日 皇民化に反発した植民地台湾（「10氏が語るわたしの天皇感覚」）（《朝日ジャーナル》V.31—No.3）
- 1月31日 送走昭和的感想（《海外學人》198・台北）
- 2月23日 天皇在日人心に仍有尊貴地位對日本政局有微妙的影響（《聯合報》）
- 2月23日 「變わる台湾が告げるもの」於：南日本政経懇話会（鹿児島市・'89.2.22） 関連記事：南日本新聞 89.2.23（木）
- 2月25日 戴著への書評：《週刊東洋経済》（四八四三号）
- 3月7日 戴著への書評：《エコノミスト》（評：許世楷）
- 4月 Ed. by Hung-chao Tai "Confucian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oriental alternative?" 《儒家文化與東亞經濟》・(Kuo-hui Tai: Chap. 4) Confucianism and Japanese Modernization: A Study of Shibusawa Eiichi.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Press (U. S. A.)
- 4月1日 中国大陸——時代と歴史からの考察——自己變革による「食えない社会主義」からの脱出を目ざす——《新国策》56卷7号（通120号）財團法人国策研究会
- 5月 戴著への書評：《歴史と地理》No.405評：越田稜
- 8月 台湾經營にみる近代史の斷面 談：戴／聞き手：松本健一（《知識》92号）
- 8月16～18日 財團法人時報文教基金會主辦 中國民主的前途研討會 日本的鏡子 議題5「明治維新與日本的民主政治發展——立足台灣解讀中國『近代』座標軸之一個嘗試——」（中國時報大樓大禮堂）
- 9月 《台灣總體相——人間・歴史・心性》（本土與世界4）戴著／魏廷朝譯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9月 日本にて同胞中国人の生きざまを掉む——中国史のなかの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三省堂ぶつくれつ》No.82）

- 9月5日 天安門ショ——ビジネスの落とし穴 (《Aera》(アエラ) No.38 朝日新聞社)
- 11月 「台湾人元日本軍將兵の疼き」 《今こそ問う天皇制——幾千万戦争犠牲者の聲を聴きつつ》所収(わだつみ会編筑摩書房)
- 11月 座談会 「留学生問題と私立大学——国際性を求められている日本の大学」 司会・青柳清孝 戴／孫福弘／安川 和 (《大学時報》38巻2期)
- 11月 中国は何處へ——『岩波講座 現代中国』に期待する—— (《圖書》485 (岩波書店))
- 11月24日 政治狂熱與政治悲劇——台獨：「一個美麗的錯誤」 (聯合早報)
- 12月 猶太德國人史學家看——客家渡台之原委 (《漢聲》23)
- 12月 「台湾からみた『昭和』」 於：昭和史講座戦争を語りつぐ——語られなかった「昭和」——6月16日(金)立川市中央公民館 (「戦争を語りつぐ89」戦争を語りつぐ89」実行委員会編 立川市中央公民館發行)
- 12月2日 書評 矢吹晋著《文化大革命》(《週刊東洋経済》)
- 1月 「重治先生の優しさと厳しさ」 《追想松本重治》(《財》国際文化会館《追想松本重治》刊行委員会編・發行)
- 1月 テニスをめぐる百態 Court Side (コートサイド・ミタカ・ファミリールコートニュース) No.35
發行：三鷹グランドテニス 製作：主婦の友出版サービスセンター
- 2月 序 葉芸芸編《證言二・二八》(人間出版社・台北)
- 2月25日 (口述) 鑑往知人來——二・二八事件目撃者言 (《聯合報》)
- 2月27日 (口述) 道歉的政治學——二・二八の善後抉擇 (《自由時報》)
- 3月6日 書評 戸張東夫著《台湾の改革派》(《エコノミスト》〔68巻9号〕)

- 4月 第2回「日本文化を論ずる会」講演録——「アジアと日本」私の日本体験からのアプローチ 編・発行：富士ゼロックス・小林節太郎記念基金（講演・1990.2.3経団連会館にて 主催・富士ゼロックス・小林節太郎記念基金）
- 5月 監修 《漫画台湾歴史故事 台湾の歴史》 9：日據軍事統治的時代，10：日據殖民経済的時代 11：日據皇民の時代（遠流出版公司・台北）
- 5月7日 （譯註）《拯救蒋介石的日本軍官團》（小笠原清著）（《首都早報》）
- 10月2日 （コメント）客家から一言《日経》90.6.4《Monday Nikkei-Top Middle 欄 客家（ハッカ）「東洋のユダヤ人」》「祝賀与期待——爲中國時報四十周年社慶而寫」（《中國時報》）
- 11月 《台湾，いざこへ行く!?——診断と予見》（研文選書45）研文出版
- 11月 「広辭苑」と私——それはミスプリントではありません（《圖書》49号）
- 1月1日 〈コラム〉あの日私は……（《三省堂ぶつくれつと》）
- 2月15日 戴著への書評：《台湾，いざこへ行く!?》（研文出版）・《朝日ジャーナル》（V.33—No.6）。
- 3月 「シンポジウム・さまざまな国際交流を求めて：3 パネル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パネリスト 本間長世・戴喜多村和之 コーディネーター 山下彰一，89.10.7 広島全日空ホテル）所収《留学体験をどう生かすか》（シンポジウム「国際交流と留學生」の記録1）第II章（財）熊平獎學會（広島）。「シンポジウム・留學生とともに日本語を考える：3 パネル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パネリスト 外山滋比古・戴・奥田邦男 コーディネーター 粕谷一希 90.11.10 広島全日空ホテル）所収《留学体験をどう生かすか》（シンポジウム「国際交流と留學生」の記録2）第III章（財）熊平獎學會（広島）
- 7月 編・著《もつと知りたい華僑》（弘文堂）
- 12月14日〜20日（中国大陸）二次大戰後の惨勝狂想曲（《刊周時報》355）
- 12月 回首「二・二八」戴・葉芸芸（《中國論壇》16期37〔32卷5期〕）

1994	1993	1992
64	63	62
<p>3月 三民主義新釋小試論 發表於「第三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國父紀念館)</p> <p>5月 《台灣結與中國結——舉丸理論與自立・共生的構圖》(本土與世界13・遠流出版公司)</p>	<p>1月 創刊の言葉にかえて(《東洋史學論集》創刊号)(立教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史學専攻東洋史)</p> <p>3月1日 建構命運共同體共識台灣最佳選擇(《聯合報》)</p> <p>3月25日 ワールド93「動き出した台湾」(《山陽新聞》)</p> <p>8月 (戴桑)存在和全民自由意思的民主社會 正中書局主編《存在・希望・發展——李登輝先生「生命共同體——治國理念」(台北正中書局)</p> <p>8月2日〜6日 經濟發展与人才的均衡、合理性分配——日本、台灣、大陸的比較考察——(第三屆《海峽兩岸》研討會論文(寧波))</p> <p>10月 留學生之父 穗積先生は永遠に(月刊《アジアの友》319)</p> <p>12月 《史苑》の窓「ふたりの黄興」(《史苑》54—1)</p>	<p>戴／葉芸芸著《愛憎二・二八：神話與史實：解開歷史之謎》(本土與世界12)(遠流出版公司・台北)</p> <p>「台灣與現代中国」 黃仁宇ほか共著《現代中国的歷程》(華視文化公司・台北)</p> <p>4月19日〜25日 名人同學會35 從〇〇〇到二・二八(《刊周時報》738)</p> <p>(推薦文)岩波講座「近代日本と植民地」(パンフレット)</p> <p>5月9日〜10日 「自黄克強、一歐在日生活一瞥談起」(黃興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p> <p>9月 アジアの中の日本——「脱亞論」と「大アジア主義論」を重ねて讀み直し、再考したら!!(《三省堂ぶつくれっと》100号記念特別号：日本の個性 21世への展望)</p> <p>10月 台獨分析與化解之道——戴國輝教授對談記實(《國是評論》第4期)</p> <p>10月20日 講演 《台灣的歷史與現狀》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p> <p>11月 押しつけられた近代を問う日々(《思想の科學》158号)</p>

1996	1995
66	65
<p>5月 《台湾という名のヤヌス——静かなる革命への道》（三省堂）</p> <p>1月25日 台湾の近百年と日本——私的体験からのアプローチ（RUM講演会）（《チャペルニュース》440号）</p> <p>12月7日 兩岸應回到自立與共生的原點——訪立教大學教授戴國輝（《中文導報》114）</p> <p>11月 座談会 外国人が見た日本の大学教育（《大学時報》第44巻24号）</p> <p>10月 ヤヌス——二つの顔をもつ台湾（《歴史学研究》No.676）</p> <p>9月29日 講演会 台湾海峽兩岸三地（台湾、中国、香港、マカオ）をめぐる現状と展望（於第49回現代アジア研究会・共催福岡ユネスコ協会）月刊あすの九州・山口第42号（講演要旨掲載）</p> <p>9月 「歴史の中の寫眞、寫眞の中の歴史」 林えいたい編《寫眞記錄「台湾植民地統治史」山地原住民と霧社事件・高砂義勇軍》（梓書院）</p> <p>7月12日〜13日 台湾の百年（《東京新聞》夕刊〔上〕'95.7.12〔下〕'95.7.13）</p> <p>6月 「吉野作造と蔡培火」《吉野作造撰集》第9巻月報2（岩波書店）</p> <p>5月 重回歴史現場 一八九五日軍侵台圖紀——台湾民主國抗日的實錄（社會人文61）</p> <p>5月 台湾——静かなる革命から政治の季節へ（《This is 讀賣》）</p>	<p>6月8日〜10日 （對談記事）後非情時代の預告 戴 vs. 許信良（《中國時報》）</p> <p>12月4日 李總統に改革を託す（《讀売新聞》）</p> <p>12月20日 《私見・直言》二分法的な台湾認識から脱皮を（《毎日新聞》）</p> <p>2月 華僑・華人經濟パワーの新しい鼓動（《季刊アジアフォーラム》75）</p> <p>2月5日 若干問題有待澄清（《聯合報》）及《世界日報》</p> <p>3月1日 道歉之外還須做些什麼（《中國時報》）</p> <p>3月11日 心繫寶島始終如一（《中國時報》）</p> <p>4月 歷史解釋權・二二八・台灣人原罪論 訪問戴國輝教授（《中國傑出民主人士評獎報導撰輯》一九九一—一九九二）</p> <p>四 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p>

1997	1998	1999	2000
67	68	69	70
<p>1月28日 〈二八碑文詳載史實可昭炯戒〉（《中央日報》）</p> <p>7月1日 〈切勿幻想利用美日力量出頭天〉（《聯合報》）</p>	<p>2月15日 〈「民俗台灣」與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建構〉（《聯合報》）</p> <p>4月 序 陳信德《現代日本語實用語法》（人間出版社·台北）</p> <p>6月 講演 〈台灣史的微觀與宏觀〉（《國史館館刊》復刊第二十四期）</p> <p>9月28日 〈新歷史的設想與建構〉（《中國歷史學會會訊》第61期）</p> <p>12月21日 〈試論高砂義勇隊在日據時期台灣史的定位〉 發表於「回歸正義的起點——台灣高砂義勇隊歷史回顧研討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與山海文化雜誌社主辦）</p>	<p>5月16日 講演 〈我所認識的丘念台先生〉 於逢甲大學（丘逢甲、丘念台父子及其時代學術研討會）</p> <p>6月 〈從奈伊博士的戰略思考，考察東北亞二大火藥庫之未來〉（由自由時報與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主辦之「亞細亞安全保障與兩岸關係」研討會的專題演講翻譯而成）</p> <p>9月17日～18日 〈旅日時台灣史料及資料的蒐集與運用〉 原發表於「台灣史料的蒐集與運用學術討論會」，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主辦，10月23日第二次修訂稿刊於《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21期</p> <p>11月 初版《台灣史探微——現實與史實的相互往還》（南天書局）</p>	<p>1月16日 〈大魏！你為何要忙著先走！〉（《魏廷朝紀念特輯》）</p> <p>1月25日～28日 講演 〈司馬遼太郎史觀對東北亞情勢影響之淺析〉 「五十年來香港、中國與亞洲」學術研討會 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主辦 於香港</p> <p>5月20日 序 《葉榮鐘全集》</p> <p>8月 〈台灣新時代的開始〉（《世界》〔日本岩波〕第678期）</p> <p>10月 初版《台灣近百年史的曲折路——「寧靜革命」的來龍去脈》（南天書局）</p> <p>12月3日 評王曉波〈日據下台灣民族運動及其兩條路線〉 東吳大學主辦「百年來海峽兩岸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反省」學術研討會</p>

2001

71

2月

初版《愛憎李登輝——戴國煇與王作榮對話錄》
(天下文化)